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梦溪笔谈

 **E-BOOK**
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

自 志

翁年三十许时，尝梦至一处，登小山，花木如覆锦，山之下有水，澄澈极目，而乔木翳其上。梦中乐之，将谋居焉。自尔岁一再或三四梦至其处，习之如平生之游。后十余年，翁谪守宣城，有道人无外，谓京口山川之胜，邑之人有圃求售者，及翁以钱三十万得之，然未知圃之何在。又后六年，翁坐边议谪废，乃庐于浚阳之熨斗洞，为庐山之游以终身焉。元祐元年，道京口，登道人所量之圃，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翁叹曰：“吾缘在是矣。”于是弃浚阳之居，筑室于京口之陲。巨木蓊然，水出峡中，停萦杳缭，环地之一偏者，目之梦溪。溪之上耸为邱，千木之花缘焉者，百花堆也。腹堆而庐其间者，翁之栖也。其西荫于花竹之间，翁之所憩壳轩也。轩之瞰，有阁俯于阡陌，巨木百寻拱其上者，花堆之阁也。据堆之崩，集茅以舍者，岸老之堂也。背堂而俯于梦溪之颜者，苍峡之亭也。西花堆，有竹万个，环以激波者，竹坞也。度竹而南，介途滨河，锐而垣者，杏簿也。竹间之可燕者，萧萧堂也。荫竹之南，轩于水濫者，深斋也。封高而缔，可以眺者，远亭也。居在城邑而荒芜，古木与豕鹿杂处。客有至者，皆频额而去。而翁独乐焉，渔于泉，舫于渊，俯仰于茂木美荫之间。所慕于古人者，陶潜、白居易、李约，谓之“三悦”，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居四年，而翁病；涉岁而益羸，滨槁木矣。岂翁将蜕于此乎？（《嘉定镇江志》卷十一引）

【今译】

老头我 30 来岁时，曾在梦中到了一个地方，登上小山，花草树木如同覆盖着织锦一样，山下面有水，清澈得能看看到底，而它的上方有高大的树木遮蔽着。我在梦中喜欢这个地方，想要住到这里。从那年以来一两次或三四次做梦到了那个地方，熟悉得好像平生游历过一样。过了十多年，老头我被贬到宣城做太守，那里有个道人无外，介绍京口山河的美景，说县里有人寻访愿买下一块园地的人。到老头我用 30 万贯钱买下，却又不知道那园子在什么地方。又过了 6 年，老头我因商议边境战守的事遭罪被贬职，就在浚阳的熨斗洞建了一座房屋，打算在庐山作终身游逛。元祐元年，我到京口，登上道人准备的那个园子，仿佛就是梦中游历的地方。老头我感叹道：“我的缘份就在这儿了。”于是放弃了浚阳的房屋，在京口的边缘盖了住所。这里高大的树木郁郁葱葱，水从峡谷中流出，回旋缭绕，围着那地方的一边，称它为梦溪。溪上高耸的地方是小山，许多开着花的树围在那里，是百花堆。百花堆的中央建的那房子，就是老头我栖身的地方。它的西边被花、竹遮盖的那一处，是老头我休息的壳轩。在轩上望去，可以看到一座小楼伏在田间小路边，高达百寻的大树在上空嗡嗡作响，是花堆阁。靠着花堆崩塌的地方，铺着茅草的房子，是岸老堂。背对这堂而伏在梦溪前面的，是苍峡亭。西花堆有许多竹子，四周水波激荡，是竹坞。越过竹林往南，隔着道路靠着河，有低矮围墙的地方，是杏簿。竹林中可以娱乐的地方，是萧萧堂。竹林遮蔽的南边，在水边有长廊的，是深斋。又高大又坚固的土堆上，可以远眺的处所，是远亭。住在这城中却很荒凉，古树与野兽混在一起。到过这里的客人，都皱着眉头走了。但老头我偏偏喜爱呆在这里，在泉边钓鱼，在潭上划船，在这茂密的林木美好的树荫之中沉思默想。我仰慕的古人，是陶潜、白居易和李白，这叫做“三悦”，在心中与他们诗文赠答。我眼睛看到的，是琴、棋、禅、笔墨、丹青、茶、吟诗、

叙谈、酒，这叫做“九客”。住了4年，而老头我却病了；过了一年，更加虚弱，接近朽木了。难道老头我要在这里脱一层皮吗？

自序

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噓，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今译】

我回到山林田野，深居简出不再与朋友往来，想起平日里与客人谈论的事情，不时拿起笔来记下一件，就像同客人当面交谈似的，静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我交谈的对象，只是笔砚罢了，所以叫做《笔谈》。朝廷的决策、国家的大事，以及涉及宫廷官署的事情，我都不敢私自记述。至于关系到当今士大夫毁誉的事，即使是好的方面也不想写它，并非只是不说别人的缺点罢了。我记下来的只是山野间树荫下，随意谈笑，不幸涉到别人的利害的事，一直到街谈巷议，无所不有。也有从传闻听来的情况，其中不一定没有缺漏错误。把这一些当作一种言论就太算不了什么，就当我对于著书立说的事没什么用意也就可以了。

前 言

《梦溪笔谈》，北宋沈括著。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父亲沈周，曾先后在泉州、开封、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等地做官。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沈括家中藏书很多，他又从小好学，在母亲的指导下，年轻时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他也曾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增长了见闻。沈括24岁担任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县令的助手），并曾代理县令，开始了政治生涯。这时，他主持治沭工程，开百渠九堰，开辟良田7000顷。仁宗嘉祐八年（1063）他33岁考中进士之前，一直担任一些县级的官职。

中进士后，沈括先是做扬州司理参军，后来被推荐到京城编校昭文馆的书籍，又参与详定浑天仪。两年后补为昭文馆校勘。他因此而阅读了很多皇家藏书。就在这时，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也被召回京城。沈括同王安石结交较早，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在同王安石的接触中，他受到了变法革新思想的影响，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变法革新服务，并帮助王安石规划新法。他后来又被王安石推荐去视察两浙的农田水利和差役等，调查新法实施的情况。在浙东察访时，他观察了雁荡山的几座山峰。

神宗熙宁七年（1074），44岁的沈括调任右正言、司天秋官正，提升知制造。他不但负责司天监的工作，而且兼神宗的侍从官。随即又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并提举义勇保甲。察访期间曾考察太行山，发现海陆变迁的迹象。后又兼判军器监，提高了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第二年担任回谢使出使契丹，经过据理力争，成功地处理好了边界问题，胜利完成了任务。他还利用这一机会，详细考察了契丹的山川险要、气象风俗、生物情况。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王安石变法失败，沈括也被诬劾，免去权三司使，先后任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延川（今陕西延安市）等的知州。在延州时，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任职期间，他采取措施加强战备，训练民兵，补充亲军，改进军队供应，加强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团结，又争取了西夏统治集团的投诚。军务之暇，研究了古赫连城的建筑，通过考察出土的化石来推究当地古代气候，还考察了延安附近的石油储藏。

因边防有功，沈括52岁时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但不久因西夏攻陷永乐城（今宁夏银川市附近），以“措置乖方”的罪名被贬到均州（今湖北均县）等地任团练副使。在此期间，他编成了《天下州县图》，被特许赴京进呈。哲宗元祐三年（1088），沈括被允许任意居住，就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梦溪园，直至65岁去世。在他生活的最后8年中，写成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以及《良方》、《忘怀录》等书，沈括博学多才，著述很多，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共有22种155卷。

《梦溪笔谈》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杂谈式笔记，被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全书26卷，加上《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共30卷，600余条，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气象、数学、地理与制图、地质与矿物、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建筑、工程与冶金、农艺、灌溉与水利等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涉及人类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和音乐等方面；此外，还有关于朝廷与

官员生活、法律与警务、军事、占卜与方术、杂闻与轶事等内容。

在天文与历法方面，他坚持科学认识，用简单的仪器形象地演示了月亮盈亏和日食、月食的基本原理，解释了月亮发光和月食产生的原因。他连续3个月观察北极星的位置，并把观察记录绘制成200多幅图。在长期观察研究的基础上，他修改了历法，用《十二气历》代替旧历。这种历法有利于农事的安排，很适合人们的需要。现在英国用于农业统计的《肖泊伯历》，与沈括的历法相同，但比沈括晚了900年。

在数学方面，他也有杰出的成就，如“隙积术”和“会圆术”就是。前者是一个解决垛积术的问题，即高阶等差阶求和的问题；后者是求弓形的底和弓形弧的近似公式。它们使我国古代数学研究呈现出新的飞跃，为南宋数学家杨辉的“垛积术”研究和元代郭守敬创制《授时历》奠定了基础。

在物理学方面，他发现了磁偏角。这比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时的观察结果早了400多年。通过亲自观察和实验，他对针孔成像、凹凸镜聚焦成像、凹凸镜的缩小和放大作用以及声的共振等等，都有所认识和发现。

在地学方面，他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资料。如对雁荡山特殊地貌的考察，就与现代地质学上的测量结果相吻合；从太行山麓含有大量海生动物化石，提出了海陆变迁的论断，正确解释了华北平原的成因。这种认识比意大利的达·芬奇早400来年。

在矿物方面，他曾考察过石油的开采利用情况，创制了质地优良的“延川石液”墨。他把油液命名为“石油”，这一科学命名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除此以外，《梦溪笔谈》还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科学技术人员与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新成就，如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水工高超关于分节压埽堵住决堤的方法、河北磁州的炼钢工艺、我国航运技术史上的重大革新——淮南漕渠修建的复闸、苏州昆山用围堤法筑堤等等，都很详细。沈括正确认识下层人民的智慧，热情赞扬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光辉业绩，充分肯定他们的创造力，是值得称道的。

在文学、艺术方面，沈括多才多艺，造诣精深。对许多文艺现象，他都能考究源流，审慎分析，提出看法，有的对后人深入研究有一定启发。

《梦溪笔谈》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政治腐败、阶级斗争、经济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反映；对一些勤政忧民的名臣给予了肯定。这些内容，有的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同时也表现出沈括思想的进步性。

从全书可以看出，沈括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的伟大科学家。他的这一著作具有辉煌的成就，今天仍然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梦溪笔谈》也表现了他对一些事物的不正确的观点，反映了他的某种偏见，这都需要读者仔细鉴别、分析。我们以胡道静《新校正 梦溪笔谈》为底本，根据元大德刻本和《丛书集成》订正进行翻译。邀我系同事樊凌云女士译卷十四至卷二十六，我译卷一至卷十三。《补笔谈》和《续笔谈》樊凌云译的多一些，我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对樊译在字句上略作润色。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又都有教学任务，有的地方未能仔细斟酌、不妥之处。甚至错误恐难避免，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刘伯严

1996年秋于长沙

梦溪笔谈

卷一 故事一

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未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以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顶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于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谓“正祠”。

皇上亲自祭把天地神灵，祭文中都说“恭敬地献上每年的祭品”。先到景灵宫，叫做“朝献”；接着到太庙，叫做“朝飨”；最后才到南郊举行祭祀。我在编定祭祀制度时，曾参加讨论，老是怀疑它的次序，如果前面的为尊贵，那么祭天地就不应该在祭祖宗之后；如果后面的为尊贵，那么景灵宫就不应该在太庙的前面。探究这种次序的由来，大概也是有根据的。按照唐朝的老规矩，大凡祭祀上天，就都要预先派使者向各路伸灵祭告，只有太清宫、太庙就由皇帝亲自去，那些祭文中的祝词都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祭祀，不敢不禀告”。到宫庙祭祀叫做“奏告”，到别的地方叫做“祭告”。只有在南郊祭祀，才是“正祠”。到天宝九年，唐玄宗才颁布诏令说：“‘告’是上对下的用语，今后太清宫应该叫‘朝献’，太庙叫‘朝飨’。”从这时起就不用“奏告”的说法，祭文中都叫“正祠”了。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篋”；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篋”。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正式朝会听政的处所的正座，是香木制成的，加上贴金的装饰，四只脚，椭圆形的角，它的前部略为后缩，用藤条编好盖上。每逢皇帝外出巡视，就派一个老太监坐在马上抱着它，叫做“驾头”。车后弯曲的篷叫做“篋”，两把扇子把它夹在当中，统称为“扇篋”，都绣了花纹，也有熔化金丝的，就是古时候的“华盖”。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

唐朝的翰林院在皇宫中，是皇帝闲居的地方，玉堂殿、承明殿、金銮殿都在那里。充当侍候的人，从学士以下，列入名册的工匠、技艺一类的官员，都称为“翰林”，像如今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一样。唯有翰林茶酒司只称为“翰林司”，大概是依据不完整的文件。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宜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

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唐朝的制度，从宰相往下，刚任命时都没有召见的礼节，只有学士才被召见，大概因为学士院在皇宫中。没有太监宣布召见就无缘进去，所以院门上又另设一道门，也是从那儿通往内官的。另外，学士院的北门，正对着浴室的南边，便于听皇帝召见。现在的学士刚被任命时，从东华门进去，到左承天门下马等候命令，院吏从左承天门双双带领到阁门，这也是沿袭唐朝的旧制度。唐朝召见学士是从东门进去，那时学士院在西边边门，因此从翰林院东门去应召，不是像现在这样走东华门。至于像拉门铃的规矩，也是因为皇宫中，即使是学士院吏，也得停在玉堂殿门外，那它的严密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学士院在宫外，同别的官署没有什么不同，也没了门铃拉绳，都是空摆着老样子罢了。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燃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学士院玉堂，宋太宗曾经驾临过，到现在只有学士在每月初一才允许端坐在那里，其他日子都不敢单独坐着。过去的规矩是，堂中设置了视草台，每当草拟诏令时，学士就穿戴整齐依台坐下。如今不再这样，只保存了一个空台罢了。玉堂东边承旨阁子的窗格上有火烧过的痕迹，那是宋太宗曾在夜间驾临玉堂，苏易简任学士，已经睡了，急忙起来，没有蜡烛照着穿衣戴帽，宫女便从窗格中伸过烛火照着他。到现在也没有想过要更换，把它作为玉堂的一件趣事。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量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

东西头供奉官，原本是唐朝随从官的名称。从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后，皇帝大多住在大明宫，另外设置随从官，叫做东头供奉官，西头内宫原有的官员也不废除，就叫做西头供奉官。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唐朝的制度，两省供奉官东西相对站立，叫做“蛾眉班”。本朝初年，供奉官的排列在文武百官的前面横列。王溥免去宰相，做东宫一品官，排列在供奉班的后面，就让供奉班照旧分开站立。庆历年间，贾昌朝担任中丞，认为东西排列对拜是不合礼节的，又让他们横排。到现在，开始排班时分开站立，文武百官排列好后才调转行列横排，参拜完后才分开站立，百官退朝后才退出。这是综合了过去的制度。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蹀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筒，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过去的制度对于服饰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相沿承袭形成惯例。例如学士舍人穿的鞋、拜

见丞相、往来用一般的公文、上台阶、骑马之类，都用过去的规矩。近年来多用靴和笏板。章子厚担任学士时，就这些事论述，现在就已成为明文规定了。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鞞靴，有蹠蹠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鞞，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蹠蹠，盖欲佩带弓箭、蹠蹠、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蹠蹠，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蹠蹠，如马之鞞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褻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中原一带的衣帽服饰，自从北齐以来，就全部采用胡人的服装。窄衣袖、红绿相配的短衣、长筒皮靴、有挂环的皮带，都是胡人的服饰。窄衣袖有利于骑马射箭，短衣、长筒靴都便于在草地走路。胡人喜欢茂盛的草，经常躺卧其中，我出使北方时都见到过这种情形，即使君主居住也在深草之中。我到胡人朝廷时，刚下过雨，走过草丛衣裤都浸湿了，只有胡人一点都没有沾湿。皮带上所垂下的小挂环，大概是用来佩带刀剑、手巾、算袋、磨刀石一类的东西。以后虽然去掉了挂环的饰品，但还保存着那个环，环是用来穿挂附属物的，像牛马股上的皮带，也就是现在皮带上的装饰物。天子必定以13个环为度，唐代武德、贞观年间还是这样。从开元以后，虽然还沿用旧习俗，但规矩渐渐宽松了，然而皮带上的钩还是穿过皮带上的孔。当今朝代又在腰带上加了顺折，是用来显示主人的纹饰的。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中”。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颌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颌下，两带遂为虚设。

幞头又叫“四脚”，就是四条带子。两条带子系在脑后垂下来，两条带子反上去系在头上，使它曲折附着在头顶，所以也叫“折上巾”。唐代的制度规定，只有君主才可以用硬脚幞头；晚唐时方镇专权，才超越本分用硬脚幞头。当今朝代的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共5种，只有直脚幞头是贵贱的人普遍使用的。此外，百姓所戴的头巾，唐代人也叫“四脚”，那是因为两条带子系在脑后，两条带子系在下巴底下，取它干活时不会脱落。无事时就把两条带子反系在头顶上。现在的人不再把带子系在下巴底下了，那两条带子就成了摆设。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唐朝中书省管书写公文的事叫“堂帖子”。我曾见过唐朝人的堂帖，宰相签署，格式同现在呈报的“堂札子”一样。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密院劄子问宣头所起。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堂语诏，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

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劄子。但中书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劄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

我到史馆当检讨时，枢密院札子询问宣头的由来。我考查了唐朝的旧制度，中书舍人掌管诏书诰命，都要写成四份，其中一份是底本，一份是宣。这个“宣”说的是对外颁布，没有把它作为诏书的名称。晚唐时枢密使从皇宫中接受圣旨，出来交给中书省，就称为“宣”。中书接到诏令后，抄录在簿册上，叫做“宣底”。如今史馆中还有过去的《宣底》2卷，与现在的《圣语簿》一样。后梁初年设立崇政院，专门执行机密命令。到后唐庄宗时恢复枢密使的职务，派郭崇韬、安重诲担任，开始分别兼任政事，不经由中书省直接下达的诏令称为“宣”，比如中书的敕令；小事就颁布头子、草拟堂帖。到现在枢密院还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也用札子。不过中书札子，宰相签署在上，副相和参政依次向下；枢密院的札子，枢密院的长官签署在下面，副职以下依次向上。以此作为区别。头子只是给驿马之类使用。

百官子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唱，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宗，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则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文武百官在中书省拜见宰相时，九卿以下的官员，等中书省的官吏高声叫一出“屈”时，就快步走进去。宰相作揖并进茶时，都高声赞颂，叫做“屈揖”。待制以上官员进见，就说“请某官”，不再屈揖，到退下时仍然进茶水。都在宰相席位的南面横向摆设百官的座位，上朝时就坐，京官以下都站立。后殿带领臣属时，对待制以上的官员，要宣布名字叩拜挥手；对普通官员只引导叩拜，不宣布名字，不挥手顿足。中书省对高贵官员就减省礼仪，表示与他同样高贵；在皇帝面前对低级官员就减省礼仪，这是礼仪衰微了。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阶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

唐朝的制度，副官、侍从被封官就要向殿门谢恩，现今三司副使以上被封官，就在殿前台阶上跪拜舞动，其他官员在台阶下叩拜，但不舞动。这也是沿袭了殿门谢恩的老规矩。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彻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予为学士时，目观此事。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正前方有一株大槐树，一向来就叫做“槐厅”。过去传说住在这阁子里的人，很多能做到宰相。学士们都争着进槐厅里去，甚至有搬开前人的行李而强占槐厅的。我做学士时，亲眼看见了这样的事。

谏议班在知制诰上，若带待制，则在知制诰下，从职也。戏语谓之“带

坠”。

谏议官的等级在知制诰之上，如果带有待制的衔头，就在知制诰之下，这是依照职衔的缘故，玩笑话叫做“带坠”。

《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

《集贤院论》说：“开元年间的老规矩，校书官允许称做‘学士’。”现在三馆的职事都称做学士，是沿用开元年间的老规矩。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馆阁新书净的本子有写错的地方，用雌黄粉涂抹。我曾经比较过一些改字的方法：刮洗损伤了纸；贴上一张纸又容易脱掉；用粉涂字又不能涂没，要涂几遍才能完全盖住；只要用雌黄一涂就涂掉了，而且经久不脱落。古人称这个为“铅黄”，大概用这种方法已有很久了。

予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割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我担任鄜延经略使的时候，新设了一厅，叫做“五司厅”。延州正厅是都督厅，管理延州的政事。五司厅管理鄜延路的军事，像唐朝的使院一样。五司，指的是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唐朝的制度，藩镇都兼任节度、观察、处置三使。现今节度的职权大多归于总管司，观察归于安抚司，处置归于经略司。那节度、观察两司文案连带分管的推官、判官，现今都管理全州的事务罢了。经略、安抚司不设立辅佐官，因为统帅的权力不能再不集中了。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如同签书公事一样，都受经略使管辖。

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当隶门下省，故事乃隶枢密院，下寺监皆行劄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自从本品行案用枢密院杂司人吏。主判食枢密厨，盖枢密院子司也。

银台司兼任门下封驳，是给事中的职务，应当隶属门下省，过去规定却隶属枢密院。下发寺、监的公文都用札子，寺、监陈述是申状，即使是三司也要称个“上”字。银台主判官不论官阶，初冬时节都赏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的官员，自然依照本人的官阶办理文书，使用枢密院众多的机构和人员。主判官在枢密院厨房进餐，因为都是枢密院的下属机构。

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

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

皇帝的仪仗队中有勒箭，像古代的勒契一样。其中雄性的叫做“雄牡箭”，雌性的叫做“辟仗箭”。这本来是胡人的规矩。熙宁年间废掉了。

前世藏书分隶数处，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讎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校讎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

前代藏书分放好几处，那是为防止水火灾害中散失。现今三馆、秘阁总共4处藏书，但一起放在崇文院。其中的官府图书许多被人盗窃，士大夫家里往往能找到这样的书。嘉祐年间，才设置了8名编校官，综合考订4个馆中的书籍，赐给100个书吏，都用黄纸订成大本子抄写。从此私人家中不敢随便收藏。校订了好多年，仅只校完昭文一馆中的书就停止了。

旧翰林学土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

过去翰林学土地位清高，都不兼任别的职务。文馆职务，从校理以上，都有职务薪金，只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不发。杨亿长时间做学士，家里贫寒，请求到京城外去做官，送上千多字的报告，其中有两联说：“空当甘泉的从臣，终成莫敖的饿鬼。”“侍从官的毛病未犯，东方朔的饥饿要死。”

京师百官上日，唯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陈和叔除学士，时和叔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自和叔始。

京城文武百官上任时，只有翰林学士由皇帝下令设置音乐，别的即使是宰相也没有这样的礼遇。歌舞演员都由开封府点名召集。陈绎被任命为学士，当时他担任开封知府，就没有用女演员。学士院校诏令不用女演员，是从陈绎开始的。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礼部贡院考试进士的时候，在台阶前摆设香案，主考官与举人相对而拜，这是唐朝的旧制度。安放座位的地方陈设很多用具，官府摆放了茶水饮料。到考试经生时，就全部搬走帐幕毡席一类的东西，也没有茶水，考生渴了就喝砚池中的水，每个人的嘴唇都成了黑的。这并非故意要难为他们，是为防止从帐幕毡席外及供应茶水的人偷偷传递所考的经义内容。大概曾经有人败露过，所以这样做来作好防范。欧阳修写了诗说：“焚香礼遇进士，撤除帐幕来招待经生。”以为礼节轻重到这个程度，其实自有它的意义。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复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复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复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复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嘉祐年间，礼部上报进士名额完后，皇上还没有举行殿试，京城里就谣传王俊民是状元，不知道谣言从哪儿传出来的，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民是什么样的人。到殿试时，王安石当时担任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两人任详定官。过去的制度规定，殿试举人，设立初考官，先确定等级，再密封好，把它送给审查考官，再定一次等级，才交付详定官，打开初考官所定的等级，用来对照审查考官的等级，如果相同就可以，不同就要审核那进呈的文章，确定按照初考还是审查的等级为准，也就是不能另外确定等级。那时王安石认为初考官、审查考官所定的第一人都不恰当，就在同等级中另外选了一人为状元，杨乐道遵守规章，认为不能这样。两人商议又作不出决定，太常少卿朱从道当时任密封官，听说这事，对同僚说：“两位何必费力争执，从道我10天前已经听说王俊民是状元了，这样的事一定早已定好，两位可惜自找苦吃了。”不久，两人各自把自己的想法向皇帝报告，皇上诏令采纳王安石的请求。等到打开密封的名单，就是王俊民。详定官可以另外确定等级就从这时开始，并且成为了固定的制度。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黄鉴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嘉祐中，于崇文院置编校局，校官皆许乘马至院门。其后中书五房置习学公事官，亦缘例乘马赴局。

候选官员不能骑马进入宫门。天圣年间，候选官员担任馆阁职务，从欧阳修、黄鉴等人开始，都从左掖门下马进入馆阁，当时称做“步行学士”。嘉祐年间，在崇文院设立编校局，编校官都允许骑马到院门。在这以后中书五房设立学公事官，也照例骑马去办公处。

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则古之“清道”也。其次卫仗，“卫仗”者，视阑入宫门法，则古之“外仗”也。其中谓之“禁围”，如殿中仗。天官掌舍，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禁围门”，行于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贲、人门之类也。

皇帝车驾出巡，在前面当先锋的叫做“队”，就是古时候的“清道”。它的后面是卫仗。卫仗，与阻挡进入宫门的规矩一样，就是古时候的“外仗”。中间的称做“禁围”，如同殿中仗。天官掌管住宿，没有宫殿，就要安排人环列成门，如今叫做“殿门文武官”，从普天下的高个子中挑选8人，皇上驾临前殿，就拿着钺站在紫宸门下；皇上出巡时，就成为禁围门，走在仪仗马队的前面。还有横木为门的10人，一个队长，挑选那些武力高超的人充当。皇上进到后殿，就拿着挝分东西相对站在殿

前，也就是古时候的虎贲，人门一类的人。

予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乃除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有拟状云：“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衷，委司判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制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书曰：“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付中书门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

我曾经买到后唐闵帝应顺元年的一份案卷，是任命宰相刘昫兼任判三司堂的封签。前面的草稿写道：“县官刘昫重视，肯定刘昫治国的才能很高，辅佐君主的心志殷切，正是符合上天的气运，确实凭借谋略开始的规划。应当投注皇上的衷情，委任为司判出谋划策，逐步走向富庶，永远辅助圣明的君主。我们这些人商议，希望授予他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地同过去一样，不知是否可行？如果承蒙允许，希望交付翰林传下命令办理。谨录此呈报。”后面有皇帝的诏令说：“宰臣刘昫重视，可以兼判三司公事，应由中书、门下省照此执行。交付中书、门下省批准这一议案。四月十日。”这里用了皇帝新刻的印，与如今政府下发的公文略有区别。

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道、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处。按《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道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藁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道亲笔，盖故事也。

本朝有要事上报皇帝，一般的事拟好草稿送进宫去，皇帝写了“可”字以后就执行，称做“熟状”；事情紧急来不及上报，就先下发，再准备诏令草稿报告皇帝，称做“进草”。熟状用白纸书写，宰相签署，其他执政官列出姓名。进草就用黄纸书写，宰相、执政都在状纸背面签字。封签上宰相、执政都不签署，只有宰相的属官在封签背面写上日期，差吏签名盖印，这种草稿有文词，宰相在封签上签署却不盖印。这是它特异的地方。大概唐代的风俗，从朝廷往下到郡县，判断事情都有文词，叫做“判”，这就有了书判科。封签上签署的两个人，是冯道、李愚。草稿是冯道亲笔，有很多修改涂抹的地方。据《旧五代史》说：“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逝世；庚辰，任命宰相刘昫判三司。”正好是十日，与这封签没有不同。宋敏求记载《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藁草》、《拟状注制集》，很多都用四六文，全是宰相亲自草拟的。现在这份草稿，是冯道亲笔，大概是老规矩吧。

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

过去的制度，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的印都涂了金。近来的规定，三省、枢密院的印用银铸

成，涂金；其他的都用铜铸罢了。

卷二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阁门取旨，间有叙学士上者，然不为定制。

三司使排列在翰林学士的上面，从前的制度权使与正官地位相同，因此三司使签署官衔都在官职的上面。庆历年间，叶道卿做了权三司使，执政大臣中有想压制他的，在颁发诏令时，把三司使移至官职下面签署，就摆到了翰林学士的下面了。到现在还是惯例。后来曾有人议论过，签署官衔虽然依旧不变，但权三司使刚被任命，在阁门领取圣旨，偶尔也有排在学士上面的，但不是固定的制度。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子与刁亲旧，刁尝出表藁以示予。

皇族子弟被委任为南班官，世间传说是在太尉王旦当宰相时，才有了这一动议，其实不是这样。从前的制度，皇族子弟没有升官的规矩，只是遇到少有的大庆典时，才一律提升一级。景祐年间，开始确定祖宗在向南祭祀时一同祭祀，宗室子弟想利用举行大礼的机会请求给予恩惠，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报告给皇上看。刁约见到丞相王曾，王曾问：“前些日子宗室子弟请求提升的报告，是谁写的？”刁约不知道他的用意，回答说不知道。回去后一想，担心事情弄清后被怪罪，就再次拜访丞相府。王曾又像先前一样问他，刁约越发惊慌，不敢再隐瞒，就据实回答。王曾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喜欢报告的文词罢了。”又再三夸奖，不慌不忙地说：“已经得到皇上的旨意，另有安排，过几天应当有具体指示。”从这时起就有了任为南班官的事。皇家近亲从开始封为小将军起，共提升7次就担任节度使，这就成了固定的制度。那许多皇家子弟用千匹丝绸感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与刁约是老交情，刁约曾拿出报告的草稿给我看。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大理寺法官都亲自过问案情，不得派小官吏去做。中书检正官不设置小官吏，每个办公处所提供的一个用楷书抄写公文的人，仅仅负责誊写清楚。大概想让士大夫亲自处理职责内的事务，阻止官吏的奸诈行为，还带有一个个检验才干的意思。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貽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岁宣徽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

宋太宗下令制作方团球带赏赐中书省和枢密院这二府的文官大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

王贻永都得到特别的赏赐，李用和、曹佺都因为是大舅得到赏赐，近年来宣徽使王拱辰因为年高望重得到特别赏赐。他们都是很特殊的情况，不是惯例。

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黻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近年来京城士大夫穿朝服骑马，要用暗色的衣套在外面，叫做“凉衫”。这也是古时候留下来的规矩，《仪礼》说“朝服加景”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不知道古人的制度规定花纹和颜色怎样罢了。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骑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诰凡是草拟任命官员的诏令，从给谏、待制官以上，都有润笔钱物。宋太宗时，规定了润笔的钱数，下诏令刻在石碑上竖立在舍人院中。每次任命官员，就发文督查这事，从院官往下到小官随从都可分享。元丰年间，改变了设立官职的制度，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诰都增加了薪俸，就取消了润笔的钱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复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志》，谢眺文，称“兼中书侍郎”。

唐朝的制度，官员晋升的顺序没有轮到，而用其他官阶暂时代理职务的人，称做“直官”，比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是这样。本朝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都设置了直院。熙宁年间，又设置了直舍人、学士院，只让资历浅的人充当，其实是正式职务。熙宁六年，中书舍人都被提升或免职了，秘书阁中无人，就让章衡临时任知制诰，却不任命为直院官，因为他是暂时代理。古时候的兼职官，大多是暂时代理职务，有长时间兼任的，就同正式职务一样。我家里收藏有《海陵王墓志》，谢眺撰写，署衔是“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衙吏以挺扣地警众，谓之“打杖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岁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仗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人，队长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岁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三司、开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长官上官衙办事，就由衙役在前面开路吆喝。本朝的制度，在皇官中只有三种官才能通报：宰相到中书省通报，翰林学士到翰林院通报，御史大夫上朝堂通报，都用穿红衣的差吏，叫做“三告官”。凡是经过的地方，守门官吏用棍棒敲打地面来提醒民众，叫做“打杖子”。对两府、亲王，要从殿门开始敲打直到本司或上马的地方；宣徽使敲打到本院；三司使、开

封知府敲打到本司，近年来寺监长官也要敲打，这不是过去的规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皇上特旨准许张开车盖、敲打棍棒的，那是临时的指令。拿着丝梢鞭进宫，是从三司副使以上才可以，副使只能乘坐紫丝暖座跟着他，队长拿着破木棒。对待制以上的人，近年来侍监长官拿着藤棒，这也不是过去的规矩。文武百官的仪仗规则，除有明确的法规之外，各家也有记录，还有被遗漏的。虽然规定得特别琐细，也是一个时期的礼仪制度。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唯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书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

本朝没有修改官制以前，皇舅家的人没有兼任中书令的，只有追赠官职时才有。元丰年间，曹侑以大舅的身份被特别任命兼任中书令，发文到度支使发给薪俸。官吏说：“从来没有活的中书令接受薪俸的先例。”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都堂及寺观里文武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大多是临时安排的。唐朝以前的旧制度都无法查考，只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的信上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成一，十二卫大将军在其次；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成一，九卿、三监各自为界。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差错。”这里也能大略看出当时的那些规矩。现抄录在这，用来补充文献的缺漏。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首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复赐。

赏赐“功臣”的称号，从唐德宗奉天战役开始。这以后藩镇往下到从军资历深的人，照例赏赐“功臣”称号。本朝只用来赏赐将相。熙宁年间，因给皇帝加上尊号，宰相带领同级官员当面向皇帝请求三、四次，皇上始终没有答应，说：“徽号正如你们各位的‘功臣’称号一样，对名和实有什么好处？”这时吴正宪当宰相，就请求废止“功臣”称号，皇上听取了这一建议。从这时起大臣们一个接一个请求免除称号，于是不再赏赐了。

卷三 辩证一

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木，器仗铠冑，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钧石的石，属五种称量单位的名称，一石重 120 斤。后人把一斛作为一石，从汉代就已这样，如“喝酒一石不醉”就是。拉弓踏弩，古人用钧石作标准；现今人们还是把一斛粳米的重量定为一石。凡是石都以 92 斤半为准，相当于汉代秤 341 斤。如今的武士踏弩，有达到 9 石的，算算他们力气，是古时候的 25 石，与魏代的武士相比，一人当两人还有余。有拉弓 3 石的，是古时候的 34 钧，拿颜高的弓来比，一人当五人还有余。这都是近年来教育培养出来的。以至于搏击、刺杀、跑马、射箭，都发挥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最高技术，兵器盔甲，都达到了古今最精巧的程度。武器装备的丰富，前代没有比得上的。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楚辞·招魂》的句末都是“些”。现在夔峡、湖湘及长江南北的少数民族凡是念符咒的句末都说“些”。这是楚地人的老习俗，就是楚语中的“萨嚩诃”。三个字合起来说，就是“些”字。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如人摇橹，桌为之碍故也。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桌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摇橹之势，故举手则影愈下，下手则影愈上，此其可见。（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西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用阳燧照物体都是倒立的影像，是因为中间有障碍的缘故。算学家说这叫做“格术”。譬如人摇橹，作支撑的小木桩成了橹的障碍一样。像老鹰在空中飞行，它的影子随着鹰飞而移动，如果鹰和影子之间的光线被窗孔所约束，那么影子与鹰飞的方向就相反了。又像窗孔中透过楼塔的影子，中间的光线被窗孔所约束，也都是倒垂，与阳燧同样的道理。阳燧的镜面是凹陷的，当一个手指靠近镜面时，像是正的；当手指渐渐移远到某一位置，像就不见了；超过这一位置，像就倒过来了。那个看不见像的地方，正如窗户的孔、架橹的木桩、腰鼓的腰成了障碍一样，物体与像相对，就成了摇橹的情形。所以举起手来影子就越向下，放下手来影子就越向上，这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岂止物体是这样，人也如此，中间不被外物阻碍的很少。小的就把利害互相改变，是非互相颠倒；大的就把自己当成外

物，把外物当成自己。不要求去掉障碍，却想看到不颠倒的物像，太难了啊！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岁亦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

以前的学者把日食正阳的月份，仅仅说成四月，是不对的。“正阳”是两回事，“正”说的是四月，“阳”说的是十月。“岁亦阳止”就是这个意思。《诗经》中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两句，是先王所厌恶的。大概四月是纯一的阳气，不喜欢它被阴气侵袭；十月是纯一的阴气，不希望它受阳气触犯。

予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予预讨论。雷、郑之学，阙谬固多，其间高祖远孙一事，尤为无义。丧服但有曾祖齐衰五月，远曾缌麻三月，而无高祖远孙服。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傍亲之杀也。上杀下杀至于九，傍杀至于四，而皆谓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过此则非其族也，非其族则为之无服，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我编写的《丧服后传》，书写成时，是熙宁年间，有要重新制定五种丧服的诏令，于是我参与了讨论。雷、郑的学说，缺漏、错误本来就多，其中高祖、远孙这件事，更没有道理。《丧服》中只有曾祖穿齐衰服六个月，远曾祖穿缌麻服三个月，但没有高祖、远孙的丧服。前代学者都以为高祖、远孙的丧服与曾祖、曾孙的相同，所以不说出可以推想得知。又有人说，“经典上没说就没有丧服”，都不对。曾，就是重，由祖父以上的，都是曾祖；由孙以下的，都是曾孙；即使过一百代也是这样。假如有碰到这情况的，就一定要为他服丧三个月。所以即使是成王对后稷，也称“曾孙”，而在祭礼祝祷文词中，不分远近都说成“曾孙”。《礼记》中所说的“以五为九”，是说对旁系亲属可以削减。向上削减向下削减到了第九代，旁系亲属削减到了第四代，就都称为同族。同族兄弟的父母、同族的祖父母、同族的曾祖父母，超过这些就不是他那一族了，不是那一族就是不要穿丧服。只有正统王朝不依族名，那就不会断绝了。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过去传说黄陵有两个女子，即尧的女儿、舜的妃子。因为尧、舜两帝的道德非常高尚，是从闺门中开始的，那两个女子就应具有任、姒的品德。考究她们的年龄，在舜出巡的时候，两个妃子的年纪已有一百岁了。后人在诗词中所写的，都把她们作女孩子看待，语言有很多亵渎轻慢，都是礼义方面的罪人。

历代宫室中有“謠门”，盖取张衡《东京赋》“謠门曲榭”也。说者谓“冰室门”。按《字训》：“謠，别也。”《东京赋》但言别门耳，故以对

“曲榭”，非有定处也。

历代宫室中都有“謬门”，大概是根据张衡《东京赋》的“謬门曲榭”。解释的人说是“冰室门”。据《字训》说：“謬，就是别。”《东京赋》只说别门，所以用“曲榭”和它相对，并没有确定的地方。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灊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此概举一二耳，其详不能具载。予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清漳、浊漳，合于上党。当阳即沮、漳合流，灊上即漳、鄆合流，漳州予朱曾目见，鄆郡即西江合流，毫漳即漳，涡合流，云梦即漳鄆合流。此数处皆清浊合流，色理如螭，数十里方混。如“璋”亦从“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执。《诗》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体也，合之则成圭，王左右之臣，合体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杀宗庙礼之半也。有牙璋以起军旅，先儒谓“有鉏牙之饰于剡侧”，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洛”与“落”同义，谓水自上而下有投流处。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河流用“漳”做名称、“洛”做名称的最多，现在略举几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河、浊漳河，当阳有漳水，灊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河，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这是略为举出一两处罢了，那详细的不能全部写出来。我考察它们的意义，清浊互相混杂就是“漳”。章，就是花纹，也是区别。漳，说的是两种东西互相混合又有花纹，并且可以区别。清漳河、浊漳河，在上党汇合。当阳就是沮水、漳水合流，灊上就是漳水、灊水合流。漳州我不曾亲眼见过，鄆郡就是两江合流，毫漳就是漳水、涡水合流，云梦就是漳水、鄆水合流。这几处都是清浊合流，色彩纹理像彩虹一样，过了几十里才混合。比如“璋”字也是从“章”，璋是君王左右的臣属所拿的。《诗经》说：“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是圭的一半，合起来就成了圭。君王左右的臣子，合起来一条心，都趋向君王。另外，诸侯用来做给女家的聘礼，是取它两半合成的意思。用之来祭祀山河，因为它削减了祭祀宗庙的一半礼仪。还有牙璋用来调动军队，前代学者说是“有牙齿一样的装饰品放在尖刀刀刃边”，不对。牙璋，是可以分合的东西，应该在结合的地方成牙齿形，像现今的“合契”。牙璋，就是雄性的契。用来调动军队，那它的雌性的应该在军队中，就是虎符的方法。“洛”与“落”意思相同，说的是水从上到下有奔流的地方。现在淝水、沱水天下也多，前代学者都各有解释。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人。其北有尧梢水，一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有成盐。唯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盐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于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解州盐池方圆 120 里。雨下得久，四面山上的水都流到池中，池水却不曾漫出过；天大旱也不

曾干涸。卤水是红色的，在硝板的下面，民间俗称为“蚩尤血”。唯独盐池中间有一孔泉水，竟是淡水，有了这水以后可以使盐卤结晶。另外，盐池北边有一条尧梢水，亦叫巫咸河。很浓的卤水，没有淡水调和，不能制成食盐。唯有巫咸河水流进来，盐卤就不再结晶，所以人们称它为“无咸河”，是盐池的祸患。人们修筑大堤来防备它，超过了防范盗贼。推究它的道理，大概是巫咸河水是浑浊的水，流进卤水中，就淤淀了盐卤矿脉，因而盐就不能结成，并非别的原因。

《庄子》：“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

《庄子》说：“程生马。”应当看看文子的注释：“秦人管豹叫程。”我到过延州，那里的人到现在还称虎豹做“程”，大概就是说的“虫”。方言就是这样，或者也是旧习俗吧。

《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汧河”之目，人多不晓“汧河”之义。予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溘溘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駟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子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讲，字书亦作渥。按古文，渥，深泥也。术书有“汧河”者，盖谓陷运，如今之“空亡”也。

《唐六典》讲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汧河”的名目，人们大多不知道“汧河”的含义。我在鄜延时，看见安南行营的各位将领查阅兵马的登记册，有说到“过范河损失”的。问他们什么是“范河”，原来越人称泥沙为“范河”，北方人叫做“活沙”。我曾经路过无定河，越过活沙，人马踏上去，百步以外都在动，晃晃荡荡地好像人走在帐幕上，那伸脚的地方虽然还很坚硬，假如碰到那一块陷下去的地方，那人马车辆随即就都沉没了，甚至有几百人平空陷落没有一个留下的。有人说这就是流沙。又说沙随着风流动，叫做流沙。渥，字典上也写成“渥”。查一下古文字，渥，就是很深的泥沙。方术书上有“汧河”，大概指的是厄运，像如今的“空亡”一样。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阁后，今不复有存者。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古人藏书防蛀虫用芸香。芸香，是香草，现今的人称为“七里香”的就是这个。叶子像豌豆叶，成小丛生，它的叶子非常芳香，秋后叶子间带一点白色像被粉弄脏了，防蛀虫特别有效。南方人采集放到席下，可以除跳蚤、虱子。我兼管昭文馆时，曾在文彦博家得到了好几株，移植到秘阁后面，如今没有存活的了。香草这些东西，大概很多都有奇特的名字，如所说的兰荪，荪，就是现在的菖蒲；蕙，就是现在的零陵香；茝，就是现在的白芷。

祭礼有腥、燔、熟三献。旧说以谓“腥、燔备太古、中古之礼”，予以为不然。先王之于死者，以之为无知则不仁，以之为有知则不智。荐可食之熟，所以为仁；不可食之腥、燔，所以为智。又一说：“腥、燔以鬼道接之。”

馈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谓“鬼神嗜腥、燔”。此虽出于异说，圣人知鬼神之情状，或有此理，未可致诘。

祭礼有腥、燔、熟三种献礼。过去的说法认为“腥、燔具有远古、中古的礼节”，我以为不对。古时的君王对待死去的人，把他当作无知就不仁义，把他当作有知就不明智。进献可以吃的熟食，所以是仁爱；不可以吃的生肉和半生的肉，所以是明智。还有一种说法，“用生肉、半生肉是用对待鬼的方法接待他，送上食物是用对待人的方法接待他”，我很怀疑。有人说，“鬼神爱吃生肉、半生肉”，这虽然是一种奇特的说法，但圣人了解鬼神的情况，有时也说出了这样的道理，不好进一步去询问了。

世以玄为浅黑色，璊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熙宁中，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谓之黑紫，与皂相乱，几不可分，乃所谓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稷之璊色者谓之糜。（璊字音门，以其色命之也。《诗》“有糜）有璊”。今秦人音糜，声之伪也。）璊色在朱黄之间，似乎赭，极光莹，掬之粲泽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盖所谓璊，色名也，而从玉，以其赭而泽，故以谕之也，犹璊以色名而从鸟，以鸟色谕之也。

世人把玄当作浅黑色，璊当作赭色的玉，都不对。玄是红黑色，燕子羽毛就是这个颜色，所以叫它玄鸟。熙宁年间，京城贵人和皇亲大多穿深紫色的衣服，称为黑紫，与黑色混杂，几乎不能分辨，就是所说的玄了。璊是赭色。“毳衣如璊”，璊色的粟称为璊。璊字音门，是用它的颜色命名的。《诗经》上有“有糜有璊”的句子，如今秦地人的读音是“糜”，这是声音变了。璊色在红色和黄色之间，与赭色相似，非常光洁晶莹，捧起来光泽明亮闪闪烁烁像红色的珠子一样。这自成一色，像赭色又不是赭色。大概所谓璊是颜色的名称，但从玉，因为它是赭色而有光泽，所以用玉来说明，好比璊因颜色得名而且从鸟，是用鸟的颜色来说明它。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予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世上打铁所称的钢铁，是用熟铁盘绕起来，再把生铁嵌在它的中间，用泥把炉子封起来烧炼，锻打使它们相互渗入，叫做“团钢”，也叫做“灌钢”，这只是假钢罢了，暂时借助于生铁使它坚硬，烧炼两三次以后生铁就成了熟铁，得到的仍然是熟铁。但是天下没有人认为不对的，那是因为不认识真钢罢了。我出使时，到磁州打铁作坊看炼铁，才认识了真钢。凡是有钢的铁，就像面里有面筋，洗尽柔软的面，面筋就出现了。炼钢也是这样，只要选取精铁锻打百多次，每锻打一次称一次，锻打一次就轻一些，直到多次锻打斤两却不再减少，那就是纯钢了。即使再锻打上百次也不会耗减了。这才是铁里面的精纯部分，它的色泽清明，磨得光洁明亮了，就呈现暗淡的青黑色，与一般的铁明显不同。也有锻打到最后却根本成不了钢的，会是因为产地的缘故。

《诗》：“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结锥也。芄兰生莢支，出于

叶间垂之，正如解结锥。所谓“佩觿者”，疑古人为觿之制，亦当与芡兰之叶相似，但今不复见耳。

《诗经》上说：“芡兰之支，童子佩觿。”觿，是解开绳结的锥子。芡兰生莢支，长在叶子中间往下垂，正像解绳结的锥。所说的“佩觿”，我怀疑做觿的式样，也应当与芡兰的叶子相像，只是现在没什么奇怪的了。

江南有小栗，谓之“茅栗”，以予一观之，此正所谓“茅”也。则《庄子》所谓“狙公赋茅”者，此文相近之误也。

长江以南有一种小栗，叫做“茅栗”，据我观察，这正是所说的“茅”，即《庄子》所说的“狙公赋茅”，这是文字相近出现的错误。

予家有阎博陵画唐秦府十八学士，各有真赞，亦唐人书，多与旧史不同。姚柬，字思廉，旧史乃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明、薛庄，《唐书》皆以字为名，李元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皆不书字。房元龄字乔年，《唐书》乃“房乔字元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字仲达”。苏典签名从“日”从“九”，《唐书》乃从“日”从“助”。许敬宗、薛庄官皆直记室，《唐书》乃摄记室。盖《唐书》成于后人手，所传容有讹谬，此乃当时所记也。以旧史考之，魏郑公对太宗云：“目如悬铃者佳”，则元龄果名，非字也。然苏世长，太宗召对真武门，问云：“卿何名长意短？”后乃为学士，似为学士时方更名耳。

我家里有阎立本画的唐代秦府十八学士图，各自有画像的赞文，也是唐代人写的，大多与过去的史书不同。姚柬，字思廉，过去史书上是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明、薛庄，《唐书》上都用他们的字作为名。李玄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上都没有写他们的字。房玄龄字乔年，《唐书》上却是“房乔字玄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上是“字仲达”。苏典签名从“日”从“九”，《唐书》却从“日”从“助”。许敬宗、薛庄的官职都是直记室，《唐书》却是摄证室。大概《唐书》是在后人手中写成的，所写的或许有错误，这赞文却是当时所记的。用旧史来考证这些问题，魏征对唐太宗说：“眼睛像悬铃一样的人就好。”那玄龄果然是名，不是字。但苏世长，唐太宗召他到玄武门，问他说：“你为什么名字叫长而用意短？”他后来做了学士，好像是当了学士时才改的名。

唐正观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谢朓诗云：“芳州采杜若”，乃责坊州贡之。当时以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书省中植紫薇花，何异坊州贡杜若，然历世循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唐朝贞观年间，有诏令让度支司寻找杜若。省郎引谢朓的诗说：“芳洲采杜若”，朝廷就责成坊州进贡杜若，当时认为这是个笑料。又如唐代的老规矩，中书省中种植紫薇花，与坊州进贡杜若有什么不同？但历代依照去做，不认为不对。到现在舍人院紫薇阁前种紫薇花，是沿用唐代的老规矩。

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予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醪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

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

汉代人有喝一石酒不醉的，我拿酿酒法一比较，汉代每两斛粗米，酿成 6 斛 6 斗酒；现在最薄的酒，每一斜稻谷不过酿成 1 斛 5 斗酒。假如像汉代的方法，就略有酒气罢了，能喝的人多喝而不醉，应该不值得奇怪。但汉代的一斜，也就是现在的 2 斗 7 升，人的肚子里又怎么装得下 2 斗 7 升水呢？有人说“石”是“钧石”的“石”，是 120 斤。用今天的秤来称，应当是 32 斤，也就是现在的三斗酒。于定国喝几石酒不醉，我怀疑没有这种道理。

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济水性趋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疾。今医方不载此意。

从前说济水潜在地下暗暗地流，如今历下凡属是掘地都是流水，世间传说济水经过它的下面。东阿也是济水所经过的地方，用井水煮胶，称为“阿胶”。用来搅动浊水就变清了。人一服用了它，下膈痰少了、呕吐也可止住，都是利用济水性质趋向下又清又重，所以用来治积食、胀气及呕吐之类的病。现在医生的验方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了。

予见人为文章，多言“前荣”。荣者，夏屋东西序之外屋翼也，谓之东荣、西荣。四注屋则谓之东霤、西霤。未知“前荣”安在？

我见别人做文章，大多说“前荣”。荣，是大屋子东西两边的屋檐，叫做东荣、西荣。四边有檐的屋就叫东霤、西霤。不知前荣在哪里？

宗庙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处奥也。即主枯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献则尸出于室。坐于户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户西谓之扆，设扆于此，左户右牖，户牖之间该之牖。坐于户西，即当扆而坐也。）上堂设位而亦东向者，设用室中之礼也。

宗庙的祭祀面向西边的，是室中的祭祀。死者放在西边墙壁上，让生者位于屋子的西南角。因为靠近神主去请求保佑，所以面向西边祭祀。到三献时代死者受祭的人从室内走出。坐在门西边，面向南方，这是堂上的祭祀。上堂设立牌位也向着东面的，是用了室中的祭礼。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关雎》、《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

“人如果不读《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墙壁站立一样。”《周南》、《召南》，是音乐的名称。“乐官根据《雅》和《南》击鼓”，就是这意思。《关雎》、《鹊巢》，是二《南》中的诗罢了，其中有音乐有舞蹈。读书人的事，开始学的是《周南》、《召南》，最后才到跳《大夏》《大武》舞。所说的表演《周南》、《召南》，不仅仅诵读诗歌而已。

《庄子》言：“野马也，尘埃也”。乃是两物。古人即谓野马为尘埃，如吴融云：“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云：“窗里日光飞野马”。皆以尘为野马，恐不然也。“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群马，又如水波，佛书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庄子》说：“野马啊，尘埃啊”，其实是两种东西。古人就称野马是尘埃，比如吴融说：“动梁间之野马”；又如韩偓说：“窗里日光飞野马”。都把尘埃当作野马，恐怕不对。“野马”是田野里的浮气，远远望去像一群马，又像水波。佛家书上说“如热时野马阳焰”，就是指这种东西。

蒲芦，说者以为蜾蠃，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蒲芦，解释的人以为是蜾蠃，我怀疑不对。蒲芦就是蒲苇罢了，所以说：“人适合干政事，地适合种作物。”那政事就如同蒲芦，人们于政事，就如同地上种蒲苇，适应它罢了，也就是做它那些没有什么问题的事。

予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我研究乐律及接受诏令改铸浑天仪，探索秦、汉以前度量的斗、升，计算出6斗相当现在1斗7升9合；秤的3斤相当现在13两（1斤相当现在 $4\frac{1}{3}$ 两，1两等于现在6铢半）；做升的中间是方形；古时尺子的2.53寸，相当现在尺子的1.845寸多一点。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之小游太一，此出于后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官，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后殿，各全其尊，深为得礼，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棋”，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

十神太一：一是太一，二是五福太一，三是天一太一，四是地太一，五是君基太一，六是臣基太一，七是民基太一，八是大游太一，九是九气太一，十是十神太一。只有太一最尊贵，再没有别名，只称做太一，3年变动一次。后人因为它另外没有名字，就相对于大游而叫它小游太一，这是由于后人的错误加上去的。京城的东西太一宫，正殿供奉五福，但太一却在走廊上，大大地乱了次序。熙宁年间，首次修建太一宫，诏令让太史考定神位，我那时兼任太史，参加了那次讨论，如今前殿供奉五福，而太一另外建了后殿，各自保全了它们的尊严，非常符合礼数。但君基、臣基、民基要避唐明皇李隆基的名讳改作“棋”，到现在还沿袭原名，没有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县人有方瓿者，其高祖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人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

为宁国人。璵有杨溥与方虔、方从训手教数十纸，纸剖皆精善，教称委曲书，押处称“使”，或称“吴王”。内一纸报方虔云：“钱镠此月内已亡歿”，纸尾书“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钱镠以后唐长兴二年卒，杨溥天成四年已僭即伪位，岂得长兴二年尚称“吴王”？溥手教所指挥事甚详，翰墨印记，极有次序，悉是当时亲迹。今按天成四年岁庚寅，长兴二年岁壬辰，计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纸，至今家藏。

我在嘉祐年间寄住宣川宁国县。县里有个叫方璵的，他的高祖方虔，是杨行密的守将，带兵守卫宁国，用来防备两浙。方虔后来被吴地人抓去，他的儿子方从训代理驻守宁国，所以儿孙到如今都是宁国人。方璵有杨溥给方虔、方从训的手书几十张，纸札都精美。手出称为委曲书，签署的地方写成“使”，或是写“吴王”。其中一张告诉方虔说：“钱镠本月中已经去世。”纸的末尾写“正月二十九日”。据《五代史》记载，钱镠是在后唐长兴二年死的，杨溥在后唐天成四年已僭越即伪皇帝位，哪里会在长兴二年还称“吴王”？杨溥手书所指示的事非常详细，笔墨印章，很有次序，都是当时的亲笔。现在考证天成四年是庚寅年，长兴二年是壬辰年，共差两年。杨溥的手书我得到其中的4张，至今收藏在家里。

卷四 辩证二

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漾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澎湃。”《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猪；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有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底定，此水之理也。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叙述上林的各条河流说：“丹水、紫渊、灞水、灞水、泾水、渭水，八条河分流，互相背离而且形态各不相同。水势浩大，向东流入太湖。”八条河自然流入黄河，黄河距离太湖几千里，中间隔着泰山及淮河、济水、长江，怎么会与太湖有关系？郭璞的《江赋》说：“流入五湖而广阔无边，灌入三江而澎湃作响。”《墨子》说：“大禹治理天下，在南边疏导长江、汉水、淮河、汝水，向东流入五湖。”孔安国说：“从彭蠡开始，长江分成三条，流到震泽后，集中到北江再流入海。”这都是没有仔细考察地理。长江、汉水到五湖之间本来就隔了山，它们最后都绕过五湖入海，怎么会流到五湖呢？淮河、汝水直接从徐州入海，完全没有什么支流与五湖有关。《禹贡》说：“彭蠡已经营水，是大雁停留的地方。三江已有流入，震泽湖达到平定。”根据这些对应文字的说法，那彭蠡是水蓄积之处，三江是水流入之处，不是流到震泽。震泽湖的上源，都是山峦环绕，完全没有大河；震泽的下游，才有许多大河，也不知道哪是指三江。大约三江的水没有地方流，那震泽就堵塞成了灾害，三江的水有处可流，这以后震泽达到平静，这是水流的规律。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旁，后人又收入《图经》。予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予初仕为沭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此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家”，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家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两座古墓，《图志》说这是“黄儿墓”。有一块石碑，已经模糊到不能阅读了，不知道黄儿是什么人。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巡行到县中看见了它，说：“汉代的二疏是东海人，这一定是他们的墓了。”就叫它做“二疏墓”，在它的旁边刻块碑，后人又把它收入《图经》中。我考证了，疏广是东海兰陵人，兰陵现在属于沂州承县；现在的东海县就是汉代的赣榆，从来就属琅琊郡，不是古时候的东海。如今承县以东40里本来就有疏广墓，它的东边2里有疏受墓。石延年不研究地理书，只看到现在说的东海县，就以“二疏”来称呼这古墓，差得非常远了。大凡地名像这样的情况特别多，不值得记下来。这是我刚担任沭阳主簿时，才看见《图经》中增添了这件事，后人不明白

它的究竟，往往以为是按实记录。我随手在这里记下来，可看出天下的地理书，都不可深信。那墓的北边还有孝女坟，庙的样子很大，写进了祭祀典章中。孝女也是东海人。赣榆既不是东海的老地点，那孝女坟也是后人附会县名而修建的了。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主，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杨文公《谈苑》记南唐李后主讨厌清暑阁前长出草来，徐锴让人用桂枝屑散布在砖缝中，多年生的草都死了，据《吕氏春秋》说：“桂枝的下面不长别的树。”大约是桂枝辛辣刺激的原因。但是桂技能杀死草木，自然是它的本性，不是因为辛辣刺激。《雷公炮炙论》说：“用桂枝制成钉，把它钉在树中，那树立刻就死了。”一颗钉是很小的，未必能刺死大树，只因为它们的特性相互制约罢了。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谿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谿，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水县章华之侧，亦有乾谿。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谿”，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元非一处。楚灵王十二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箴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谿。此则城父之乾谿。灵王八年许迁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谿，王众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谿。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枢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六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杀其君于乾谿。”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天下的地名，错乱谬误，大多难以考证确凿。比如楚地的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都有。乾溪也有几处。据《左传》记载，楚灵王七年，建成了章华台，与诸侯一起祭祀了它。杜预注释：“章华合在华容城中。”华容就是现在的监利县，不是岳州的华容，到如今还有章华台的旧址在县城里，与杜预的说法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它的旁边也有章华台，旧台基下往往能找到人骨，说是楚灵王战死在这里。商水县章华台的旁边，也有乾溪。薛综注释张衡的《东京赋》引用《左传》说“楚国国君在乾溪建成章华台”，都是错误的说法，《左传》中其实没有这段话。章华与乾溪，本来不在一个地方。楚灵王十二年，楚王打猎到干州未，派荡侯、潘子、司马督、箴尹午、陵尹喜率领军队包围徐国来恐吓吴国，楚王驻扎在乾溪。这就是城父的乾溪。灵王八年允许迁到东部地区的，就是这个地方。灵王十三年，公子比发动叛乱，派观从率领军队到乾溪，灵王的人马溃败，灵王也死了，不知死在哪里。平王即位，杀了囚犯，给他穿上灵王的衣服，丢在汉水中漂流，再捞上来埋葬，来安定国人，再赶到乾溪。灵王其实是被羊尹申亥氏勒死的。另一年，申亥把灵王灵枢的事报告了，才取出安葬，而不是死在乾溪。昭王二十七年，吴国攻打陈国，楚王率领军队救陈国，驻扎在城父。快要开战时，楚王在城父去世了。但《春秋》又说：“臣子在乾溪杀了他们的国君。”那么后世说灵王实实在在死在这里，照理说也不值得奇怪了。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鹿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现在的人主管一个郡叫做“建麾”，是用了颜延年的诗“一麾乃出守”，这是错的。颜延年说的“一麾”，是“指麾”的“麾”，如同武王“右手拿着白色大旗来麾”的“麾”，不是“旌麾”的“麾”，颜延年《阮始平诗》说，“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是说山涛推荐阮咸任吏部郎，三次上书，武帝都不任用阮咸，后来被荀勖一挤，就出任到始平，所以有这句诗。颜延年被排斥，借这诗句作为自己的寄托。从杜牧的登乐游原写诗说：“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人们才错用“一麾”。从这时起就成了一个典故。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阶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任命官职，说“除其旧籍”，不对。“除”像“易”一样，用新的更换旧的叫“除”，比如新年旧年之交叫做“岁除”。《周易》说：“除戎器，戒不虞。”用新的更换坏的，是用来防备难以预料的事。官职叫做“除”，是从下到上，也是更换的意思。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辩，退之遂为熙载矣。

世人画韩愈，是小脸孔又有漂亮的胡须，戴着纱帽，这是江南的韩熙载。还有当时的画，题字和标记很清楚。韩熙载的谥号是文靖，江南人称它“韩文公”，因此就错误地以为是韩愈。韩愈胖而胡须少，元丰年间，用韩愈随文宣王庙受祭，郡县画伪，都是韩熙载，后世不能再分辨，韩愈就成为韩熙载了。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铸为垫钱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灭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

如今的人计算钱数，100钱叫做“陌”，是借用了“陌”字，其实只是个“百”字，如同“什”与“伍”罢了。唐代从皇甫铸推行垫钱法起，到昭宗末年，就规定80钱为“陌”。后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次支出官府钱，又减少3钱，用77钱为“陌”，百姓交纳官府还是80钱。直到现在，交纳官府的钱还有用80钱为“陌”的。

《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

乃古之“参”字，恐相传之误耳。

《唐书》上说：“开元钱重二铢四参。”如今蜀郡也把十参作为一铢。“参”是古代的“参”字，恐怕是互相传抄的错误吧。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棻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外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以前的史书说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放纵不守法，李白因此写了《蜀道难》。据孟棻记载，李白刚到京城时，贺知章听到他的名字，最先去拜访他，李白拿出《蜀道难》，贺知章还没有读完，就再三再四赞叹。这时是天宝初年，当时李白已经写了《蜀道难》。严武任职剑南，是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很远了。大概小说的记录，各各从一时的见闻找到的，首尾不清楚，大多出现谬误，都是这种文字之类。李白的诗集中说是讽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记载的不同，这是《唐书》错了。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义。”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义”。诏改《禹贡》从古本，予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寢，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郢，郢则今之安陆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郢，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予自随州道安陆入于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予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义矣。此古本之为允也。

从前《尚书·禹贡》上说：“云梦土作义。”太宗皇帝时，找到古本《尚书》，写成“云土梦作义”。皇上诏令根据古本校改《禹贡》。我考察孔安国的注释：“云梦之泽在江南。”不对。根据《左传》，“吴国人攻入郢都，楚国国君跨过睢水渡过长江，逃到云泽中。楚王睡下后，敌人攻击他，用戈攻击楚王，楚王逃跑到郢。”楚国国君从郢都向西跑，跨过睢水，就应当从江南出发；这以后渡长江进入云泽中，再逃往郢，郢就是现在的安陆州。跨过长江以后到云泽，到了云泽之后再往郢，那么云泽就在长江以北。《左传》说：“郑伯到楚国，楚王请他到江南的梦泽打猎。”杜预注释说：“楚国的云梦泽，横跨长江南北。”说了“长江以南的梦泽”，那云泽在长江以北就清楚了。元丰年间，我从随州经过安陆到了汉口，有个景陵县的主簿郭思，能说出汉水、沔水间的地理情况，也说长江以南是梦，长江以北是云。我用《左传》验证这个说法，郭思的说法是确实的。长江以南就是现在的公安、石首、建宁等县，长江以北就是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是水流汇集的地方，那地势最低。长江以南的二浙，地势稍微高些，云等于土而梦已成为义了。这也说明古本还是正确的。

卷五 乐律一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徵、羽名之。为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谓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钟为宫，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今则谓之角，虽谓之角，名则易矣，其实第五之声安能变哉？强谓之角页已。先王为乐之意，盖不如是也。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如目钟为富，则林钟角声也。乐有用林钟者，则变而用黄钟，此把天神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函钟为宫，则太簇徵声也，乐有用太簇者，则变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黄钟为宫，则南吕羽声也，乐有用南吕者，则变而用应钟，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谓能变均外间声以为羽也。（应钟，黄钟宫之变徵，文、武之世不用二变声，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当以类求之。朱弦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异乎养道，此所以变其律也。声之不用商，先儒以谓恶杀声也。黄钟之太簇，函钟之南吕，皆商也，是杀声未尝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声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降兴上下之神，虚其中声，人声也。遗乎人声，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庙之乐，宫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宫、角、徵、羽相次者，人乐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世乐之叙宫、商、角、徵、羽，此但无商耳，其余悉用，此人乐之叙也。何以知宫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吕次叙知之也：黄钟最长，大吕次长，太簇又次，应钟最短，此其叙也。）圜丘、方泽之乐，皆以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叙，故以之礼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全耳，其余悉用。此叙天地之叙也。何以知其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序知之也：黄钟最长，大簇次长，圜钟又次，姑洗又次，函钟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叙也。）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气始于子，故先以黄钟；天之功毕于三月，故终之以姑洗。地之功见于正月，故先之以太簇；毕于八月，故终之以南吕。幽阴之气，钟于北方，人之所终归，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钟，终之以应钟；此三乐之始终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终。天之气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见处，则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簇为角，天以太簇为徵；三月，万物悉达，天功毕处，则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生物尽成，地之功终焉，故南吕以为羽。（圜立乐虽以圜钟为宫，而曰“乃奏黄钟，以祀天神”。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而曰“乃奏太簇，以祭地祇”。盖圜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簇也。天地之乐，止是世乐黄钟一均耳。以此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方泽乐而已。唯圜钟一律，不在均内。天功毕于三月，则宫声自合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当用夹钟也。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均？盖黄钟正均也。乐之全体，非十一均之类也。故《汉志》：“自黄钟为宫，则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徵。他律虽当其月为宫，则和应之律

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终于八月，统一岁之事也。他均刚各主一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休文《宋书》曰：“下徵调法：黄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徵变谓之下徵调。”马融《长笛赋》曰：“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谓南吕本黄钟之羽，变为下徵之商，皆以黄钟为主而已。）此天地相与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萃于幽阴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阴之魄，稍出于东方也。全处幽阴，则不与人接，稍出于东方，故人鬼可得而礼也。终则复归于幽阴，复其常也。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世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者，天地岁事之一终也。鬼道无穷，非若岁事之有卒，故尽十二律，然后终事先追远之道，厚之至也。此庙乐之始终也。人鬼尽十二律为义，则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叙，则始于宫声，自当以黄钟为宫也。天神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太簇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则自当以圆钟为宫也，地抵始于太簇，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函钟当均，自当以函钟为宫也。（天神用圆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夹钟而曰圆钟者，不曰林钟曰函钟者，以地道言之也。黄钟无异名，人道也。）此三律为宫，次叙定理，非可以意凿也。圆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礼也。（自辰以往常在昼，自寅以来常在夜，故卯为昏明之交，当其中间，昼夜夹之，故谓这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簇，三变南吕，四变姑洗，五变应钟，六变蕤宾，七变大吕，八变夷则，九变夹钟。函钟一变为太簇，再变为南吕，三变姑洗，四变应钟，五变蕤宾，六变大吕，七变夷则，八变夹钟也。圆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合至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簇清宫为四变，五变合至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合至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律有清宫，总谓之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皆无清宫，但处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为序者。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五者六变八变九变，皆会于夹钟者。

《周礼》上说：“大凡音乐以圆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如果这些乐调经过六节变换，就可使天神下降，那就可祭祀他们了。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如果乐调经过八节变换，地祇就会出现，就可祭祀他们了。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如果乐调经过九节变换，那人鬼也可祭祀了。”整个音调的高低，分成五等，用宫、商、角、徵、羽作为名称。排在前面的叫“宫”，第二位叫“商”，第三位叫“角”，第四位叫“徵”，第五位叫“羽”，这就叫做次序。调名可以变换，次序不能变换。圆钟为宫，那黄钟就是第五位羽音了，如今就称它为角；虽然叫做角，名称变换了，其实第五位的音调怎能变换呢？是勉强叫做角罢了。古代圣王创制音乐的本义，大概不是这样。

世俗的音乐与祭祀音乐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圆钟为宫，那林钟就是角了。音乐中有用林钟的，要变换改用黄钟，这就是祭祀天神的音乐了，不是说能把羽音变换成角音。用函钟为宫，那太簇就是徵了。音乐中有用太簇的，就变成用姑洗，这是祈求地祇的音乐了，不是说能把羽音变换成徵音。用黄钟为宫，那南吕就是羽了。音乐中有用南吕的，就变成用应钟，这是祈求人鬼的音乐了，不是说能

把韵外交错的音调变换成羽音。祭祀鬼神的事，应该可以从同类事物去探求。熟丝做成琴弦，蒲草织成座席，不用五味调和的肉汁，洁净的酒，都是送给阴曹地府的鬼魂的，与人们养生之道不同。这就是祭祀的音律也要变换。

这种音乐不用商调，因为从前的学者把它说成是恶杀的声音。黄钟到太簇，函钟到南吕都有商调，这说明杀声不是不能用，之所以不用商调，因为商调是中声。宫调产生徵调，徵调产生商调，商调产生羽调，羽调产生角调，所以商调是中声。对升降上下的神，要空出那中声，中声是人声。除去人声，所以对于鬼神就可以达到一致。

祭祀宗庙的音乐，宫调放在最前面，其次是角调，再次是徵调，然后是羽调。宫、角、徵、羽依次排列，就是人间音乐的顺序，所以用它来祈求人鬼。世俗音乐的顺序是宫、商、角、徵、羽，这里只有商，其他的都用，这就是人间音乐的顺序。凭什么知道宫调在最前面，其次是角调，再次是徵调，然后是羽调？凭音乐的次序知道：黄钟最长，大吕第二长，太簇短一点，应钟最短，这就是它们的顺序。祭祀天坛、地坛的音乐，都把角调放在最前面，其次是徵调，再次是宫调，然后是羽调。从角调开始是角配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过了金，所以不用商调。木、火、土、水依次排列，是天地的次序，所以用来祭祀天地。五行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里只是不用金，其他的都用。这是依照天地的顺序。凭什么知道角调在最前面，其次是徵调，再次是宫调，然后是羽调？凭音乐的次序知道：黄钟最长，太簇第二长，圆钟短一点，姑洗又短一点，函钟再短一点，南吕最短，这是它们的顺序。这就是四个音调的顺序。

天的气从子时开始，所以把黄钟排在最前面；天的功到三月结束，所以把姑洗放在最后面。地的功从正月出现，所以把太簇排在最前面；到八月结束，所以把南吕放在最后。阴暗的气汇聚在北方，那是人最后的归宿，鬼魂藏匿的地方，所以把黄钟排在最前面，把应钟放在最后面。这是三种音乐各自的始终。

角，表示事物的开始；徵，表示事物的形成；羽，表示事物的终结。天的气从十一月开始，到了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表现出来之处，那天功形成了，所以祭地把太簇作为角调，祭天把太簇作为徵调。到了三月，万物都长出来了，是天功结束之处，那地功形成了，所以祭天把姑洗作为羽调，祭地把姑洗作为徵调。到了八月，有生的物体都长成了，地的功终结了。所以把南吕作为羽调。祭天坛的音乐虽然把圆钟作为宫调，却说“要演奏黄钟，用来祭把天神”。祭地坛的音乐把函钟作为宫调，却说“要演奏太簇，用来祭祀地祇”。大约祭天坛的音乐，是从黄钟开始；祭地坛的音乐，是从太簇开始。祭天地的音乐，仅仅是世俗音乐黄钟这一种韵律罢了。从此黄钟这一种韵律，分为天、地两种音乐：黄钟的韵律，是黄钟作为宫，太簇作为商，姑洗作为角，林钟作为地坛音乐罢了。只有圆钟一律，不在韵律中间。天功在三月结束，那宫调自然应当在徵调的后面，羽调的前面，正好适合夹钟。这两种音乐为什么专用黄钟这一种韵律？因为黄钟是正韵。音调的全部，不是 11 韵之类。所以《汉书·律历志》说：“从黄钟作为宫调，就都用纯正的音乐应和，没有细微的演奏。其他音律虽然正对那个月作为宫调，那应和的音律就极小极细，不会有那种纯正。”那种韵律从十一月开始，到八月结束，包括一年的农事。其他音韵仅各管一个月罢了。

古代的音乐有下徵调。沈约《宋书》说：“下徵调的法则是：黄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来是正声，黄钟的徵调一变就叫做下徵调。”马融《长笛赋》说：“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说的是南吕本是黄钟的羽调，变成下徵的商调，都是以黄钟为主而已。这是天与地在一起的顺序。

人鬼开始在正北方，在东北方形成，在西北方结束，并聚集在阴暗的地府。在十一月开始，到正月形成，那是阴暗地方的魂魄，渐渐从东方出现。要是完全是阴暗的地方，就不能与人接近；渐渐地从东方出现，所以才可以祭把人鬼。祭礼结束后又回到阴暗的地方，恢复它的常态。只有羽音距离其他音韵最远，所以世俗音乐从十一月开始，到八月结束，这正是天地间一年农事的一个始终。因为鬼道没有穷尽，不像一年的农事有一个结束，所以要用完 12 音律，然后完成祭祀先人追念远祖的事，这感情是极为深厚的。这是祭祀音乐的始终。祭把人鬼要演奏完 12 音律为好，所以就从黄钟开始，到应钟结束。按宫、商、徵、羽的顺序，就是从宫音开始，自然应当以黄钟为宫了。

祭祀地祇从太簇开始，到南吕结束，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那宫音应当在姑洗徵音的后面，南吕羽音的前面。中间只有函钟正合韵律，自然应当以函钟为宫了。

祭祀天神从黄钟开始，到姑洗结束，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那宫音应当在太簇徵音的后面，姑洗羽音的前面，就当然要以圆钟为宫了。

祭祀天神用在圆钟的后面，姑洗的前面，只有圆钟一个音律，自然应该用它。不称夹钟而称圆钟的原因，是因为天体是圆形的。祭祀地祇的音乐以函钟为宫。不称林钟而称函钟的原因，是因为地是承载万物的，黄钟没有别的名称，因为它是祭祀人鬼的开始，象征人之道。这三种音律定为宫调，次序排列有固定的规则，不是可以随意决定的。圆钟为宫演奏 6 节，函钟为宫演奏 8 节，黄钟为宫演奏 9 节，一同在卯时会合。卯时是黑夜和白天相交的时间，所以能够连接天地，贯通阴阳，聚集人神，所以天神、地祇、人鬼都可以祭祀。自辰时以后多是白天，自寅时以前多是夜晚，所以卯时是黑夜和白天相交的时间，处在这中间，昼夜夹着它，所以称为夹钟。祭祀人鬼从黄钟开始，一变成了林钟，再变成太簇，三变成了南吕，四变成姑洗，五变成了应钟，六变成了蕤宾，七变成了大吕，八变成了夷则，九变成了夹钟。祭祀地祇从函钟开始，一变成了太簇，二变成了南吕，三变成了姑洗，四变成了应钟，五变成了蕤宾，六变成了大吕，七变成了夷则，八变成了夹钟。祭祀天神从圆钟开始，一变成了无射，二变成了中吕，三变成了黄钟清宫，四变本应到林钟，因为林钟没有清宫，所以到太簇清宫为第四变；五变本应到南吕，南吕也没有清宫，一直到大吕清宫才成了第五变；六变本应到夷则，夷则也没有清宫，一直到夹钟清宫才成了第六变。在 12 律中，黄钟、大吕、太簇、夹钟这 4 律都有清宫，总共 16 律。从姑洗到应钟 8 律，都没有清宫，只是占一个位置罢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则，不能改变的。古人以为难得理解，那是没有去深入探求。听听音乐的声音，探求它的含义，考察它的次序，就知道不能有丝毫的变动，这就是自然规则。一是祭祀人鬼，按宫、商、角、徵、羽的次序；二是祭祀天神，三是祭祀地祇，都接木、火、土、金、水的次序；四是用黄钟一种韵律区分祭天、祭地两种音乐；五是演奏 6 节、8 节、9 节，都在夹钟会合。

六吕：三曰钟，三曰吕，（夹钟，林钟，应钟。大吕，中吕，南吕。）钟与吕常相间，常相对，六吕之间复自有阴阳也。纳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曰夹钟、林钟、应钟，阳中之阴也。黄钟者，阳之所钟也，夹钟、林钟、应钟、阴之所钟也。故皆谓之“钟”，巳、酉、丑，大吕、中吕、南吕、阴中之阳也。吕，助也，能时出而助阳也，故皆谓之“吕”。

六吕：其中三个叫做钟，三个叫做吕，就是夹钟、林钟、应钟和大吕、中吕、南吕。钟与吕常常互相间隔、互相对应：六吕之间也自有阴阳之分。音、律和五行配合的法则是：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其中亥、卯、未分别对应夹钟、林钟、应钟，这是阳中之阴。黄钟，是阳纪所汇聚之处；夹钟、林钟、应钟，是阴纪所汇聚之处；所以都叫做“钟”。巳、酉、丑分别对应大吕、中吕、南吕，这是阴中之阳。吕，就是辅助，能够时时出现来辅助阳，所以叫做“吕”。

《汉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者，谓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问。如此则自大吕以后，律数皆差，须自蕤宾再上生，方得本数。此八八为伍之误也。或曰：“律无上生吕之理，但当下生而用独倍。”二说皆通。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又当再上生。如此时上时下，即非自然之数，不免牵合矣。自子至巳为阳律、阳吕，自午至亥为阴律、阴吕。凡阳律、阳吕皆下生，阴律、阴吕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言阴阳至此而中也。（中吕当读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则谓之蕤宾，阳

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纳音之法，自黄钟相生，至于中吕而中，谓之阳纪。自蕤宾相生，至于应钟而终，谓之阴纪。盖中吕为阴阳之中，子午为阴阳之分也。

《汉书·律历志》说，阴阳互相促进，从黄钟开始，接着是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的意思，说的是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隔。像这样的话，那从大吕以后，律数都会不相对。必须从蕤宾开始再上生，才能得到对应的数。这就是八八为伍的错误。有人说：“乐律没有上生为吕的道理，只应当下生而用一个倍数。”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但到了蕤宾清宫生出大吕清宫，还应当再上升。像这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不符合自然的规律，免不了是一种牵强凑合了。

从子到巳为阳律、阳吕，从午到亥为阴律、阴吕。凡是阳律、阳吕都为下生，阴律、阴吕都为上生。所以巳这个区域的音律叫做中吕，它正是阴阳到了这个中间。中吕应当读它的本音，读成“仲”不对。到了午这一区域就叫做蕤宾，因为阳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的意思是，阴到了这一区域就成为宾了。音、律、五行配合的法则是，从黄钟开始上升，到了中吕就居中，称为阳纪；从蕤宾开始上升，到了应钟结束，称为阴纪。中吕处在阴阳的中间，就像子时和午时是阴阳的分界一样。

《汉志》言数曰：“大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主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上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邻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長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汉书·律历志》讲到天文历数时说：“天地未分时一团太极元气，包含了，三，又混合为‘一’。极，是充满的意思。元，是开始的意思。运行在12辰之中，从子开始运动，3倍子数，在丑得3；再3倍，在寅得9；又3倍，到卯得27。这样经过12辰，得177147。这是阴阳和合，气凝聚在子，然后变化产生万物。”却不知道这就是为计算律管长短所规定的计算方法，另外没有什么意义。编写史书的人只见这个数字特别庞大，不清楚它的用途，就说“这是阴阳和合，变化产生万物”。从前有人在土里拣到一根腐烂了的捣衣木棒，不认识它，拿回去给乡邻们看，大人小孩都来围观，没有不感到惊奇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有一个读书人经过这里，看见这东西，说：“这是神灵的东西。我听说古时候防风氏身高3丈，骨头占满一车，这就是防风氏的小腿骨啊！”乡邻都很高兴，修了一座庙祭祀它，叫做“小腿庙”。班固这段言论，大概与“小腿庙”很接近吧。

吾闻《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时，尚闻其声。泾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遗音遂绝。今乐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远”，了无余迹。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柜”。用力如此，其为艺可知也。

我听说《羯鼓录》中叙述羯鼓的声音道：“穿透高空，细长悠远，与其他乐器的声音大不相同。”唐代的羯鼓曲，现在只有邠州一位老人能够演奏，有《大合蝉》、《滴滴泉》的曲子，我在鄜延时，

还听过他演奏的乐曲。泾原走马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入朝报告公务，带回圣旨命令召这个人去朝廷。扬元孙到鄜州，那个人已经死了，羯鼓曲的遗音就灭绝了。现在乐队的乐曲中所有的，只是名目还存在罢了。那穿透高空、细长悠远的声音已完全没有一点遗迹了。唐明皇与李龟年谈论羯鼓时说到破坏了的鼓槌装了4个柜子，用力这样大，那种技艺是可以想见的了。

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苗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唐曲有《突厥盐》、《阿鹞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

唐代的杖鼓，本来叫做“两杖鼓”，演奏时两头都用杖敲打。现在的杖鼓在另一头用手拍击，那是唐代的“汉震第二鼓”。唐明皇、宋璟都善于演奏这种鼓乐。它的乐曲大多是独奏，如《鼓笛曲》这样的。今天的杖鼓，常常只用来打打节拍，很少有专门独奏的美妙。从前的曲目全都散失不存了。近年皇家大军南征，在交趾得到一支曲子《黄帝炎》，竟是杖鼓曲。“炎”又写作“盐”。唐代的杖鼓曲还有《突厥盐》、《阿鹞盐》。施肩吾的诗写道：“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这是说的当时的情况。现在的杖鼓曲谱中还有炎杖的音乐。

元稹《连昌宫词》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催、哨、催、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元稹《连昌宫词》中有诗句“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说的“大遍”，有序、引、歌、、催、哨、催、擷、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共有几十章，每章又重复演奏好几遍。假如选取其中一段演奏，就叫“摘遍”。现在人们演奏的大曲，都是选段，全都不是“大遍”了。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

唐代宫廷乐队中有拱辰管，就是古代的叉手管，是太宗皇帝赐给的现在这个名字。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今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驻守边境的军队每次获胜归来，都是全队高唱凯歌，那时古时候流传下来的音乐。凯歌的歌词很多，都是街市上的通俗语言。我在鄜延时，创作了几十支歌曲，让士兵们唱，现在还略为记得几首。第一首是：

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

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

第二首是：

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黄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

第三首是：

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

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

第四首是：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北嵬打回回。

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第五首是：

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

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传之。

《柘枝》原来的曲子遍数很多，如《羯鼓录》所记录的《浑脱解》之类，现在再也没有这么多遍数了。寇莱公喜好《柘枝舞》，会见客人一定要舞《柘枝》，每一次一舞就是一整天，当时的人说他是“柘枝颠”。如今凤翔有一位老尼姑，还是寇莱公时的柘枝舞女艺人。她说：“当时《柘枝》还有几十遍，今天所舞的《柘枝》，比起当时来不到十分之二、三。”老尼姑还能唱那些曲子，喜好的人往往互相传唱。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砢，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蓄，谓之“叫曲”。

古时候会唱歌的人有这样的话，说应当做到“声中无字，字中有声”。所有的曲子，只是一种清浊相间、高低起伏、好像弯曲的细线一样。歌词中的字，又有喉、唇、齿、舌等发音的不同。应当使每个字整个地都轻细圆润，完全融化在声音中，使它在音调转换的地方没有疙瘩，这就叫做“声中无字”，古人称为“像串起的珍珠”，现在说的“善于过渡”。比如宫音的字，而曲谱应该用商音，能够把宫音转换成商音唱出来，这就是“字中有声”，会唱歌的叫做“内里声”。不会唱歌的，声音没有高低强羽，叫做“念曲”；声音没有含蓄，叫做“叫曲”。

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昌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遇于君声无嫌。（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

羽以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读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之，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复条理矣。

五音中，宫、商、角是从声，徵、羽是变声。从，是说商、角都从属宫这个律，或者都从属宫这个吕。变，是说徵、羽这些律都从属宫、商、角这些吕，或者徵、羽这些吕都从属宫、商、角这些律。所以用从声来配君、臣、民，这个尊卑有规定，不能互相逾越。变声是用来象征事和物的，那即使与君声相遇也没有妨碍。六吕成了君声，那么商、角都要以吕调来相应，徵、羽以律调来相应。增加了变徵以后，从声和变声的关系已很随便了。隋朝柱国郑译分别列举了出来，辗转相生，共有 84 调。这样，清浊混淆，纷乱而无系统，竞相创制新声。以后又出现了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等各种手法。从声和变声就更加没有条理了。

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外国的音乐，前代本已区别为四夷乐。自从唐代天宝十三年，才有皇上的命令让宫廷乐曲与胡部乐曲合奏。从此演奏音乐完全丧失古时法规，以先王传下来的音乐为雅乐，前代的新音乐为清乐，与胡部合奏的音乐为宴乐。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古时候的诗歌都是吟咏的，然后将声调按照韵律谱成歌曲，叫做“协律”。诗人的思想感情安适平和，那就不用安适平和的声调来吟咏；诗人的思想感情忧郁怨恨，那就不用忧郁怨恨的声调来吟咏。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显得安适欢乐，那诗歌与思想感情，声调与歌曲，无不表现出安适欢乐。动乱时期的音乐显得幽怨愤怒，那诗歌与思想感情，声调与歌曲，无不表现出幽怨愤怒。这就是说仔细研究音乐便能了解政治情况的原因。

诗歌之外再加上和声，这叫做“曲”。古代乐府都是把和声与词连带写在一起的，比如说“贺贺贺”、“何何何”之类，都是和声。如今管弦乐曲中的“过门”，也是古代传留下来的手法。从唐代人开始便将词填入曲中，不再使用和声了。这种格式虽说是王涯首创，但贞元、元和年间，已有很多人这样做了，其中也有在王涯之前的人。另外，小曲中有“咸阳沽酒宝钗空”的句子，相传是李白作的，但李白诗集中有《清平乐》词 4 首，唯独没有这句诗；而《花间集》中收有“咸阳沽酒宝钗空”

这句诗，却说是张泌所作，不知哪一种说法对。

如今曲调与词意紧密配合，只有街头的民歌小调以及《阳关》、《捣练》之类，比较接近过去的传统。但唐代人填词时，多依照曲名的含意填词，所以悲哀与欢乐的情绪同曲调还比较协调。现在的文人就不再懂得曲调有哀与乐的分别了，用悲哀的曲调唱欢乐的歌词，用欢乐的曲调唱哀怨的歌词，所以，语意虽然很深切，却不能动人心弦。这是由于曲调与词意不相协调的缘故。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

古代的音乐中有三种声调，即清调、平调、侧调。王建的诗说：“侧商调里唱伊州”，就是指这个。如今乐部中还有这三种调子的音乐，曲子都比较短小，声音都很急促，只有道调、小石法曲还演奏它。虽然名称还叫三调乐，但都不再能分辨出清调、平调、侧调了，只是比其他音乐更加繁复罢了。

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虞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虞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独异志》上说：“唐朝接在隋朝的动乱之后，悬挂钟磬的架子散失，独少了徵音的磬。李嗣真秘密地寻访，听到打制弓箭的军营中的砧声，就找了一个丧车上的铃铛，到弓箭营的东南角摇晃，果然有回声，挖掘开来，找到了一块石头，把它截成四段，用来补足钟磬架上的缺漏。”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磬的声音有长短厚薄的区分。《考工记》说：“造磬的人听声音，过高了就磨它的旁边，过低了就磨它的两端。”磨那么一点点，声音就会跟着变化，哪里有把捣衣石截磨成磬还能保存原来声音的啊！况且古代音乐中宫、商还没有固定的声调，是随着音律的高低来决定，可以交替定为宫或者徵。李嗣真可能曾做过一块新磬，那些多事的人就加油添醋这样说。既然说是“截成了四段”，那就不仅仅补上徵音了。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

《国史纂异》上说：“有人在润州曾挖掘出 12 只玉磬来献给皇帝。张率更敲一敲其中的一个，说：‘这是晋朝某年所制。那一年有闰月，制磬的人依照月数，应当制了 13 只。应在埋黄钟磬东面 9 尺的地方挖掘下去，一定能再找到一个。’人们照他说的做，果然像他说的那样。”这是胡说八道！根据月份制磬，就要依照节气，这一年固然有闰月，但闰月没有中气，怎么能按照月份制造？这是无知的人编造出来的。只敲了一只磬，怎么知道是晋朝某年所制？既然是陷落在地下，哪里有工夫再按方向距离来埋呢？这实在是十分荒诞的啊！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居易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关于《霓裳羽衣曲》。刘禹锡在诗中说：“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另外王建的诗写道：“听风听雨作《霓裳》。”白居易在诗的注释中说：“开元年间，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创作。”郑嵎《津阳门寺》注释中说：“叶法善曾经把玄宗皇帝带到月宫，听到了神仙的音乐。到皇上回来，只记得一半了，就用笛子吹出来。正好遇见西凉府都督杨敬述献上《婆罗门曲》，与那仙乐的音调相符，于是就把在月宫中所听到的作为散曲序，用杨敬述所献的作为它的腔调，而取名为《霓裳羽衣曲》。”几种说法各不相同。现在蒲中逍遥楼的门楣上有唐代人横写的字，跟梵文相像，相传是《霓裳曲》的乐谱，因为字解释不清，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有人说现今燕乐中有《献仙音曲》，就是它传下来的音调。但《霓裳曲》本来是道调法曲，现在的《献仙音曲》却是小石调，不知哪种说法对。

《虞书》曰：“夏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夏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夏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虞书》说：“敲打圆磬，柏击琴瑟来歌唱，祖先会来到。”圆磬并不是可以敲打，是因为思想感情和谐到了极点，一般的歌唱不足以表达了，有时竟会又敲又打。琴瑟并不是可以拍击，是因为思想感情激动到了极点，一般的演奏不足以表达了，有时竟会又拍又击。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手舞足蹈而自己还不觉。思想感情激动到了极点，那么祖先也要受感动而到来了。从内心激发出来的思想感情，就能够表现出这样的艺术感染力。后来从事音乐表演的人，形式完整而内容不充实。乐师对于表演的追求，主要限于节奏准确、声律和谐而已。古时候的乐师，都能了解天下人的思想感情，所以悲哀和欢乐都能在内心形成，然后在声音中表达出来，那就必然有适当的动作表情来配合表现它。所以说音乐中有感情，歌声中有形态。它所以能深深地感动人，并不是仅仅依靠乐器而已。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兽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予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新五代史》记载唐昭宗驾临华州，登上齐云楼，向西北眺望京城，写了三首《菩萨蛮》。其中最后一首说：“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现在这首词的墨迹还收在陕州一座佛寺中，稿纸上写得很潦草。我前些年经过陕州曾见过一次，后人的题跋多得写满一大幅了。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复无《阳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汉至于夏口，然后溯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邕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世上的人把会唱歌的称做“郢人”。到如今郢州还有一座白雪楼，这是因为宋玉曾经说过：“有位外乡人在郢州唱歌，他先唱《下里巴人》，接着唱《阳河》《薤露》，还唱了《阳春》《白雪》，唱出了几种音调，还加上流动的音韵。”这就有了郢人会唱歌的说法，却完全不去研究这段话的意思。宋玉说“有位外乡人在郢州唱歌”，就是说唱歌的不是郢州人。他说：“那《下里巴人》，城里跟着唱的有几千人；《阳河》《薤露》，跟着唱的几百人；《阳春》《白雪》，跟着唱的不过几十人，到几种音调都出现，还有流动的音韵时，跟着唱的不过几个人罢了。”像这样楚国的老都城，各种人物都多，但能跟着唱的仅仅几个人，那就是说不懂唱歌的多了，所以用这来比喻自己。《阳春》《白雪》，都是郢州人所不会唱的，用他们做不到的事来说明他们的习俗，难道不是个大错误吗？虽然《襄阳耆旧传》说到：“楚国有个会唱歌的，唱《阳菱白露》、《朝日鱼丽》时，跟着唱的不过几个人。”这里再也没有《阳春》《白雪》的名称。另外，现在的郢州本来叫做北郢，也不是古代楚国的都城。有人说：“楚国的都城在现在的宜城界内。还有残存的废墟在。”这也不对。那是鄢城，不是郢城。据《左传》记载：“楚成王封斗宜申做商公，他沿着汉水走，又沿长江上，快要到郢城时，楚成王在渚宫里召见他。”沿着汉水到了夏口，然后溯江而上，那么郢城应当在长江的边上，不在汉水的边上。另外，渚宫大概也在郢城。楚国开始是在丹阳建都，即现在的枝江；楚文王时迁都到郢城，楚昭王时又迁都到郢，这都在现在的江陵境内。杜预在《左传》的注释中说：“楚国的国都，就是现在南郡江陵县北面的纪南城。”谢灵运《邕中集诗》说：“南登宛郢城”。如今江陵北面12里有纪南城，就是古时候的郢都，又叫做南郢。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页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主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上。（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主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

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同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簇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复纪。（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阴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

六十甲子有与它们相配的60音，很少有人察觉它的本意。其实就是60律旋相作为宫音的方法。一个音律包含五个音，12律可以相合为60音。气从东方开始，向右运行；音从西方开始，向左运行。阴阳交错，就发生了变化。这里说气从东方开始，是指四季从木开始，向右运行传到火，火传到土，土传到金，金传到水。这里说音从西方开始，是指五音从金开始，向左旋转传到火，火传到木，木传到水，水传到土。这种音律的配合与《周易》甲子的方法相同，乾配甲而坤配癸，从乾开始而到坤结束；从金开始配合音律，金就是乾，到土结束，土就是坤。音律相配的方法，同娶妻生子类似，每隔八生一个孩子，这是《汉书·律历志》上说的。这就是律吕相生的方法，五行中仲在前而孟在后，孟的后面是季，这就是依循六甲三元法则。甲子是金的仲，同位娶乙丑，同位，说的是甲与乙丙丁之类。下面都像这样。隔八下面产生壬申金的孟。隔八，即大吕下面产生夷则。下面的都像这个。壬申同位娶癸酉，隔八上面产生庚辰金的季，这里仅仅拿阳辰来说，就是依循六甲逆向传往仲孟，如果连妻来说，又顺向传往孟仲季。庚辰同位娶辛巳，隔八下面产生戊子火的仲。金三元结束，就向左行传往南方的火。戊子娶己丑，产生丙申火的孟。丙申娶丁酉，产生甲辰火的季。甲辰娶乙巳，产生壬子木的仲。火三元结束，就向左行传往东方的木。像这样左行到丁巳中吕的宫，五音一周结束。再从甲午金的仲娶乙未，隔八产生壬寅，完全像甲子的法则，到癸亥结束。这是说蕤宾娶林钟，向上产生太簇之类。从子到巳都是阳，所以从黄钟到中吕都向上产生；从午到亥都是阴，所以从林钟到应钟都向上产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然相同，但甲子乙丑是阳律，阳律都向下产生，甲午乙未是阳吕，阳吕都向上产生，60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我在《乐论》中有很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记它。

今太常钟铸，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鬼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磨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括挂之，横括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箫之“箫”，立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碍横括，以其横括所在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括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铸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括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括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

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现在太常寺的钟铸，都在钟柄靠根部处做了挂纽，叫做“旋虫”，这些钟铸都是侧向悬挂。皇祐年间，杭州西湖过出土了一座古钟，又匾又短，钟面上的枚将近半寸长，大概的形制如《考工记·凫氏》所记载的那样，只是柄是中空的，柄的上半部比下半部略小，就是称为“衡”的。我仔细地研究过它的形制，也像有道理。柄制成中空的原因，我怀疑钟铸从它们正中垂下，到了衡与柄之间，把横括挂起来。横括也许就是“旋虫”。如今探究它的名称，竹笛的“箛”，字从竹从甬。那柄只是中空的，柄的上半部略微小一点，是用来挡住横括的，因为那是横括所在，就有“衡”的作用。那横括的形状，像虫，可以旋转，我怀疑就是所谓“旋虫”。用现在的钟铸来比较，这样的衡柄中空，衡还比柄小，是想要挡住横括，好像有什么根据。现在的衡柄都是实心的，衡又比柄小，好像没有什么根据。另外，因为那个“括”横在钟铸的中间，就应该有“衡”的作用。实心的柄向上移了，还叫做横有什么作用？另外，古钟的横括能够旋转又像虫的样子，也许可以叫做“旋虫”，现在的钟钮实在是不能动的，为什么有了个“旋”的名称呢？假如把它侧向悬挂，那钟可以摇荡旋转，钟就会经常不固定，敲钟的人怎么能时时撞中钟隧呢？这都是可以怀疑的地方，不知哪种说法对。那座钟如今还在钱塘，我家里的年轻人收藏着。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山阳蔡绳为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晚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傍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裯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海州文人李慎言曾经梦见到了一座水边的宫殿里，观看宫女玩踢球的游戏。山阳人蔡绳为此写了一篇传记，很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还有十余首《抛球曲》，文词都很清丽，现在只记下两首：

侍燕黄昏晓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
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傍人认绣球。

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裯揉尽绣鸳鸯。
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卢氏杂说》：“韩皋谓稽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王陵、母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璩《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卢氏杂说》记述：“韩皋说秘康琴曲中有一首叫《广陵散》的，因为王凌、母丘俭这些人都在广陵败散，认为魏的败亡是从广陵开始，所以就把这首琴曲取名为《广陵散》。”据我考证，“散”本来是一种曲子的名称，如操、弄、掺、淡、序、引一样。所以潘岳《笙赋》写道：“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另外应璩《与刘孔才书》说：“听广陵之清散”。可见“散”是曲子的名称，就很清楚了。也可能是嵇康借这个曲名来讽刺时政，“散”取它的曲名，“广陵”是他为这曲子定的标题，两方面结合起来表示一定的意义。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 使易持。”李善注谓：“ ，马策也。裁

笛以当马，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故潘岳《笙赋》云：“修内辟，余箫外透。”“裁以当”者，余器多裁众以成音，此笛但裁一，五音皆具，当之工，水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马融《笛赋》说：“裁以当使易持。”李善注释说：“，就是马鞭。把笛子截断做成马鞭，所以拿在手中就方便。”这是错误的说法。笛子怎么可以做马鞭呢？，就是管，古人把乐器中的管叫做“”。所以潘岳《笙赋》说：“修内辟，余箫外透。”“裁以当”的意思，是说其余的乐器要裁取很多竹管来发音，这种笛子只要截取一根，就具备了五音。制造笛子的工艺并不复杂，所以能方便地拿在手中。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箎篪。”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判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运乃今时所吹五空竹篪。”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篪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篪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笛有雅笛、羌笛两种。它们原来的形制，过去有不同的说法。《周礼》说：“笙师负责箎和笛的教学。”又有人说：“汉武帝时，丘仲才制成了笛。”另一说是：“从羌人开始有的。”东汉马融歌唱长笛，说它空洞无底，上面削了五个孔，还有一个孔开在背上，正像现在的“尺八”。李善替他作注释说：“笛有七个孔，长1尺4寸。”这却是现在的横笛，太常礼院鼓吹部叫它做“横吹”，不是马融所歌唱的那种。马融在赋中说：“京君明懂得音律，所以在原来四个孔之外增加一个孔，君明所加的孔开在后面，这就是商音，五音就完备了。”沈约《宋书》也说：“京房使五音完备了。”《周礼·笙师》的注释中说：“杜子春说：篪就是现在所吹的五个孔的竹笛。”照马融、沈约所写的来说，古时候的笛不应当有五个孔。那么杜子春的说法也就不一定对。现在《三礼图》画篪也是横着拿，又有五个孔，也不知根据什么典籍作依据。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常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微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喻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呾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呾陀”也。

古琴虽然用桐木制成，但要用存放了多年、水分已干尽的，声音才激昂。我曾见过唐代初年路氏所制的琴，木性都已干透到将近朽了，而它的声音更加清脆。我还常常能见到越地人陶道真收藏的张越所制的琴，传说是古墓中腐烂棺材的杉木，声音非常刚劲有力。吴地智和和尚有一张琴，琴的颜色有点像碧玉一般，用带花纹的石头做琴轴，制作规格和音韵都达到完美的境地。琴底板上有李阳冰书写的几十个篆字，它的大意是：“南溟岛上找到了一根木头，名叫伽陀罗，木纹如同银屑，它的坚

硬程度像石头一样，让工匠修制成这张琴。”文字古朴苍劲。制琴的材料要有轻、松、脆、滑的特点，叫做“四善”。木质坚硬得像石头那样，可以用来制琴，也是以前所不知道的。《投荒录》说：“琼州所属地区有很多乌、喏陀树，都是稀有的木材。”我怀疑“伽陀罗”就是“喏陀”。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似，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湖间。人亦莫知其如何者为吴音。

高邮人桑景舒生性懂得音乐，听到各种东西发出的声音，都能预测它的祸福。他特别精通音律。过去传说有一种虞美人草，听到人们演奏《虞美人曲》，便枝叶都摇动起来，演奏别的曲子就不这样。桑景舒试了一次，真如传说的那样。他在仔细了解这个曲子的音调后说，“那都是吴地的音乐”。又一天，他拿来一张琴，试着用吴地音调创作一支曲子，对着虞美人草演奏，它的枝叶也摇动起来，就叫这曲子为《虞美人操》。那音调与《虞美人曲》完全不相接近，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音符相似，但草还是有了反映，与演奏《虞美人曲》没有区别，音律调式乐器都相同，这草对音乐的领会竟达到了这样奇妙的程度。桑景舒中过进士，最终还是个州县官。现在《虞美人操》还在长江太湖一带流行，但人们也不知道哪些是吴地的音调。

卷六 乐律二

前世遗事，时有于古人文章中见之。元稹诗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盖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调。稹诗言人十一调，人多不喻所谓。予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簇、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始喻稹诗言，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徽，徽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声皆当如此。古人仍须以金石为准，《商颂》“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简，不复以弦管定声，故其高下无准，出于临时。怀智《琵琶谱》调格与今乐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尚有雅律遗法，今之燕乐，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乐工自不能言其义，如何得其声和。

从前留下来的事情，有时从古人的文章中见得到。元稹的诗中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84调，因为12律各有7韵，才构成84调。元稹诗中说81调，许多人都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我在金陵丞相家里找到一本唐代贺怀智的《琵琶谱》，书的序言说：“琵琶84调，其中黄钟、太簇、林钟的宫声调琴弦上弹不出来、要用管色来定弦。其余81调，都以这三个调为基准，用不着再用管色来定弦了。”我这才知道元稹诗中说的意思。像现在调琴，要先用管色合字定出宫弦，才好用宫弦向下定出徽弦，徽弦向上定出商弦，上下互相配合，在少商弦上结束。凡是往下定弦要隔两根弦，往上定弦隔一根弦。所有的弦乐器都应当这样。古人定弦还要用金石类乐器作标准，《诗经·商颂》中“依我磬声”就是这样。现在的人马虎了事，不再用弦乐器、管乐器来定声调，所以它的高低没有标准，都是临时定的。贺怀智《琵琶谱》的调格，与现在的音乐完全不同。唐代人的音乐学识精深，还保存着雅律留传的法则。现在的燕乐，古代的音韵大多失传了，新的曲调又大都没有规矩。乐师们自己都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怎么能使声音和谐！

今教坊燕乐，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当宫声，比宫之清宫微高。外方乐尤无法。大体又高教坊一均以来。唯北狄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乐疑亦唐之遗声也。

现在教坊里的燕乐，比雅律中的高二韵弱，“合”字比太簇稍微低一点，却用“凡”字作为宫声，又比官的清官稍高。外来的音乐更不合法则，了解它的格式又比教坊燕乐高一韵多。只有北狄音乐比教坊音乐低二韵。北狄人的衣冠饰物，大多按照唐代风俗，这种音乐大约也有唐代音乐的遗风吧。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申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现在的燕乐28调，分布在11律中，只有黄钟、中吕、林钟三律都适合宫、商、角、羽四种音调，其余的或者只有一调，或者二、三调，唯独蕤宾一律都不合。其中的管仙吕调，是在蕤宾律上，又不完全符合本律，这中间的声音有出入，也不完全符合古代的法则，只是略为可以配合罢了。观今

的中吕宫，都是古代的夹钟宫；南吕宫是古代的林钟宫。现在的林钟商是古代的无射商，现在的大吕调是古代的林钟羽。即使是宫廷里的乐师也没有人能够弄清其中的原因。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簇之间，“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簇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

12律连同清宫，应当有16个音。现在的燕乐只有15个音。大概现在的燕乐比古时的音乐高2律以下，所以没有正黄钟声，仅仅以“合”字正对大吕，还略微低了一点，应当在大吕和太簇之间，“下四”字接近太簇，“高四”字接近夹钟，“下一”字接近姑洗，“高一”字接近中吕，“上”字接近蕤宾，“勾”字接近林钟，“尺”字接近夷则，“工”字接近南吕，“高工”字接近无射，“六”字接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簇清，“高五”字为夹钟清。规则虽然是这样，但各个音调的杀声都不能全回到本律，所以有了偏杀、侧杀、寄杀、元杀等。虽然与过去的规则不同，推论起来也都是有理的。懂得音乐的人都能说明这一点，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古法：钟磬每虞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虞又自应一律，有黄钟之虞，有大吕之虞，其他乐皆然。且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谓之清徵，或谓之清角。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音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极天地至和之声，世之乐工，弦上音调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古时候的规则，钟磬每架挂16只，就是16律的意思。但每一架还应各自对应一律，这就有黄钟架、大吕架，其他乐器也都是这样。就以琴来说吧，声音虽然都清脆响亮，其中还是有重音、有轻音。琴本身就有五音，所以古人给琴取名，有的叫做“清徵”，有的叫做“清角”。还不仅仅有五音，还应和着各个调。我的朋友家有一张琵琶，放在空屋子里，用管色奏出双调，琵琶弦总有声音和它共鸣，奏别的调子就不发生共鸣，就把它当作奇特的东西加以珍爱。哪里知道这是很普通的道理。在28个调中，只要有音高相同的，就会产生共鸣；假如奏遍28调而不产生共鸣，那就是逸调声了。古时候的音乐规则，一个乐律有7个音，12律共有84调。再细分一点，还不止84这个数。逸调声最多，人们偶然在28调中发现有共鸣现象，就感到奇怪，其实这是普通的道理。这是声学中最精妙的地方。现在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能最充分地运用天地同一切最和谐的声音。世上的乐师，连琴弦上的音调还不知道，哪有功夫顾到这些呢！

卷七 象数一

开元《大衍历法》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至熙宁中考之，历已后天五十余刻，而前世历官，皆不能知。《奉元历》乃移其闰朔，熙宁十年，天正元用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夷朝贡者用旧历，比来款塞。众论谓气至无显验可据，因此以摇新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暑景，与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长不同，则知天正之气偏也。凡移五十余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为验，论者乃屈。元会使人亦至，历法遂定。

开元年间的《大衍历法》是最精密的，每一代都用它的推算朔的方法。到熙宁年间考核下来，历法的节气比实际天象推迟了 50 多刻，但前代的历法官都不知道。《奉天历》改变了原来历法的闰月和朔的时刻。熙宁十年，冬至原来定的是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方朝贡的人都是用的旧历，近来都入境了。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没有明显的迹象证明节气到了，想以此来推翻新历。皇帝就把这件事下达给主管部门考核鉴定。一般情况下，立冬的日影和立春的日影长度是相像的。现在两个节气的日影长短不同，由此知道冬至节气在历法上与实际有了偏差。要一共移动 50 多刻后，立冬和立春的日影才相当。用这一点作为验证，原来议论的人才服输。正好元旦潮会时各方使者也到了，历法就确定下来了。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登”避仁宗嫌名。），为正月将；戌曰“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类。“太阳过宫”者，正月日躔娵訾，二月日躔降娄之类，二说一也。此以《颛帝历》言之也。今则分为二说者，盖日度随黄道岁差。今太阳至雨水后方躔娵訾，春分后方躔降娄。若有“合神”，则须自立春日使用亥将，惊蛰使用戌将。今若用太阳，则不应合神；用合神，则不应太阳，以理推之，发课皆用月将加正时，如此则须当从“太阳过宫”。若不用太阳躔次，则当日当时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应天行。以此决知须用太阳也。然尚未是尽理，若尽理言之，并月建亦须移易。缘目今斗杓昏刻已不当月建，须当随黄道岁差。今则雨水后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后四日方合建卯，谷雨后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与太阳相符，复会为一说。然须大改历法，事事厘正。如东方苍龙七宿，当起于亢，终于斗；南方朱鸟七宿，起于牛，终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娄，终于舆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东井，终于角。如此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就是把天分为 12 辰。亥，叫做“登明”；“登”是避讳仁宗的名字。这是日、月在正月相会的地方。戌，叫做“天魁”，是在二月相会的地方。古人称做“合神”，又叫“太阳过宫”。“合神”，是说正月北斗星的斗柄指在寅位，日月相会在亥位；二月北斗星的斗柄指在卯位，日月相会在戌位，等等。“太阳过宫”，是说太阳在正月运行到娵訾，二月运行到降娄，等等。这两种说法是一致的。这是根据《颛帝历》的说法。现在分成了两种说法，是因为太阳的运行时间每年都有差异。现在太阳到雨水后才运行到娵訾，春分后才运行到降娄。假如按照“合神”的说法，那要从立春日就用“登明”，惊蛰就用“天魁”。现在假如按照“太阳过宫”的说法，就不同“合神”相应；按照“合神”，也不同“太阳过宫”相应。用这个理推算，占卜算卦按月亮运行加上正时，像这样就应按照“太阳过宫”的说法了。假如不按照太阳运行的次序，那么当天当时的日月、五星、天干地支、二十八星宿都不会与天体运行相应。凭这一点清楚地知道必须按照太阳过宫。但也还不是完全符合规律；如果

完全按规律来说，就连每月所建之辰也要移动，因为现在看到的北斗星的斗柄黄昏时所指方位与每月所建之辰已不相当，应跟着每年的差别而改变。现在雨水后一天北斗星的斗柄才指向寅位，春分后四天才指向卯位，谷雨后五天才指向辰位。这样一来才与太阳过宫的算法相符，以上两种算法才能统一为一种说法。但这样必须对历法进行大的修改，事事都要更正。比如东方苍龙七宿，应改为从亢宿开始，到斗宿终结；南方朱鸟七宿，应从牛宿开始，到奎宿结束；西方白虎七宿，从娄宿开始，到鬼宿完结；北方真武七宿，从井宿开始，到角宿终止。像这样，历法才得到校正，就不仅是六壬罢了。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释其义曰：“正月阳气始建，呼召万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华叶从根而生，故曰‘从魁’。四月阳极无所传，故曰‘传送’。五月草木茂盛，逾于初生，故曰‘胜先’，六月万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谷成实，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条坚刚，故曰‘天罡’。九月木可为枝干，故曰‘太冲’。十月万物登成，可以会计，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复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为酒醴以报百神，故曰‘神后’。”此说极无稽据义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阳始兆于地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从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从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传送”者，四月阳极将退，一阴欲生，故传阴而送阳也。“小吉”，夏至之气，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小人之吉也，故为婚姻酒食之事。“胜先”者，王者向明而治，万物相见乎此，莫胜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刚之所建也。（斗杓谓之刚，苍龙第一星亦谓之刚，与斗刚相直，）“太冲”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门户，天之冲也。“功曹”者，十月岁功成而会计也。“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称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天 12 辰，古人解释它的意思是：“正月阳气才生发，呼唤万物生长，所以叫‘登明’。二月万物生根发芽，所以叫‘天魁’。三月万物的花和叶从根茎上长出，所以叫‘从魁’。四月阳气十分充足没有别的传来，所以叫‘传送’。五月草木长得茂盛，所以叫‘胜先’。六月万物较为旺盛，所以叫‘小吉’。七月各种谷物开始长成果实，自己能够依靠自己，所以叫‘太一’。八月枝条变得坚硬刚直，所以叫‘天罡’。九月树木可以变得干枯，所以叫‘太冲’，十月万物都已成熟，可以计算收成了，所以叫‘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位，太阳又回到它的起点，所以叫‘大吉’。十二月酿酒来报答各路神灵，所以叫‘神后’。”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没有道理。据我考证，登明，指正月三阳开始出现在大地上，在田间现出了龙形，天下都呈现锦绣光明，所以叫登明。天魁，就是斗魁第一星。斗魁第一星到了戌位，所以叫天魁。从魁，是斗魁第二星，斗魁第二星到了酉位，所以叫从魁。北斗星的车柄一星在方，斗魁二星在方，一星到了酉位。传送，指四月阳气到了顶点即将衰退，阴气正要发生，所以就传阴而送阳。小吉，指夏至之气去的多而来的少，年轻人适宜成长，是年轻人的好日子，所以办理婚姻酒宴这样的事。胜先，说的是君王在贤明治国，万物在这时相互表现，没有能超过这时的。太一，是太微垣所在的位置，太一所停留的地方。天罡，即北斗星斗勺所在的方向。斗勺叫做刚，苍龙第一星也叫做刚，与斗刚相遇。太冲，是日月五星出入的门户，上天的卫护。功曹，指到了十月一年的功夫有了成效可计算了。大吉，指冬至之气去的少来的多，君子适宜成长，是大人们的好时光，所以正适合与文武大臣有关的事。十二月子位，正是北方的正中，上帝住的地方。神后，就是帝君的称呼。天上 12 辰，都是用天下事命名的。

六壬有十二神将，以义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将，贵人为之主，其前有五将；谓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谓寅、卯、辰、巳、午。）其后有五将：谓天后、太阴、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谓未、申、酉、亥、子。）唯贵人对相无物，如日之在天，月对则亏，五星对则逆行避之，莫敢当其对，贵人亦然，莫有对者，故谓之“天空”，空者，无所有也。非神将也，犹月杀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对见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将，前二火二木一土间之，后当二会二水一土间之。真武合在后二，太阴合在后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六壬有 12 神将，按它们的意义来考究，只应有 11 神将。贵人是主子，它的前面有 5 将，叫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这是木、火之神在地的左方。地的左方叫寅、卯、辰、巳、午。它的后面也有 5 将，叫天后、太阴、真武、太常、白虎，这是金、水之神在地的右方。地的右方叫未、申、酉、亥、子。只有贵人无物可对，比如太阳在天，月亮如同它相对就亏虚，五星同它相对就倒退避开，没有敢同它对。贵人也是这样，没有同他相对的。所以叫做“天空”，空，就是什么也没有。不是神将，正像月食时有月空一样。用它来占卜事情的吉凶，吉凶都是空无根据的，只有寻找那些相对可见的以及能向君王申述道理的神将，遇见它才是吉利的。11 将，前面 2 火 2 木中间夹着 1 土，后面应是 2 金 2 水中间 1 土夹着。真武应在后面的两个中，太阴应在后面的三个中，现在两神将交叉重叠，这情形似乎令人怀疑。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星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之。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见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星，大火为之长；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后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近辅，远乎日不过一辰，故为行星之长。）

天下事物用“辰”来命名的很多，都来源于“辰巳”的“辰”。现在略举几件事：12 支叫做 12 辰，一时叫做一辰，一日叫做一辰，日、月、星叫做三辰，北极星叫做北辰，大火星叫做大辰，五星中有辰星，四季的时令叫做五辰，《尚书》说“顺着五辰”就是指此。以上都叫做“辰”。现在考证从子丑到戌亥叫做 12 辰的原因，据《左传》说：“太阳和月亮会合这就叫做‘辰’。”一年中太阳月亮会合 12 次，就有 12 辰。太阳月亮会合时所在的星宿，是从东方苍龙角宿和亢宿这两个星宿开始的，都从辰位起始，所以用它开始的方位来命名。从子丑到戌亥的月份既已叫做“辰”，那么 12 支、12 时都从子丑到戌亥，毫无疑问也叫做“辰”。一天叫做一辰，是按 12 支来说的，按照 10 干来说，叫做“今日”；按照 12 支来说，叫做“今辰”。所以支、干叫做“日辰”。日、月、星之所以叫做三辰，

是因为日、月、星有时在早晨都能看到，就用能看到它们的时间命名，所以都叫它们为“辰”。四季看到它们的时间有早有晚，到了辰时，四季中都能看到，所以“日”加在“辰”的上面成了“晨”，表示太阳才出来的时候。星有三类，一类是经星，北极星是它们的头；二类是舍星，大火星是它们的头；三类是行星，辰星是它们的头。所以这些星都叫做“辰”。北极星在它自己的地方，许多星星环绕着它，所以它成了经星的头。大火星处在天王的地位，所以它成了舍星的头。辰星是太阳的近邻，距离太阳不过一辰，所以它是行星的头。

《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上面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力生数，各并中央之上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上不须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

《尚书·洪范》中“五行”的数，从一到五。过去的学者说这是五行相生之数，各加上土的数，把它作为整数。因此说五行没有土不成，所以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起来是五十又五。只有《黄帝素问》中，土的相生之数是五，整数也是五。那是因为水、火、木、金都要依靠土才能形成，土则另外没有什么依靠，所以只是一个五罢了。把这个画成图，其中的道理可以看出来。画成的图，在东方设置木，在西方设置金，火在南方，水在北方，土在中央，四方本来是相生之数，各自连同中央的土而成为整数。土自己处在本位，另外没有什么相连的，自然只有五这个数，因为土不必另外依靠土才能形成。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就是大衍的数。这也有道理。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则一，而四十九隐于一中；散之则四十九，而一隐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则归于一，动则惟睹其用。一在其间而不可取。此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数蓍草的法则：49根蓍草，集中起来就是“一”，那49就隐在“一”中间；分散开来就是49，那“一”就隐在49中间。所谓“一”，就是“道”。认为它无那“一”就存在，认为它有那“一”就不可取。49，是应用的。静，就回到了“一”；动，就只看见它的应用。“一”在其中却不可取。这就是说“大衍的数字是50，它那应用的是49”。

世之谈数者，盖得其粗迹。然数有甚微者，非巧历所能知，况此但迹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迹不预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迹求，况得其粗也。予之所谓甚微之迹者，世之言星者，恃历以知之，历亦出乎亿而已，予于《奉元历序》论之甚详。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钦天》凡十一家大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历岂足恃哉。纵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里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经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历之能知也。又一时之间，天行三十余度，总谓之一宫。然时有始末，岂可三十度间阴阳皆同，至交他宫则

顿然差别？世言星历难知，唯五行时日为可据。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长者，止是知一岁之间，如冬至后日行盈度为阳，夏至后日行缩度为阴，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长，望前月行盈度为阳，望后月行缩度为阴，两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问》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剧。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剧。”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时也。安知一时之间无四时，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无四时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纪、一会、一元之间又岂无“大四时”邪？又如春为木，九十日间，当氤氲消长，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时属木，明日子时顿属火也。似此之类，亦非世法可尽者。

世上那些谈论命运的大概只了解它的皮毛。这命运有很细微的，不是灵巧的历法所能明白的，何况这只是一点迹象罢了。至于说“心有所感就透彻地了解天下的变故”的，实际上并不事先知道。这就是所以说那先知先觉的神异，也不容易推究，何况还是了解一个大略。我所说的很细微的情况，像世上谈论星象的人，凭借历法来知道一点，其实历法也是出自揣测罢了。我在《奉元历序》中论述得很详细。治平年间，金、火在转星处会合，依照《崇真》、《宣明》、《景福》、《明崇》、《钦天》共 11 家大的历法推算，都不相合，有相差 30 天以上的。历法哪里可以依凭呢！即使在那个范围里面，但又有运行在一年之中的，运行在一年之外的，运行在一年之上的，运行在一年之下的，有依循标准的，有违反标准的，有冲犯经星的，有冲犯客星的，所占算的各有不同，这也不是历法能够明白的。另外，一时之间，天象运行 30 多度，总起来叫做一宫。但时间有始有终，难道可以说 30 度阴阳都相同，到接触别的宫就立刻有了差别？一般人说星象历法难以了解，只有五行时日是可依凭。这也不对。一般人说五行消长变化，仅仅知道一年之中，比如冬至后太阳运行有增长度为阳，夏至后太阳运行有亏减度为阴，春分、秋分运行均为平均之度。却不知道在一个月中间，自有消长变化，望日以前月亮运行有增长度为阳，望日以后月亮运行有亏减度为阴，上弦、下弦运行均为平均之度。至于像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一个月中间也是这样。不只是一月之中，一天之中同样如此。《素问》说：“肝部有疾病，寅、卯时发病，到申、酉时加重，心脏有疾病，巳、午时发病，到子、亥时加重。”这是说一天之中本来也有四时的区分。哪里知道一时之中没有四时，哪里知道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没有四时呢？又哪里知道十年、百年、一纪、一会、一元之中难道没有“大四时”吗？又比如春属木，90 天中，应该不停地变化，不会在三月三十日亥时属木，第二天子时立刻就属火了。像这一类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规则可以全部包括得了的。

历法步岁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谓之“斗分”，故“岁”文从“步”从“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历法中推算年分的方法，是把冬至时北斗星斗柄所到的方位，直到第二年冬至所到的方位，那天数的非整数部分，叫做“斗分”，所以“岁”字从“步”从“戌”。戌，就是斗星、魁星所到的方位。

正月寅，二月卯，谓之“建”，其说谓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说。但春为寅卯辰，夏为巳午未，理自当然，不须因斗建也，缘斗建有岁差，盖古人未有岁差之法。《颛帝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则正月建丑矣。又岁与岁合，今亦差一辰。《尧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东壁，此皆随岁差移也。

正月北斗星斗柄指寅，二月指卯，叫做“建”，这一说法是由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得来的，

其实不一定用这种说法。春季为寅、卯、辰，夏季为巳、午、未，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不必要根据斗柄所指的方位来说明。因为斗柄所指的方位有岁差的变化，而古人还未发现计算岁差的方法。《颛帝历》说：“冬至那天太阳停留在牛宿初度。”现在冬至那天太阳却停在斗宿六度，古时正月的斗柄指寅，现在正月的斗柄却指丑了。把古时和现在每月斗柄所指的方位一比较，现在也比过去相差一辰了。《尧典》说：“白天最短那天昴宿在天顶。”现在白天最短那天黄昏时却是壁宿在天顶，这都是随岁差引起的变化。

《唐书》云：“落下闳造历，自言‘后八百年当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说也。落下闳历法极疏，盖当时以为密耳。其间阙略甚多，且举二事言之。汉世尚未知黄道岁差，至北齐张子信方候知岁差。今以古今历校之，凡八十多年差一度。则闳之历八十年，自己差一度。兼余分疏阔，据其法推气朔五星，当时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诞也。

《唐书》说：“落下闳编制历法时，自称‘八百年后应该有一日之差’。到唐代，一行和尚出来纠正了这个说法。”这是错误的记载。落下闳的历法非常粗糙，而在当时认为是精确的，其中缺漏的地方很多，就举两个例子说说吧，汉代还不知道黄道岁差，到北齐张子信经过观察才知道了岁差。如今把现行历法与古代历法相比较，80多年相差1度。那落下闳的历法，80年就差1度了。再加上余分计算马虎，根据他的历法推算节气、朔日和五星运行，在当时就不能应用，不必等80年，竟说“八百年有一日之差”，太荒谬了。

天文家有浑仪，测天之器，设于崇台，以候垂象者，则古玑衡是也。浑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银转之，置于密室，与天行相符，张衡、陆绩所为，及开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礼部试《玑衡正天文之器赋》，举人皆杂用浑象事，试官亦自不晓，第为高等。汉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谓之“极星”，自祖亘以玑衡考验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熙宁中，予受诏典领历官，杂考星历，以玑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每“极星”入窥管，别画为一图。图为一圆规，乃画“极星”于规中。具初夜、中夜、后夜所见各图之，凡为二百余图，“极星”方常循圆规之内，夜夜不差。予以《熙宁历奏议》中叙之甚详。

天文学家有浑天仪，是观测天体的仪器，安置在高台上，用来观察天空星象的，就是古代叫做“玑衡”的东西。浑象，是模拟天体运行的仪器，用水冲击它，或用水银转动它，安置在密闭的房子里，与天体运行的情况相符，张衡、陆绩所造的，唐代开元年间放置在武成殿的，都是这种仪器。皇祐年间，礼部考试，题目是《玑衡正天文之器赋》，应试的举人都把关于浑象方面的事夹杂在一起乱说一通，主考官自己也不懂，还把这样的举人录取在很高的名次上。汉朝以前，人们都认为北极星在天空的正中，所以称它为“极星”。自从北齐祖亘用玑衡考察北天极，才发现是在极星末部1度多的地方。熙宁年间，我奉诏令主管历官，多方面考察星象和历法。我用玑衡观察北极星，夜晚开始时从窥管中还可看到极星，过了一会就到窥管外面了，因此知道窥管大小，不能容纳极星运转的情况，于是稍为扩大窥管再观察它，一共经过3个月，极星才在窥管范围内运行，再也不移到窥管外了，这才知道北天极是在离极星3度多的地方。每当极星进入窥管孔中，我分别画成一张图。图上有一圆圈，把极星画在圈中，把黄昏、半夜、后夜的情况分别画成图，一共200余张，极星才一直在圆圈内运行，

昼夜不差。我在《熙宁历奏议》中写得很详细。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子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其间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涩，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渐所壅，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然后复求晷景漏刻，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缩，其消长以渐，无一日顿殊之理。历法皆以一日之气短长之中者，播为刻分，累损益，气初日衰。每日消长常同；至交一气，则顿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圆，纵有强为数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数相诡。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数，方圆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荡，无所附益，混然冥会者，真数也。其术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环天正圆，圆之为体，循之则其受至均，不均不能中规衡；绝之则有舒有数，无舒数则不能成受。以圆法相荡而得衰，则衰无不均；以受法相荡而得差，则差有疏数。相因以求从，相消以求负。从负相入，会一术以御日行。以言其变，则秒刻之间消长未尝同；以言其齐，则止用一衰，循环无端，终始如贯，不能议其隙。此圆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积，反生日衰，终始相求，迭为宾主，顺循之以索日变，衡别之求去极之度，合散无迹，混如运规。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与其微也。其详具于奏议，藏在史官，及子所著《熙宁晷漏》四卷之中。

古今谈论刻漏的有几十家，都是十分粗疏而又错误的。历法家中谈到晷漏的，从《颛帝历》到现在，在世上流行而称为官方颁行的历法的，共有 25 家。它们测算刻漏的方法都不符合天象实际运行的度数。我观测了天象与日影，以至用浑仪浑象检验，用所得数据考核刻漏的下水量，经过 10 多年，才粗略地推算出时间的真实数据。写成 4 卷书，叫做《熙宁晷漏》，都没有沿用前人的痕迹。其中有两件事最为精细。一件是，一般研究刻漏的人往往担心冬天水不流畅、夏天水滑，以为水性本来是那样，又怀疑冰屑会阻塞刻漏的通道，千方百计地调整刻漏，最后还是不符合标准，我按道理分析，冬至太阳运行得快，在天上还没有运行到一周，而刻漏表上的一天已经过了，所以这一天实际上超过 100 刻；夏至太阳运行较慢，在天运行已经一周，而刻漏的表上一天还不到，所以这一天实际上不到 100 刻。得到了这些数据，再去探求日影与刻漏所测的时间，它们没有一个不是吻合的。这是古人所不知道的。另一件是，太阳运行时间的多少，它的增减有一个过程，没有在哪一天突然改变的道理。历法中都将一个节气中时间短长的平均值，表现为刻这样的单位，累积亏减和增长。在节气刚开始时时间一天天减少，而每天减少的时间都是相同的，到两个节气相交，就突然减少到刻。所以黄道就像有了棱角而不圆了。即使勉强凑成一个数来测算，也不会像依据常理运算那样，会常常出现实测与计算不吻合的现象。一般来说，物体总是有一定形状的，每一种形状都有相对应的数据。如方形、圆形、正方体、斜体，都是确定的形体，用乘、除等方法计算，不增加其他东西，结果全都暗暗相合，这也就是一定的数据。这些方法只可以用心去体会，不能用语言来说明。黄道环绕天体是一个正圆，圆是它的本体，依照回来计算就会是稳妥平衡的，如果不平衡就不能用圆规来衡量。分开来看，太阳运行有慢有快，没有快慢就不会平稳。用圆法计算会得到差，那差无不是均等的；用稳妥的方法计算也舍得到差，那差就会有大有小。经过相乘或相减的运算，把结果汇总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式来阐释太阳运行的规律。要说它的变化，那一秒一刻之间的增减并不相同；要说它的完整性，那只用一项差数，就循环而无尽头，始终连贯地计算，不能有间断。这是圆法的精密之处，是古时推算天象的人所不懂

的。由日差到日积差，反过来再变为日差，互相推求，互为宾主。依照这个规律去探求太阳运行的变化，比较其他方法求取日积的行程，综合分析毫无破绽，就会像运用圆规一样准确。要是不深刻了解运算的方法，就不能深入到它的精微之处。这些我都详细地写进了奏章中，收藏在史官那里，同时也写进了我的著作《熙宁晷漏》四卷里面。

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官长问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对曰：“天事本无度，推历者无以寓其数，乃以日所行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余而一期天，故以一日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记之，然后可窥而数，于是以当度之星记之，循黄道日之所行一期，当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反如伞椽，“当度”谓正当伞椽上者。故车盖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则予浑仪奏议所们“度不可见，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谓之舍，含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数也”。今所谓‘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黄道所由当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我在昭文馆编校文书时，参与审定浑天仪。官长问我：“在28宿中，每宿的度数多的有33度，少的只有1度，这样不均匀，是什么原因呢？”我回答说：“天体运行本来没有刻度，推算历法的人没有办法表示它的度数，就根据太阳在天上运行一周的天数分为365°多。太阳运行一周为365天多一点，就把一天作为一度。既然分出来了，必然要有物体作为标志将它记住，然后才可以观测和计数，于是用与度的位置相当的星作为标记，而沿着黄道一周，在整度数上的星只有28个而已。度就如同伞骨子，当度的意思就是星在伞骨上。伞盖上有28根弓形骨子，用来象征28宿，就是我在《浑仪奏议》中说的：“度是不可见的，可见的只有星。日、月、五星所经过的路径上，有星存在，其中正当整度数上的有28个，称为舍，舍是定度的标记，有了标记就可以确定度数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距度星’。并不是不想定得均匀，黄道上正当度数的星只有这些罢了。”

又问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予对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值而无碍。”

官长又问我：“日月的形状，像回球呢，还是像团扇？假如像圆球，那它们相遇时难道不相互阻碍吗？”我回答说：“日月的形状像圆球。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月圆月缺的现象中可以验证。月亮本身不发光，就像一个银球，太阳照射它才有光。月光初现时，太阳在它的旁边，阳光从侧面照着它，所以看上去像个钩子；太阳渐渐远了，斜照着月亮，月亮就渐渐圆起来了。比如一个圆球，用白粉涂掉它的一半，从侧面看，涂粉的地方像个钩子；从正面看，就是一个正圆了。这就是我判断它们像圆球的依据。太阳、月亮都是气，有形状但没有实体，所以相遇时不会相互妨碍。”

又问：“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予对曰：“黄道与月道，如二环相叠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则日为之蚀，正一度相对，则月为之亏。虽同一度，而月道与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当其交处则蚀；而既不全当交道，则随其相犯浅深而蚀。凡日蚀，当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内，则蚀起于西南，复于东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则蚀起于西北，而复于东南。日在交东，则蚀

其内；日在交西，则蚀其外。蚀既则起于正西，复于正东。凡月蚀，月道自外入内，则蚀起于东南，复于西北；自内出外，则蚀起于东北，而复于西南。月在交东，则蚀其外；月在交西，则蚀其内。蚀既则起于正东，复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罗睺、计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谓之‘罗睺’，交中谓之‘计都’。”

官长又问：“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每个月相会一次，相对一次，但有时发生食、有时不发生食，是什么原因呢？”我回答说：“黄道和月道，就像两个圆环相叠而稍有一点偏差。一般说来，太阳和月亮如果同在一个黄经圈上相遇，就出现日食；在同一黄经圈相对，就发生月食。即使在同一黄经圈上，月道与黄道不相靠近，自然不会互相侵蚀；在同一黄经圈而又靠近黄道、月道的交点，太阳和月亮相遇，就会互相交错而遮掩。如果正好在黄道、月道的交点，就发生全食；假若不完全处在黄道、月道的交点上，就会按照它们相遮的程度不同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偏食。日食时，当月亮从外到内与黄道相交，日食就从西南方开始，到东北部复圆；当月亮从里面穿过外面，日食必定从西北部开始，到东南方复圆。当太阳在交点的东南时，偏食的方位必定在太阳的北侧；当太阳在交点的西南时，偏食的方位必定在太阳的南侧。全食时，初亏的方位必定是在太阳的正西面，到正东面复圆。月食时，当月亮从黄道外面入内，那月食的初亏方位必定从月亮的东南部开始，到西北部复圆；当月亮由黄道内向外运行时，那月食的初亏方位必定从月亮的东北部开始，在西南部复圆。月亮在交点的东边，那偏食的方位必定在月亮的南部；月亮在交点的西边，那偏食的方位必定在月亮的北部。全食时，初亏的方位必从月亮的正东开始，到西部复圆。黄道和白道的交点每月向西后退 1° 多，经过249个交点就是一个周期。所以印度历法上的‘罗睺’、‘计都’都是由东向西退行的，也就是现今所说的黄道、白道的交点了。开始的那个交点叫做‘罗睺’，中间的那个交点叫做‘计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辞。《周礼》：“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如鱼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汉人尚视其体；今人虽视其体，而专以五行为主，三代旧术，莫有传者。

古代占卜的人都有繇辞。《周礼》上有“三兆，它的卦辞1200”的说法。如“凤凰子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如鱼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等等都是。如今这样的书已失传了。汉代人还见到了它们的卦象；现在的人即使看到卦象，也专门以五行为主，夏、商、周三代的老方法，没有流传下来的。

北齐张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则行速，星多则尤速。月行自有迟速定数，然遇行疾，历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说，亦阴阳相感自相契耳。

北齐张子信根据天象占验吉凶，认为大凡月亮前面有星就运行得快，星多就更快。其实月亮运行本来有它的快慢的标准，但遇到它运行迅速，数数它的前面一定有星。照张子信的说法，也是阴阳相互感应又相互契合罢了。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

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溥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晴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之谓“从”，天气明絜，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厉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初之气厥阴，以至终之气太阳者，四时之常叙也，故谓之主气。唯客气本书不载其目，故说者多端。或以甲子之岁，天数始于水十一刻；乙丑之岁，始于二十六刻；丙寅岁，始于五十一刻；丁卯岁，始于七十六刻者，谓之客气。此乃《四分历法》求大寒之气，何预岁运？又有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谓之客气。此亦主气也，与六节相须，不得为客。大率臆计，率皆此类。凡所谓“客”者，岁半以前，天政主之；岁半以后，地政主之。四时常气为之主，天地之政为之客。逆主之气为害暴，逆客之气为害徐。调其主客，无使伤沴，此治气之法也。

医家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大到预测天地的变化，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等灾害，通常都有一定的规律；小到人的各种疾病，也都随着气运的盛衰而变化。现在的人不会运用，而拘泥于固定的方法，所以他们用起来都不灵验。假如“厥阴”占主导地位，它的气候特点是多风，人们容易得腹泻病，难道天下到处都是多风，天下的人们都患腹泻病吗？至于同一个地方，也有晴雨的不同。这些气运的主导作用又哪里去了呢？这样应用，要想不出错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事物的发展规律有正常和异常变化的区别。运气占主导地位时，是正常变化；不是运气占主导地位时，都是异常变化。正常变化合乎本来的气运，异常变化是无所不至的，而各有不同的征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太足等多种变化，它们的来源都不相同。假如厥阴起作用，风多，草木繁荣茂盛，这叫做“从”；天气晴朗，干燥无风，这叫做“逆”，天空尘土飞扬，流水不结冰，这叫做“淫”；大风刮断树木，乌天遮天翻滚，这叫做“郁”；山泉湖泽干涸，草木枯萎凋谢，这叫做“胜”；大暑大热，螟蝗成灾，这叫做“复”；山崩地震，不时风沙满天，这叫做“太过”；突然阴云密布，白日天暗，这叫做“不足”。随着这些变化，可能会相应发生流行病，这都要看当时当地出现的情况而定。虽然相隔只有几里，但气候不同，相应发生的情况也就完全不一样，这难道可以拘泥于固定的法则吗？

熙宁年间，京城附近久旱，求雨的方法都用尽了，后来连续几个大阴天，人们都说一定要下雨了，一天又忽然转晴，烈日炎炎。我当时因事去朝见皇帝，皇帝问什么时候有雨，我回答说：“下雨的征候已经出现，估计明天会下雨。”许多人认为连日阴闷潮湿，尚且不降雨，像这样晴朗干燥的天气，难道还会有希望吗？第二天，果然下了大雨。当时“湿土”起作用，连日阴天，是因为“从”气

已开始应验，只是被“厥阴”克制，不能形成雨。以后有一天突然放晴，“燥金”之气出现，“厥阴”之气理当衰退，“太阳”升到主导地位，第二天气运配合顺畅了，因此推知一定下雨。这也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所作的预测。如果在别的地方，征候不同，预测的结果也不同。这个道理是很微妙的，不容有丝毫的差错。按照这个道理去推测探求，就会得到真理。

一年的运气有主气，有客气，经常有的为主，从外面到来的为客。从年初的厥阴之气，直到年终太阳之气，就是四季正常的顺序，所以叫做主气。只有客气本书没有记载它们的名目，所以有多种多样的说法。有的认为甲子年天数从水下1刻开始，乙丑年从26刻开始，丙寅年从51刻开始，丁卯年从76刻开始，这就叫做“客气”。这是用《四分历》的法则推求大寒之气，哪里能事先知道一年的运气？另外有人看到火位下面是水气承接；土位下面是风气承接，就叫做“客气”。其实这也是主气，与人的六种感情相联系，不能成为客气。大略地推测，基本上就是这些。大凡所谓“容”，在半年以前，由天上的大事主管；半年以后，地上的大事主管。四季之中常气是主，天地的事是容。违逆主气要担心迅猛，违逆客气要担心舒缓。调整主客之气，不使它们相克，这就是处置运气的法则。

六气，方家以配六神。所谓“青龙”者，东方厥阴之气，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长，其虫鳞，兼是数者，唯龙而青者可以体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阳水之气也；曰“腾蛇”，少阳相火之气也。其在于人为肾，肾亦二，左为太阳水，右为少阳相火。火降而息水，水腾而为雨露，以滋五脏，上下相交，此坎离之交，以为否、泰者也。故肾为寿命之藏。左阳右阴，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肾为胎育之脏。中央太阳上曰“勾陈”。中央之取象，惟人为宜。“勾陈，’者，天子之环卫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于君？君之道无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环卫居人之中央而中虚者也。虚者，妙万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虚；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虚。不虚不足以妙万物。其在于人，勾陈之配则脾也。勾陈如环，环之中则所谓“黄庭”也。黄者中之色，庭者宫之虚地也。古人以黄庭为脾，不然也。黄庭有名而无所，冲气之所在也，脾不能与也。脾主思虑，非思之所能到也。故养生家曰：“能守黄庭，则能长生。”黄庭者，以无所守为守。唯无所守，乃可以长生。或者又谓“黄庭在二肾之间。”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黄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为之名，意可到则不得谓之虚，岂可求而得之也哉。

六气，方术家把它们与六神相配。青龙，指东方厥阴之气，它的本性仁慈，它的精神幻化，它的颜色是青的，它的体形是长的，它是有鳞的虫，同时具备这几个方面，只有龙而且是青的才有这样子，但不一定有这种东西。其他取事物征象的道理都是这样。只有北方有两个，叫做“玄武”的，是太阳水之气；叫做“腾蛇”的，是少阳相火之气。这相对于人就是肾脏，肾脏也是两个，左边的是太阳水，右边的是少阳相火。火下降能止住水，水升腾成为雨露，用来滋润五脏，上下相交，这就是坎卦、离卦之交，用来表示幸运和不幸的。所以肾脏是生命的宝藏。左阳右阴，左右相交，这就是乾、坤之交，用来生出其他六卦的。所以肾是孕育的脏器。中央太阳土叫做“勾陈”。中央取的物象，只以水为宜。“勾陈”，就是天子周围的护卫。处在人们的中央没有比得上君主的，为什么不从君主取征象？君主的思想到处都有，不能只从一个地方来说。环绕卫护处在人们中央的人却要内里空虚。空虚，是使万物美妙的地方。在天文方面，星辰都处于四周而内中空虚；八卦分布在八方而内中空虚。不空虚就不能使万物美妙。对于人来说，勾陈是与脾脏相配的。勾陈像一个环，环的中间就是所谓“黄庭”。黄，是中央之色；庭，是官中空旷的地方。古人把黄庭当作脾，不对。黄庭有名但没有实际的地方，是冲气的地方，脾脏不能同之相联，脾脏管思虑，不是思想所能到的地方。所以养生家说：“能

够保住黄庭，就能长生。”黄庭，把没有什么可守当作守。唯其没有什么可守，才可以长生。另外又有人说“黄庭在两个肾脏之间”，还有说“在心的下面”，或者说“黄庭有神人守护”，都不对。黄庭，是空虚而又微妙的，勉强给它取个名称，意思可以到达就找不到叫做虚，难道是可以寻求而找得到的吗！

《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八为少阴，六为老。旧说阳以进为老，阴以退为老。九六者乾、坤之画，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数，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有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为巽，中为离，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则变（纯少阳盈，纯多阴盈。），盈为老，故老动而少静，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卦爻之辞皆九六者，惟动则有占，不动则无朕，虽《易》亦不能言之。《国语》谓：“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虽不动，亦引爻辞断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动，则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辞？此流俗之过也。

《周易》卦象九表示老阳，七表示少阳；八表示少阴，六表示老阴。旧的说法，阳主进，少阳进而为老阳，阳主退，少阴退而为老阴。九六是乾、坤的画数，乾有三画，坤有六画，因为阳得兼阴，所以乾数为九，因为阴不得兼阳，所以坤数只能为六。这都是按照心意相配，不对。九七、八六的画数，阳顺、阴逆的道理，都有它们的来由，是自然得出来的，不能由人们主观随意来配合。大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称为阴爻，如爻的偶数；“少”称为阳爻，如爻的奇数。三个阳爻构成乾卦，所以称为老阳。由九束蓍草可以得到老阳，所以老阳之数为九·有草 36 根。两个阴爻和一个阳爻组合，就以阳爻为主，称为震卦、坎卦、艮卦，所以都叫做少阳。在这三卦中，初爻为阳爻的是震卦，中爻为阳爻的是坎卦，末爻为阳爻的是艮卦。这都是由七束蓍草获得，所以少阳之数为七，有草 28 根。三个阴爻构成坤卦，所以叫做老阴，由六束蓍草可以得到它，所以老阴之数为六，有草 24 根。两个阳爻和一个阴爻组合，就以阴爻为主，称为巽卦、离卦、兑卦，所以都叫做少阴。在这三卦中，初爻的阴爻的是巽卦，中爻为阴爻的是离卦，末爻为阴爻的是兑卦。都可由八束蓍草获得，所以少阴之数为八，有草 32 根。物体充满、溢出就要变化，纯少阳爻就溢出来，纯多阴爻就溢出来。“溢出”表现在爻上就是“老”，所以由老阳、老阴得到的爻都象征着变动，而由少阳、少阴得到的爻都象征着静止。卦的吉凶和忧虑之象都是从“动”和“变”，推测出来的，卦爻之辞都是就变动的阳爻和阴爻来说的，只有通过变爻才能预测，从不动的爻得不出事物发展的征兆，即使根据《周易》也不能预测出什么结果来。《国语》说：“震在屯卦中处于内的位置，在豫卦中处于内的位置，它的两个阴爻都不是变爻”；“所得泰卦的爻构成震，而震的两个阴爻都不是变爻”，就是这个意思。如今的人用《周易》来卜筮，即使不动，也引爻辞来推断。《周易》中只有老阳、老阴，既不动，那么这少阳和少阴怎么能用老阳、老阴的爻辞呢？这是世俗的错误。

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其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

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未济，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予后因见兵部员外郎秦君夬，论夬所谈，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其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得闻也。”予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夬与雍、玠皆已死，终不知其何术也。

江南人郑夬曾写一本谈《周易》的书，其中一处说道：“乾卦、坤卦，是大父母。复卦、姤卦，是小父母。乾卦一发生变化生出复卦，得到一阳；坤卦一发生变化生出姤卦，得到一阴。乾卦再一次变化生出临卦，得到二阳；坤卦再一次变化生出遁卦，得到二阴。乾卦第三次变化生出泰卦，得到四阳；坤卦第三次变化生出否卦，得到四阴。乾卦第四次变化生出大壮卦，得到八阳；坤卦第四次变化生出观卦，得到八阴。乾卦第五次变化生出姤卦，得到十六阳；坤卦第五次变化生出剥卦，得到十六阴。乾卦第六次变化生出未济卦，开始就得到三十二阳；坤卦第六次变化生出归妹卦，开始就得到三十二阴。乾卦、坤卦错综变化，阴阳各得三十二，生出六十四卦。”郑夬写的书，都是荒唐的言论，只是这“变卦”的观点，不知它是对是错。我后来有机会见到兵部员外郎秦君玠，同他讨论了郑夬所谈的内容，他惊异地感叹道：“郑夬从哪里得到这个方法？我曾遇见一位奇人传授这个方术，用它一个一个地推算自古以来的兴衰变故，没有不灵验的，曾遗憾自己没有完全学到这一方术。洛阳邵雍也大略懂得一些，已经能够看清吉凶的变化。而这个人把它写成了书，一定会受到上天的责怪。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应该知道的。”我听他这一说觉得奇怪，更加上很神秘，就不想进一步追问他。如今郑夬与邵雍、秦君玠都已死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方术。

庆历中，有一术士姓李，多巧思。尝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筒，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用筒毙之。以献荆王，王馆于门下。会太史言月当蚀于昏时，李白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表闻，诏付内侍省问状。李云：“本善历术，知《崇天历》蚀限太弱，此月所蚀，当在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禳以动朝廷耳。”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监楚衍推步日月蚀，遂加蚀限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辰蚀东方不效，却是蚀限太强。历官皆坐滴，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庆历年间，有一个术士，姓李，有很多奇巧的心思。曾经用木头雕刻成一个舞动的钟馗，有两三尺高，左手拿着铁筒，把香食饵放在钟馗左手中。老鼠缘着手来吃食，它的左手抓住老鼠，右手挥动铁筒把老鼠打死。姓李的术士把它献给荆王，荆王把他留养在家里。恰碰上太史说黄昏时会发生月食，李自己说：“有办法可以消除。”荆王让他试一下，当夜月食果然没有发生。荆王很感神异，当天就上表报告皇上，皇上下令交内侍省询问具体情况。李术士说：“我本来善于历法，知道《崇天历》对食限的角度定得太小了。这次月食的位置应在地平线以下。因为出身微贱不能通达上级官府，才用一个设置机关的东西来求得进荆王府，现在是假装能消除月食来惊动朝廷罢了。”皇上有令送司天监核查检验。李术士与司天监长官楚衍推算日食、月食，于是把食限增加了2刻，李术士补上了司天学生的职务。至熙宁元年七月的一天早晨，东方出现日食，原来推算不合，却是食限的角度定得太

大，历法官们都因此被贬。皇上命令监官周琮重新修订，他又减去庆历年间所增加的 2 刻，随随便便地就想求出熙宁的这次日食，但庆历年间的那次月食又算不出来了。议论了很久，意见纷纷，始终没有一种巧妙的算法，于是废掉了《明天历》，重新采用《崇天历》。到熙宁五年，卫朴制定了《奉元历》，才知道过去的日、月食推算法只用了太阳运行的平均速度，因此在太阳运行较快时就超过了，在太阳运行较慢时又达不到。《崇天》、《明天》两种历法对食限的加减都不曾寻求计算偏差的原因，至此才弄清了它们的关系。

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龟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谓之“长离”，盖云离方之长耳。或云：“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少昊以凤鸟至乃以鸟纪官，则所谓丹鸟氏即凤也”。又旗旒之饰皆二物，南方曰鸟隼，则鸟隼盖两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鸟”，乃取象于鹑。故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鹑火、鹑尾，是也。鹑有两种，有丹鹑，有白鹑。此丹鹑也。色赤黄而文，锐上秃下，夏出秋藏，飞必附草，皆人类也。或有鱼所化者，鱼鳞虫龙类，火之所自生也。天文东方苍龙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鸟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无尾，此其取于鹑欤。

表示四方的征象苍龙、白虎、朱雀、龟蛇，只有“朱雀”不知是什么东西，只说是红色的鸟，羽毛多数是红的而又向上飞翔，栖息时一定贴着树木，这就是火的象征。有人说是“长离”，大概说的是南方的首领。又有人说：“鸟就是凤，所以叫做凤鸟。少昊因为凤鸟到来，就用鸟来记载官职，那么所谓丹鸟氏就是凤了。”另外，旗子上的装饰物都是这两种东西，南方叫鸟隼，那鸟隼实际上是两种东西。但古人求取物象，不一定找重要的东西。天象家的“朱鸟”，竟是依鹑取的物象，所以南方朱鸟七宿，叫做鹑首、鹑火、鹑尾的，都是这个。本来鹑有两种，有丹鹑，有白鹑。这里所指的是丹鹑。它的毛色红黄而有花纹，尖锐的嘴，腹部较秃，夏天出来活动，秋天就躲藏起来，飞一会儿就会贴在草上，都属火一类。有的是鱼变化的，属鱼鳞虫龙之类，火就从那里生出。天象说的东方苍龙七宿，有角宿和亢宿，有尾巴；南方朱鸟七宿，有喙、有食袋、有翅膀但没有尾巴，这大概是从鹑取的物象吧。

司马彪《续汉书》候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缙谷，气至则一律飞灰。世皆疑其所置诸律，方不逾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何也？或谓：“古人自有术。”或谓：“短长至数，冥符造化。”或谓：“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盖彪说得其略耳。唯《隋书志》论之甚详。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极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齐，入地则有浅深。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钟一琯达之，故黄钟为之应。正月阳气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达，黄钟、大吕先已虚，故唯太簇一律飞灰。如人用针彻其经渠，则气随针而出矣。地有疏密，则不能无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后实土案上，令坚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概，然后埋律。其下虽有疏密，为木案所节，其气自平，但在调其案上之土耳。

司马彪《续汉书》记载占验节气变化的方法是，在密室里用一段木头作桌子，上面放 12 支定音律管，各自相当它们的方位，用芦灰填塞，上面覆盖橘红色的谷子，气一到来那律管的芦灰就飞扬。一般人都怀疑他所设置的各个律管，不超过几尺见方，气一到唯独那一律管相应，是什么道理？有人说：“古人自有方术。”又有人说：“短和长都包含精妙的道理，与大自然暗合。”还有人说：“支干方位，本来互相感召。”这些说法都不对。那是因为司马彪说得太简略了。只有《隋书志》说得很

详细。它讲的方法是先准备一间屋子，让地面非常平整，再埋下定音的律管，使它们顶部都一般齐，埋在地下的却有浅有深。冬至阳气距地面 9 寸就停止，只有黄钟一支律管达到了这个程度，所以黄钟与它相应，正月阳气距地面 8 寸就停止，从太簇以上都达到这个程度，黄钟、大吕早已空虚了，所以只有太簇一支律管的芦灰飞扬。假如有人用针毕直穿透它外围，那么气会随针透出。土质有疏有密，就不能没有差错，所以先用木头桌子隔开，然后在桌上放置厚实的土，使它们密固均衡，上面用水平器刮平，然后埋下律管。地下即使有疏有密，被木头桌子节制，那气自然就平了，只是在于调节桌上的土罢了。

《易》有“纳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时。予尝考之，可以推见天地胎育之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处胎甲者。左三刚爻，乾之气也；右三柔爻，坤之气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纳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纳寅申；（震纳子午，顺传寅申，阳道顺。）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纳辰戌。（亦顺传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纳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离，初爻纳卯酉；（巽纳丑未，逆传卯酉，阴道逆。）上爻交于乾主兑，初爻纳巳亥。（亦逆传也。）乾、坤始于甲乙，则长男长女乃其次，宜纳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纳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未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处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谷之实皆倒生，首系于干，其上抵于颖处反是根。人与鸟兽生胎，亦首皆在下。）

《周易》有“纳甲”的法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曾经考证过，从这里可以推见天地孕育的道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就是上下包起来。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这六子是从乾、坤的包中生的，如同物体处在胎壳中一样。左三刚爻，是乾的气；右三柔爻，是坤的气。乾的初爻同坤相交生震，所以震的初爻纳子午；乾的初爻就是子午的缘故。中爻同坤相交生坎，初爻纳寅申；震纳子午，顺次传到寅申，阳道就顺。上爻同坤相交生艮，初爻纳辰戌。也是顺次相传。坤的初爻同乾相交生巽，所以巽的初爻纳丑未；坤的初爻就是丑未的缘故。中爻同乾相交生离，初爻纳卯酉；巽纳丑未，逆向传到卯酉，阴道就逆。上爻同乾相交生兑，初爻纳巳亥。也是逆向相传。乾、坤从甲乙开始，那么长男长女是其次，适宜纳甲丁；少男少女处在最后，适宜纳庚辛。现在竟与这相反，卦一定会从下面生，首先是初爻，其次是中爻，最后才到上爻。这是《周易》的顺序，但也是孕育的道理。物体处在胎壳中，没有不是倒生的，从下至上就是卦的顺序，却暗合了自然孕育的道理。这种精到的道理是与自然相合的。大凡草木五谷杂粮的果实都是倒生的，头部系在主干上，它上面连到附属部分的反而是根。人与鸟兽生的胎，也都是头在下。

卷八 象数二

《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如所谓律数者，八十一为宫，五十四为徵，七十二为商，四十八为羽，六十四为角，此止是黄钟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岂得定以此为律数？如五十四，在黄钟则为徵，在夹钟则为角，在中吕则为商。兼律有多寡之数，有实积之数，有短长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实积数耳。又云：“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长七寸七分二，夹钟长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分四，中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蕤宾长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钟长五寸七分四，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吕长四寸七分八，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误也。此亦实积耳，非律之长也。盖其间字又有误者，疑后人传写之失也。余分下分母，凡“七”字皆当作“十”字，误屈其中画耳，（黄钟当作八寸十分一，太蕤当作七寸十分二，姑洗当作六寸十分四，林钟当作五寸十分四，南吕当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史记·律书》中论述的28舍、12律，很多是凭臆想相配的，完全没有道理；就是它说的数字，也有很多差错。比如说律数，是81为宫，54为徵，72为商，48为羽，64为角，这只不过是黄钟的一律罢了；12律各有5音，难道能把它定为律数吗？像54在黄钟中为徵，在夹钟中又为角，在中吕中又为商。再说律数有多有少，有实积数，有短长数，有周径数，有清浊数。那81、54、72、48、64，只是实积数罢了。又说：黄钟长8寸7分1，大吕长7寸5分3分1，太簇长7寸7分2，夹钟长6寸2分3分1，姑洗长6寸7分4，中吕长5寸9分3分2，蕤宾长5寸6分2分1，林钟长5寸7分4，夷则长5寸4分3分2，南吕长4寸7分8，无射长4寸4分3分2，应钟长4寸2分3分2。这就更错了。这也是实积数，不是律长。其中还有字错了的，我怀疑是后人传抄时写错的。余分下的分母，凡是“七”字都应是“十”字，误把中间一笔写弯曲了。黄钟应该是8寸10分1，太簇应该是7寸10分2，姑洗应该是6寸10分4，林钟应该是5寸10分4，南吕应该是4寸10分8。凡属是说到7分的，都是10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书，工拙系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动，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无心也。则凭物之无心者而言之，如灼龟鬲瓦，皆取其无心，则不随理而震，此近乎无心也。

现在人占卜，都是用的古书，用得巧和不巧关系到用的人。正由于它无声无息一动不动，才能通晓天下相当的事物，人不能到达的那种无心的境界。而就无心的事物来说，如烧灼龟甲磨治瓦片，都是取它的无心，并不依照它的纹理而动，这就接近无心了。

吕才为卜宅、禄命、卜葬之说，皆以术为无验。术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波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术二人用之，则所占各异。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无累，而寓之以无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术之微，难可以俗人论也。才又论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岂可配以宫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从“攴”，从“支”，今乃谓之“苟”与“文”，五音安在哉！此为无义，不待远求而知也。然既谓之寓，则苟以为字皆寓也。凡视听思虑所

及，无不可寓者。若以此为妄，则凡祸福吉凶，死生变化，孰为非妄者？能齐乎此，然后可与论先知之神矣。

吕才认为占卜地宅、禄食命运、测算安葬等说法，都是方术而无法验证。方术不可依凭是确实的，但他不知道它们都有寓意，像神明一样，存在某种人之中，所以一种方术两个不同的人应用，那所卜算的结果各不相同。人的心原本神奇，因为它不能没有牵累，而把无心的事物寄寓其中，又用我们所称的神灵来解说这种方术的微妙，是很难同一般世俗之人议论的。吕才又谈到人的姓氏，有的依用官职，有的依照籍贯家族，难道都可以与官商这些音调相配吗？这也是对的。如今有姓“敬”的，或者改姓“文”，或者改姓“苟”。根据文字来考证，都不对。“敬”原本从“攴”，从“支”，现在变到了“苟”与“文”，五音又在哪里呢！这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不必向深处探求就知道的。但既然说有寄寓，就会随随便便以为每个字都有寓意。凡属看到的、听到的、想到它，没有不可寄寓的。假如把这话当作胡说，那么凡属是福祸吉凶，死生变化，哪种不是胡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才可以谈论先知先觉的神灵了。

历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实有也。亦由天之日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尝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强为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南北极之中度最均处，谓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谓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谓之“黑道”；黄道之东，谓之“青道”；黄道之西，谓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为九。日月之行，有迟有速，难以一术御也，故因其合散，分为数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筹、黑筹，以别正负之数。历家不知其意，遂以为实有九道。甚可嗤也。

历法说到，天有黄道、赤道，月亮的运行又有九道。这都是人们勉强叫出来的罢了，不是实际就有的。又如说天空有 360°，天空哪里有度数呢？把太阳运行 365 天当作一个周期，勉强作为度，由此来测算日、月、五星的运行位置罢了。太阳运行的路线，叫做“黄道”；在南北极正中分度最均等的地方，叫做“赤道”。月亮在黄道南面运行的路线，叫做“朱道”；在黄道北面运行的路线，叫做“黑道”；黄道的东边，叫做“青道”；黄道的西边，叫做“白道”。黄道的内外各有 4 道，包括黄道共为 9 道。太阳月亮的运行，有快有慢，很难用一个方法笼统地说明，所以就根据它们会合、分开的情况，分成几段，每一段都用一种颜色命名，就是想用来分头测算月亮的运行位置罢了，如同算法中用红筹码和黑筹码分别代替正数和负数一样。历法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以为天空中真正有 9 道，是很可笑的。

二十八宿，为其有二十八星当度，故立以为宿。前世测候，多为改变，如《唐书》测得毕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类；皆谬说也。星既不当度。自不当用为宿次，自是浑仪度距疏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即须以当度星为宿，唯虚宿未有奇数，自是日之余分，历家取以为斗分者此也，余宿则不然。

28 宿，是因为有 28 颗星正好在度的整数位上，所以才把它们标为“宿”。前代在测量天体时，往往发现宿星的位置有许多改变了的。比如《唐书》记载测得毕宿是 17° 半，觜宿只有半度之类，都是错误的说法。星星既然不正好在度数上，自然不应该把它当作宿星，这正是浑仪的度距疏密不均罢了。大凡 28 宿的度数，都用赤道作为标准。只有用黄道分度不是整数，因为黄道有斜有直，所以它的度数与赤道的度数不相等，就必须把落在分度整数上的星作为宿，只有虚宿末尾有余数，正是整数后

面的那个余分，历法家拿来作斗分的就是这个余分，其余的星宿就不是这样了。

予尝考古今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叶，两末锐，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两末星行成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成度稍速，以其径绝故也。历家但知行道有迟速，不知道径又有斜直之异。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术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已，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历》五星步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

我曾经考察这古今历法，在五星运行度数方面，只是“留”和“逆行”的差别最大。从黄道内侧顺行的行星，必定从黄道外侧逆行回来；而从黄道外侧顺行的行星，必定从黄道内侧逆行回来。它们运行的轨道像顺着柳叶一样，两头尖，中间往返的路径相隔很远，所以两头的星运行一度的时间较长，因为路径是斜的；当星星在柳叶形轨道中间运行时，运行一度的时间较短，因为路径是直的。历法家只知道五星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而不知道运行的路径有斜和直的不同。熙宁年间，我担任太史令，卫朴编制历法，对节气和朔望都作了调整，但五星的情况都没有实测记录可以验证。前人修改历法，大都只对旧历作些数字上的增减，而没有实际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情况。观测的方法是，必须测验每夜黄昏、拂晓、半夜3个时分月亮和五星所在的度位，用本子记录下来，满了5年后，中间去掉阴天和五星在白天出现的天数，可以得到3年实际运行的情况，然后进行计算，将每天连贯起来，这就是古代所说的“缀术”。当时司天监中的历官，都是继承世袭，挂名拿薪俸，本来就没有懂得历法的，他们嫉妒卫朴的本领超过自己，一起反对和破坏卫朴的工作，多次制造大的案件诬陷卫朴。虽然最终没有把卫朴搞垮，但记录观测天象的资料至今也没有完成；《奉元历》推算五星运行的方位，就只是对旧历进行加减，纠正最明显的错误，十成中只有五六成准确而已。卫朴编制历法的本领，现在和过去的人都没有，却遭到那些历法官的阻挠破坏，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真可惜啊！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谲见云物祺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外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缠度誉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本朝在皇宫中设立了天文院，设置了漏刻、观天台、铜浑仪，一切和司天监的一样，用来和司天监互相检验、监察。每夜天文院都要把观测到的吉凶的预兆以及当晚行星的位置，在皇城开门之前报到宫中。皇城开门后，司天监观测天象的报告才送到，把这两份报告进行核对，以防弄虚作假。近年来这两个机构暗中商量串通，写出同样内容的报告，已经习以为常，由来已久了，宫内外的人都知道，不以为奇。他们报告日、月、五星的运行和位置，都是根据民间历法的计算抄录上报的，不曾进行实际的观测，这些机构的官员只是白领薪俸罢了。熙宁年间，我担任太史令，曾经揭发过他们的欺骗行为，罢免了6个人的官。过了不久，这种老毛病又和以前一样了。

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历官韩显符所造，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斛兰之法，失于简略。天文院浑仪，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简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而失于难用。熙宁中，予更造浑仪，并创为玉壶、浮漏、铜表，皆置天文院，别设官领之。天文院旧铜仪，送朝服法物库收藏，以备讲求。

司天监的铜制浑天仪，是景德年间历官韩显符造的，他仿照刘曜时的孔挺、晁崇、斛兰的方法，缺点在于构造简略。天文院的浑仪，是皇祐年间冬官正舒易简制造的，是按照唐代梁令瓚、僧一行的方法，相当周密完备，但缺点是不便使用。熙宁年间，我改造了浑天仪，还创制了玉壶浮漏、铜质圭表，都安放在天文院中，另外安排官员管理。天文院中的旧铜浑仪，送到朝服法物库收藏起来，以便研究时用。

卷九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准赞成上意。乘舆方渡河，寇骑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准所为，而准方酣寝于中书，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景德年间，河北发生战事，皇上想亲临澶渊，朝廷内外意见不一，唯独寇准赞同皇上的想法。皇上的车驾刚刚渡过黄河，敌人的骑兵就纷纷涌出，到了城下，人们情绪慌乱，喧闹不止。皇上派人暗地里察看寇准在做什么，而他正在中书酣睡，鼾声如雷。人们因为他一时镇定自若，把他比作谢安。

武昌张谔好学能议论，常自约仕至县令，则致仕而归。后登进士第，除中允。谔于所居营一舍，榜为中允亭，以志素约也。后谔稍稍进用，数年间，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寺，皆要官，权任渐重。无何，坐事夺数官，归武昌，未几捐馆，遂终于太子中允，岂非前定。

武昌的张谔好学又长于议论，自己曾许下诺言做官做到县令，就辞官归隐。后来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中允。他在任所建了一间房子，挂上匾额叫“中允亭”，以记下过去的诺言。后来他一步步得到提升，几年之间，做了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寺，都是重要官职，职权渐渐加重。不多久，犯了罪过被免去几个官职，回到武昌。没多久就死了，最后的官职就是太子中允，难道不是命中注定吗？

许怀德为殿帅，尝有一举人，因怀德乳姥求为门客，怀德许之。举子曳褙拜于庭下，怀德据座受之。人谓怀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谓之曰：“举人无没阶之礼，宜少降接也”。怀德应之曰：“我得打乳姥关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许怀德任殿前都指挥使，曾有一个举人通过怀德的乳母请求做他的门客，怀德答应了他。举人拖着褙衫在堂前一拜，怀德坐在座位上受了这一礼。旁边的人以为怀德是个武将，不识事体，偷偷地告诉他说：“举人没有在阶下行礼的礼节，你应当稍微下台阶迎接。”怀德回答说：“我得到的是一个打通乳母关节的秀才，只须这样对待他。”

夏文庄性奢侈，禀赋异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连，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以数千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磺，莫知纪极。晨朝每食钟乳粥，有小吏窃食之，遂发疽，几不可救。

夏竦性情豪爽，天赋与一般人不同，刚一睡下全身冰凉直到僵硬，完全像个死人，醒来之后，必须让人温暖他，很久才能动弹。有人看见他在陆地上行走，把两辆车相连，载着一个高大的东西，问他，竟是绵帐，用几千两丝绵做成的。他常常服食仙茅、钟乳、硫磺，不知有个限度。早晨他常吃钟乳粥，有个小官偷吃了，就生了痈疽，差一点没有救活。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名。又云：“骐驎已老，甘弩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

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之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辉，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

郑獬因有名气而自负，国子监考试排在第五名心中非常不平，向主考官致的答谢词中，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的话。又说：“骥驥已老，甘弩马以先之；巨鳖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考官深深怀恨。到后来廷试时，那个主考官又是考官，坚决要让郑獬落榜，来回答他的不谦逊。有个考试成绩与郑獬差不多的人，冤枉遭到贬斥，不久打开考卷，郑獬竟以第一名考中。另外，嘉祐年间，读书人刘几多次成为国子监第一名，多处写出险怪的句子，学生们一致仿效他，因此形成一种风气。欧阳修非常憎恶这种文风，碰上他主持考试，决心狠狠惩罚，凡属写这种新型文章的，全都废弃，当时文体因此大变，是欧阳修的功劳。有个举人议论说：“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说：“这人肯定是刘几。”他开玩笑地接着说：“秀才到，试官刷。”就用大红笔横抹试卷，从头抹到尾，称做“红勒帛”，批上很大的“纰缪”字样张贴，后来得知果然是刘几的。过了几年，欧阳修担任殿试考官，刘几在场上。欧阳修说：“去除邪恶一定要尽力，现在一定要痛斥那些轻浮的学生，以革除文章的毛病。”有一个读书人议论说：“皇上把精明能干的人收藏在皇冠之下。”欧阳修说：“我已经有刘几了。”废弃之后，却是吴地人萧稷。当时的试题是《尧舜性之赋》，有文章写道：“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欧阳修大加赞赏，提这人的第一名，到了高声叫名时，竟是刘辉，有认识他的人说：“这就是刘几，改了名啦。”欧阳修惊愕了好久，就想成就他的功名。他的小赋中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欧阳修认为“积”与“学”的意思接近，就改成“蕴”，没有人不认为欧阳修精通言论。

古人谓贵人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一见王东城，遂厚遇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唯杨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子弟，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日，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子弟乃问公：“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后果如其言。又文潞公为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回谒吕许公，公一见器之，问潞公：“太博曾在东鲁，必当别墨。”令取一丸墨濒阶磨之，揖潞公就观：“此墨何如？”乃是欲从后相其背。既而密语潞公曰：“异日必大贵达。”即日擢为监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庆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岁，以太师致仕，凡带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尝改易，名位隆重，福寿康宁，近世未有其比。

古人说地位高贵的人大多了解人，因为他们看到过的人和事很多。张士逊做殿中丞时，一见到

王东城，就受到很高的待遇，一起说话谈了好长时间。王东城向来所看重的只有杨亿，他有一个茶叶袋，只有杨亿到来，才拿茶叶袋准备茶水，其他客人是不会给的。他家的年轻后辈只要听到拿茶叶袋，就知道是杨亿到了。有一天，他叫拿茶叶袋，年轻人都出来偷看杨亿，等人到了，却是张士逊，另一天，他又叫拿茶叶袋，年轻人再去偷看，还是张士逊。这些年轻人就问他：“张殿中是什么人，您要这样对待他？”王东城说：“张士逊有贵人的样子，不出十年应会坐到我这样的位置上来。”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另外，文彦博当太常博士时，担任兖州通判，回拜吕夷简，吕夷简一见就器重他，问他说：“太博曾在东鲁呆过，一定能区别墨的质量。”就让人拿一块墨到台阶边磨，恭请文彦博走近去看，问：“这墨怎么样？”原来是想从后面观察文彦博的背部。过一会儿悄悄对文彦博说：“过些日子一定会非常高贵、大为发达。”当天文彦博被提升为监察御史，不到十年又当了丞相。文彦博从庆历八年当上丞相，到79岁，以太师的身份退休，总共任平章事37年，不曾有变化，名位高贵，福寿安康，近代以来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王延政据建州，令大将军章某守建州城，尝遣部将刺事于军前，后期当斩，惜其材，未有以处，归语其妻，其妻连氏有贤智，私使人谓部将曰：“汝法当死，急逃乃免。”与之银数十两，曰：“径行，无顾家也。”部将得以潜去，投江南李主，以隶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将适主是役，城将陷，先喻城中能全连氏一门者有重赏。连氏使人谓之曰：“建民无罪，将军幸赦之，妾夫妇罪当死，不敢图生。若将军不释建民，妾愿先百姓死，誓不独生也。”词气感慨，发于至诚。不得已为之戢兵而入，一城获全。至今连氏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踵踵，皆连氏之后也。又李景使大特胡则守江州，江南国下，曹翰以兵围之三年，城坚不可破。一日，则怒一饷人鲙鱼不精，欲杀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满地，奈何以一食杀士卒邪。”则乃舍之。此卒夜缒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虚实。先是城西南依峻素不设备，卒乃引王师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则一门无遗类。二人者，其为德一也，何其报效之不同邪？

王延政占据建州，命令大将军章某守卫建州城，曾派手下将领去刺探军情，耽误了时间判处斩首，因爱惜他的才能，没有这样处置，回家后对妻子说了。他妻子连氏贤慧聪明，暗地里派人告诉那将领说：“你犯了法判处死刑，赶快逃跑才能免死。”给了那将领几十两银子，说：“快点走，不要管家里人。”那将领潜逃去了，投奔了江南的李煜，隶属查文徽部下。查文徽攻打王延政时，那将领正好指挥这一战，快要攻下城池时，事先通告城中的人：“能够保存连氏一家的人有重赏。”连氏派人对那将领说：“建州百姓无罪，希望将军宽恕他们，我们夫妇罪应处死，不敢想到要活下去。假若将军不放过建州百姓，我愿死在百姓前面，决不一个人活着。”语气激昂慷慨，出自一片诚心，那将领不得已让士兵收起武器进城，全城人都保全了。到现在连氏作为建安大族人家，官做到卿相的人一个接一个，都是连氏的后代。

另外，李景派大将胡则驻守江州，江南国灭亡后，曹翰发兵围困江州3年，江州城墙坚固不能攻破。有一天，胡则因厨师切的鱼不精细而发脾气，要杀掉他。胡则的妻子赶快制止说：“士兵们守城好几年了，摆着的尸骨遍地都是，怎么能因为一点吃的杀兵士呢！”胡则就放了他。这个士兵晚上沿着绳子坠出城，跑去投奔了曹翰，把城里的虚实全都讲了。事先城西南凭借险要地势一向没有设防，他就带着朝廷军队从西南进攻江州，当夜攻下了江州城，胡则一家没有留下一个人。

这两个人，他们施行仁德是相同的，为什么得到的报应这样不同呢？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便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家人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

其子弟诉于公曰：“庖肉为饕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饕人所私。”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

太尉王旦胸襟宽阔，人们不曾见他发过脾气。饮食如果不精细不干净的话，不过是不吃罢了。他家里人想试一试他的气量，把一点点墨粉放到汤中，先生只是吃饭罢了。家里人问他为什么不喝汤，他说：“我间或不喜肉。”有一天，又把墨放到他的饭里，先生看了看说：“我今天不喜欢饭，可以准备一点粥。”他家里的年轻后辈告诉他说：“厨房的肉被厨师偷吃了，我们吃不饱肉，请处理一下厨师。”先生说：“你们这些人估计要吃多少肉？”他们说：“一斤。现在只能吃半斤，另外半斤被厨师藏起来了。”先生问：“整整一斤可以吃饱吗？”回答说：“整整一斤应当可以吃饱。”他说：“以后按每个人估算一斤半就可以了。”他都是像这样不揭发别人的过错。曾有一次他住宅的门坏了，管家把整个屋里的门都换新的，暂时在走廊边开一张门用来进出。先生到了旁边的这张门，门很低，便伏下身贴着马鞍过去，完全不怪罪。门换好后，又走正门，也不管。有个驾马的士兵年限满了向先生告辞，先生问他：“你驾马多长时间了？”回答说：“5年了。”先生说：“我不记得有你。”他走了以后，王旦又叫他回来说：“你就是某某人吗？”于是送给他许多财物。原来是每天驾马，王旦只见他的背，不曾见过他的面，到他离开时，见到他的背才记起来。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问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张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红牙牌十余。其一槃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状，懵然愚駮，殆不分菽麦，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不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

石曼卿住在蔡河下曲，邻居中有一个富豪，每天都可听到唱歌奏乐的声音。富豪家里几十个仆人，经常在石曼卿门前来往。石曼卿叫住一个仆人对富豪是什么人，回答说：“主人姓李，才20岁，另外没有兄弟，家里穿着绫罗绸缎的侍女有几十个。”石曼卿想求见那个人，他的仆人说：“我家先生从来不曾接待过士大夫，别的人一定不能见到他；但他喜欢喝酒，多次谈到听说学士能喝酒，那意思也像想与您相见，等我试着问问他。”有一天，富豪果然派人请石曼卿，石曼卿就戴上帽子去见他，坐在他家的堂屋中，过了很久，富豪才出来。这位主人戴着头巾，系着丝腰带，没有完整的衣帽，见了石曼卿，完全不懂得拱手作揖的礼节。他带领石曼卿走到另一间客房，那里醒目地陈设着供宴会用

的帷帐和用具。坐了很久，有两个陪侍的婢女各自端着一个小盘走到石曼卿跟前，盘中放着十多块红色牙牌。其中一盘是酒，共有十多种，让石曼卿选择一种品牌；另一盘是菜肴的名谱，让选择5种。过一会儿两个丫环走了，另有十多个歌妓，各自拿着菜肴、果品和乐器，妆扮、服饰、相貌都是艳丽光彩。一个歌妓斟酒进献上来，喝完酒又奏起了乐，那一些拿着果品、菜肴的歌妓都集中站到石曼卿前面，等着吃完又分开排列在他们的两旁。京城里的人把这叫做“软盘”。喝酒过了5巡，这些歌妓都退下去了，主人也洋洋自得地进去了，一点也不向客人行礼。石曼卿独自走出来。石曼卿说起那富豪的样子，一副懵懂呆傻相，根本分不清豆与麦，却受到这样的奉养，是十分奇怪的事。后来有一天石曼卿试着派人转达殷勤问候的意思，却关着门不接待，也没有在门口回答的人。询问他的邻居，邻居说：“那个人不曾与人来往，即使是邻居也不相识。”古人称做“钱痴”的，确实有这种人啊。

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曾往访之，见其人颇潇洒，自陈“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卜自给者甚多，自食既足，不当更兼乡人之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曰：“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之为人，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唯买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傍游一步也。”予时方有军事，至夜半未卧，疲甚，与官属闲话，轸遂及此，不觉肃然，顿忘烦劳。

颍昌阳翟县有个叫杜先生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家乡人只叫他杜五郎。他住的地方离县城30乡里，只有两间屋，其中一间自己住，另一间他儿子住。屋前有一块一丈多长的空地，靠着篱门，杜先生不出篱门共有30年了。黎阳县尉孙轸曾去拜访他，看见这个人相当潇洒，自称：“一个村民，没有什么才能，为什么承您来看望？”孙轸询问他不出门的原因，这人笑一笑说：“告诉你这话的人说过头了。”指着门外一棵桑树说：“15年前，我也曾到这桑树下乘凉，怎么说不出门呢？只是我对世人无用，对别人无所求，间或不独自出去罢了，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孙轸问他靠什么过活，回答说：“以前我住在县的南边，有50亩田，与哥哥一起耕种。后来哥哥的儿子娶了媳妇，我想靠种田不够养家糊口，便把它给了哥哥，带着妻子儿女到了这里。偶尔有乡里人来借这屋子，就让他住。只是替人选择好日子，还卖点药，就这样有一碗稠粥了，也有时接不上来。后来儿子能耕种了，乡里人同情我，给了30亩田，让儿子耕种，还有点余力，又被别人雇去耕种，从此就吃得饱了。乡里人贫困，靠行医占卜养活自己的人很多，自己吃的已经足够了，不应该另外占乡里人的好处，就这样替人选个好日子、卖点药，其他一切都不做。”孙轸又问平常的日子做什么，回答说：“规规矩矩地坐着罢了，没有什么可做的。”问他是不是也看看书，回答说：“20年前也曾看过书。”问他看的什么书，回答说：“曾经有人赠送了一本书，没有写书名，其中大部分说的是《净名经》，也不清楚《净名经》是什么书。当时很喜欢它的议论，现在也忘记了，而且书也很久就不知道放到哪里了。”他的气韵悠闲

旷达，话语精当简洁，是个有修养的人。很冷的时候也只穿布袍草鞋，屋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而已。问他儿子的为人，回答说：“是个乡村孩子。但本性十分淳朴敦厚，没有什么虚言假语，也不曾嬉戏游玩，只在买盐买醋才偶尔到县城去，可以计算出他的行程，等着他回来，直去直回，不曾到别的地方游玩一步。”当时我正有军务在身，到半夜还没有睡，很疲倦了，与属下官员闲谈，孙轸就说到这里，我不知不觉恭敬起来，一下子忘记了烦躁劳累。

唐白居易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为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奂图于妙觉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韩国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议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年七十五；秘书监刘几，年七十五；卫州防御使冯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年七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年六十四。

唐代白居易住在洛阳时，与 8 位年岁大的人交往，被称为“九老”。洛阳城里的士大夫到现在住下来的很多，接着结成九老会的人不少。元丰五年，文彦博在洛阳任职时，又建立了“耆年会”，每人写一首诗，让画师郑奂画在妙觉佛寺中，共有 13 人，包括 79 岁的辞去司徒的韩国公富弼，77 岁的担任太尉的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77 岁的辞去司封郎中的席汝言，76 岁的辞去朝议大夫的王尚恭，75 岁的辞去太常少卿的赵丙，75 岁的秘书监刘几，75 岁的卫州防御使冯行已，73 岁的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72 岁的辞去朝议大夫的王慎言，71 岁的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兼管大名府的王拱辰，70 岁的太中大夫张问，70 岁的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64 岁的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

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瓶，令空腹饮之，可以调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楹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术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予于《良方》叙之甚详。然昔人未知用之。钱文僖公集《篋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中尝赐近臣”。即谓此也。

太尉王旦身体虚弱多病，真宗皇帝当面送他一瓶药酒，让他空腹喝下，可以调和气血，避开外来致病因素。王旦喝了酒之后，很觉得安康，就借见真宗时表示感谢。皇上说：“这是苏合香酒。每一斗酒，加一两苏合香丸一起加热。这酒极能调理五脏，驱除体内各种疾病，每到冒着寒冷早起时，就喝一杯。”于是皇上分别拿出几楹酒赏赐给身边的大臣。从此群臣百官家里都仿制这种酒。苏合香丸在一时之间盛行起来。这个药方原来出自《广济方》，叫做“白术丸”。后人又把它编进《千金》、《外台》。它治病有特效，我在《良方》中有很详细的叙述。但过去的人不知道运用它。钱惟演汇编《篋中方》，对苏合香丸的注解：“这种药原来是从皇宫中传出来的，祥符年间曾经赏赐给大臣。”就说的这件事。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

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然后实己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苍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既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

李士衡担任弘文馆的职务，出使高丽，一名武官任副使。高丽赠送的礼品布帛等物资，李士衡都不在意，一切交给副使。当时船在航行中漏水，副使把李士衡得到的丝绸垫在船底，然后放上自己的以避免被漏进的水沾湿。到了海上，遇到大风，船快要翻了，水手们非常惊慌，请求把船上装载的物资全部丢掉，不这样船太重必定难免翻沉。副使慌慌张张地把船上的物资全部拿出来丢到海里，没有时间挑选。大约丢了一半，风停了船稳了，接着去查点丢掉的东西，都是副使的物品，李士衡得到的放在船底，一点都没有丢掉。

刘美少时善锻金，后贵显，赐与中有上方金银器，皆刻工名，其间多有美所造者，又杨景宗微时，常荷畚为丁晋公筑第。后晋公败，籍没其家，以第赐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贱时，一造上方器，一为宰相筑第，安敢自期身殍其用哉。

刘美年轻时擅长锻造金银物品，后来成了显贵，得到的赏赐中有皇宫里的金银器，都刻有工匠的名字，其中很多是刘美锻造的。另外，杨景宗在地位低微时，常常挑着畚箕替丁谓修筑住宅。后来丁谓垮台，朝廷登记抄没了他的家产，把住宅赏赐给了杨景宗。这两个人，正是在那低微贫贱时，一个锻造皇家中用的器物，一个替宰相修筑住宅，哪里敢希望自己能享用自己所造的东西啊！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过去的制度是，天下进贡的举人到京城，全都要进入朝廷应诏答对，人数不下3千，叫做“群见”。边远地方的读书人都不懂朝廷的礼法规范，排列错杂无序，官员们不能约束抑制。“群见”的那一天，官员们先在朝位的前面设置禁入的围栏，举人都在围栏的外面跪拜，这是想限制他们向前排列。更有人互相牵拉，以便张望皇帝的宝座。官员们担心这事，近年来就仅仅让乡试第一名的解元进见，但还是不少于几百人。嘉祐年间，我愧到解元之中，另外成为一排，站在最前列。我看见队列中只有从前面起的一两行略为符合跪拜起立的礼节，其余的还终于排不成行连不成列就结束了，这常常成为内阁门中的负担。常言说朝廷上排列不可能整齐的，只有3种，即举人、外国人和骆驼。

两浙田税亩三。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贇均两浙杂税，方贇悉令亩出一。使还，责擅减税额，方贇以谓亩税一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至今亩税一者，自方贇始。唯江南、福建犹循旧额，盖当时无人论列，遂为永式。方贇寻除右司谏，终于京东转运使，有五子，皋、准、覃、巩、罕。准之子珪为宰相，其他亦多显者。岂惠民之报欤。

两浙的田税每亩 3 斗。钱氏的国家被消灭以后，朝廷派王方贄去平均两浙的杂税，王方贄统一规定每亩出 1 斗。他完成使命回到京城，皇上责怪他擅自减少税额，王方贄却说：“每亩收税 1 斗，是天下普遍的规定。两浙既已成为皇上的臣民，怎么可以再依照伪国的法令？”皇上同意了他的话。到现在还是每亩交税 1 斗，就是从王方贄开始的。只有江南、福建还遵循过去的税额，因为当时没有议论过，就成了永久的法规。王方贄过了不久被任命为右司谏，最后是京东转运使。他有 5 个儿子：王皋、王准、王覃、王巩和王罕。王准的儿子王珪做了宰相，其他的人也有很多地位显贵的。难道不是给人民好处的回报吗？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砚以石润为贤，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竟不受。

有人曾给孙甫一方砚台，价值 30 千钱。孙甫问：“这砚台有什么奇特竟要这样的价钱？”客人说：“砚台以石质润泽为好，这种石头呵口气就有水流出来。”孙甫说：“一天呵出一担水，才值 3 个钱，买它有什么用？”终于没有收下。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安石患哮喘病，药中要用紫团山的人参，无法找到。当时薛向从河东回来，正好有这种人参，赠送给王安石几两，王安石不接受。有人动王安石说：“先生的病，没有这种药不能治。有病值得忧虑，药不必推辞。”王安石说：“我一辈子没有用过紫团山的人参，也活到了今天。”终于没有接受。他的脸色青黑，门人很担忧，去问医生，医生说：“这是污垢，不是病。”医生进献澡豆让王安石洗脸，王安石说：“天生我一副黑脸，澡豆对我能怎么样！”

王子野生平不茹荤腥，居之甚安。

王质一辈子不吃荤腥食物，活得很安适。

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鹤，坐则看鹤鼓琴。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頰然鼓琴不问。

赵抃任成都转运使，外出巡视管辖的范围，只带一张琴、一只鹤，坐下来就看鹤弹琴。他曾经过青城山，遇到下雪，住在旅店里。店里的人不知道他是转运使，有的人怠慢他，他恭恭敬敬地弹琴不加过问。

淮南孔旻隐居笃行，终身不仕，美节甚高。尝有窃其园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为架一小桥渡之。推此则其爱人可知。然予闻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辍鼓可也，为其死而鼓之，则不若不鼓之愈也；犹邠原耕而

得金，掷之墙外，不若管宁不视之愈也。

淮南的孔旻专心专意隐居，一辈子不出去做官，美好的节操非常高洁。曾有人偷了他园子里的竹，他可怜那人蹉水水冷，替那人架了一座小桥渡水。从这里推想就可知道他的爱人之心了。但我听说，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敲着盆子唱歌，妻子死了不停地敲是可以的，因为她的死而敲，就不如不敲为更好。就像邠原耕地拾到金子丢出墙外，不如管宁不看金子为更好。

狄青为枢密使，有狄梁公之后，持梁公画像及告身十余通，诣青献之，以为青之远祖。青谢之曰：“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赠而还之。比之郭崇韬哭子仪之墓，青所得多矣。

狄青任枢密使，有狄仁杰的后代拿着狄仁杰的画像和 10 多件委任书，拜见狄青并献给他，把狄仁杰说成是狄青的远祖。狄青辞谢说：“我一时遇到了机会，怎么敢自比梁公呢？”赠送了重礼，还把送来的东西退还。与郭崇韬在郭子仪墓前哭悼相比，狄青所得的就多了。

郭进有才略，累有战功。尝刺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进于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乃设诸工之席于东虎，群子之席于西虎。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今资政殿学士陈彦升宅，乃进旧第东南一隅也。

郭进有才能和谋略，多次立过战功，曾担任邢州刺史，现在的邢州城就是郭进修筑的。那城墙有 6 丈厚，至今坚固完好。他的铠甲兵器精巧，以至保护收藏也有规矩。郭进在城北修建住宅落成，邀集家族中的人和宾客举行祭祀，连土木工匠都来参加，就在东边廊屋摆设工匠们的席位，在西边廊屋的是他的几个儿子的席位。有人说：“各位公子怎么能与工匠并列？”郭进指着那些工匠说：“这是建造住宅的人。”再指着几个儿子说：“这是出卖住宅的人，就应该坐在建造住宅的人的下方。”郭进死后不久，住宅果然成为他人所有。现在资政殿学士陈荐的住宅，就是郭进旧居东南边的一角。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乐闲放，而家甚贫，忽吟一诗曰：“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宁。

有个武士，忘了他的姓名，志向喜欢悠闲放任，但家里很贫困。他一下子吟出诗句说：“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于是丢掉官府的征召文书走了。他到现在还是隐居，还算安宁。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拜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今日早候对，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门下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明日却对来，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归，乃往见，丞相方谢客，门阑悄然无一人，昌武与向亲，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上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复唯唯，终未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复使人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饮食宴会，亦寂无一人。明日再对，上问“昨日见敏中否？”对曰：“见之。”“敏中

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

真宗皇帝时，向敏中被封为右仆射，任命诏书下达的那天，李宗谔是翰林学士，应诏答对。皇上对他说：“我从即位以来，不曾封过仆射，现在授给向敏中，这是特殊的任命，向敏中应该非常高兴。”李宗谔回答说：“臣下今天早晨等候应诏答对，也不知道宣布任命诏书的情形，不知道向敏中怎么样。”皇上说：“向敏中家中今天宾客一定很多，你去看看，明天再来报告，不要说是我的意思。”李宗谔等到丞相回去，才去见他，丞相刚刚辞谢客人，家门口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李宗谔与向敏中是亲家，就径直进去见他，不慌不忙地祝贺说：“今天听说下达任命诏书，士大夫没有不欢喜宽慰的，朝廷上下都互相庆贺。”向敏中只是唯唯应答。李宗谔又说：“从皇上即位以来，不曾授予相位，这是皇上的特殊任命，要不是你功高德隆，对你异常爱护和倚重，哪里会到这个程度。”向敏中还是唯唯应答，李宗谔终于没有揣测到他的心意。李宗谔又一项一项地叙述前代任仆射的人功勋品德的高大，皇上提升任命的隆重，向敏中也是唯唯应答，终于不说一句话。李宗谔出去后，又派人到厨房里，打听今天有没有亲戚宾客的吃喝宴会，也是静寂没有一人。第二天应诏答对，皇上问：“昨天你见到向敏中了吗？”回答说：“见到了。”皇上又问：“向敏中的情绪怎么样？”李宗谔就把自己见到的情况一一回答。皇上笑着说：“向敏中特别耐受得官职啊。”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晏殊是小孩的时候，张知白就向朝廷推荐了他，皇上召他到宫门，正好碰上皇帝亲自考试进士，便让它参加考试。他一到试题就说：“臣下10天前已经写好了这篇赋，赋的草稿还在，请求另外命题。”皇上非常喜欢他的毫不隐瞒。到晏殊在馆阁中任职时，天下太平，皇上允许大臣们选择好的地方宴饮。当时侍从弘文馆的士大夫各自举行宴会，以至街市酒馆中往往都张挂帷帐，成为这些人游玩休息的地方。晏殊当时贫寒得很，不能出去，独自在家与兄弟讨论、学习。有一天朝廷挑选东宫官员，忽然从宫中批准任命晏殊。执政的大臣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第二天进宫回复皇上，皇上告诉他说：“最近听说馆阁的大臣们无不游玩宴饮，整天整夜不停，只有晏殊关上门与兄弟一起读书。像这样谨慎忠厚，正可以担任东宫官。”晏殊接受任命后进宫答对，皇上当面告诉他任命的原因，晏殊用质朴通俗的语言说：“臣下不是不喜欢宴饮游乐，完全是因为贫困没有游乐饮宴的财力。臣下假若有钱，也会去的，只是没有钱不能出去罢了。”皇上更加嘉奖他的诚实，懂得为国君效力的根本，对他的爱护关注一天天加深，到仁宗当朝时，晏殊终于受到重用。

宝元中，忠穆王吏部为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叛，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忠穆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忠穆善，出城见之。忠穆谓公仪曰：“黜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必术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黜至定，治事毕，玮谓黜曰：‘决事已毕，

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 王黼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饌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总枢柄。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蒐阅人材，不然，无以应卒。’ 王黼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见教。’ 曹玮曰：‘玮实知之，今当为公言，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人以马博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方十余岁，极谏不已，曰：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货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牙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形容，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须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 王黼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

宝元年间，吏部王黼担任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反叛，皇上询问边防情况，辅佐的大臣都不能回答。第二天，枢密院的4个人都免了职，王黼降职到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王黼关系好，出城来见他。王黼对苏公仪说：“我这次的行程，十年前已经有人说过了。”苏公仪说：“那一定是方术之士。”王黼说：“不是。从前我做三司盐铁副使，粗略地处理监狱里的囚犯，到了河北。这时曹玮从陕西贬官后刚被起用做定的主帅。我到了定，把事情处理完，曹玮对我说：‘处理完事，就应当回去；希望明天再留一天，有些话想对你说。’我既喜欢他的雄才大略，又听他想对我说什么，就留了下来。第二天，他准备了很简朴的饭菜，吃完后，让身边的人退去，说：‘您满面权贵的骨相，不做枢密大臣就是边关主帅。有人说您要当宰相，就不对了。但不到10年必定会掌管枢密院大权。现在西方有紧急情况，您应当事先研究边防问题，查看人材，不这样的话，不能应付突发事件。’我说：‘边防方面的事，只有您懂得，请您指教。’曹玮说：‘我确实懂得一点，今天应当对您说说。我在陕西的时候，河西的赵德明曾派人用马来与中原地区做交易，因对利息太低感到愤怒，想杀掉来交易的人，没有人能够劝阻。赵德明有个儿子，才10多岁，极力劝阻不停，说：用战马帮助邻国，已经是失策了；现在又因交易的事杀边疆的人，那谁愿意帮我们做事？我听了这些话，暗暗地想：这孩子想要收买人心了，这必定别有用心。听说他经常在边境贸易场所往来，我想认识他一下，好几次派人引诱他，都不行，就派会画画的人画下他的相貌，画好送来，我一看，真是英雄人物，这人一定会成为边境祸患，算一算时间，正是在您执政的时候，您尽点力吧。’我当时很不以为然，现在明白画师所画的就是赵元昊，都像曹玮说的那样。”

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闾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著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抄，谓之“巢饮”。以稿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其狂纵大率如此。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扞虱庵”。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

石曼卿喝酒喜欢喝个痛快，与平民刘潜是朋友，他曾任海州通判时，刘潜来拜访他。石曼卿到石闾堰去迎接，与刘潜喝了很多的酒，到半夜里酒要喝光了，看到船上有一斗多醋，就把醋倒到酒里一起喝。到第二天，酒和醋都喝完了。他常常在与客人痛痛快快地喝酒时，露出发赤着脚，戴着木枷坐着，称之为“囚饮”；爬到树梢上喝，叫做“巢饮”；用稻草捆住自己，伸出头来喝，再缩回稻草中，称做“鳖饮”。他的狂放大体上就是这样。他的官署后面是一座庵，他常常睡在那里，取名叫“扞虱庵”。他没有哪一天不喝醉，仁宗喜爱他的才能，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想让他戒酒。石曼卿听说了，就不再喝酒，因此生病死去。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篋遗丁曰：“家素贫，唯此饮器，原以赈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后晋公骤达，极力携挽，卒至显位。庆历中，谏官李兢坐言事谪湖南物务，内殿承制范亢为黄、蔡间都监，以言事官坐谪，后多至显官，乃悉倾家物，与兢办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辈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工部侍郎胡则当县令时，丁谓是离家久居外乡的人。胡则见到他，对他非常客气，丁谓就写诗找胡则要米。第二天，胡则请丁谓赴宴，平时所用的酒具全部拿走，只用陶器。丁谓失望了，以为是讨厌自己，就告辞走了。胡则去看他，拿出一个银质的箱子送给丁谓说：“我家向来贫困，只有这个酒具了，愿意把它送给你作告别的礼物。”丁谓这才明白摆设陶器的原因，非常惭愧又非常感激他。后来丁谓一下子地位显贵起来，极力提携胡则，胡则最后也有了高贵的职位。庆历年间，谏官李兢因议论政事获罪被贬到湖南做杂务官，内殿承制范亢担任黄、蔡两地的都监，认为那些因议论政事被降职的，以后大多又可以担任显贵的官职，就用尽全部家产，为李兢准备行装。李兢到湖南，没多久就死了。前辈有这样的说法：“人不可有意去做什么，有意去做就会出差错。”事情本来是不可预料的。

朱寿昌，刑部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板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恸绝，感动行路，乃迎以归，事母至孝。复出从仕，今为司农少卿。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

朱寿昌是刑部侍郎朱巽的儿子，他母亲衰微了，就流落到贫困的人家，10多岁才得以回到家乡，却不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朱寿昌悲哀思念得不得了。等到长大了，便辞去官职寻访母亲，走遍了四方，经历了许多艰难，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同情他的。听到佛经上有“水忏”的说法，那是说想见到父母的人，诵读佛经就会如愿，朱寿昌就昼夜捧读，并且刺出血来书写“水忏”，刻板印刷送给别人，只想见到母亲，经历了许多年。有一天他到河中府，终于找到了他的母亲，母子相互拉着手痛哭欲绝，感动了行路的人。他迎接母亲回家，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后来他又出去做官，现在是司农少卿。替他写传记的读书人有好几个，丞相王安石以下的许多人，都写了《朱孝子诗》几百篇。

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廷式为婚，后契阔数年，廷式读书登科，归乡间访邻翁，而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极困饿，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辞以疾，仍以佣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坚不可，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与成婚。闺门极雍睦，其妻相携而后能行，凡生数子。廷式尝坐小谴，监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为之阔略。其后廷式管于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极哀。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

朝廷的官员刘廷式，本是农家子弟。邻舍一位老大爷很贫穷，有一个女儿与刘廷式订了婚约。后来离别了多年，刘廷式读书中了进士，回家乡寻访邻家老大爷，而老人已死，女儿也因病双目失明，家庭非常贫困，经常吃不饱饭。刘廷式派人去申说以前的婚约，但女子的家人以她有病为由推辞，再加上替人当雇工，不敢与士大夫联姻。刘廷式坚持不同意，认为与老大爷有约，怎么可以因老人死、

女子病就背弃呢，终于与她成了婚。在家中与他的妻子极为和谐，互相拉着手才行走。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刘廷式曾因故而受到小的谴责，监察官想要驱逐他，又赞赏他的好品德，就宽恕了他。后来，刘廷式主管江州太平宫，妻子病死了，哭得十分悲痛。苏子瞻喜爱他的信义，写了文章赞美他。

柳开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衣襴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柳开年轻时爱任性，常说大话自居人上。参加举人考试时，他把文章达到帘幕前交给主考官，共有上千卷，用独轮车装载，在考试那天穿着襴衫推着车进去，想借此惊动大家获取名声。当时张景善写文章有名气，只在袖中带一封信到帘幕前献上，主考官大为称赞，选拔张景为优等。当时的人对此评论说：“柳开千卷，不如张景一封信。”

卷十 人事二

蒋堂侍郎为淮南转运使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使人，独不肯去，须责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隶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蒋曰：“不然。审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为之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乃天章阁待制杜杞也。

侍郎蒋堂担任淮南转运使时，下属各县照例送信祝贺冬至，大都是送了信就回去了，有一个县令的送信人，偏不肯走，一定要求回封信，蒋堂身边的人告诉他，都不听，以至呵斥他、赶他，也不离开，说：“宁可得罪大人，不拿到信不敢回县里去。”当时苏舜钦在座，很感奇怪，说：“差役这样的野蛮厉害，那县令也可以想见了。”蒋堂说：“不对。细想一下那县令一定是个强有力的人，能像这样使人不敢轻慢他的命令。”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那送信人才离去。苏舜钦回到吴中一个多月后，收到蒋堂的信说：“那个县令果然是个有才能的人。”于是替他传扬声誉，后来那县令终于成了名臣。有人说，那县令就是天章阁待制杜杞。

国子博士李余庆知常州，强于政事，果于去恶，凶人恶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医博士多过恶，常惧为余庆所发，因其困，进利药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势已危。余庆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厅事，召医博士杖杀之，然后归卧，未及席布死。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过墓者皆下马。有病疟者，取墓土著床席间，辄差。其敬惮之如此。

国子博士李余庆担任常州知州，处理政事有力；清除坏人果敢，恶人酷吏像神明一样的畏惧他。晚年他得了病十分痛苦，有个存在许多过错劣迹的州医博士，常常害怕被李余庆发觉，趁他痛苦时，送上泻药来毒害他。李余庆服药后腹泻不止，病势危急。他察觉那个医博士的奸诈，让人扶抬他坐到厅堂办理公务，召来医博士，用木棒打死，然后回去睡，还没到席上就死了，葬在横山。人们至今畏惧他，经过他的坟墓都下马。有患疟疾的人，取他坟墓的土放在床席之间，就好了。那敬畏到了这种程度。

盛文肃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文肃骤称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谓有章曰：“盛公未尝燕过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饭。”有章荷其意，别日为一诗谢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诗以入。公得诗，不发封即还之，使人谢有章曰：“度已衰老，无用此诗。”不复得见。有章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亦不谕其由，曰：“府公性多件，诗中得无激触否？”有章曰：“元未曾发封。”又曰：“无乃笔札不严？”曰：“有章自书极严谨。”曰：“如此必是将命者有所件耳。”乃往见文肃而问之：“夏有章今日献诗何如？”公曰：“不曾读，已还之。”绎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读其诗，何也？”公曰：“始见其气韵清秀，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切记之，他日可验。”贾文元时为参政，与有章有旧，乃荐为馆职，有诏候到任一年召试。明年，除馆阁校勘，御史发其旧事，遂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郑州推官。未几，卒于京师。文肃阅人物多如此，不复挟他术。

尚书右丞盛度担任扬州知州时，简朴持重，很少随随便便地答应什么的。当时夏有章从建州司户参军的职位上授任郑州推官，经过扬州，盛度多次称赞他才情高雅，第二天摆酒席接待他。有人对夏有章说：“盛公不曾宴请宾客，有特别器重的人才接待吃一餐饭。”夏有章蒙受盛度的情意，离别的时候作了一首诗答谢盛度。他来到客房，先派人拿着诗送进去。盛度接到诗，还没有打开看就退还来人，派人辞谢夏有章说：“盛度已经衰老，用不着这首诗了。”不 125 再见他。夏有章很有点意外，去会见通判刁绎，把经过情况都讲了一遍，刁绎也不明白这事的缘由，说：“盛公的性格多与人合不来，你诗中的言辞大概没有刺伤他的地方吧？”夏有章说：“他根本没有打开信封。”刁绎又问：“是不是书写不工整？”回答说：“我亲自写成的，非常严谨。”刁绎说：“像这样的话，一定是奉命送信的人有违背盛公的地方了。”就去拜见盛度并问他：“夏有章今天送上来的诗怎么样？”盛度说：“没有读，已退还他了。”刁绎说：“您开始时对待夏有章很客气，如今却不读他的诗，是什么原因呢？”盛度说：“开始时见他气韵清秀，认为他一定会有很高的才能，如今诗封上竟自称‘新圃田从事’，做了一个幕府官，就这样轻佻，您只看着吧，他一定是做官到此为止，志向已经到头了。你千万记住，以后可以应验。”贾文元当时是参政，与夏有章有老交情，就推荐他担任三馆的职务，有诏令让他到现任任上一年以后再应召赴考。第二年，夏有章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御史揭发了他过去的事，就被罢免了，改派为国子监主簿，还是兼任郑州推官。没有过多久，在京城里死了。盛度观察人物大多能像这样，不再靠什么别的办法。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学，唯不能棋。常谓有曰：“逋世间事皆能之，唯不能担粪与著棋。”

林逋隐居在杭州孤山，经常养着两只鹤，放开它们就飞入云霄，盘旋了很久之后，再进笼子里。林逋常常驾着小船，游览西湖各个寺庙，有客人到了林逋住的地方时，就有一个孩子出来接待，请客人坐下，再打开笼子放鹤出去，过不多久，林逋必定摇着小船回来，大概是曾经让鹤飞来传出消息吧。林逋超脱高傲，学问很广，只是不会下棋。他常常对人说：“我林逋世上的事都会，只是不会挑粪与下棋。”

庆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谓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庆历年间，有个皇帝身边的大臣犯了法，罪过还不到处死，执政的人认为他情节严重，请求杀了他。范仲淹一个人不说话，退堂后告诉同事们说：“各位大臣请求皇上不依法处死大臣，一时之间虽然痛快，不应该让皇上亲手搞乱啊。”那些同事都无言可说。

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主判官方进呈，上忽问此人名“次公”者何义？主判官不能对。是时庞庄敏为殿中丞、审刑院详议官，从官长上殿，乃越次对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黄霸之为人也。”上颔之，异日复进谏，上顾知院官问曰：“前时姓庞详议官何故不来？”知院对任满已出外官。上遽指挥中书与在京差遣，除三司检法官，俄擢三司判官。庆历中，遂入相。

景祐年间，审刑院审判案件，有个叫何次公的使臣准备案卷，由主判官方进呈送皇上。皇上忽然问：“这个人叫‘次公’是什么意思？”主判官无法回答。当时庞籍担任殿中丞、审刑院的详议官，跟着主判官上殿，就越级回答说：“臣下曾读过《前汉书》，书上说黄霸字次公，那是因为‘霸’在‘王’之次。这个人一定是仰慕黄霸的为人。”皇上点了点头。另一天，再一次提请审判定案，皇上回头向知院官问道：“上次姓庞的详议官为什么不来？”知院官回答说：“任期满了，已离京到外地任职。”皇上马上下令中书省让庞籍在京城里听从安排，任命他为三司检法官。庞籍很快升为三司判官。庆历年间，就做了丞相。

卷十一 官政一

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岁计几增十倍。予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余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世人说陈恕当三司使时，修改了茶法，茶税因此而差不多增加10倍。我任三司使时，查了他的登记册，发现从景德年间契丹入侵以后，河北简便买进的办法完全不用了，从此以后茶税收入丧失了9/10。陈恕在任时，碰上与契丹讲和，商人的买卖很快恢复，当年的税收就增加了。虽然说多达10倍，我查了一下还没有到过去那么多。他的事到现在还受到称颂，大概是他没有料到的声誉吧。

世传算茶有“三说法”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耳。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二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余为一说，便余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余”者，极边粮草，岁入必欲足常额，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桩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钱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余”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余数足，然后听便余及直便，以此商人竞相争先赴极边博余，故边粟常充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世代相传折算茶钱有三说法最为便利，所谓“三说”，指的是现钱为一说，犀角、象牙、香料、药材为一说，茶为一说。根本不是这样。这只是三分法罢了。说的是沿边一带送交粮草，那价款折合成三部分，一部分支付现钱，一部分折合成犀角、象牙、杂货，一部分折合成茶叶。后来又加上折合成盐变为四分法，改了不止一次，都不是“三说”。我在三司时，找到了“三说”的旧案卷。“三说”，指的是三件事：博余是一说，便余是一说，直便是一说。它所说的“博余”，指边远地区的粮草，每年交纳必须交足规定的数额，每年由三司下达数额到库务司，先储备现钱、紧便钱、紧茶钱，然后召人向朝廷缴纳钱物。“便余”，指靠近过境地区的粮草，由商人先向朝廷缴纳，再到京城结算提取慢便钱、慢茶钱和杂货。“直便”，指商人图取方便，在沿边地区交纳现钱，到京城结算提取。三说就是先博余，到数额足了，然后听任便余和直便。因此商人竞相抢先赶到边远地区博余，所以边疆的粮食常常充足，没有被各州郡分割，粮草的价格不能飞涨，各路税收也都超额，这是个好办法。我在三司时，正想研究探讨，恰好遇到调任，没有实现这个建议。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一火出，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予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刳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

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见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延州旧丰林县城，是赫连勃勃修筑的，至今还叫赫连城。城筑得紧，像石头一样，用刀砍它都有火花迸出。那城墙不很厚，但它的马面很长又很密。我亲自派人去丈量过，马面都长4丈，相距6、7丈。因为马面修得密，城墙就不必太厚，人力也很难攻打。我曾亲眼见过攻城，如果马面长就可以反过来射击城下进攻的敌人，加上马面密就可以射箭和投石相交，敌人到了城下，那四面的箭和石头就落到他们身上。要使敌人不能到城下，才是最好的办法。如今边城城墙虽然厚，但马面很短又很稀，假如敌人可以到达城下，那么城墙即使厚，终究是危险的事。这些马面又有很多被削掉了角，称为“团敌”，这尤其没有益处。守城的人完全靠依凭楼角来投射箭和石，以保护城墙墙脚。只要使敌人防备的地方多，他们就无处藏身。赫连这样的城墙，十足可以成为范例。

刘晏掌南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余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余价，与所余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廩收，但第一价则余第五数，第五价则余第一数，第二价则余第四数，第四价则余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余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极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余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刘晏掌管国家财政，几百里外物价的高低，当天就知道了。有人赞扬刘晏的一件事，我在三司的时候，曾经把他的做法在东南一带推行。每年发运司从郡县征购粮食，并不知道粮价高低，要各地先将价格呈报，再根据价格的贵贱，贵就少买，贱就多购。只有收齐了各地价格后，才能定下数量发下执行。等到公文发到时粮价已经上涨，所以常常高价买进。刘晏的方法是让产粮多、交通便利的郡县，把几十年价格的高低和所购粮食数量的多少，各分为五等，详细地登记造册上交主管机关（现在属发运司管辖）。粮价刚一确定，不再向上报告，即时开仓收粮。只要是第一等价格的就按第五等数收购，第五等价格的就按第一等数收购，第二等价格的就按第四等数收购，第四等价格的就按第二等数收购。同时派人将收购数量迅速报告发运司。这样，粮价低的地方自然收购到最大数量，其他各种粮价的地方也收购到适当的数量，就不会有不合理的收购。发运司还要综合各郡县收购的数量安排计划，如果收购过多，就减少价格高和路远地方的收购量；如果还少，就增加价格低和路近地方的收购量。从此以后，掌握粮价再也不会贻误时机，各自与本地粮食收成的好坏相适应，当天就知道价格。这确定是好办法。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从前的校书官大多不熟悉职责，只是拿来旧书用墨涂掉个把字，再在旁边注上原来的字，把这项工作作为每天的工作。从设立编校局开始，只能用红笔圈字，还得在卷末写上校书官的姓名。

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或有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

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余崇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五代时藩镇割据，大多在原来税收之外，再向百姓搜刮。本朝初年全部免去、改正，税额一次就定下来，其中可能有轻重不等的地方，就根据情况平衡一下。福州和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就规定用两贯500钱折合缴纳1匹绢，歙州缴给官府的绢只有几两重。太原府要送交的税全部免了，只用减价买卖的方式补上。后人往往怀疑福州、歙州折合成绢太贵，太原折合成米又太贱，那是看不到当时均衡税收的本意吧。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麹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麹，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夏秋两季按例缴纳的钱物，如盐曲钱之类，名称种类琐细。庆历年间，主管部门建议合并归到一个名目下，以便简省记帐的麻烦。程琳担任三司使时，偏偏认为还按老办法要方便些，假如取消了原来的名目，以后并不清楚了，可能又会加上盐曲之类，那会引起重复收税。这也是善于考虑事理啊。

近岁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复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即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时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近年来邢、寿两郡分别审判一件案子，运用刑法都有失误，被刑曹驳回。寿州有人杀了妻子的父母兄弟几个人，州里主管以大逆不道牵连到他的妻子。刑曹驳回说：“打杀妻子的父母，就是恩义断绝，何况他是谋杀，不应该再牵连他的妻子。”邢州有一个盗贼杀一家人，那夫妇二人当时就死了，只有一个孩子第二天才死，州里主管按照户绝法把他家的财产给出嫁了的亲生女儿。刑曹驳回说：“这一家父母死的时候，那儿子还活着，这个时候财产是他儿子的了。出嫁了的亲生女儿，就是他的出嫁了的姐妹，不应该得到。”这两件事大体相同，一个错在活着的人，一个错在死了的人。

深州旧治靖安，其地碱卤，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卤。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奏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碱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原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深州故城在靖安，这个地方盐碱很重，不能种植庄稼，连井水、泉水都是苦的。景德年间，讨论迁移深州古城，当时，傅潜在李晏，就上书皇帝请求把深州迁到李晏，就是现在的深州。这里的土地不长庄稼、草木，与旧的州城没有什么区别，盐碱与土地差不多各占一半，城墙早晨修补晚上就垮了，至于柴草，也要靠外县供应。只有胡卢河水勉强可以供居民食用，但水源来自城外，这对边城也是很不利。旧州城北面有安平、饶阳两县，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还处在通往徐村的要道上，与祁州、永宁如犬牙交错之势，可以互相照应。不把州城迁到这里，而顾念私利，匆忙地迁到李晏，这

是傅潜的罪过。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法律条文规定：“免除官职的人，三年以后，在原来品级上降低两等起用；免除担任的职务及降级抵当徒刑的人，一年以后，在原来品级上降低一等起用。”降先品，指的是免官时职务、官阶都免了，就从没有降的品级下降二等起用；免除担任的职务及只降一级官阶抵当徒刑的人，就从那没有降的品级降一等起用。现在起用官员却从现有的官级上再降一等，是误解了法律的意思。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其义，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牾。予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法律规定连降的官级即使多，分别不得超过4等。这种有下限的规定不光是规定一下，是有所顾忌，不得有个下限。根据法律，犯官另外有历任官职的仍然连降，降级即使多，分别不得超过4等。注释：各，指官职、官阶分别降级，不在打通一起计算的限制之内。二官指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等各降4等，不能打通一起计算，那样是共降8等才止住。我研究它的含义，被除名以后再起用的办法是，正四品在正七品下起用，从四品在正八品上起用，就是在原来品级上降了9等。免除官职、降级抵当徒刑假如各降5等，那反而比除名还重了，这就不得有个下限。这种法律规定现在虽然不用，但执法者应该了解立法的本意，那就与新的规定没有抵触了。我担任检正刑房公事的时候，曾经一一询问老法官，竟没有一个明白这一层意思的。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台，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岁边臣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边城的防守设施中有一种战棚，用长木头架在墙垛上，大体上像城楼那样。可以拆卸与安装，安装时顷刻之间就能完成，用来防备城楼突然被摧毁，或者没有城楼的地方受到进攻，就迅速装起战棚对付敌人。梁代侯景进攻台城时，就搭起高战楼靠近城墙，城上也搭一座战楼来抵御，派勇士在楼上交战，这是近似战棚一类的东西。防御敌人的进攻，不是匆促间可以准备好的。近年来驻守边城防地的官员有一种议论，认为既然有了城楼，那战棚就可以废除了，恐怕这种说法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吧。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者。小人靳财，兼不愤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鞠真卿当润州知州时，百姓中有打架的人，在判打架斗殴罪之外，另外要先动手打人的出钱给后动手的。那些人格低下的吝惜钱财，更不甘心拿钱给敌手，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互相瞪着眼，没有人敢先动手。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连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继，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隶系有司，具前后巨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脏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曹州人赵谏曾经做过小官，因为犯了罪被撤了职，只好靠记录别人的隐私来控制乡里，没有敢违背他的心意的，人们怕他超过了怕匪徒盗贼，官府也被他控制，一举一动都要看他的脸色。兵部员外郎谢涛任曹州知州时，充分了解了他的劣迹，把他抓起来关到牢里，详细整理他前前后后的危害情况呈报，奏章又发到了御史府按察处处理。赵谏犯罪贪财多得不得了，就被处杀头，曹州人都互相庆贺。因此有了把“告不干己事法”明明白白地写进诏令的事。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通过驿站传递文件的方法过去有三种，即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每天行走400里，只有发生战争时才用这一种。熙宁年间，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像古代的羽檄那样。在木牌上刷上红漆再写黄金色的字，光耀眩目，经过的时候如飞电一般，看见的人没有不躲避让路的，每天可走500里。有战前机要必须尽快处理的，就从皇帝处发下这种金字牌，就是三省、枢密院也不能参与。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竟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皇祐二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者的尸体遍布路上。这时范仲淹主管浙西，调发国家粮食并募集民间所存钱物来赈济灾民，方法极为完备。吴中百姓喜欢比赛划船，爱好做佛事，范仲淹就鼓励百姓比赛龙舟，太守每天出游到西湖上宴饮，从春天到夏天，居民都出外游玩。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的主持，告知他们说：“灾荒年间工价最低廉，可以大兴土木工程。”于是各寺院的修建工程都很兴盛。他又修建仓库和官员宿舍，每天动用工匠一千多人。监察机关弹劾杭州长官不体恤荒政，嬉游玩乐而无节制，以及官府、私家大修房舍，伤耗民间财力。范仲淹于是自己草拟奏章，申述宴饮游乐以及兴修房舍的原因，是要调出民间有余的钱财，来救济贫困的人。从事贸易、饮食、工匠、民夫一类的人，仰仗官府、私家过活的，每天大概有几万人。救济灾荒的措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一年两

浙路灾区只有杭州平静无事，百姓没有流亡的，这都是范文正公的恩惠啊！饥荒年岁动用司农寺粮仓的粮食赈济灾民，募集民间财力为地方兴利，近年来已定为法令。这种措施，既赈救了饥荒，又趁此机会为民间兴利，这真是古圣先王的美德啊。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予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夫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凡是行军作战，如何从敌方取得粮食，是最急要的事情。自己运粮不仅耗费大，按情势说也难得运好远。我曾经计算过，一个民伕背6斗米，一个士兵自带5天的干粮，如果一个民伕供养一个士兵，去一次可吃18天。6斗米，每人每天吃2升，两个人吃，18天吃完。假如计算回程，只可以前进9天。两个民伕供应一个士兵，去一次可吃26天。1石2斗米，3个人每天吃6升，过了8天一个民伕背的粮食就已吃光，再给他6天的粮食返回。后面的18天，两个人吃，每天4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假如算上回程，只可以前进13天。前8天每天吃6升，后5天加上回程，每天吃4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3个民伕供应一个士兵，去一次可吃31天。1石8斗米，前6天半4个人吃，每天8升。回去一个民伕给4天粮食。中间7天3人吃，每天6升。又回去一个民伕，给9天粮食。后面18天，两个人吃，每天4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算上回程，只可以前进16天。前6天半，每天吃8升；中间7天，每天吃6升；后面两天半加上回程，每天吃4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3个民伕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最大限度了。如果出兵10万人，其中运送辎重的人员占1/3，能参加驻防和作战的只有7万人，要用30万人运粮，此外很难再增加了。返回的运粮民伕还要有援兵，沿途运粮还有死亡、生病的，人数会逐渐减少，暂且把省下的粮食来准备援兵需要。运粮的规定，每个民伕背6斗，这是参照总数平均估算的数字。他们中队长不背粮，炊事人员只背一半，他们没有背的部分全部平均分给所有民伕，再加上死亡、生病的，这些人背的米又全部平均分摊，那么，每个民伕所背的，常常不止6斗了。所以军队里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人。一个人吃闲饭，要两三个人供应他，还可能不够。假如用牲畜来运送，那骆驼可以驮3石，马、骡驮1石5斗，驴1石，比起人力运送，虽然背负得多而花费较少，但喂草放牧不及时，牲畜大多会消瘦病死。一头牲畜死了，那就得连同它所驮的粮食一起丢掉，比起用人来背，利害各占一半。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券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

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券见给？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券。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券，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锄之，罢其旧券，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

忠、万一带的少数民族，在大中祥符年间曾来抢劫，边防官员随随便便地尽力招来，派人叫来他们的酋长，把领取粮米的字据给他。从此以后有照着这样抢劫的，官府不得已，又用字据引他来。他们中有发生争执的，甚至有人自己说出来：“像某人才杀、抢多少人，就得到一张字据，我总共杀了兵士、百姓有他几倍之多，怎么也只给我一张字据呢？”他们互相比较，认为抢劫得厉害的就得多拿这样的字据。到熙宁年间一算账，前后一共给了400多张字据，子孙相继，代代不断。根据他们是盗匪这一点，全部铲除了他们，取消了那些老的字据，什么也不给了。从此这些少数民族畏惧威严，不再侵犯边防地区。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方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塌，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庆历年间，黄河在大名府商胡埽决堤，很久没能堵住，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自去督促施工。通常堵塞河堤决口，都在将要合拢的地方安放中间一节埽，称为“合龙门”，工程的成败全在于此。当时多次堵口都没有合龙。那时合龙门的埽长60步，有一个叫高超的河工建议，认为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下去，埽不能沉到水底，所以不能截断河中流水，而绳缆大多被拉断了。现在应当把60步的埽分成3节，每节埽长20步，中间用绳索连接起来。先压下第一节，等它到底后再压第二、第二节。老河工竭力争辩，认为不行，说：“20步长的埽不能塞住水的渗漏，白费了3节埽，所用的人力物力会多要一倍，而决口还是堵不住。”高超对他们说：“压下第一节埽确实不能断流，但水势必然减弱一半。压下第二节埽，只要用一半力气就够了，即使水流还没有截断，也不过是小的渗漏罢了。压第三节埽是平地施工，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三节埽都安放好了，前两节自然就会被泥沙淤填，用不着再耗费人力了。”郭申锡主张用老办法，不肯采用高超的建议。当时贾魏公任大名府主帅，只有他认为高超的说法是正确的，暗地里派遣几千人到下游去捞取冲下去的埽。按照老办法做埽果然被冲走，河堤决口反而更加扩大，郭申锡因此被降职。后来还是采用了高超的办法，商胡埽决堤才被堵住。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

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余万缗。唯未盐岁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余，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余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盐的种类很多，过去的史书记载，周围少数民族地区就有 10 多种。中原产的盐，也不少于几十种。现在官营、私营的有 4 种：一种是“未盐”，就是海盐。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等 11 路的人食用。其次是“颗盐”，解州盐泽及晋州、绛州、潞州、泽州等地出产，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襄、剑等地的人食用。再次是“井盐”，是打井开采出来的，益州、梓州、利州、夔州 4 路的人食用。还有一种是“崖盐”，是在土崖之间出产的，阶州、成州、凤州等地的人食用。只有陕西路的颗盐有税收的定额，每年的税款是 230 万贯。除此以外税额多少不一，大约一年的税收是 2000 多万贯。只有未盐税每年从中提取 300 万，供河北边防地区买粮，其他地区的盐税都给本地作经费使用。沿边地区买粮食的钱要靠中央财政机构支付，河北路就用官卖海盐的收入，河东、陕西两路则以池盐和蜀茶的税收为主。运盐的方法，凡是走 100 里，陆运每斤收 4 文，船运每斤 1 文，以此作为收费标准。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馘灰汤之类薄之，都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吏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袖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太常博士李处厚任庐州慎县县令时，曾有参与打架致死的，李处厚去验伤，把用酒腌过的肉和灰汤一类的东西贴在尸体上，都没有见到伤痕。有一个老大爷求见，说：“我是县里的老书吏，听说您验伤没有发现伤痕，其实这容易分辨。用新红油伞在中午时盖在尸体上，再把水浇到尸体上，那伤痕一定会显现出来。”李处厚照他说的那样一做，伤痕就清楚地出现了。从此江、淮一带官府往往用这个办法验伤。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巨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幌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钱塘江在吴越国钱氏时修筑了石堤，堤外又竖起十几行大木柱，叫做“滉柱”。宝元、康定年间，有人提议把滉柱取出来，这可以得到几十万很好木材。杭州的主帅认为这主意好。不久，旧木柱从水中取出来，全都朽烂不能用了；而滉柱一经取空，石堤被波涛冲击，年年都被摧垮。大概前人埋滉柱是为了减弱浪涛的猛势，使石堤不直接受到潮水冲击，因此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任转运使时，有人提议从浙江盐场以东，退后几里修筑一道半月形石堤，以便避开汹涌的潮水。大多数水工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只有一个老水工认为不可，暗暗地告诉他的同伴说：“移修堤坝每年就没有水患了，你们靠什么穿衣吃饭？”众人都乐于自身得到的利益，就跟随附和的主张。杜伟长没有察觉他们的计谋，花费了上万的巨款，而江堤溃决的灾害仍年年发生。近年来才考虑到月堤的好处，修了月堤

后江涛的危害渐有减小，但是还不如立幌柱的办法好。可是幌柱花费钱财太多，不可能再修建了。

陕西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 141 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劳。异日犂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陕西盐，以前的制度都是官府自己搬运，设置机构管理运输和买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创立凭钞运销食盐的制度，规定商人在边郡交 4 贯 800 文钱买一张盐票，凭票到解池领盐 200 斤，由他自行出卖。把得到的钱充实边塞的府库，也省了数十郡人民搬运的劳役。从前驾车的牛驴死于运盐的，一年达上万头，犯了禁卖私盐的罪名而受到征罚的人不知有多少，到这时一切都解脱了。实行这个制度的时间长了，盐价时高时低，又在京都设立掌管盐务的机关，由陕西转运司派官去管理。京城中食盐，每斤卖不到 35 文时，就收集起来不贩卖，这样来提高盐价；超过 40 文时，就大量发售库存盐压价，防止盐商高价谋利。使盐价稳定，而发行盐票也有定额。这种制度实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认为有利。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悉罢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复有献谋者，予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河北盐业专卖法，太祖皇帝曾经发出亲笔签署的诏令，听任民间商人贩卖，只收税钱，不允许官府专卖。这以后有关部门多次请求关闭私营盐业。仁宗皇帝又批下诏书说：“我最终都不会让河北的百姓常吃高价盐。”提建议的人全都被遣散了。河北父老都在手中捧着灰，点火焚香，遥望京城欢呼感谢。熙宁年间，又有提出这样建议的。我当时在三司，寻求两朝皇帝的亲笔诏书都没有找到，但人人能够背出其中的话，那种提议也就停息了。

卷十二 官证二

淮南漕渠，筑埭以蓄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船。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予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淮南的运粮水道，修筑栏水土坝来蓄水，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前传说召伯坝是谢安修筑的。按李翱《来南录》的说法，唐朝时这里还是流水，那就不应该在谢安时修筑这座坝的。天圣年间，监管真州排岸司的右侍禁陶鉴才提议建造复闸节制水流，来减省行船过坝的劳累。当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任正副发运使，上奏获准推行这个办法，才修建了真州闸，每年可省去多余的差役500人，杂费125万。旧船运法规定，一条船载米不超过300石。水闸建成后，开始可装载400石，后来载运量渐渐增多，官家船达到700石，私家船可装运800多袋米，1袋等于2石。从此以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等坝，相继废除，至今成了水运的便利。我在元丰年间经过真州，在江亭后面的粪土中发现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是胡宿撰写的《水闸记》，简略地记述这件事，但不很详尽。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丞相张杲卿任润州知州时，有个女人的丈夫外出好多天不回家，忽然有人报告菜园的井里有死人，那女人吃了一惊，走去看了，大哭着说：“是我丈夫啊！”就报告了官府。张杲卿让下属官员召集她的邻居到井边验证是不是她的丈夫，大家都认为井太深不能分辨，请求打捞尸体查验。张杲卿说：“大家都分辨不清，这女人一个人凭什么知道是她丈夫？”就将这女人收押交给所属官员讯问清楚，果然是奸夫杀了她的丈夫，这女人参与了谋杀。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著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庆历年间，朝廷上议论开放私卖茶盐的禁令和减免对商人的征税。范仲淹认为不能这样做。官卖茶盐和征收商税的收入，只不过是分减了商人的一部分利益罢了，对商人并没有很大害处。现在朝廷的费用没有减少，因此每年的收入也不可缺少，既然不向茶山、盐池和商人中征收捐税，那就必然要向农民收取。与其损害农民的利益，何不向商人征收？现在的办法，不如先节省朝廷的开支，朝廷的开支有盈余，就应当先放宽对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然后才顾及商人。开放私卖茶盐的禁令和减免商税都不是当务之急。议论于是平息了。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岁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著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真宗皇帝在开封府官署时，开封府的17县都因为旱灾减免了赋税，立刻有流言传到宫中，想中伤真宗皇帝。太宗知道后不高兴。御史打听到了太宗的心思，都在奏章上把开封府减免赋税的事公开他说过了头，太宗传下旨意给京东、京西两路各州要求选派官员核查。其中亳州应当查考太康、咸平两县。当时曾会任亳州知州，王钦若在曾会手下，曾会喜欢王钦若的见识气度，常常以王公宰相期待他。到这时派王钦若去，曾会还告诫说：“这一去事关重大，不宜稍有差错。”王钦若到了太康、咸平两县，查考得很细致，其他人都高谈减免赋税过多，要追收赋税物品，但王钦若一个人请求全部减免，人们都替他担忧。第二年，真宗即位，首先提升王钦若为右正言，还对身边辅佐的大臣说：“在那样的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忧惧。钦若是个小官，敢于一个人替百姓伸张道理，这是大臣的气节啊！”从此以后几次越级提拔，最终成了宰相。

国朝初平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年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本朝刚平定江南时，每年铸造7万贯钱，从此以后渐渐增加，到天圣年间，每年铸钱100多万贯。庆历年间，达到了300万贯。熙宁六年以后，每年铸造铜钱、铁钱600多万贯。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二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天下的小官员向来没有固定的薪俸，只靠受人请托而收受财物为生，往往有能达到富裕的。熙宁三年，才制定天下小官员的薪俸标准，并设立重刑来断绝以私事相托的弊病。这一年，京城各官署每年支取小官员的薪俸3834贯254文钱，以后年年增加。到熙宁八年，每年支取371533贯178文。从那以后，每年增减不定，但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京城原来有薪俸的小官吏和全国各地小官吏的薪俸，都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

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本朝茶叶的收益，除去官府资本及杂费之外，净收入国库的钱到禁止官府专卖时选一年收入的中间数，共计1904093贯885文，其中649069贯是经营茶叶的纯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入160431贯527文，除去本钱及杂费外，得纯利106957贯685文。容茶交纳的引钱，嘉祐三年，除去本钱及杂费外，得纯利542111贯524文。445024贯670文是茶税钱。这是居于中间的嘉祐元年所收的数字，除去川茶钱在外。允许商人买卖以后，选一年收入的中间数，共计1175104贯919文，其中369072贯470文是茶租。嘉祐四年允许茶商买卖，立下的规矩是茶叶要交引钱684321贯380文，后来多次减免税收，这是到了治平二年，居中间的年份分收上交的数字。806032贯648文是茶税。这是居中间的治平三年的茶税，除去川茶税钱外总共得出这个数字。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岁罢诸处榷货务，寻复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内，中间时有增亏，岁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掇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复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人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阁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十斤，前三司使李咨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本朝关于茶叶的规定，乾德二年，才诏令在京、建州、汉、蕲口分别设立专卖处。乾德五年，开始禁止私卖茶叶，做到不把情理放在重要位置。太平兴国五年，朝廷修改了禁令条款，开始设立同级罪。淳化二年，让商贩到种茶户买茶，国家在官办交易场所实行“贴射”收税，开始实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开始实行交引法，废止贴射法，茶商在西北把粮食上交“交引”机构后领取凭据，从通利军开始实行，当年就废止了各处的专卖处，不久又照原样恢复。到咸平四年，茶利钱的标准是1392119贯319文。到嘉祐二年，共61年，都按照这个标准，官府本钱和杂费都包括在内，中间有时有增加或亏损，年收入没有一定规律。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开始设立三分法，将茶价作为10分，4分付给香药，3分付给犀角象牙，3分付给茶票。咸平六年，又改成支付6分香药、犀角、象牙，4分付给茶票。景德二年，朝廷允许人们缴纳给国家钱、丝绸和金银，叫做“三说”。到大中祥符九年，茶票更加不重要，朝廷采纳秦州知州曹玮的建议，到永兴、凤翔用官钱收买茶商的茶票，来保住茶票的价值，在此以前已多次增加了利钱。到天禧二年，镇戎军缴纳一斗大麦，本价之上再加上利钱支付1贯254文。乾兴元年，朝廷修改三分法，支付茶票3分，东南现钱2分半，香药4分半。天圣元年，再一次

实行贴射法，实行了3年，茶叶利润全归大商人了，官办交易场只得到了发黄的、迟生的、质次的茶，仁宗就颁布诏令让孙奭重新议定，废除贴射法。第二年，追究原议省吏、计复官旬献等的罪责，都发配到沙门岛，原详定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分别罚扣一个月的薪俸，御史中丞刘筠、入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阁门使薛昭廓和三部副使分别罚铜20斤，撤销前三司使李谿的枢密直学士官职，仍旧任洪州知州。皇祐三年，计算茶钱依旧只用现钱。到嘉祐四年二月五日，仁宗下诏令废除茶禁。

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都卖茶岁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额钱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其六榷货务，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额钱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七贯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祖额钱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贯三百七十五，受纳潭、鼎、澧、岳、归、峡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汉阳军祖额钱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贯五十一，受纳鄂州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蕲州蕲口祖额钱三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贯八百一十四，受纳潭、建州、兴国军片茶五十万斤。无为军祖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受纳潭、筠、袁、池、饶、建、歙、江、洪州、南康、兴国军片散茶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祖额钱五十一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受纳潭、袁、池、饶、歙、建、抚、筠、宣、江、吉、洪州、兴国、临江、南康军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受纳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场祖额钱共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九十九贯七百三十二，共买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六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买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钱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贯三百四十八。商城场买茶四十万五千五十三斤，卖钱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百四十六。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庐州王同场买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场买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钱一万四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太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钱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蕲州洗马场买茶四十万斤，卖钱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祺场买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石桥场买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六千八十贯。

本朝有6个专卖处、13个山场，总管卖茶一年共10533747斤半，本额为2354047贯10文。其中6个专卖处，取居中间的数字，嘉祐六年，收售茶叶5736786斤半，本额钱1964647贯278文。荆南府本额钱315148贯375文，收纳潭州、鼎州、澧州、岳州、归州、峡州和荆南府的片散茶总共875357斤。汉阳军本额钱218321贯51文，收纳鄂州的片茶238300斤半。蕲州蕲口本额钱359839贯814文，收纳潭州、建州和兴国军的片茶50万斤。无为军本额钱348630贯430文，收纳潭州、筠州、袁州、池州、饶州、歙州、江州、洪州、南康军和兴国军的气散茶总共斤。真州本额钱514022贯932文，收纳潭州、袁州、池州、饶州、歙州、建州、抚州、筠州、宣州、江州、吉州、洪州、兴国军、临江军和南康军的片散茶总共2856206斤。海州本额钱308703贯676文，收纳睦州、湖州、杭州、越州、衢

州、温州、婺州、台州、常州、明州、饶州和歙州的片散茶总共 424590 斤。13 个山场本额钱共有 289399 贯 732 文，共收购茶叶 4796961 斤。光州光山场收购茶叶 307216 斤，卖出收入 12456 贯。子安场收购茶叶 228030 斤。卖出收入 13689 贯 348 文。商城场收购茶叶 400553 斤。卖出收入 27079 贯 446 文。寿州麻步场收购茶叶 331833 斤，卖出收入 34811 贯 350 文。霍山场收购茶叶 532309 斤，卖出收入 35595 贯 489 文。开顺场收购茶叶 269077 斤，卖出收入 17130 贯。庐州王同场收购茶叶 297328 斤，卖出收入 14257 贯 642 文。黄州麻城场收购茶叶 284274 斤，卖出收入 12540 贯。舒州罗源场收购茶叶 185082 斤，卖出收入 10469 贯 785 文。太湖场收购茶叶 829032 斤，卖出收入 36096 贯 680 文。薪州洗马场收购茶叶 40 万斤，卖出收入 26360 贯。王祺场收购茶叶 182227 斤，卖出收入 11953 贯 992 文。石桥场收购茶叶 55 万斤，卖出收入 36080 贯。

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羨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发运司每年供应京城的米，以 600 万石为定额。淮南供应 130 万石，江南东路 991100 石，江南西路 1288900 石，荆湖南路 65 万石，荆湖北路 35 万石，两浙路 150 万石。总计丰歉平均每年交纳 620 万石。

熙宁中，废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仪、滑、慈、邦、集、万、乾、儋、南仪、复、蒙、春、陵、宪、辽、夔、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废县一百二十七：晋州（赵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华州（渭南）、德州（德年）、陵州（贵平籍县）、忠州（桂溪）、兖州（邹县）、广州（信安、四会）、陕府（湖城、峡石）、河中（西河、永乐）、巴州（七盘、其章）、坊州（昇平）、春州（铜陵）、北京（大名、渔水、经城、永济）、莫州（郑县、长丰）、梧州（戎城）、邛州（临这）、梓州（永泰）、河阳（汜水）、沧州（饶安、临津）、融州（武阳、罗城）、象州（武化）、归州（兴山）、汝州（龙兴）、怀州（修武、武陟）、道州（营道）、庆州（乐蟠、华池）、瀛州（束城、景城）、顺安（高阳）、澶州（顿邱）、洛州（曲周、临洛）、丹州（云岩、汾川）、潞州（黎城）、琼州（舍域）、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阳、礼丹、金城、述昆）、汾州（孝义）、延州（金明、丰林、延水）、太原（平晋）、随州（光化）、邢州（尧山、任县、平乡）、秦州（长道）、达州（三冈、石鼓蜀）、扬州（广陵）、赵州（隆平、柏乡、赞皇）、雅州（百丈、荣经）、祁州（保泽）、同州（夏阳）、嘉州（平羌）、河南（洛阳、福昌、颍阳、缙氏、伊阙）、滨州（相安）、慈州（文城、吉乡）、成都（犀浦）、戎州（宜宾）、绵州（高昌）、荣州（公井）、宁化（宁化）、乾宁（乾宁）、真定（灵寿、井陘）、荆南（建宁、支江）、辰州（麻阳、招化）、陈州（南顿）、桂州（修仁、永宁）、安州（云梦）、忻州（定襄）、剑门关（剑门）、汉阳（汉川）、恩州（清阳）、熙州（狄道）、河州（枹罕）、卫州（新乡、卫）、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许州（许田）、奇岚（岚谷）、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珂）、涪州（温山）、阆州（晋安、岐平）、复州（玉涉）、润州（延陵）。

熙宁年间，撤并全国的州、县。到熙宁八年，总共撤销州、军、监 31 个：仪、滑、慈、郑、集、万、乾、儋、南仪、复、蒙、春、陵、宪、辽、夔、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撤销县 127 个：晋州的赵城、杭州的南新、普州的普康、磁州的昭德、华州的渭南、德州的德平、陵州的贵平和藉县、忠州的桂溪、兖州的邹县、广州的信安和四会、陕府的湖城和峡石、河中的西河和永乐、巴州的七盘和其章、坊州的昇平、春州的铜陵、北京的大名、洹水、经城和永济、莫州的郑县和长丰、梧州的戎城、邳州的临溪、梓州的永泰、河阳的汜水、沧州的饶安和临津、融州的武阳和罗城、象州的武化、归州的兴山、汝州的龙兴、怀州的修武和武陟、道州的营道、庆州的乐蟠和华池、瀛州的束城和景城、顺安的高阳、澶州的顿邱、洛州的曲周和临洛，丹州的云岩和汾川、潞州的黎城、琼州的舍城、火山的火山、横州的永定、宜州的古阳、礼丹、金城和述昆、汾州的孝义、延州的金明、丰林和延水、太原的平晋、随州的光化、荆州的尧山、任县和平乡、秦州的长道、达州的三冈、石鼓和蜀、扬州的广陵、赵州的隆平、柏乡和赞皇、雅州的百丈和荣经、祁州的深泽、同州的夏阳、嘉州的平羌、河南的洛阳、福昌、颍阳、缙氏和伊阙、滨州的招安、慈州的文城和吉乡、成都的犀浦、戎州的宜宾、绵州的西昌、荣州的公井、宁化的宁化、乾宁的乾宁、真定的灵寿和井医、荆南的建宁和枝江、辰州的麻阳和招谕、陈州的南顿、桂州的修仁和永宁、安州的云梦、忻州的定襄、剑门关的剑门、汉阳的汉川、恩州的清阳、熙州的狄道、河州的郑罕、卫州的新乡和卫县、渝州的南川、虢州的玉城、果州的流溪、利州的平蜀、许州的许田、岢岚的岚谷、蓬州的蓬山和良山、冀州的新河、涪州的温山、阆州的晋安和岐平、复州的玉沙、润州的延陵。

卷十三 权智

陵州盐井，深五百余尺，皆石也，上下甚宽广，独中间稍狭，谓之“杖鼓腰”。旧自井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自木干垂纆而下，方能至水，井侧设大车绞之。岁久井干摧败，屡欲新之，而井中阴气袭人，入者辄死，无缘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则阴气随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复止。后有人以一木盘，满中贮水，盘底为小窍，洒水一如雨点，设于井上，谓之“雨盘”，令水下终日不绝，如此数月，井干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复旧。

陵州盐井有 500 多尺深，井壁全是岩石。井的上部和下部都很宽大，只有中间比较狭窄，叫做“杖鼓腰”。过去，从井底开始用柏木做成板，往上直到井口。从沿壁的木板放下绳子，才能到达水面。井旁安放大绞车绞动绳索。年代久了，木板腐烂，多次想更换新的，但井中阴气袭人，人一下去就死，无法施工。只有等到下雨天雨水落到井里，阴气随雨水下降，才稍为可以施工，天一晴就得停止。后来有人用一个木盘，盘中盛满水，盘底凿些小孔，水像雨点一样洒出，安放在井口上，称为“雨盘”，让水整天不停地洒下。这样连续八个月，木板被换成新的，陵州盐井又被重新利用起来了。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噪叫子”。尝有病暗者，为人所苦，含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噪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

人们用竹子、木头、象牙、兽骨之类做成哨子，放在人的喉咙里吹，能发出像人说话似的声音，被称作“噪叫子”。曾有一个喉咙哑了不能说话的人，被人害苦了，有着冤屈却说不出。听诉讼的人试着拿一个噪叫子让他放在喉中，发出了像木偶那样的声音，能粗略地听出小部分意思，他的冤屈因而得到了伸雪。这件事值得记录下来。

《庄子》曰：“畜虎者不与全物、主物。”此为诚言。尝有人善调山鹪，使之斗，莫可与敌。人有得其术者，每食则以山鹪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见其鹪，则欲搏而食之，此以所养移其性也。

《庄子》说：“养老虎的人不给老虎吃完整的或活的动物。”这是很有道理的话。曾经有一个很会调教驯养鹪鹩的人，让它和别的鹪鹩斗，没有一只敌得过它。有人发现了他的方法，每次喂食时都用鹪鹩皮裹上肉给它吃，时间长了，它看见别的鹪鹩，就想捕捉来吃掉，这就是通过驯养未改变鹪鹩的习性。

室元中，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狄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殆无遗类。又青在泾原，尝以寡当众，度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器，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狄天使勇？”时虏人谓青为“天使”。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也。

宝元年间，党项人侵犯边境。当时刚刚招募的“万胜军”，没有经过战阵的演习，遭遇敌人经常打败仗。狄青当了将领，有一天，把万胜军的旗帜全部交给虎翼军，让他们出战。敌人望见这种旗

帜。认为容易对付，全军径直冲过来，结果被虎翼军打败，大概没有剩下什么人了。另一次，狄青在泾原带兵，曾经以少数兵力对付许多敌人，考虑到必须用奇计才能取信，事先告诫全军都放下弓箭，一律使用短兵器，传令全军听到一声钲响就停止前进，听到第二声就严整阵容佯装撤退，钲声一停，就高喊着冲向敌人。士兵们都像他布置的那样。刚一遭遇敌人，还没有接火，钲声立刻响了起来，士兵们都停止前进；第二次钲声响起，又都撤退。敌人大笑起来，互相说着：“谁说狄青是天使勇猛？”当时敌人叫狄青为“天使”。钲声突然停止，士兵们一下子冲向敌人，敌兵大乱，互相踩踏致死的，数都数不过来。

狄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依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飧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劝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矣。

狄青任枢密副使时，被派到广西当宣抚使。当时依智高占据着昆仑关。狄青到宾州，正赶上元宵节，他下令军营中张灯结彩，头一夜宴请各路将领和参谋官员，第二夜宴请一般官员，第三夜款待广大军士。第一夜饮宴奏乐通宵达旦；第二夜二更时分，狄青忽然说有病，一下站起来进去去了。过了很久，他派人告诉孙元规，要他暂时主持宴会敬酒，自己稍微吃点药就出来，又多次派人向座上宾客劝酒。到拂晓，将校等都不敢离席。忽然有人飞马传报说，当夜三更时候，狄青已经夺取了昆仑关。

曹南院知镇戎军日，尝出战小捷，虏兵引去。玮侦虏兵去已远，乃驱所掠牛羊辎重，缓驱而还，颇失部伍。其下忧之，言于玮曰：“牛羊无用，徒糜军，不若弃之，整众而归。”玮不答，使人候虏兵去数十里，闻玮利牛羊而师不整，遽还袭之。玮愈缓，行得地利处，乃止以待之。虏军将至，迎，使人谓之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苦疲甚，皆欣然严军歇良久。玮又使人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各鼓军而进，一战大破虏师，遂弃牛羊而还。徐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著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

曹玮主持镇戎军事务时，有一次出战获得了的胜利，敌人退走了。曹玮派人侦察得知敌军走得很远了就下令赶着缴获的牛羊和辎重车辆，慢慢地走回未，队伍也很不整齐。部下担忧地对曹玮说：“这些牛羊没什么用处，白白地牵制住军队，不如丢掉它们，整好部队迅速返回。”曹玮没有说什么，只是派人继续侦察。敌兵走了几十里，听说曹玮贪图牛羊，部队完全乱了，突然掉头回来袭击。曹玮越走越慢，走到一处地形有利的地方，就停止前进，等待敌人。敌军快要走近的时候，他派人去说：“你们的军队从远处走来，一定很疲劳，我不想利用别人疲惫的时机进攻，请你们让兵马休息，一会儿再进行决战。”敌兵正苦于非常疲劳的时候，听到这话都很高兴，在保持戒备状态的情况下休息了好一阵子。曹玮又派人告诉他们说：“休息好了，可以进军啦！”于是各路军队都击鼓进军，一个回合就大败敌军，然后放弃了牛羊回营。他对部下慢慢地说：“我知道敌人已经疲劳了，所以装出贪利的样子引诱他们。等他们重新回来时，几乎走了100里路了。假如乘敌人士气旺盛时就决战，还可能有胜有负。走远路的人，如停下一会儿，就会腿脚酸软站立不住，士气也会涣散。我正是因此而取胜的。”

予友人任术者，尝为延州临真尉，携家出宜秋门。是时茶禁甚严，家

人怀越茶数斤，稠人中马惊，茶忽坠地。其人阳惊，回身以鞭指城门鸱尾，市人莫测，皆随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监司尝使治地讼，其地多山，峻不可登，由此数为讼者所欺。乃呼讼者告之曰：“吾不忍尽尔，当赏尔半。尔所有之地，两亩止供一亩，慎不可欺，欺则尽覆入官矣。”民信之，尽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处覆之，文致其参差处，责之曰：“我戒尔无得欺，何为见负？今尽入尔田矣。”凡供一亩者，悉作两亩收之，更无一犁得隐者。其权数多此类。其为人强毅恢廓，亦一时之豪也。

我的一位朋友很会运用策略。他曾在担任延州临真尉时，带着家人出宜秋门。当时茶禁很严格，他家人揣着几斤越茶，遇到人多的地方马受了惊，茶叶一下子掉到地上。他假装吃惊，转过身用马鞭指着城门屋脊的鸱尾，街上的人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都顺着马鞭指的方向望去，茶叶袋就被踩碎到尘土中去了。监司曾让他处理一些有关土地的官司。那地方有很多山，形势险峻难以攀登，因此好几次被那些打官司的人欺骗。这一次就叫那些人来告诉他们说：“我不忍心把你们的财产都收尽，可以放宽你们一半。你们所有的地，两亩只要交一亩的税，你们慎重一点不要再欺骗人了，再欺骗人就要全部没收充公了。”这些人都相信了他，按全部土地的一半交税。过了一会儿，他指着一处进行查验，东算西算算出它的差错处，责备说：“我告诫你们不要再欺骗人了，为什么要违背我的意思？现在必须全部没收你的田地。”凡是上报一亩的，都按两亩地征收，再也没有一点土地能够隐瞒的了。他的随机应变大多属这一类。他的为人坚强刚毅，恢弘豁达，也是当时的豪杰。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雩：“何者是獐，何者为鹿？”雩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王雩几岁的时候，一位客人将一只獐和一只鹿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问他：“哪一只獐，哪一只鹿？”王雩确实不能分辨，过了一会儿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客人对他的回答很感惊奇。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唯与此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诺。”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满口，忽嚙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搯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嚙水之事，寇复用之，水才出口，矛已洞颈。盖已陈刍狗，其机已泄，恃胜失备，反受其害。

濠州定远县有一个弓箭手，善于使用长矛，远近的人都佩服他的本领。有一个小偷也善于击刺，一直瞧不起官府的军队，只与这位弓箭手不相上下。他说：“见了那弓箭手，我一定与他拼个你死我活。”有一天，弓箭手有事到了村边泊船处，正好那小偷在街上喝酒，看样子是不可回避了，他们就提起长矛打起来，观看的人像一堵墙似的围着。斗了很久，两人都不能取胜。弓箭手对小偷说：“校尉来了！我与你都是健儿，你敢与我到校尉的马前决一生死吗？”小偷说：“行。”弓箭手应声刺去，一下子就刺死了小偷，就是利用了他的空子啊。还有一件事，有人曾遇到强盗打，长矛刚刚相接的时候，强盗事先已含了一口水，忽然喷到他的脸上，这个人惊愕起来，强盗的矛尖已刺进了他的胸膛。后来有一个勇士又一次与强盗相遇，已预先知道强盗喷水的伎俩，强盗还是用这个办法，他的水才出口，勇士的矛已经刺穿了他的喉咙。因为他已经显示出微不足道的本事，他的机巧已经泄露，想靠这

一下子取胜而没有防备，反而遭到杀害。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使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陕西因为洪水冲下一块大石头堵在山涧中，水就横流造成灾害。石头大到像一间屋子，靠人力移动不了它。州县官员担忧这件事。雷简夫当那里的县令，就派人在石头底下挖通一个洞，估计像石头那样大时，把石头引入洞里，水害就平息了。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乃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熙宁年间，高丽入来进贡，所经过的州县，都要一份地图，所到之处都给好送给他们，山河道路，地形险易，没有什么不是详细画上的。他们到了扬州，送一份公文到州署索取地图。当时任扬州刺史的是现在的丞相陈升之，骗高丽使者：“我想全部看看两浙所提供的地图，好仿照那个样子绘制。”等地图拿来后，陈升之都把它们烧了，并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

狄青戍泾原日，尝与虏战，大胜，追奔数里。虏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险，士卒皆欲奋击，青遽鸣钲止之，虏得引去。验其处，果临深涧，将佐皆悔不击。青独曰：“不然。奔亡之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落其术中，存亡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青后平岭寇，贼帅依智高兵败，奔邕州，其下皆欲穷其窟穴，膏亦不从，以为趋利乘势入不测之城。非大将事，智高因而获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脱智高于垂死。然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尝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譬如弈棋，已胜敌可止矣，然犹攻击不已，往往大败，此青之所戒也。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也。

狄青驻守泾原的时候，曾经与敌人打了一仗，取得了巨大胜利，追赶敌人好几里。敌人一下子堵在一座山前停下来了。狄青推测他们的前面一定遇到什么危险，他的士兵都想奋力追击，狄青却下令敲钲制止部下，敌人因而逃跑了。查看那个地方，果然面临深涧，将士们都后悔没有追击。狄青却说：“你们说的不对。正在逃亡的敌人一下子就停下来抵御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军已取得大的胜利，残余的敌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什么好处，就是得一点也不会有什么。万一落到他们的圈套里，存亡就不清楚了。宁可后悔没有追击，不能后悔没有停止。”狄青后来平定昆仑关的盗匪时，匪首依智高失败了，逃往邕州。狄青的部下都想要彻底扫荡匪窟，狄青也不听他们的，认为为了得到一点好处就乘势深入那种不知深浅的城池，不是一个大将应该做的事，依智高因此而得以逃脱。全国上下都指责狄青不攻入邕州，依智高逃跑了还能垂死挣扎。但是狄青用兵，注重胜利罢了，不追求建立奇功，所以他不曾有什么大的失败。计算战功他最多，终于成为有名的将领。比如下棋一样，已经战胜了敌人就可停止了，但如不停地攻下去，往往会大败，这是狄青引为鉴戒的。面对一点好处而能谨慎，正是狄青超过别人的地方。

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瀦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

作《蓼花吟》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淀，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源，东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远淀，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潞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异日惟是聚集游民，刮碱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潞潦，奸盐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

瓦桥关以北和辽人为邻的地区，一向没有可以作为防守的关河险要。往年正七品武官何承矩镇守瓦桥，开始建议利用低洼的地方，蓄水作为边防屏障。想亲自去看看，又怕计谋泄露出去。就每天会集部属官员，驾船饮酒观赏蓼花，作了几十首《蓼花吟》，要求在座的人和诗，还画成图，传送到京城，人们都不明白他的意图。从此就开始了拦截塘泊筑堤蓄水的工程。庆历年间，太监杨怀敏又接着进行这项工程。到熙宁年间，又挖开徐村、柳庄等地的湖泊，并引来徐河、鲍河、沙河、唐河等河流，叫猴、鸡距、五眼泉等泉水的水源，东面汇合滹沱河、漳水、淇水、易水、涑水等河流，下游并入黄河，这样，从保州西北沈远淀，直到东边沧州的泥枯海口，近 800 里的地方都成为塘泊，水面宽的地方有近 60 里，到现在还依靠它作为屏障。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侵没民田，每年会减少边防地区的粮食收获，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深圳、冀州、沧州、瀛州范围内，只有被黄河、滹沱河、漳水淤灌的地方才成为良田，淤灌不到的地方，都是盐碱地，不能种植。以前这里聚集了许多游民，刮碱煮盐，违犯了朝廷禁卖私盐的法令，有时还变成了盗贼。自从这里成为塘泊以后，做私盐的事便很少发生，鱼、蟹、茭白、芦苇带来了财富，百姓们也可以靠它们过活。

浙帅钱镠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其幕下，屡谏以谓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寮客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敌耶？”隐谏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浙帅大笑曰：“本欲拒敌，设向内何用？”对曰：“以隐所见，正当设于内耳。”盖指宣率将为敌也。后浙帅巡衣锦城，武勇指挥使徐绾、许再思挟宣卒为乱，火青山镇，入攻中城，赖城中有备，绾等寻败，几于覆国。

钱镠任浙江统帅时，宣州叛军 5000 人向他表示忠诚，钱镠接受了，还把他们当作心腹。当时罗隐在他的门下，多次用敌对国家的人不能轻信的话劝说他，这位浙江统帅不听。杭州新修了一段城墙，城楼很高大，钱镠带着部属一起去观赏。罗隐指着那却敌楼，假装不懂地问：“修个这样的楼有什么用？”钱镠说：“您难道不明白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吗？”罗隐又假意地说：“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它面向城内修建呢？”钱镠大笑着说：“本意是想抵御敌人，面向城内修建有什么用？”罗隐回答说：“据我看来，正是应当面向城内修建啊！”指的就是宣州降兵将会重新为敌。钱镠巡视衣锦城，担任了武勇指挥使的徐绾、许再思带领宣州兵发动叛乱，放火烧了青山镇，攻进了城内。幸好城里有准备，徐绾等人不久就失败了，但也差一点国都亡了。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其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驰至克胡，渡河入延福县，自钱前驿夜入绥州，谋其所向。继隆欲径袭夏州，或以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以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已露，岂复能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

继捧犹未知，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抚宁旧治无定河川中，数为虏所危。继隆乃迁县于滴水崖，在旧县之北十余里，皆石崖，峭拔十余丈，下临无水，今谓之啰瓦城者是也。熙宁中所治抚宁城，乃抚宁旧城耳。本道图牒皆不载，唯李继隆《西征记》言之甚详也。

淳化年间，李继捧担任定难军节度使，暗地里与他的弟弟李继迁商议反叛，朝廷派李继隆带兵去讨伐。李继隆飞速赶到克胡，渡过黄河，进入延福县，从钱前驿乘夜到绥州，想着应该往哪里进发。李继隆想直接偷袭夏州，有的人说夏州是叛军统帅所在地，我们的兵力少，恐怕不能攻克，不如先占领石堡，观察一下叛军的动向。李继隆认为这样不好，说：“既然我们的兵力少，假如直接攻打夏州，是出其不意，敌人也不一定能探知我军的多少。假如先占领石堡，我军兵力的多少就暴露了，哪里再能发动进攻呢？”就带兵飞奔抚宁县。李继捧还不知道。随后又进攻夏州，李继捧慌慌张张出城迎战，被俘获押回朝廷。抚宁县的老县城在无定河平原上，经常被敌人骚扰。李继隆就将县城迁到滴水崖，在旧县城的北面 10 多里。这里到处都是石崖，峭壁高达 10 多丈，下边正对无定河，现在说的啰瓦城就是这里。熙宁年间的抚宁县城，是抚宁老县城。这一道的地图和文件上都没有写明这件事，只有李继隆的《西征记》说得很详细。

熙宁中，党项母梁氏引兵犯庆州大顺城。庆帅遣别将林广拒守，虏围不解。广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虏度其势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强弓劲弩丛射，虏多死，遂相拥而溃。

熙宁年间，党项族女将梁民带兵进犯庆州大顺城。庆州统帅派另一位将领林广守城抗敌。敌军紧紧地包围了全城。林广让守城士兵都用质量差的弓箭射击敌人，敌人估计这种箭的力量所到的地方，渐渐靠近城墙。这时守军才换用强劲的弓箭密集射击，敌人大多死亡，其余的就互相拥挤着溃逃了。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蘼蔕刍稿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蘼蔕中，候乾，则以水车沃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上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

苏州至昆山县共 60 里，都是浅水，没有陆路，百姓都因往来涉水感到不便，很久就想修筑长堤。但苏州是低洼的水乡，没有地方取土。嘉祐年间，有人建议，在水中用芦席、草把等做成墙，排成两行，相距 3 尺，离墙 6 丈远的地方再做成同样的墙。捞起淤泥填在墙中，等淤泥干了，就用水车排去两道墙中间的积水，墙中间 6 丈宽的地方都是土了。留下它的一半作为堤基，把另一半挖成渠，用挖出来的土筑堤。每隔 3、4 里修一座桥，以便南北两侧的水相通。不久堤修成了，到现在还在提供方便。

李允则守雄州，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恐其生事。门外旧有东岳行宫，允则以银为大香炉，陈于庙中，故不设备。一日，银炉为盗所攘，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庙中屡遭寇，课夫筑墙围之，其实展北城也。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则今雄州北关城是也。大都军中诈谋，未必皆奇策，但当时偶能欺敌，而成奇功。时人有语云：“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诚然。

李允则镇守雄州时，北门外居民住宅非常多。城里地面狭窄，他想向北扩展城墙，却因为与辽

国发展友好关系，又担心它生出事来。北门外原来有一座东岳行宫庙，李允则用银子做成一个大香炉，摆放在庙里，故意不派人守卫。有一天，银香炉被盗贼偷走，他就四处张榜悬赏捉拿盗贼，并派人抓紧搜捕。过了很久还没有抓到盗贼，他又放出口风说庙里多次遭到偷抢，就督促民仗筑一道墙把庙围起来，其实是扩展北边的城墙。不到10天城墙筑好了，辽国人也不感到奇怪。那就是现在雄州的北关城。大体上说来，军事上的机谋，未必都是奇异的策略，只要当时偶尔能够骗过敌人，就能成为奇功。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这话说得很实在。

陈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县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为盗者。述古乃给之曰：“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使人迎置后阁祠之，引群囚立钟前，自陈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述古自率同职祷钟甚肃，祭讫，以帷围之，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无墨，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于小说。

枢密直学士陈述古担任建州浦城县令时，有人被偷了东西，抓了一些有嫌疑的人而不知谁是盗贼。陈述古就骗他们说：“某庙里有一座钟，能辨认盗贼，非常灵验。”派人把钟抬到后面的楼阁里祭祀，带这群囚犯到钟前站好，告诉他们说，不是盗贼的摸它就没有声响，做了盗贼的摸它就有声音。陈述古自己率领县衙门的官员很恭敬地向钟祈祷，祭祀完后，用帐幕把钟围起来，又暗地里叫人用墨汁涂在钟上。过了一会儿，带领囚犯一个一个地伸手到帐幕中去摸钟，出来后检查他们的手，手上都有墨迹，只有一个囚犯没有，他就承认是盗贼。原来他害怕钟会发出声响不敢摸它。这也是古代用过的方法，出自小说的记载。

熙宁中，滩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献时莅其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熙宁年间，滩阳县内掘堤引汴水带泥沙到田地里，汴水突然到来，堤防坍塌得很厉害，快要垮了，人力不能遏制。都水丞侯叔献当时到现场指挥这项工程，看到在上游几十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就下令紧急掘开汴水河堤放水进古城，下游水位就降低了，再迅速派人修复坍塌的河堤。第二天，古城里的水满了，汴水又顺着河道流下来，而坍塌的堤已修好了。再慢慢地堵塞通向古城的决口，由于堤内外的水相平而没有急流，所以很快就可以堵塞好。人们都佩服侯叔献的机智敏捷。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入明珠族。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之。”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元昊乳母白姥有隙。岁除日，野利引兵巡边，深涉汉境数宿，白姥乘间乃谮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尝得蕃酋之子苏吃曩，厚遇之，闻元昊尝赐野利宝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窃野利刀，许之以缘边职任、锦袍、真金带。吃曩得刀以还，世衡乃唱言野利己为白姥谮死，设祭境上，为祭文，叙岁除日相见之欢。入夜，乃火烧纸钱，川中尽明。虏见火光，引骑近边窥覘，乃佯委祭具，而银器凡百余两悉弃之。虏人争取器皿，得元昊所赐刀，及火炉中见祭文已烧尽，但存数十字。元昊

得之，又识其所赐刀，遂赐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以至不能军。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屠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宝元年间，党项族侵犯边境，有个明珠族部落首领凶狠蛮横，是边防的最大祸患。种世衡做将军时，想用计抓住他。听说这个人喜欢打鼓，于是制了一个“马持战鼓”，镶上银子，装饰得极其华丽，秘密派间谍把这鼓假意卖给了明珠族。然后挑选了几百名勇敢兽战的勇士，告诫他们说：“凡看见有随身带银鼓的，要出死力把他捉拿回来。”有一天，这明珠族首领背着鼓出来，就被种世衡活捉。

另外，元昊有个大臣叫野利，是主要的出谋划策的人，驻守天都山，号称天都大王，平时与元昊的奶妈白姥不睦。有一年除夕，野利领兵巡察边防，深入汉境好几天。白姥乘机诬蔑野利想叛军投宋，元昊开始怀疑他了。种世衡曾俘获一个西夏酋长的儿子苏吃囊，用厚礼热情地款待他。听说元昊曾赐给野利一把宝刀，而苏吃囊的父亲得到野利的喜欢和信任，种世衡就要苏吃囊偷出野利的宝刀，许诺他事成后留他做边防官，并赐给他锦袍、金带。苏吃囊果然拿到宝刀归来，于是种世衡到处散布说野利已被白姥陷害死，并在边境上设坛祭祀，为野利作祭文，叙述除夕那天同野利相见的欢乐。到晚上，又焚烧纸钱，把山沟照得通明。敌兵见有火光，领着骑兵到附近侦察，种世衡又假装抛弃祭器，还把千多两银器都扔在那里。敌人争先恐后地抢夺那些银器，捡到了元昊赐给野利的宝刀，并在焚纸炉中发现烧过的祭文，还剩下几个字。元昊得到这些物证，又认识他所赐的宝刀，立即赐野利自杀。野利有大功，又不是因犯罪而死，从此以后，西夏国君臣之间便互相猜疑，以至不能出兵打仗。讨平西夏的功绩，以种世衡献的计谋最多，但当时人们并不了解。种世衡死后，朝廷才查证、登记他的功劳，追赠他为观察使。

卷十四 艺文一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辘”之句。文忠以为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辘鹧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辘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扬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欧阳修常喜爱林逋的诗句“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辘。”欧阳修认为语言新颖而又对偶贴切。钩辘，是鹧鸪鸟的鸣叫声。李群玉的诗说：“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辘格磔声。”郭索，是螃蟹爬行的样子。扬雄的《太玄》说：“螃蟹郭索，是因为用心浮躁的缘故。”

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杜子美诗：“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全。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

韩愈集子中的《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的句子。现在与石刻验证，原来是“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这种格式，如《楚辞》中有“吉日兮辰良”的句子，又有“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大概是想要相互交错成文，则文章语句的气势就矫健有力了。杜甫有诗句：“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也是词语颠倒而意思周全。韩愈的《雪诗》有诗句“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也是效仿这种体式，但是稍许牵强了一些，不似前人的诗句那么浑然天成。

退之《城南联句》首句曰：“竹影金锁碎。”所谓“金锁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题中有“日”字，则曰“竹影金锁碎”可也。

韩愈《城南联句》诗中的首句是：“竹影金锁碎。”所说的“金锁碎”，是指日光，不是指竹影。如果题中有“日”字，那么说“竹影金锁碎”也可。

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诗》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绢围夜玉。”十幅红绢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唐代人写作富贵诗，大多记载他们供养器物服饰的繁盛，那不过是穷人眼中所惊奇的东西罢了。例如贯休的《富贵诗》说：“刻成箏柱雁相挨，”这是乡里弹琴卖艺的人都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比如韦楚老的《蚊诗》说：“十幅红绢围夜玉。”用十幅红纱做成帐子，见方不到四五尺，不知道该如何伸脚？这就是所说的“从来没有接近过富贵人家”。

诗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挺蹂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抵今何处。”至今所传此两本，唯《本事诗》作“祇今何处。”唐人工诗，大率多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

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

诗人用诗来表现人物，因此即使是小诗，没有不反复锤炼修改，达到极其工致之后才罢休的。所说的“句锻月炼”，确实不是虚妄之言。崔护题咏《城市诗》，开始写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来因为它的意义不够完全，语句不够工致，改第三句为：“人面只今何处。”到现在流传下来的两个版本，只有《本事诗》写作“只今何处。”唐代诗人对诗句的锤炼，大多如此。即使有两个“今”字，也不顾忌，而是取诗句的意义为主。后来的人因为它有两个“今”字，只多通行前篇诗文。

书之阙误，有可见于他书者。如《诗》：“天天是椽”，《后汉·蔡邕传》作：“天天是加”，与“速速方谷”为对。又“彼祖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坊记》：“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礼》：“君子之道，譬犹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辅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则”字为“明”字也。

书的缺误，有可以从其他的书中看出的。例如《诗经》“天天是椽”，《后汉书·蔡邕传》写作“天天是加”，与“速速方谷”相对。又例如“彼咀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写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坊记》说：“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礼》写作“君子之道，譬犹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辅嗣说：“居德而明禁”，是把“则”字作为“明”字了。

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观古人谐声，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与“李”字协用；“庆”字“正”字多与“章”字“平”字协用。如《诗》：“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遗我珮玖。”“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终三十里，十于维耦。”“自今而后，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涉降左右，令闻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鱼丽于罟，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极多。又如“孝孙有庆，万寿无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唯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万舞洋洋，孝孙有庆。”《易》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班固《东都赋》：“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如此亦多。今《广韵》中“庆”一音“卿”。然如《诗》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庶几有臧。”“谁秉国成，卒劳百姓，我王不宁，覆怨其正。”亦是“柄”、“正”与“宁”、“平”协用。不止“庆”而已。恐别有理也。

音韵的学问，从沈约创建四声起，到天竺梵学传入中国，它们的技法逐渐精密。考察古人的谐音，有不能理解的。例如“玖”字“有”字多与“李”字谐音通用；“庆”字“正”字多与“章”字“平”字谐音通用。例如《诗经》中有“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贻我现玖”，“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终三十里，十千维耦”，“自今而后，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涉降左右，令闻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鱼丽于罟，鲤，君子有酒，旨且有”，象这样的句子非常多。又例如“孝孙有庆，万寿无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唯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万舞洋洋，孝孙有庆”。《易经》说：“西南得朋，乃以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班固的《东都赋》说：“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象这类的例子也非常多。现在《广韵》中“庆”字的另一读音为“卿”。但是象《诗经》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庶几有臧，”“谁秉国成，卒劳百姓，我王不宁，覆怨其正”，也是“‘柄’、‘正’与‘宁’、‘平’谐音通用。不仅仅‘庆’字是这样，恐怕另外有道理。

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没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瑕可指，语音亦捩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华》也。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

小的律诗尽管是小技艺，如果工夫不达到细微的境界，不足以称为家。所以唐人都尽一生的精力来创作它。至于每个字都进行锤炼，用准一个字很困难，只是担心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看见他的诗的工致之处。新以不仅只是作诗难，知音也少，即使有煞费苦心选准了字的，也不一定为人所知。如果每一个字都是没有瑕疵可以指责，语言也艳丽华贵，但仔细推究却不切实，情景意思即使周全，让人一览无余，毫无余味，更不能讽诵吟味，这类诗最容易被人赞赏，《诗经》中的《折杨》《黄华》就是如此。譬如馆阁中用楷书法写字，不能说不精致不华丽，但是寻找它们绝妙之处，到死也没有一笔，这种毛病最难医治。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𣎵”，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𣎵”为义也。

王圣美研究文字学，推演文字的意义开创了“右文”。古时候的字书都是从“左文”。所有的汉字，它表示的类别在左边，它的意义在右边。例如木类的字，它们的左边都从木。所谓右文，如“𣎵”是小的意思，小的水流称“浅”，小的金称“钱”，小的破骨称“残”，小的贝壳称“贱”。象这样一类的字，都将“𣎵”作为自己的意义。

王圣美为县令时，尚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晒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如何从头不晓？试言之。”圣美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诨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王圣美做县令的时候，还不出名。去进见一位显赫的官吏，正碰上他在与客人谈论《孟子》，全不理睬圣美，王圣美私下讥笑他们谈论的内容。过了许久，这位官员忽然回头看着王圣美说：“你曾经读过《孟子》吗？”王圣美回答说：“我平生喜欢《孟子》，只是完全不明白它的意思。”主人问道：“不知道什么意义？”王圣美回答说：“从头都不知道。”主人问：“怎么从头都不知道？你试着说一下。”王圣美说：“‘孟子见梁惠王’，已经不理解这句话了。”达官对此十分诧异，说：“这有什么深奥的道理？”王圣美说：“既然说孟子不见诸侯，为什么去见梁惠王呢？”这位达官突然怔住无言以对。

杨大年因奏事论及《比红儿诗》，大年不能对，甚以为恨。遍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忽一日，见鬻故书者有一小编，偶取视之，乃《比红儿诗》也，自此士大夫始多传之。予按《摭言》，《比红儿诗》乃罗虬所为，凡百篇，盖当时但传其诗，而不载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载。

杨大年因为上奏政事而谈到《比红儿诗》，杨大年不能对答，感到很遗憾。他到处寻找《比红儿诗》，始终没有得到。忽然有一天，看见卖旧书的人有一本小书，偶然拿来看看，原来是《比红儿诗》，从此以后士大夫开始大量流传。我考察《摭言》，《比红儿诗》原来是罗虬所作，共一百篇，大概当时只流传他的诗而不记载它的作者姓名，杨大年也偶然忘记了《摭言》中记载的事。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如白居易《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诗》云：“厌饫不能飴”。飴乃饴耳，著作饮食，当音饮。又陆龟蒙作《药名诗》云：“乌啄蠹根回”，乃是“乌喙”，非“乌啄”也。又“断续玉琴哀”，药名止有“续断”，无“断续”。此类极多。如杜牧《阿房宫赋》，误用“龙见而雩”事，宇文时斛斯椿已有此谬，盖牧未尝读《周》、《隋》书也。

晚唐的文人专门以小诗而著名，但是读书粗心大意。例如白居易的《题座隅诗》说：“俱化为饿殍”，是押“孚”字的韵。杜牧的《杜秋娘诗》说：“厌饫不能飴”，飴是糖的意思，如果当作饮食讲，应该读“饮”的音。又例如陆龟蒙的《药名诗》说：“乌啄蠹根回”，应该是“乌喙”，而不是“乌啄”。又例如“继续玉琴哀”，只有“续断”的药名，而没有“断续”的药名。这样的例子有许多。例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误用了“龙见而雩”的典故，北周宇文氏时斛斯椿已经有了这种错误，大约杜牧没有读过《周书》、《隋书》。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过去文人写文章大多推崇对偶，直到穆修、张景等人才开始写作散文，在当时称之为“古文”。穆修和张景曾经一齐在东华门外等待天亮上朝，正在议论文章的时候，恰好看见有一匹奔马踩死了一只狗，二个人各自记下了这件事，来比较各自句式的优劣。穆修说：“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说：“有犬死奔马之下”。当时文体刚刚变化，他们两人的话虽然都呆板生硬，但人们已经认为很好，一直流传到现在。

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儒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根据《史记》“年表”记载：“周平王向东迁都二年，鲁惠公才即位”。那么《春秋》就应该开始于鲁惠公，但却开始于鲁隐公，所以各派儒家议论纷纷，这是《春秋》开卷的第一宗大义。只有啖助、赵氏完全不解说开始于隐公的含义，学者们常常对此感到疑惑。只是在《纂例》“隐公”的下面注明了八个字说：“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这样，那么《春秋》自然应该从鲁隐公开始，这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这就是啖氏、赵氏不议论这件事的原因。然而，这与《史记》的说法不相同。不知道啖氏、赵氏是从什么书上知道的？我曾经看到文人石端编集一本纪年的书，推究论说各家的年代统系，非常周详严密。它叙述平王东迁这件事也在惠公二年，我得到这份资料非常高兴，连忙问石端，他说：“出自于一本史传书中，匆忙检索而没有找到。”我最终没有见到确切考证。根据《史记》“年表”的注是：“东迁在平王元年，岁在辛未。”“本纪”中都没有提到，诸侯的“世家”说东迁却都在庚午岁，《史记》的记载自己也有差错谬误，不知它的确切时间。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人卢宗回一诗颇佳。唐人诸集中不载，今记于此：
“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冷光摇藻井，玉峰晴色坠栏干，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人卢宗回的一首诗很好。唐人的各个集中没有记载，现在记录于此：“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冷光摇藻井，玉峰晴色坠栏干。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

古人诗中有诗句“风定花犹落”，以为没有人能对得上。王安石用“鸟鸣山更幽”的句子来对。“鸟鸣山更幽”原本是宋人王籍的诗句。原来的对偶句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个意思。“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却是上句是静中有动，下句是动中有静。王安石开始写作集句诗时，多的达到了一百个韵，都是汇集前人的诗句，句子的意义、对仗往往比原诗还亲密贴切，后来渐渐有人仿效他做集句诗。

欧阳文忠尝言曰：“观人题壁，而可知其文章”。

欧阳修曾经说：“看一个人在墙壁上题辞，就可以知道他的文章怎样。”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幽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毗陵郡一姓李的士人家有一个女儿，才16岁，较能写诗，有许多好的诗句，吴中的很多人都有她的诗。她有《拾得破钱》诗说：“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

不平事。”又有《弹琴》诗说：“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声。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诗虽然有情致，但是并不是女子所应有。

卷十五 艺文二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软”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如颠、天、田、年，邦、降、庞、厖之类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为之。如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帮，宫之清。当，商之清。刚，角之清。威，徵之清。央，羽之清。）纵调之为四等，帮、滂、傍、茫是也。（帮，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茫，宫之不清不浊。）就本音本等调之为四声，帮、滂、傍、博是也。（帮，宫清之平。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博，营之不清不浊。）四等之声，多有声无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两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汤、康、苍止有四字。四声则有无声亦有无字者，如萧字、肴字全韵皆无入声，此皆声之类也。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庞驳，师法多门。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乐家所用，则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皆不论清浊。五行家则以韵类清浊参配，今五姓是也。梵学则喉牙齿舌唇之外，又有折、撮二声。折声自脐轮起至唇上发，如“欬”字之类是也。撮声鼻音，如“欲”字鼻中发之类是也。字母则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啰、拖、婆、茶、沙、嚩、哆、也、瑟、吒、迦、娑、么、伽、他、社、锁（呼）、拖、奢、佉、义、娑多、多壤、曷多、（三合）车、袞摩、诃婆、縵、伽、吒、拏、娑颇、娑迦、也娑、室者、佗、陀。为法不同，各有理致。虽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历世浸久，学者日深，自当造微耳。

反切的学问，本是出自西域，汉代人训释字音，只是说：“读如某字”，没有运用反切。但是古时的语音已经有把两个音合为一个字的，例如将“不可”合成为“叵”，“何不”合成为“盍”，“如是”合成为“尔”，“而已”合成为“耳”，“之乎”合成为“诸”之类，类似于西域两个拚合的语音，大约是反切的起源。例如“𪔑”字，字形上从“而”“犬”，这也是反切之音，大约是与字音同时形成，无从知道它的来由。现在反切的方法，是先将字归类，分别归入各自的声母中。唇音、舌音各有八个，牙音、喉音各有四个，齿音有十个，半齿、半舌音各有二个，共是36个，分为五音。

天下的声母，全汇总在这里了。每个声母又有四等，称为清、次清、浊、平。例如颠、天、田、年、邦、腓、庞、庞之类的音就是如此，都是得于自然，不是人为的造作。如“帮”字，横向排列为五音：就是帮、当、刚、臧、央。纵向排列为四等，就是帮、滂、傍、茫。以本音、本等来排列为四声，就是帮、膀、傍、博。四等的声母很多是有声母而无字的，例如封、峰、逢只有三个字，邕、身只有两个字，竦、火、欲、以都只有一个字。五音也是如此，滂、汤、康、苍只有四个字。四声则有没有声调也没有字的，例如萧字、肴字，整个韵都无入声，这些都是声母的情形。所说的切韵，是取上字为切声，取下字为韵母。切声必须归于本母，韵必须归于本等。切声归于本母，称为音和，例如“德红”切为“东”之类。“德”和“东”是同一声母。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五等声，全部泛入别等。称为类隔。虽然隔等也必须依用它们的声类。就是唇音与唇音为一类，齿音与齿音为一类。例如“武延”切为“绵”，“符兵”切为“平”之类就是这样。韵母归于本等，例如“冬”和“东”，字母都属于“端”字，“冬”本来是“端”字中第一等声母，因此“都宗”切的“宗”字是第一等韵，因为它归于“精”组字，因此“精”是徵音的第一等声母。“东”字是“端”字中第三等声，所以“德红”切的“红”字是第三等韵，因为它归于“匣”组字，因此“匣”为羽音的第三等声。还有互相借声的，这类的例子很多。大约自从沈约创立四声，音韵学便越来越严密，然而梵学中有中华、天竺的差异，南渡之后，又掺杂了吴地的语音，因此音韵驳杂，师法多门。至于划分五音，方法也不统一。例如音乐家运用的五音，就是根据乐律来确定，本来没有固定的章调，经常以浊音为宫，稍微清的音为商，最清的音为角，清浊不定的音为徵、羽。切韵家则以唇、齿、牙、舌、喉音为宫、商、角、徵、羽。其中又有半徵、半商的音，例如“来”“日”二字就是，都不论清、浊音。五行家则把韵类清浊相配，现在的五姓就是。梵学除了喉、牙、齿、舌、唇声母之外，又还有折、撮两种声母。折声从肚脐发音到嘴唇发出，例如“欲”字之类就是如此。撮声是鼻音，例如“欲”字音从鼻中发出，这一类就是如此。梵音字母有42个，称为：“阿、多、波、者、那、嚩、拖、婆、茶、沙、麼、哆、也、瑟、吒、迦、娑、麼、伽、他、社、锁、拖、奢、佉、义、娑多、多壤、曷多、三合车、娑麼、诃婆、縵、伽、吒、拏、娑颇、娑迦、也娑、室者、佉、陀。方法不同，各有各的道理。虽然先王没有言及，但是不妨碍有这些道理，经历的时间越久，学习的人更加深入，自然应该达到精微的地步。

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龕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辩。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板。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

幽州僧人行均收集佛书中的字，替它们注音、释义、共有16万字，分为四卷，称为《龙龕手镜》，燕地僧人智光替它作了序，言词很是雄辩。成书于契丹朝重熙二年。契丹的书禁十分严厉，把书传入中原的人根据法律都处以死。熙宁年间，有人从胡地得到了这本书，传入傅钦的家中，蒲宗孟为浙西帅臣，取来刻板印行。书序的末尾原来称：“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宗孟将它删掉。观察书中字的音韵次序，都有道理法则，后世大约不会把他当作燕地人了。

古人文章，自应律度，未以音韵为主。自沈约增崇韵学，其论文则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后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傍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之类。诗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今略举数事。如徐陵云：“陪游馱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又云：“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两“长乐”，意义不同，不为重复，此类为“傍犯”。

如《九歌》：“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当曰：“蒸蕙肴”，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邪”对“子”，兼“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长”，以“鸡”对“杨”，以“朱云”对“白日”，如此之类，皆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与“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叠韵。诗第二字侧入，谓之“正格”，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之类；第二字平入，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类。唐名贤辈诗用多正格，如杜甫律诗，用偏格者十无一二。

古人的文章，自然符合音律法度，没有以音韵为主的。自从沈约推崇音韵学，他评论文章时说：“要使宫音、商音相互变化，高低节奏不同，如果前面有轻扬之声，那么后面必须晕重浊之音。一章之内，音韵完全不同；两句之中，轻重都有区别，能够通达其中的神妙，才可以谈论文章。”从此以后，浮艳工巧的语句、文章的体制渐渐多了。例如傍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之类。诗又有正格、偏格，门类极多，因此有 34 格、19 图、四声八病之类。现在大致列举几个例子。例如徐陵说：“陪游馭娑，骋铁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又说：“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然两处用“长乐”，但意义不相同，不是重复，这一类就是“傍犯”。例如《九歌》中的“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应该说：“蒸蕙肴”，与“奠桂酒”相对，现在颠倒运用，称之为“蹉对”。例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仅仅是“赤”对“朱”，“耶”对“子”，加上“狼狈”与“流离”是兽名与鸟名相对。又例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长”，将“鸡”与“杨”相对，将“朱云”与“白云”相对，这样一类，都称为“假对”。例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和“吹唱隔江”都是双声。例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都是叠韵。诗的第一个字为仄声入句，称为“正格”，例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之类；诗的第二字用平声入句，称为“偏格”，如象：“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类。唐代著名的诗人们写诗大多用正格，比如杜甫的律诗，用偏格的诗不到十分之一二。

文潞公归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珣、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淡麴麴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

文彦博归洛阳的时候，78 岁。同时的还有中散大夫程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归休的席汝言，都是 78 岁。他们曾经组成为“同甲会”，各自赋诗一首。文彦博的诗写道：“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淡麴麴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

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赋》：“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馱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恍许，疑函谷之丸封。”

晚唐五代时，文人作赋运用典故也有非常工致的。例如江文蔚的《天窗赋》说：“一窍初起，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馱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有《土牛赋》说：“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恍许，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之涣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河中府鹳雀楼有三层，往前可以看见中条山，往下可以俯瞰大河。唐代诗人留有很多诗。只有李益、王之涣、畅诸的三篇诗能够形容出它的景致。李益的诗写道：“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之涣的诗写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的诗写道：“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庆历中，予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镇肉，视之若有镌刻，试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铭》，谢朓撰并书，其字如钟繇，极可爱。予携之十余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托以坠水，今不知落何处。此铭朓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中枢诞圣，膺历受命，于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軫猎，高辟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簠，言观帝则，正位恭己，临朝渊嘿。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邈明德。西光已谢，东旭又良，龙夕俨，葆挽晨镞。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长！”

庆历年间，我住在金陵，有厨子用一块方形的石板压肉，我看见石板上面好象有雕刻的痕迹，就试着取来石板洗干净，原来是南朝刘宋时期的《海陵王墓铭》，文和字都是由谢朓撰写的，字体像钟繇，非常可爱。我随身携带它十多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就借口说坠落到水里，现在不知道流落在什么地方。这篇铭文谢朓的文集中没有记载，现在抄写于此：“中枢诞圣，膺历受命，於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軫猎，高闻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簠，言观帝则，正位恭己，临朝渊嘿。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邈明德。西光已谢，东旭又良，龙夕俨，荷挽晨镞。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长！”

枣与棘相类，皆有刺。枣独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为别。其文皆从“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主者枣也，束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识二物者，观文可辨。

枣与棘相似，都长有刺。枣单独生长，树干高而少横的枝条；棘并列而生，低矮而成树林，以此作为它们的区别。刺与棘这两个字都由“束”组成，读作“刺”的音，是树木上的刺。从“束”而相互上下重叠竖着生长的是枣，从“束”而彼此并列横向生长的是棘。不认识这两种植物的，看它们的字形就可以分辨清楚了。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记，善篆隶，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余年，潦倒贫困。赴选集于京师，是时韩魏公当国，恢献小诗自达，其一联曰：“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学石经，因此得复官。任华

州推官而卒。

金陵人胡恢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擅长于篆书和隶书，喜欢评论人物，因为犯法丢官十多年，穷困潦倒。到京城候选，这时韩琦执掌朝政，胡恢献上小诗自荐，其中有一联写道：“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家寒”。韩琦非常可怜他，让他篆刻太学石经，因此得以复官，推任华州推官而去世。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蚀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蚀，百官入贺，是日有皇子之庆，蔡子正为枢密副使，献诗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蚀，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熙宁六年，天文官署报告说将在四月初一日发生日蚀，皇上因此撤消御膳，避开正殿。这一晚上下小雨，第二天没有看见日蚀，文武百官入宫庆贺，这天有皇子诞生的喜事。蔡挺为枢密付使，献上贺诗一首，诗的前四句说：“昨夜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暗随夜雨消。”诗中叙述四月一日皇上避开正殿、皇子诞生、云层阴暗不见日蚀，四句诗概括尽了，当时的诗没有能超过它的。

欧阳文忠好推挽后学。王向少时为三班奉职，于当滁州一镇，时文忠守滁州。有书生为学子不行束修，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书生讼于向，向判其牒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宁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岂两辞而造狱。”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公一阅，大称其才，遂为之延誉奖进，成就美名，卒为闻人。

欧阳修喜爱提拔后生学子。王向年轻时为三班奉职，管理滁州的一个镇，当时欧阳修担任滁州太守。有一个读书人因为学生不行拜师礼，他便自己前去见礼，学生关上门不接纳，书生向王向提起诉讼，王向在他的状子上判决说：“按照礼仪，只听说学生前来学习，没有听说先生亲自去教。先生既然已经将自己委曲，学生怎么不把自己稍微抬高？你们二位为什么不收敛各自的威仪，哪里用得上各持一词来告状呢？”书生对王向的判辞不服，径直拿着状子去见欧阳修，欧阳修读了，大大地称赞王向的才学，于是为他宣扬提携，造就了他的美名，王向终于成为名人。

卷十六 艺文三

士人刘克博观异书。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主”，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又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

读书人刘克广博览奇书。杜甫的诗说：“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上解说的人都认为夔州、三峡一带现在还有鬼户，是蛮夷人，他们的首领称为“鬼主”。但是并没有听说过有乌鬼的说法。而且鬼户是蛮夷人的称法，并非家庭喂养的东西。刘克就根据《夔州图经》，以为三峡的人称鸬鹚为“乌鬼”。住在水边的蜀人都养鸬鹚，用绳子系住它的脖子，让它们去捕鱼，捕到鱼之后就把鸬鹚倒提着让它把鱼吐出来，到现在都是如此。我在蜀中时看见人们养鸬鹚让它们捕鱼，的确是如此，但不知道它们称为“乌鬼”。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纂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纂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孙和悖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未有印记甚完。

和凝有一本艳词集，名字叫《香奁集》。和凝后来显达了，于是就将这部词集托名为韩偓所作。现在世上流传的《香奁集》是和凝所作。和凝生平的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纂金》六个集子。他自己替《游艺集》作的序说：“我有《香奁》、《纂金》两个集子，没有在世上流传”。和凝在官府时，要避免别人的议论，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又想要让后人知道是他作的，所以在《游艺集》中的序言中记叙了这件事。这是和凝的意图。我在秀州的时候，和凝的曾孙和悖家里收藏有各种书籍，都是和凝留下的东西，它们后面的印记都非常完整。

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善为诗，以诗著名，卜居陕州东门之外。有《陕州平陆县》诗云：“寒食花藏县，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最为警句。所居颇潇洒，当世显人多与之游，寇忠愍尤爱之。尝有《赠忠愍》诗云：“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忠愍镇北都，召野置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硬，士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谄。”吴正宪《忆陕郊》诗曰：“南郭迎天使，东郊访隐人。”“隐人”谓野也。野死，有子闲，亦有清名，尚居陕中。

蜀人魏野隐居不做官，会写诗，以诗写得好而闻名，居住在陕州东门之外。他有一首诗《陕州平陆县》写道：“寒食花藏院，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是最为绝妙的句子。魏野生活得非常潇洒，当时的显贵之人多与他有来往，其中寇忠愍特别喜欢他。魏野曾经写过一首《赠忠愍》的诗说：“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来寇忠愍镇守北部，将魏野召到他的门下。北都有一个妓女非常美丽，但行为举止却非常生硬倔强，文人称她为“生张八”。一次州府举行宴会，寇

忠愍让她向魏野讨一首诗，魏野赠与她的诗写道：“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请。”吴正宪的《忆陕郊》写道：“南郭迎天使，东郊诏隐人。”“隐人”就是指魏野。魏野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名为魏闲，也有很清高的名声，现在还住在陕中。

卷十七 书画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为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

收藏书画的人，很多人是贪图作者的名气，偶尔有传说是钟繇、王羲之、顾恺之、陆探微的手笔的，见到的都争着买进，这就是所说的“耳鉴”。还有的人看画用手去摸，据说着色均匀，手指摸上去没有高低不平的感觉的就是好画。这种方法又比“耳鉴”低下，叫做“揣骨听声”。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

欧阳修曾经得到一幅古画“牡丹丛”，画的下方有一只猫，他不知道这幅画的好坏。丞相吴育与欧阳修是亲家，他一见这画就说：“这是正午的牡丹。怎么知道的呢？画上的花，看上去涣散无力，而且颜色干燥。这正是中午时的花。猫的黑眼仁就像一条线，这正是正午时的猫眼。早上带有露水的花，花心收拢，颜色湿润。猫的眼睛在早晨和夜里都是圆的，随着太阳升高逐渐变为狭长，到正午的时候就像一条线了。”这也是善于推求古人的创作意图了。

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予以谓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相国寺的旧壁画，是高益的手笔。有一面墙上描绘了众多乐工奏乐的画非常有意思。人们大多责怪弹琵琶的人拨错了下弦，那众多的乐管都发出“四”字的音，而琵琶的“四”字应在上弦，这里的一技却是掩着下弦，是错误的。我认为这并不是错误的，大约管弦乐器是放开指头发出声音，琵琶是手指拨过琴弦发出音响，这一拨尽管按下弦，但是声音却是发自于上弦。高益对画面的安排居然能达到这样的地步，他的匠心可以从中知道了。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予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着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

书画的妙处，应该用心神去领会，很难用具体的形象来寻求。世上看画的人，大多能指点评说画中形象、位置、色彩方面的瑕疵罢了，至于能够达到深刻理解其中奥妙的人却十分少见。就如彦远《画评》所说：“王维画东西，大多不管四季，比如画花卉，往往把桃花、杏花、芙蓉花和莲花同画

在一个景中。”我家收藏的王维的画《袁安卧雪图》，上面画有雪中芭蕉，这就是王维得心应手，意到便成的画，所以达到的意境出神入化，全然得之于天意，这是难以和俗人论说的。谢赫说：“卫协的画，尽管不具备完全的形体之妙，但却具备一种超出群雄的气势，这真是从来没有的绝妙之笔。”又如欧阳修的《盘车图》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 187. 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这是真正的懂得画。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

王钦臣观看我家收藏的画，他最喜爱王维的那幅《黄梅出山图》的图画，大概画上描绘的黄梅、曹溪两个人的气质风韵都与他们的为人一致。读了这两个人事迹，再回过头来看画，就可以想象出这两人的实际样子。

《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不过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无此声，岂独《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别有奇声可验，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居易诗云：“中序擘擘初入拍。”“中序”即第七叠也。第三叠安得有拍？但言“第三叠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说尝有人观画《弹琴图》，曰：“此弹《广陵散》也。”此或可信。《广陵散》中有数声，他曲皆无，如拨擗声之类是也。

《国史补》记载：“有个客人拿着《按乐图》给王维看，王维说：‘这幅画上正在演奏的乐曲是《霓裳》曲的第三叠第一拍’。客人不认为是这样，让乐工们演奏了这支乐曲才相信。”这个故事是那些喜欢猎奇的人编的。所有画奏乐的图，都只能画一个声音被奏出时的情形，不过金、石、管、弦同时用一个字罢了，但什么曲子又没有这样一个音，哪里唯独是《霓裳》第三叠第一拍呢？有的人疑心是舞蹈的节奏以及其它动作和拍法中别有其他乐音可以验证，这也不是如此。《霓裳曲》共有 13 叠，前六叠没有拍，到第七叠才称为“叠遍”，从这里才开始有拍而有舞蹈动作，所以白居易的诗说：“中序擘初入拍”。“中序”就是第七叠，第三叠怎么有拍呢？单说“第三叠第一拍”，就知道这是错误的。有人说曾有人观看《弹琴图》这幅画说：“这是弹奏《广陵散》。”这或许是可信的，《广陵散》中有几个音，别的曲子全没有，如拨擗声这种音就是。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毛，予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予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盈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为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摹，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椽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

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

人们画牛和老虎都画毛，只有画马不画毛。我曾经用这一问题问画工，画工说：“马的毛细，不能画。”我刁难他说：“老鼠的毛更加细，为什么却画呢？”画工不能回答。一般画马，大小不过一尺，比真正的马要小得多，如果按照比例缩小，毛就细得不能画了，画老鼠则与实物大小差不多，自然应当画毛。但牛和老虎也是把大的画成小的，按道理说也不应该画毛，但牛、虎的毛深，马的毛浅，从道理上讲应该区别，所以名画家画小牛、小虎，虽然也画毛，只不过是略涂数笔而已。假使一定要画得周到细密，反而显得芜杂而累赘；简单涂上几笔，倒自有神观，更为生动，不过这个道理很难与那些不懂画理的人去论说。如果象画大牛、大虎一样画马，理应当画毛。大约见小马没有毛，于是也就不画毛了，这是庸人因袭旧迹，不可与他们论理。又如李成画山上的亭馆和楼塔这些建筑，都用仰视的角度来画飞檐。他的说法认为“从下向上望，就如同人在平地望到塔檐，只看见屋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一般画山水的方法，都是将大的景物当作小的景物，就如同人看假山一样。如果用看真山的方法从山下往上看，只应该看见一重山，怎么能一重一重全都看到，更不应该看到溪谷中的情景了。又如看屋舍，也不应看得见中庭后巷中的东西。如果人站在东边，那么山的西边就应该是远境；人站在西边，那么山的东这就应该是远境。象这样怎么能画成画呢？李成大约不知道以大观小的方法，怎样处理高低远近，其中自有奥妙的道理，哪里在于把屋角掀起来呢？

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哉。

画工画佛像身上的光圈有扁圆如扇子的，佛像的身子侧着，那光线也侧着，这是大谬误。他仅看见了木雕的佛，却不知道这种光常常是圆的。还有画行走的佛，光的尾是向后方的，称为“顺风光”，这也是谬误。佛光是定果的光芒，即使是遇见了劫灾大风也不会动，怎么是普通的风能摇动的呢？

古文“己”字从“一”从“亡”，此乃通贯天、地、人，与“王”字义同。中则为“王”，或左或右则为“己”。僧肇曰：“会万物为一己者，其惟圣人乎？”子曰：“下学而上达。”人不能至于此，皆自成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古文“己”字从“一”从“亡”，这是贯通了天、地、人，与“王”字的意义相同。竖笔放在中间就成了“王”字，放在左边或者右边就成了“己”字。僧人肇说：“把万物会合在自己身上的，大约只有圣人吧！”孔子说：“学习基础的东西，从而通达上乘的道理。”人不能达到这种境地，都是自己造成的。使自己成为全人的人便是这样的。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岁小.190.窑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

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日进。

度支员外郎宋迪擅长绘画，尤其善于画平阔广远的山水。他画有《平沙雁落图》、《远浦帆归图》、《山市晴岚图》、《江天暮雪图》、《洞庭秋月图》、《潇湘夜雨图》、《烟寺晚钟图》、《渔村落照图》，被称为“八景”，好事的人都将它们到处宣扬。过去，小窑村陈用之擅长画画，宋迪看了他画的山水之后对陈用之说：“你的画确实很好，但是缺少了一点天然的情趣。”陈用之非常佩服宋迪的话说：“我经常忧虑自己的画不如古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宋迪说：“要解决这个并不难，你应当先找一堵破败的墙，把白色的绢完会铺开，将它靠在破墙上，早晚观察它，观察久了，隔着绢看到败墙上面，高低曲折的地方，都会形成山水的景象。眼里留存着这些形象心里就想：高的是山，低的是水；坑穴是山谷，空缺是山涧；明显的是近景，模糊的是远景；用心神去领会用意去营造，仿佛看见有人、鸟、草、木在飞动往来的景象，清清楚楚如在眼前，景物自然都是天然而成的，不象是人为的，这就叫做“活笔”，陈用之的画的格调从此日益提高。

古文自变隶，其法已错乱，后转为楷字，愈益讹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为“吴”，无口为“天”。按字书，“吴”字本从“口”从“”，（音揆）“天”字也。此固近世谬从楷法言之。至如两汉篆文尚未废，亦有可疑者，如汉武帝以隐语召东方朔云：“先生来来。”解云：“来来，枣也。”按，“枣”字从“束”（音刺）不从“来”。此或是后人所传，非当时语。如“卯金刀为刘，货泉为白水真人。”此则出于纬书，乃汉人之语。按“刘”字从“”（音酉）从“金”，如、、皆从“”，非“卯”字也，“货”从“贝”，“真”乃从“具”，亦非一法，不知缘何如此？字书与本史所记，必有一误也。

古文字自从演变为隶书以来，它的法则已经错乱，后来又转变为楷书，就更加错乱，字的原义差不多不可考察了。比如说有“口”就成了“吴”字，没有“口”就成为“天”字。根据字书的说法，“吴”字从“口”从“天”，而不是从“天”字。这一定是近代错误地根据楷书的方法来解说的。至于西汉时代，篆文还没有被废，但也有可疑的地方，如汉武帝用隐语召东方朔说：“先生来来。”解释说：“来来就是枣字。”考证“枣”字从“”不从“来”。这或许是后人传说，不是当时的语言。例如说：“卯金刀为刘，货泉为白水真人。”这是出自于纬书，是汉代人的语言。考证“刘”字从“”从“金”，如、、都是人“”，不是从“卯”字。“货”字从“贝”，“真”字是从“具”，也不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字书与史书所记录的，其中一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唐韩偓为诗极清丽，有手写诗百余篇，在其四世孙奕处。偓天复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县，子孙遂家焉。庆历中，予过南安，见奕出其手集，字极淳劲可爱。后数年，奕诣阙献之，以忠臣之后，得司士参军，终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师，见偓《送鞏光上人》诗，亦墨迹也，与此无异。

唐代诗人韩偓写的诗非常清丽，他有手写的诗一百多篇，保留在他的第四代孙韩奕那儿。韩偓在唐昭宗天复年间隐遁在泉州的南安县，他的子孙于是就在这安家。庆历年间，我经过南安，看到了韩奕向我出示的韩偓手写的文集，字迹特别淳厚遒劲，令人喜爱。几年后，韩奕到朝廷献上了这本集子，因为他是忠臣的后代，得到了司士参军的官职，官最后做到了殿中丞。另外，我在京城，看见韩偓的诗《送鞏光上人》，诗的墨迹也同那本集子一样没有差异。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铉尝自谓吾晚年始得孺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长，孺匾之法，非老笔不能也。

江南人徐铉擅长写小篆，映照着日光看他的字，在笔画的中间有一线浓墨，到了笔画弯折的地方这条浓墨也在正中间，没有偏斜的地方，这是笔锋直下而不偏侧的缘故，所以笔锋总在笔画的正中，这是运笔的方法。徐铉自己说他晚年才得到歪扁的方法，凡是小篆喜欢瘦而且长，歪扁的方法，不是写字老道的人是无法掌握运用的。

《名画录》：“吴道子尝画佛，留其圆光，当大会中，对万众举手一挥，圆中运规，观者莫不惊呼。”画家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尽臂挥之，自然中规。其笔画之粗细，则以一指拒壁以为准，自然均匀，此无足奇。道子妙处不在于此，徒惊俗眼耳。

《名画录》记载：“吴道子曾经画佛像，把圆形的光圈留着不画，在一次大的聚会中，他当着众人的面举起手一挥，圆形就顺着他的手的运动而画成了，观看的人没有不惊叹的。”画家画这样的东西自然有办法，只要将肩膀靠着墙壁，尽着手臂的长度将手一挥，自然就画成了一个圆形。他的笔法的粗细，就是以手指隔着墙壁作为标准，笔法自然均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异的。吴道子的画好处并不在这里，只不过使那些俗人的眼睛惊奇罢了。

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正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

晋代与南朝宋人留下来的书法真迹，很多是凭吊死者和问候病人的书信。唐朝贞观年间，购集前世书法真迹很少遗漏，不是吊丧问疾的书信，都被皇家收去了。士大夫家中保存的墨迹，都是朝廷当时没有选取的，因此这些墨迹流传到现在。

鲤鱼当肋一行三十六鳞，鳞有黑文如“十”字、故谓之鲤。文从鱼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袭者。

鲤鱼在胸部的两侧各有一行鳞，共有 36 片，鳞上有如同“十”字的黑色斑纹，所以称为鲤。字形上从文从里，就是 360。但井田制以三百步为一里，大约这是四代的规矩，可能有不相因袭的情况。

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伪蜀翰林待诏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长于画花竹。蜀平，黄筌并二子居宝、居实、弟惟亮皆隶翰林图画院，擅名一时。其后江南平，徐熙至京师，送图画院品其画格。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筌恶其轧己，言其画粗恶不入格，罢之。熙之子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工与诸黄不相下。筌等不复能瑕疵，遂得齿院品。然其气韵皆不及熙远甚。

北宋初年，汪南平民徐熙，后蜀的翰林待诏黄筌，都由于擅长于绘画而闻名，他们特别擅长于画花和竹。后蜀为北宋灭亡后，黄筌与他的二个儿子居宝、居实，弟弟惟亮，都归属于翰林图画院，一时间有极大的名气。后来，南唐为北宋灭亡，徐熙到了京城，把他的画送到图画院去品评画的格调等级。黄筌和他的兄弟、儿子画花妙处在于着色，用笔极其新颖细腻，几乎看不见墨迹，只是用淡色染成，称之为“写生”。徐熙用墨笔作画，笔法非常简朴，稍许涂一点颜色，便神气活现，另有它生动的意味。黄筌憎恨徐熙压倒了自己，就说徐熙的画粗糙丑恶没有格调，不用徐熙。徐熙的儿子就仿效黄氏父子的风格，再不用墨笔，径直用彩色描画，称为“没骨图”，功夫、技巧与黄氏父子兄弟不相上下。黄筌等人无法再挑剔出毛病来，于是徐熙儿子被收入画院，然而这些画的神气和风韵与徐熙相比都差得很远。

予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之作字，分制无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须字字可拆。若笔画多寡相近者，须令大小均停。所谓笔画相近，如“杀”字乃四字合为一，当使“乂”“木”“几”“又”四者小大皆均。如“赤”字乃二字合，当使“上”与“小”二者大小长短皆均。著笔画多寡相远，即不可强牵使停。寡在左而取上齐，寡在右则取下齐。如从“口”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唵”即取上齐，“𠂔”则取下齐。如从“喟”从“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则“叔”当取下齐，“喟”当取上齐。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又曰：“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我的侄儿沈辽喜欢学习书法，他曾经议论说：“书法的神韵尽管在心领神会中得来，但是它的法则规范还是一定要依赖讲解与学习。我经常担忧现在世上的人写字，规则散乱没有一定的法规。凡是由两个字、三个字或四个字组合成的一个字，必须每个字都能拆开来看。如果笔画多少相近的字，必须让它们大小均匀。例如“唵”字就是由四个字组成，如“𠂔”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应该让“上”与“小”二个字的大小长短都均匀。如果字的笔画多少相差很远，就不能勉强拉扯使它们均匀。字的左边笔画少，就让它上面对齐；字的右边笔画少，就让它下面对齐。例如一个字从“口”从“金”，这就是笔画多少不一样，“唵”字就取上面对齐，“𠂔”字就让下面对齐。例如一个字从“喟”从“又”，以及另一个字从“口”从“胃”，是三个字合成的字，它们的笔画多少不相同，那么‘叔’字应该下面对齐，‘喟’字应该上面对齐。这样的道理，不能不知道。”他又说：“运笔的时候，要经常使意在笔先，这就是古人写字的好方法。”

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其后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不曾入圜。”本朝人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王羲之的书法，以前据说只有《乐毅论》是王羲之亲笔写在石上，其他的都是写在纸上和绢帛上流传的。唐太宗收集了王氏父子的墨迹，保存在的只有《乐毅论》石刻版本。后来它们随着唐太宗葬入昭陵。朱梁的时候，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掘昭陵得到了它们，二王的墨迹又流传到人间。有人说：“是公主将假的版本换掉了真的墨迹，二王的真迹原本就没有入墓穴。”本朝人，高绅学士收藏在家。

皇祐年间，高绅的儿子高安世任钱塘县主簿，《乐毅论》就在他家，我曾经见过。那时石头已残破了，在末尾单独有一个“海”字的就是。他们家在后来的十多年中，高安世在苏州，石头已经残破为几片，用铁丝拴在一起。后来高安世去世，《乐毅论》的石块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苏州一个富人家得到了它。”也再没有见过。现在流传的《乐毅论》，都是临摹本，字的笔画不再有过去的清丽遒劲。王羲之的小楷字从此大约绝迹了，象《遗教经》这样的墨迹，都不能与之相比。

王鉞据陕州，集天下良工画圣寿寺壁，为一时妙绝。画工凡十八人，皆杀之，同为一坎，瘞于寺西厢，使天下不复有此笔，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余，其间西廊“迎佛舍利”，东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飞动。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余亦不甚过人。

王鉞据守陕州时，将天下优秀的画工集中在一起画圣寿寺的壁画，成为当时的一绝。画工共 18 人，都被杀了，一同葬在一个坑穴之中，埋葬在圣寿寺西厢房，要让天下不再有这样的绝笔，王鉞丧失人伦到这样的地步。到现在还有十多堵墙留有壁画，其中西廊的“迎佛舍利”，东院的“佛母壁”最奇特神妙，画中人物神采飞扬，仿佛要飞动起来似的。其次又有“鬼母”、“瘦佛”两堵壁画，其余的画也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南唐中主时，有个北苑使董源会画画，尤其擅长画秋天山林烟岚远景，大多是江南山水的写真，不用奇特险峻的笔法。后来，建业僧人巨然继承董源画法，都达到了很高超的境界。大体上董源和巨然的画，都适宜于远看，他们用笔十分简朴，近看几乎什么也不象；远看则景物鲜明，情思深幽，仿佛看到另一个天地。比如董源的《落照图》，近看没有什么效果，远看则村落幽暗深远，都是晚景，远处山峰的顶端好象有落日返用的颜色，这正是它的奇妙的地方。

卷十八 技艺

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言谈颇有可采，然做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并入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

贾魏公做丞相的时候，有一个方士姓许，对人从不称呼名字，无论贵贱都称“我”，当时人们称他为“许我”。他言谈非常有风趣道理，但性情狂傲怪诞，不把公卿贵族放在眼里。贾魏公想要见他，四次派人邀请他，他都不到。又派门人苦苦相邀，许我才来。许我骑着驴子直接要进入丞相客厅，门吏制止他不许进入，门吏说：“这是丞相的厅门，即使是寺丞郎官也要下马。”许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助于丞相，是丞相邀请我来的，如果是这样，只须我离开罢？”便不下驴而离去。门吏急忙追他，许我不回。门吏将事情经过告诉丞相，丞相又派人道歉并邀请他，但许我终究没有去。魏公感叹说：“许我不过是一个平民，只因为他无所求于人，尚且不能用权势屈服，更何况以道义为己任的人呢！”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榑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法堂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榑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阶基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拱、榑、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荷辇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缘”，又次曰“前胁”；后二人曰“后胁”，又后曰“后缘”，末后曰“后竿”；辇前队长一人曰“传唱”，后一人曰“报赛”。）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为“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建房房屋方法的书叫做《木经》，有人说是喻皓所著。所有的房屋分为三部分：从梁以上的是上部分，地面以上的是中间部分，台基是下部分。梁有多长，那么所造的房屋屋脊也应该相应有多高，以此来确定椽子等构件的尺寸。比如梁是八尺长，那么屋脊就应是三尺五寸，这是造厅堂的法则，这称之为上部分。厅堂的柱子有多高，那么厅堂的基础也应造多高，以此来确定椽子等构件的尺寸。比如柱子高一丈一尺，那么台阶应该是四尺五寸。至于承重的斗拱和椽子、斜枋都有规定的法则，这就是中间部分。台阶分陡坡、中坡和缓坡三等，皇宫中台阶的坡度以御辇抬法的不同作为区分的标准，抬辇从下面上台阶，前竿的人双臂伸直下垂，后竿的人双臂向上举直，这样的坡度为峻道。抬前竿的人平肘抬，抬后竿的人平肩抬，这是慢道；抬前竿的人垂着手抬，抬后竿的人平肩抬，这是平道。这里所说的便是下部分。《木经》分为三卷。近年来对土木工程要求更加严格完善，旧《木经》不大适合了，没有人去重新编写，这也是优秀工匠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啊！

审方面势，覆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术”。文象形，如绳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谓之“缀术”。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

数缀之而已。北齐祖亘有《缀术》二卷。

审视方位地形，丈量高低及距离远近，被算学家称为“术”。宇是一个象形字，如同用绳去画直线用的墨斗。推究天体的运行，以及推算节气望朔变化，被称为“缀术”。意思是说不能用外部的形态来考察研究它们，只是用算术缀连起来计算。北齐祖亘写有《缀术》二卷。

算术求积尺之法，如刍萌、刍童、方池、冥谷、堑堵、鳖臑、圆锥、阳马之类，物形备矣，独未有“隙积”一术。古法，凡算方积之物，有“立方”，谓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则得之。有“堑堵”，谓如土墙者，两边杀，两头齐，其法并上下广，折半以为之广，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为股，以上广减下广，余者半之为为句，句股求弦，以为斜高。有“刍童”，谓如覆斗者，四面皆杀，其法倍上长加入下长，以上广乘之，倍下长加入上长，以下广乘之，并二位，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积”者，谓积之有隙者，如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罌之类。虽似覆斗，四面皆杀，缘有刻缺及虚隙之处，用“刍童法”求之，常失于数少。予思而得之，用“刍童法”为上行、下行，别列下广，以上广减之，余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假令积罌：最上行纵横各二罌，最下行各十二罌，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当十一行也。以“刍童法”求之，倍上行长得四，并入下长得十六，以上广乘之，得之三十二，又倍下长得十六，并入上长，得四十六，以下广乘之，得三百一十二，并二位再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三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广十二，以上广减之余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并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为罌数也。“刍童”求见实方之积，“隙积”求兄合角不尽，益出羨积也。）履亩之法，方圆曲直尽矣，未有“会圆”之术。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古法惟以中破圆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别为“拆会”之术，置园田，径半之以为弦，又以半径减去所割数，余者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余者开方除为句，倍之为割田之直径，以所割之数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圆径除所得，加入直径，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减去已割之数，则再割之数也。此二类皆造微之术，古书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算术中求物体体积的方法，比如刍萌、刍童、方池、冥谷、堑堵、鳖臑、圆锥、阳马等，各种物体的形状都齐备了，只没有隙积这一种算法。古代的算法，凡是算物体的体积，有立方体，是指六个面都是正方的物体，它的计算方法是把一条边自乘二次便求得了。有堑堵，是说如土墙一样的形状的物体，两个墙面是倾斜的，两头的面是直立的。它的截面积的算法是把上、下底面的宽相加，除以2，作为截面的宽，用直高与它相乘就得。再将直高作为股，用上底面的宽减去下底面的宽，得到的差数除以2作为句，用勾股定理算出弦，便是它的斜边长。有刍童，是说形状如倒扣在地上的斗，四个侧面都是斜面。它的计算方法是：把上底面的长乘以2，加上下底面的长，再把上底面的宽乘它，把下底面的长乘以2，加上底面的长，再用下底面的宽乘它；加上这二项，用高乘它们，再取它的六分之一，便得到了它的体积。“隙积”是说体积有空隙的堆垛体，像垒起来的棋子、分层建造的土坛和酒店里堆起的酒坛一类的东西。虽然像倒扣的斗，四个侧面都是斜的，但是由于边缘有残缺和空隙的地方，若用“刍童法”计算，得出的数字往往比实际的数要少。我想出了一种算法；用刍童法算出它的上位、下位，另外列出它的下底宽，减去上底宽，将这一差数乘以高，取其六分之一，并入前面的数目就可以了。（如果有堆垛的酒坛子，顶层上层长、宽都是两只坛子，最底层长、宽都是12只坛子，一层层相互错开垛好。先从顶层数起，数到有12只坛子的地方，恰好是11层。用刍童法来计算，

把上层的长乘以 2 得 4，加下层的长得 16，用上层的宽来乘它，得 32。又用下层的长乘以 2 得 24，加上层长得 26，用下层的宽来乘以它，得 312。上、下两位相加，得 344，乘以高得 3784。另外将下层的宽 12 减去上层的宽，得 10，与高相乘，得 110。加上前面的数字得 3894。取它的六分之一，得 649。这便是酒坛子的数目。运用刍童法算出的是“实方”的体积，运用隙积法算出的是截剩部分拼合成的体积，可以算出多余的体积。）丈量土地的方法，方、圆、曲、直的都有了，但是没有会圆的算法。凡是圆形土地，既能够拆开它，又必须让它合起来能够恢复圆形。古代的算法仅用“中破圆法”拆开来计算，它的误差有达到三倍的。我另外发明了一种拆开、会合的方法；设置一块圆形的土地，用它的直径的一半作为弦；再以半径减掉所割下的弧形的高，它们的差数作为股。弦、股各自平方，用弦的平方减去股的平方，它们的差数开平方作为勾，再乘以 2，便是割下的弧形田的弦长。再割一块田，它的算法也是这样，将总的弧长减去已割部分的弧长，便是再割田的弧长了。（假如有一块圆形田，直径是十步，想·201·让割出的弧形高二步，就用圆的半径五步作为弦，五步的平方等于 25，用半径减掉弧形的高二步，将它们的差数三步作为股，平方得九。用它来减弦的数 25，得 16，开平方得四，这便是勾，再乘以二就得弧的弦长。将圆弧的高二步自乘，得数为四，再乘以二得八，退上一位为四尺，用圆的直径相除。现在圆的直径是十，已经满了整十数，不除退上一位也可以。只需要将四尺加入弧弦长，便得出圆弧的弧长，共为八步四尺。再割一块田，也依据这种方法。如果圆弧的直径是 20 步，要计算弧长，就应该折半，这便是所说的要用圆弧直径来除它。）这两类方法都是涉及精微的算法，是古书里没有涉及到的，所以随意记录在这里。

“蹙融”或谓之“蹙戎”，《汉书》谓之“格五”。虽止用数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无敌。其法以己常欲有余裕，而致敌人于险。虽知其术止如是，然卒莫能胜之。

“蹙融”或称为“蹙戎”，《汉书》称它为“格五”。虽然规定了只用数粒棋子来同走一道，但技艺也有高低之分。徐德占精干此道，以至于没有敌手。他的下法是以己方常常要富裕，而致使敌手于险境。虽然知道他的下法是如此，但终于没有人能胜过他。

予伯兄善射，自能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体少而劲，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实，六者一张便正。凡弓性体少则易张而寿，但患其不劲。欲其劲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长一尺，乾则减半；以胶汤濡而梳之，复长一尺，然后用，则筋力已尽，无复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后傅角与筋，此两法所以为筋也。凡弓节短则和而虚，（“虚”谓挽过吻则无力。）节长则健而柱，（“柱”谓挽过吻则木强而不来。“节”谓把稍裨木，长则柱，短则虚。）节得中则和而有力，仍弦声清实。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难挽；射久天暑，则弱而不胜矢，此胶之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尽，强弱任筋而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中绳，则张而不跛。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我的大哥很会射箭，自己会做弓。他做的弓有六个好处。一是弓形体小而强度高，其二是弓易开而有力，三是久用弓力也不减弱，第四是天气冷热不同，而弓力不变，第五是开弓时弦声清脆而坚实，第六是一开弓，弓体就正，没有偏扭现象，凡是弓，弓体轻巧就容易拉开，而且使用寿命长，只是担忧弓的强度不高；要想使弓强度提高，妙处在筋的处理上。凡是一尺长的筋，干了以后就缩短一半；用胶汤浸润又极力梳直，又可以恢复到一尺长，然后再用的话，它的弹力已经没有了，不能再伸弛。再揉制做弓用的材料，向开弓相反的方向弯曲，然后才绕上筋和角，这两种方法都是用来处置筋

的。凡是弓节短的，弓就易拉开而无力，弓节长的，弓就硬而且难开，如果弓节恰好的话，弓就易开而有力，而且弦声清脆而坚实。一般的弓或在天寒时刚开始用来射，弓就硬而难拉开，而用久了，或在天热的时候，弓就会变得软而乏力，不能发箭，这就是胶造成的毛病。大凡弓上的胶要涂得薄一些，而筋要尽量泡透，弓的强弱是依凭筋的强弱而不依凭胶的厚薄，只有这样，才能使弓久用而力不乏，天气寒热始终一致。弓能正的原因，是因为所用的材料，选择材料的方法是要依据材料的纹路，其纹理不经过矫正就直的，在开弓时就不会偏。这是做弓的人应当知道的道理。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予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万兆为穰。算家以万万为亿，万万亿为兆，万万兆为垓。今但以算家数计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八千二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记。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数。（万字五十二，最下万字即万局，第二是万万局，第三是万亿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二是万兆局，第六是万万兆，谓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万万垓，第九是万亿万万垓。此外无名可纪。但五十二次万倍乘之·203·即是都大数，零中数不与。）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数。又法：先计循边一行为法，（凡十九路得一十亿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终十九行，亦得上数。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二十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四亿四千八百二十八万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两行凡三十八路变得此数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数。有数法可求，唯此法最径捷。（只五次乘便尽三百六十一路。）千变万化，不出此数，棋之局尽矣。

据小说记载：唐朝僧人一行曾算过围棋时可能下出不同局面的总数，一共有多少局，他都算出来了。我也曾经考虑过，这当然容易。但棋局数目太大，不是用现在的大数名称可以表达出来的。现在我大略说一下，如果棋盘是两路见方，就有四个用子位置，可以变化出81种棋局。是三路见方，有九个用子位置，可以变化出： $3^9 = 1.9683$ 局；是方四路，有16个用子位置，可以变化出： $3^{16} = 430,6721$ 局；方五路，有25个用子位置，可以变化出： $3^{25} = 8472,8860,9443$ 局。（根据古法，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万兆为穰。而算家以万万为一亿，万万亿为一兆，万万兆为核。我们现在只是用算家的计算方法来计数。）方六路，有36个用子位置，可以变化出： $3^{36} = 15,0094,6352,9699,9121$ 局。七路以上布局的，变化的局数无法计下来，如果将棋盘361路的变局全记下的话，大概要连写52个万字才是局的大致数字。（52个万，那么最后一个万字表示万局，第二个万字是万万局，第三个万字是万亿局，第四个万字是兆局，第五个万字是万兆局，第六个万字是万万兆局，万万兆称为一垓，第七个万字是垓局，第八个万字为万万垓局，第九个字是万亿万万垓局，再往上就没有大数名词好用了。连接52次万倍相乘后所得的积数就是棋局总数的大概。这里只给出第一位的数字，其余的数字都略而不讲。）计算的方法是：先考虑一个点，它可以有三种情况。或放黑子，或放白子，或空着不放子。从它出发，不论横直，每增加一个点，就多乘一个3；一直增加到全盘361点，每次都多乘一个3，就得到棋局的总数了。另一种算法是：先算出沿边一行的棋局数，这个数称为基本数。一行共19个点，共得1162261467局。每加算一行，就用这个基本数乘一次，乘尽19行，也得到上段所讲的棋局总数。

又一种算法是：将基本数相乘，（得 135851717672992089 局，这是两行共 38 点变化出来的局数。）把这个数布列在筹算盘的上位，下位也列这个数，用下位数乘上位数，再乘以下位数；把结果布列在上位，下位也布列它，用下位数乘上位数，再乘以下位数；再用基本数乘一次；也得到前段所讲的总数。求棋局总数有许多种方法，只有这种方法最快捷。（只须五次运算就得出 361 个点所变化出的棋局总数。）棋盘上可能布置出的局面是千变万化的，但是这个数目已经包括尽可能有的局面了。

《西京杂记》云：“汉元帝造蹴鞠，以蹴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予观弹棋绝不类蹴鞠，颇与“击鞠”相近，疑是传写误耳。唐薛嵩好蹴鞠，刘钢劝止之曰：“为乐甚众，何必乘危邀顷刻之欢？此亦“击鞠”，《唐书》误述为“蹴鞠”。弹棋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盖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今大名开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时物也。李商隐诗曰：“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今谱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汉书注》云：“两人对局，白黑子各六枚”。与子厚所记小异。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与后世法不同。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爱好踢毬，因踢毬使身体辛劳，便寻找类似子踢毬而又不使身体辛劳的游戏，于是做弹棋的游戏。”我观察弹棋这种游戏与踢毬全不类似，倒与“击鞠”类似，我疑心是传写错误的缘故。唐代薛嵩爱好踢毬，刘刚劝阻他说：“让人快乐的游戏很多，有什么必要冒着危险寻求片刻之欢呢？”此处也为“击鞠”，《唐书》错误地把它说成是“蹴鞠”。弹棋这种游戏现在的人很少玩，有一卷棋谱，大约是唐代人所作。它的棋盘二尺见方，中心高耸如同倒扣的孟盆，最高处为一小壶，四角微微隆起。现在大名府开元寺佛殿上有一张石棋盘，也是唐代所制的，李商隐诗句说：“玉·205.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说的是弹棋盘中心高，白居易有诗句说：“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长斜”是说从角上斜着弹过去，一发过半局。今天的棋谱中仍然有这种方法，柳宗元谈棋时说用 24 棋，指的就是这种游戏。《汉书注》记载：“两人对局，白黑子各六枚。”与柳宗元所说的略有出入。如下棋，古局用 17 道，合 289 道，黑白棋各 150，也同后来的下法不一致。

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乘除。唯“增成”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数少，则颇简捷；位数多，则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术不患多学，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乃为通术也。

计算方法有很多种，例如“求一”、“上驱”、“塔因”“重因”等等。这些简捷算法都离不开乘除。但是“增成”法则稍为不同，它全不用乘除，只须移多补少就成了。例如，用 9 除，就在下一位加上本位数字的一成；用 8 除，就在下一位加上本位数字的两成就行了。只是在进行这种运算的时候要一位一位的算，如果位数少，就比较简捷，但位数多时，则反而繁复，不如普通的乘除法那样普遍适用。不过，计算方法不妨多学。实际计算时，不要墨守成法，哪种方法简捷就用哪种方法，如果一种方法用起来觉得繁复，就换另一种方法。这才是一般的原则。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

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用木板刻印书籍，唐朝人还没有广泛运用。自从五代冯瀛王开始用木板刻印五经，以后的经典书籍，都用木板刻印。庆历年间，有个平民叫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的技术。方法是用胶泥来刻制活字，活字的厚度薄得象铜钱边缘，每个字做成一个印，然后用火把它杀硬。印刷前先准备一块铁板，在这铁板上铺上松香、蜡和纸灰调和成的药。要印刷时，就把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在铁板里将字密密的排上，排满以后，拿到火上烘烤，等到药物有点熔化，用一块平板在活字上面一按，整板字面就能平得象磨刀石那样。如果只印两三本书，这种方法不算简便，如果印上几十、几百以至几千本，那就非常快速。通常是准备两块铁板，一块板在印刷，另一块板则另外排字，这板才印完，第二版已准备妥当，轮流使用，转眼间就印好了。每个字都有几个印，例如“之”、“也”等字，每个字有20多个印，以便准备一板内有重复的字时使用。不用的时候，就用纸贴上标签，按每个韵为一类，放在木格里保存。如果碰上不常见到的字平时没有准备好的，可以马上刻制，用草火来烧使它变坚硬，转眼间就做成，不用木头来做字印的原由，是因为本纹有疏有密，沾上水以后就会凹凸不平，而且和药物粘连在一起，不容易取下。不如用胶泥制的好，用完把字板放在火里烤一下，让药物熔化，用手拂去后，字印就落下来了，一点也不会沾污。毕升死后，他的活字传到了我的子侄们手里，到现在还珍贵地保存着。

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食，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淮南人卫朴，精通历法，是唐代僧人一行之类的人物。《春秋》上记载了36次日食，用各种历法去验算，精密的不过算出二十六七次，只有一行算出29次，而卫朴却测得35次。只有庄公18年的一次日食，在现在和过去推算日食的方法都算不出，怀疑是以前的史书记载错了。从夏朝仲康五年癸巳岁到熙宁六年癸丑岁，总共3201年，书上记载的日食记录，共475次，用各种历法考核验证，虽然各有得失，而以卫朴推算出来的为最多。卫朴能不用算筹来推算日月食，只用口算乘除，也不会有一点差错。凡是“大历”都有一大堆数字，卫朴让别人在他耳边读一遍，就能背出来，而“傍通历”更是倒背如流。曾经叫人抄写历书，写完后叫人在耳旁读给他听，有差错一个算码的，读到那里，他就说：“这里错了某字”，他精确到了这种地步。对大数目的乘除，用不着对位，就能迅速地运算，一般人的眼睛跟也跟不上。有人故意移动一个算筹，卫朴用手上下摸一遍，摸到移动的地方，马上就能

拔正。熙宁中卫朴主修《奉元历》，因为没有天文观测记录，所以他的才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奉元历》的准确程度只达到六七成，但是已经比其他的历法都精密了。

医用艾一灼谓之“一壮”者，以壮人为法。其言若干壮，壮人当依此数，老幼羸弱，量力减之。

中医学上用艾绒治病，每次燃烧一个艾炷叫做“一壮”，是以强壮的人为标准的。医书上所说的灸多少“壮”，强壮的人应当按照这个数字，而老年、小孩或瘦弱的人，要酌量减少。

四人分曹共围棋者，有术可令必胜。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常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此虞卿斗马术也。

四个人分两方下围棋，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一定胜取。那便是，让我方棋术较差的人在对方能手之前，要求他只管急攻，并且先攻击对方非救不可的地方，使对方较强的人受到牵制，无暇顾全大局。再让我方棋术较好的人去与对方技术较差的人作战。这就是虞卿斗马的方法。

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乱”。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负。又有先祝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西北的戎人用羊来占卜，被称为“跋焦”，巫师称为“厮战”。用艾火烧羊的髀骨，观察它的裂纹，称为“死跋焦”。这种方法是：裂纹的上部为神明，接近脊椎处为坐位，坐位就是主位，靠近旁边之处为客位。根据戎人的习俗，居室的正房，通常留下中央的一间房，用来供奉鬼神，人不敢居住，称为神明，主人就坐在它的旁边。用这种方法来预算主客胜负。还有先对谷物施加咒语，用带咒语的谷物喂羊，羊吃了这种谷物，就会自己摇头，于是杀了看它的五脏，这被称为“生跋焦”，这些占卜的言辞极灵验，琐细的事都能言中。土人对“生跋焦”尤其感到神奇。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赂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肢篴，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钱氏在统治两浙的时候，在杭州梵天寺修建一座木塔，才修到二、三层时，钱帅登上它，嫌木塔摇动，工匠说：“还没有铺瓦，上面轻，所以如此。”于是在上面铺了瓦，但是塔依旧和当初没有铺瓦时那样晃动。无可奈何之际，工匠悄悄地让妻子见喻皓的妻子，并赠送了金钗，寻问塔晃动的原因。喻皓笑着说：“这很容易，只要每层铺上木板后，再用钉子钉牢，就不动了。”工匠遵照喻皓所说的，塔就稳定了。因为钉板上下紧束，上、下、左、右、前、后六面相联如同箱子一样的严实，人踩在塔板上，六面都用了力，相互扶持，塔自然不会摇晃了。人们都佩服喻皓的高明。

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或发白而须眉不白者，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

医生说的人的须发、眉毛都是属于毛类，但它们所从属的五脏又各不相同，所以有老了胡须白而眉毛头发却不白的人，有头发白而胡须眉毛不白的人，这都是从属的内脏器官的功能各有所偏重的缘故。一般是头发属于心，承受火气的影响，所以生于上；胡须属于肾，承受水气的影响，所以生于下；眉毛属于肝，所以生于两侧。男子肾气外行，上为胡须，下为外生殖器官，因为女子、太监没有男性生殖器，所以也就没有胡须，而头发眉毛则和男子一样，所以知道它不属于肾。

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如术能动钟乳，按《乳石论》曰：“眼钟乳当终身忌术”。五石诸散用钟乳为主，复用术，理极相反，不知何谓。予以同老医，皆莫能言其义。按《乳石论》云：“石性虽温，而体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后发”。如此，则眼石多者，势自能相蒸，若更以药触之，其发必甚。“五石散”杂以众药，用石殊少，势不能蒸，须借外物激之令发耳。如火少必因风气所鼓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孙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眼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其所恶，激而用之，其发暴故也。古人处方，大体如此，非此书所能尽也。况方书仍多伪杂，如《神农本草》，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

医生的医术，如果不是从心里理解，而只是依赖书本，是不会使医术达到很高的水平的。例如苍术和白术等能激发触动石钟乳的作用。根据《乳石论》说：“服了石钟乳，就永远不能再服术。”五石散一类的散剂以石钟乳为主，又用术来疗理，这本是极为相反的事，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我向老年的医生请教，都讲不出其中道理。根据《乳石论》说：“矿物性药物的性质虽然温热，而体质沉重，必须当它们相互发生作用时，其药性才能发散出来”。照这样的话，服石多了的话肯定会自己起作用，如若再用其他的药刺激它，其药性就会发散得更厉害了。在五石散中掺入了许多种药，用石钟乳的很少，势必不能自己起作用而需要用其它的药物来刺激它的药性。比如火小，一定要用鼓风的方法使火旺起来；火很旺，若再鼓风就反而有害，这是一般的常识。所以孙思邈说：“五石散是大猛急毒，宁可吃有大毒的野葛，也不要吃五石散。遇到这一药方就必须烧掉它，不要让它成为人类的祸害。”又说：“人不服食乳石，诸事都不好，乳石在体内，万事安宁。只是不可吃‘五石散’”。因为五石散集合了诸药中那些不好的特性，集中起来使用，所以发作得又猛又急。古人在处方时大致如此，也不是这本书能讲清楚的。何况医药书上有许多是不真实和杂乱的东西，比如《神农本草》是最古老的药书，里面的错误特别的多，做医生的不可不知。

予一族子旧眼穹劳，医郑叔熊见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后族子果无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张子通之奏，因病脑风，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见者。又予尝苦腰重，久坐则旅距十余步然后能行，有一将佐见予曰：“得无用苦参洁齿否？”予时以病齿用苦参数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参入齿，其气伤肾，能使人腰重，”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自后悉不用苦参，腰疾皆愈。此皆方书旧不载者。

我有一个同族的侄子长期服用川芎，医生郑叔熊见到了就说：“川芎不可长久服食，久服大多会使人突然死亡。”后来我的同族侄子果然无病而突然死亡。另外，我的亲家朝廷命官张于通的妻子，因患脑风头痛，服食川芎很久，也是突然死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另外，我曾经患过腰部沉重疼痛的病，久坐之后，起来走路时要艰难的缓步走十几步才能正常行走，有个下级军官见到我说：“你是否有用苦参洁齿的习惯？”我那时因牙病用苦参擦牙已几年了。他说：“这就是患腰痛病的原因。苦参的药气渗入到牙齿里，而这种药的气伤肾，长期用它擦牙，会使人腰部沉重。”后来太常寺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擦牙，时间久了也得腰痛。从此之后，我们全都不用苦参擦牙，腰痛也都好了。这些都是医书上没有记载过的。

世之摹字者，多为笔势牵制，失其旧迹。须当横摹之，泛然不问其点画，惟旧迹是循，然后尽其妙也。

世上临摹字帖的人，大多会被其笔的走势而牵制，失去了原字的韵味。应当横行临摹，完全不去管点画，只是按照旧的笔迹运笔，然后才能极尽它的妙理。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

古人用散笔写隶书，称为散隶。近年蔡谟又用散笔写草书，称为“散草”，或者称为“飞草”。他的方法都出自于飞白，也能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方欲入对，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憊憊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观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术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

四明僧人奉真，是高明的医生。天章阁待制许元作江淮发运使，回京向皇上奏报漕运劳绩，正要进官奏对，而他的儿子患急病，闭着眼睛不吃东西，忧愁欲死，已有一夜时间了。请奉真来诊视，奉真说：“脾已经完全散失了功能不可医治，明日就会死。”许元说：“看他的病势，就知他不可救治，但我现在正有事必须入朝当面奏对，能否延长几天期限呢？”奉真说：“这样似乎还可以，虽然他的各种内脏功能已经衰竭，但只有肝脏过于旺盛。脾脏被肝脏所克，脾气必定先失，任何一脏丧失功能就会死。如果立刻疏泻肝气，让肝气衰减，那么脾就能稍许缓解，可以延长三天时间，三天过后就没有办法了。”于是下了药，到了晚上病人就睁开眼睛，又稍许喝了点粥，第二天渐渐苏醒能吃些饭了。许元很高兴，奉真笑着说：“这不值得高兴，不过肝气暂时舒缓罢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三天过后，许元的儿子果然死了。

卷十九 器用

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子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共刻画甚繁，大体似“缪篆”，又如栏盾间所画回波曲水之文，中间有二目，如大弹丸，突起煌煌然，所谓“黄目”也。视其文，仿佛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谓“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上中得一铜钲，刻其底曰：“诸葛士全茗鸣钲”。“茗”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将名。其钲中间铸一物，有角，羊头，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时术士所画符。傍有两字，乃大篆“飞廉”字。篆文亦古怪。则怔间所图，盖“飞廉”也，飞廉，神兽之名。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亦有一钲，所图飞廉及篆字，与此亦同。以此验之，则“黄目”疑亦是一物。“飞廉”之类，其形状如字非字，如画非画，恐古人别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为。昔夏后铸鼎，以知神奸。殆亦此类，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谓。或曰：“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未可质，如今人得古铜樽者极多，安得言无？如《礼图》瓮以瓦为之，《左传》却有“瑶瓮”。律以竹为之，晋时舜祠下乃发得“玉律”，此亦无常法。如“蒲谷壁”，《礼图》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发古家，得蒲壁，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谷壁如粟粒耳。则《礼图》亦未可为据。

《礼书》上所记载的黄彝，画上人的眼睛作为装饰，称为“黄目”。我到过关中，得到一件古代铜黄彝，完全不象《礼书》所说的那样。这件黄彝上面刻的纹饰很繁缛，大体上象王莽时很屈曲的“缪篆”字体，不像栏杆、盾牌上所画回旋形的辟邪图素，中间有二只眼睛，象大弹丸那样大，突出而且很光亮，这就是所谓“黄目”了。看它上面的花纹，仿佛有牙、角、嘴和口唇的形象；所以有人认为“黄目”是一种动物。我过去在姑熟王敦所筑城故址中得到一件铜钲，其底部刻有“诸葛士金茗鸣钲”的铭文，“茗”就是古“落”字，是“部落”的“落”。诸葛士全是部将的名字。钲的中间铸有一个动物，有角，象羊头，器身上的花纹也象篆体字一样，又象现今道士画的符。旁边有二个字，是用大篆体写的“飞廉”，篆文字体也写得很古怪。看来，钲上的花纹，就是“飞廉”了。“飞廉”是神兽的名称，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也得到一铜钲，上面的“飞廉”纹饰和篆体铭文，和我所得的那件是相同的。由此可证明，“黄目”可能也是一种动物。“飞廉”这类花纹图案，它的形状，象字非字，象画非画，古代人这样做恐怕是别有含义的。大致上古代的器物，都不是随便做出来的。过去夏代的帝王铸鼎，是为了使人们懂得害人的神鬼。类似这种东西，其中必有它的含义，可惜我们不能把这些道理都深刻他说清楚。有人说：“《礼图》所载的博、彝等器物都是用木制的，没有听说过用铜制的。”这种说法也不可相信，现在人们发现了许多古铜樽，怎么说没有呢？比如《礼图》说翁是瓦作的，但《左传》中却有“玉翁”的记载。音乐用的定音管大多用竹制成，但晋代舜祠地下曾出土过玉制的定音管，这些也都是没有一定的规定的，又如“蒲谷壁”，《礼图》把它的纹饰全画成草和庄稼的形象，但现在人发掘古墓，出土的蒲壁，上面刻的纹饰象茂盛的蒲花；谷壁的纹饰象粟粒一般。看来《礼图》这部书也是不能完全作为根据的。

礼书言彝画云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状。今祭器中画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经。予尝得一古铜彝，环其腹皆有画，正如人间屋梁所画曲水，细观之，乃是云雷相间为饰。如 者，古云字也，象云气之形。如 者，雷字也。古文 雷，象回旋之声。其铜彝之饰，皆一 一 相间，乃所谓“云雷之象”也。今《汉书》“彝”字作“ ”。盖古人以此饰彝，后世自失传耳。

《礼书》上说罍上刻画有云雷的饰纹图象，但是谁都不知道雷是什么样子。现在祭祀用的器具中有的将雷刻成鬼神敲鼓的样子，这是非常荒谬的。我曾经得到一只古铜罍，环绕中间一圈都有刻画的花纹，正象人家屋梁上刻画的水曲波纹，详细一看，原来是云雷相间的饰纹，如 是古代的“云”字，它的形状象云气一样；如 是“雷”字，古文中 就是“雷”，像雷鸣的回旋之声。这只铜罍上的纹饰，都是一 一 相间，这就是“云雷”的形象了。现在《汉书》上还把“罍”字都写成“ ”字。大约古人用这个装饰罍，但后来年代久了，也就失传了。

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

唐人诗句中多提到“吴钩”。吴钩，是一种刀的名称，它的刀刃弯曲，现在南方少数民族仍在用它，叫做“葛党刀”。

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

古代用牛皮做盛箭的袋子，睡时就将其取下来做枕头，利用箭袋中间空虚，贴着地面而枕，几里外有人马走动的声音都能听见。是由于从地面传来的声音通过箭袋内空气振动而扩大，为枕套而卧的人所收听到。

郢州发地得一铜弩机，甚大，制作极工。其侧有刻文曰：“臂师虞士，耳师张柔。”史传无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郢州挖掘地下时得到一把“铜弩机”，非常大，制作十分精致，旁边刻有一行字：“臂师虞士，耳师张柔”。史传记载中没有这种人，也不知是哪一朝代制作之物。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李定本党项羌酋，自投归朝廷，官至防团而死。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

熙宁年间，李定进献了一台偏架弩，形状象弓，但装有连杆和踏脚，把踏脚踩到地上使弓张开，能射三百步远，能射穿铠甲上的几层铁片，称为“神臂弓”，是一种最具杀伤力的兵器。李定本是党项羌的首领，自愿投降归附朝廷，做官直做到防御使、团练使才死去。他的几个儿子都以勇猛矫健称雄于西北边地。

古剑有“沈庐”、“鱼肠”之名。（沈音湛，）“沈庐”谓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尔则多断折。剑之钢者，刃多毁缺，巨阙是也，故不可纯用剂钢。“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燔熟，褫去胁，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剑文也。

古代有叫做“沈庐”和“鱼肠”的著名宝剑，“沈庐”是说剑有深黑色的光泽。古人做剑用剂钢做刀刃，用柔铁做剑身，不这样，剑就容易断折。过分刚硬的剑，剑刃容易毁缺，“巨阙”就是这样得名的，所以不能全用剂钢。“鱼肠”剑就是现在的“蟠钢剑”，又叫做“松文”剑。说其形很象

烧熟的鱼去掉肋部以后，人们看到鱼肠子的形状，正象现在的“蟠钢剑”的花纹一样。

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鲋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

济州金乡县发现一座古墓，是汉代大司徒朱鲋的墓。石壁上都刻画了人物、祭器、乐架等物，有人的多种衣冠，有如今天的幞头的，巾额都是方形的，与今天的规格完全相同。妇女也戴有象今天的垂肩冠，象近年所穿戴的角冠，两翼包住面部，下垂到肩，没有丝毫不同之处。人情不相远，千多年前的服饰就如此。墓中的器物也与今天的器物类似。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入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

古代人制造铜镜时，镜面大就做成平的，镜面小就在成凸的。凡是凹面的镜子照出来的人脸就大，凸面的镜子照出来的人脸就小。小的镜子不能照出人面的全貌，所以让它稍微凸起，使照出的人脸形缩小，那么镜子虽然小也能照出人的整个脸形。铸镜时，就要测试镜面的大小，来决定镜子的凸或凹的程度，要让照出来的人面孔与镜子的大小相当。这是古代造镜工匠的奇巧智慧，后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近来人们获得古镜，都把它磨成平面的，这正是师旷哀伤缺少知音的原因。

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读，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士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长安古宫殿门阙前还遗留有一块唐代的肺石，它做得像佛寺里敲击用的响石，但很大，有八九尺长，形状象下垂的肺，上面也刻有题款，只是因为长久风雨的剥蚀而难于辨认。根据《秋官·大司寇》说：“用肺石使百姓的冤曲上达”。探求它的本意，是伸冤者站在石下边击打鸣冤，然后问官再详细听他们的冤曲，正象今天敲击“登闻鼓”一般。它之所以做成肺形的样子，是为了便于垂挂。另外，肺主声音，声音是用来表达冤情的。

熙宁中，常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一”。当时在庭皆疑古无“得一”年号，莫知何代物。予按《唐书》：“史恩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顺天”乃其伪年号，“得一”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

熙宁年间，挖掘地下时曾得到三十余千文的大钱币，钱上都铸有“顺天”“得一”的字样。当时在场的人都怀疑古时没有“得一”年号，不知道它究竟为哪个时代制造的。我根据《唐书》记载：“史恩明冒用帝王的尊号，铸造“顺天”“得一”钱币，“顺天”是他的伪年号，“得一”只是特地用这个名称造的钱罢了，并不是年号。

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

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世上有能透光的镜，镜背面有铭文，共 20 字，字体非常古奥，没有人能读懂。用这面镜子承受日光，那么背面的花纹和 20 个字都透射到墙上，清清楚楚。有人探求它的道理，认为是因为铸造时薄的地方先冷，唯有花纹和字的地方较厚，冷得慢，以致铜收缩要多一些。铭文和花纹虽然在背面，但镜面也会隐约可见。所以镜子放在日光中就会现出来。我观察这面镜子，道理确实如此。但是我家有三面镜子，另外看见别人家收藏的镜子，都是一样的，图案铭文没有一点差异，样式都非常古老。只有那一面镜子能透光，其它的镜子也有非常薄的，却都不能透光。由此想来，古人在造这面镜子时自有别的方法。

予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参连为奇，谓以度视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纬，则设之于棚，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予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设度于机，定加密矣。

我前几年在海州，一户人家挖地得到一驾弩机，弩机的望山很长，望山的侧面有小的标记，如同尺上刻有分、寸。探求它的意思，是用眼睛瞄准箭头，再用望山的刻度来确定箭头的高低，这正是运用了算术家们所用的勾股之法。《太甲》记载说：“射箭的时候先检查箭括，当箭括和刻度相合时就放箭。”这或许就是书中所说的度。后汉陈王刘宠擅长射弩箭，做到十发十中，而且都射中一个地方。他的方法是：“天覆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三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这些话隐晦难懂。大意是：“天覆地载”，是指发射时前后手的姿态。“参连为奇”是指用望山的刻度对准箭头，又用箭头对准目标，三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如同秤杆，这就是用勾股定理来确定望山刻度的高低的技术。“三经三纬”就是用三根垂直线与三根水平线划在箭靶上，用来确定上下左右的位置。我曾经在箭靶上划出三经三纬，用箭头对准它发射弩矢，发十枝也可以中七八枝。倘若在弩机上刻上度数，一定会射得更加准。

予于关中得一铜匱，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兰注水匱，容一升，始建国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当是官名。《王莽传》中不载。

我在关中时得到一只铜匱，它的背面刻有字 20 个，说：“律人衡兰注水匱，容一升，始建国元年癸卯造。”都是小篆字体，律人应当是官名，《王莽传》中不见记载。

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麋皮为緇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棊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札，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原厚三分

减二，乃成。其未留箸头许不锻，隐然如瘕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笋也。谓之“瘕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隐起伪为瘕子，虽置瘕子，但原非精钢。或以火锻为之，皆无补于用，徒为外饰而已。

表堂羌人擅长锻造铁甲，铁甲呈青色，其表面光洁明亮可以照见人的头发，用麕皮带子把甲片依次串连起来，铁甲既柔薄又坚韧。镇戎军有一件铁甲，用木匣子珍藏着，当作宝物相传。韩魏公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时，曾拿出来做试验：让人站在离它 50 米远的地方用强弩射它，射不进去。曾经有一支箭穿透了铁甲，原来是射中了甲上的钻孔，箭头穿过时反而被铁甲刮得卷起来了，这种甲就是如此坚硬。所有锻甲之法，开始很厚，不加热而用冷锻锻打，等到锻打得

比原来的厚度减少 $\frac{2}{3}$ 时，就成了。锻甲时在铁的末端留下一块筷子头大小的地方不锻，

以形成“瘕子”，目的在于把它用来标志锻前的厚薄，就如同疏通河道时留下的土桩，因此叫做瘕子甲。现在人们总是在甲背上敲砸，使其鼓起形成一个假的瘕子，虽然有个瘕子，但完全不是由精心锻造的钢制成；有的是用火加热锻造的，这些都没有用，只是作为外表的装饰罢了。

朝士黄秉少居长安，游骊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钗，刻为凤首，已皆破缺，然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郑嵎《津阳门》诗曰：“破簪碎钿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纓纒。”非虚语也。予又尝过金陵，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予曾见一玉臂钗，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世多谓前古民醇，工作率多卤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朝中官员黄秉少年时住在长安，一次游骊山时，正碰上一道士在清理故宫的石渠，从石头下面得到一支折断的玉钗，雕刻成凤头形状，都已经破缺，但做工非常精致，水平是后来的工匠所达不到的。郑嵎《津阳门》诗说：“被簪碎钿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纓纒。”并不是虚妄的话。我又曾经过金陵，有人挖掘六朝陵墓，得到很多古文物。我曾经见过一技玉臂钗，两头都有旋转的机关，可以屈伸自如，合起来是圆的，看不见一点缝隙，做成九龙缠绕其间，真是鬼斧神功。人们都以为古人醇厚，工作大多是卤莽拙笨，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古代器物非常精巧，这正是由于古代人醇厚的缘故。人情醇厚，工匠工作才认真，后世风俗虽然奢侈，但在工作上所用的力，比不上古代人，所以制作的物品多数不够精美。

屋上覆椽，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顶”。唯宫室祠观为之。

房屋木架上的天花板，古人称是“绮井”，也叫“藻井”，又有叫“覆海”的。现在营造法式中规定叫“斗八”。江浙一带的人，叫它作“顶。”只有宫殿和祠庙寺观才有这种装置。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

现在从地下出土的印章，大多数是军队里的官印。古人佩带的印章，只要是被撤职、免职、调动以及死亡的，都要上交印章，很少有能用印章陪葬的。现在从地下出土的印章，大多是死于战场上的人的印章。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动摇不安，竟废不用。元丰中，复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皇帝的玉辂大驾，是唐高宗时制作，到现在仍为皇帝所用。从唐朝到现在，总共三次到泰山封禅，其他巡幸各地的次数，真是不计其数。到现在仍完好结实，坐上安稳如山岳。放置一杯水在上面都不会泼洒。庆历年中，曾经另外制作了一辆玉辂，集中了天下的能工巧匠来制作，皇帝坐上却动摇不稳，终于废弃而没有使用。元丰年中，又制作一辆玉辂，做工特别精致，还没有让皇帝乘坐，放置在大庭中，不想车屋倒塌，玉辂被压碎。以后，只用唐时制作的玉辂，它非常坚固经久耐用，历代都不能看破其中奥妙。人们相传有神物护卫它，如果它行走在其它车辆的后面，便会隐然出声。

卷二十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尝得见。元丰中，予居随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传。凡雷斧多以铜铁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世传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间多雷斧、雷楔。按《图经》：“雷州境内有雷、擎二水，雷水贯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则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电白县，乃是邻境，又何谓也？

有人获得雷斧、雷楔，说：“这是雷神掉下来的，大多在震雷下面得到。”但并没有人见过。元丰年间，我住在随州时，夏天打巨雷，震断了一棵树，在树下得到一个雷楔，的确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一般雷斧用铜、铁做成，雷楔则是用石头做成，形状象斧头但无孔。人们说雷州多有雷电，在那里还建有雷祠，里面有许多雷斧、雷楔。根据《图经》说：“雷州境域内有雷和擎两条河水，雷河穿过城下，于是以雷作为州的名称。”这样说来那么“雷”自然是河流名称，说“多有雷电”是虚妄的。但是，高州有电白县，与雷州是邻县，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越州应天寺有鳗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数丈。井才方数寸，乃一石窍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诗云：“深泉鳗井开。”即此也，其来亦远矣。鳗将出游，人取之置怀袖间，了无惊猜。如鳗而有鳞，两耳甚大，尾有刃迹。相传云：“黄巢曾以剑刺之。”凡鳗出游，越中必有水旱疫疠之灾，乡人常以此候之。

越州应天寺有一口鳗井，在一块很大的磐石上面，有几丈高。井才几寸见方，是一个石穴。它的深度不可知。唐代徐浩的诗说：“深泉鳗井开”，就是指这口井，它的来由十分久远。鳗出来游动时，人们把它捉住放在衣袖里面，它一点也不受惊扰，形似鳗而身上有鳞，两只耳朵非常大，尾巴上有刀伤的印迹。传说：“黄巢曾经用剑砍过它。”凡是鳗出来游戏，越州便必定有水灾、旱灾或瘟疫，当地人常以此来预测灾害。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火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匣藏，游人到则发视。王无咎为之传甚详。

治平元年，在常州，一天太阳快落山时，天空中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只见东南方向出现一颗月亮般大小的火星流星。一会儿一声巨响，这颗星又移向西南方；再一声震响，就落在宜兴县一个姓许的人家的园子里。远近的人都看见了，火光映红了天空，许家的篱笆都被烧毁了。到火熄灭时，看见地下只有一个碗口大的窟窿，非常深，往下一看，星星就在里面，微微发光。过了很久，慢慢地暗下来，但还是热得不能接近。又过了很久，发掘那个洞，有三尺多深，找到一块圆石头，仍然是热的，如拳头般大小，一头稍尖，颜色如铁，重量也和铁差不多。州官郑伸得到它，将它送到润州金山寺，至今还用匣子保藏着。每当游人来了，就打开来看。王无咎曾经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予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间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亦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如季咸之见壶子，大耳三藏观忠国师也。又问以中篋中物，皆能悉数。时伯氏有《金刚经》百册，盛大篋中，指以问之，其中何物？则曰：“空篋也。”伯氏乃发以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经，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谓文字相空，因真心以显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窥也。

山阳有一个女巫，她的神机妙算非常灵验，我的长兄曾经召请她来询问。所有人间事物，即使在千里之外的事，问她全都能说；甚至人们心里萌发了一个什么念头，她都能知道。在坐的一位客人正在下棋，试着将几颗黑白棋子握在手中，问她有多少颗，她的回答没有不符合事实的。又随意抓一把棋子数都不数，问她有多少，她也不知道有多少。大约人们心里知道的，她也知道；人们心里不知道的，她也不知道。如同季咸见壶子，大耳三藏看忠国师一样。又问她箱子中所装的物品，她全能一一说清。当时长兄有一百册《金钢经》，装在大箱子中，长兄指着问她里面有什么，女巫回答说：“是空箱子。”长兄于是打开箱子让她看，说：“这里面有一百册佛经，怎么说是空箱。”女巫过了许久说：“空箱子罢了，怎么能欺骗我。”这就是所谓用文字引导空无，依靠真心以显示非具像事物，就是鬼神也不能窥视这个境界。

神仙之说，传闻固多，予之目睹者二事。供奉官陈允任衢州监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褛，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数揩而良久归家，家人见之，皆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惊，以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中，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髯及发尽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萧渤罢白波，辇运至京师，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授之悉成银，渤厚礼之，问其法，石曰：“此真气所化，未可遽传。若眼丹药，可呵而变也。”遂授渤丹数粒，渤饵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银。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时丞相当国，予为宰士，目睹此事。都下士人求见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术遂无验。石，齐人也。时曾子固守齐。闻之，亦使人访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补年寿，然不数年间，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关于神仙的说法，传闻非常乡，我亲眼见过两件事。供奉官陈允监管衢州酒务时已经很老了，头发掉了，牙齿也落了。有客人来看望他，自称孙希龄，穿的衣服十分破烂，送给陈允 1/10 匙的药，让他用以擦牙齿，陈允不怎么相信，有闲暇时就用药擦上牙齿，擦了几次后，过了很久回家，家中人看见他，都笑着说：“为什么用墨把胡须染黑？”陈允很吃惊，用镜子来照，只见上嘴须如漆一般的黑；急忙取下头巾，看见光秃秃的头上已长出几寸长的头发，脱了的牙也隐隐的有新长出来的。我看见陈允时，已经 70 多岁，上唇胡须和头发全是黑色，而下唇胡须如同雪一样白。另外，正郎官萧渤罢免了白波发运使官职，到了京城，有个脸上刺了字的姓石的士兵，能在手中把瓦石沙土全部揉搓成银子，萧渤用厚礼优待这位士兵，向他寻问方法，姓石的士兵说：“这是真气造成的，不能立刻传授。如果服含丹药，就能呵气而变化。”于是授予萧渤几粒丹药，萧渤吃下，取来瓦石呵气，也都变成了银子。萧渤是丞相王安石的亲家，当时丞相正执掌国事，我是宰士，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城中求见姓石的士兵的人象赶集一样的多，姓石的就逃离了，不知到哪里去了。姓石的刚离开，萧渤的法术就不灵验了。姓石的士兵是齐人，当时曾巩在齐任职，听说这件事，也派人到他家察访，全然不知姓石的

在哪里。萧渤吃了丹药后，按理应该增补年寿，但没有过几年，萧渤就病死了，我怀疑他的死非常虚幻。

熙宁中，予察访过咸平，是时刘定子先知县事，同过一佛寺。子先谓予曰：“此有一佛牙甚异。”子乃斋洁取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坠地。人以手承之，即透过。著床榻，摘然有声，复透下，光明莹彻，烂然满目。予到京师，盛传于公卿间。后有人迎至京师，执政官取入东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异之迹，不可悉数。有诏留大相国寺，创造木浮图以藏之，今相国寺西塔是也。

熙宁年间，我担任察访使时经过咸平，当时刘定任知县，和我一齐经过一座佛寺。刘定对我说：“这里有一颗佛牙，非常奇异。”我于是便清心洁身来看，只见佛牙突然生出舍利子来，如同人身上的汗，一下子涌出来，不知道它们有多少颗，有的飞到空中，有的掉到地上。用手接它，它就穿到手。落到床上，发出啾啾的响声，又透过床落下，光亮透明，满眼是夺目的光彩。我到京城后，将这件事在王公贵族间广为传播。后来有人将佛牙接到京城，执政官将它送入东府，轮流在士大夫家传看，神奇怪异的事，多得数不胜数。皇帝下诏书把它留在大相国寺，建造一木塔来收藏它，就是现在的相国寺的西塔。

菜品中茺菁、菘、芥之类，遇旱其标多结成花，如莲花，或作龙蛇之形。此常性，无足怪者。熙宁中，李宾客及之知润州，园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数。曝干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笃，因有此异”。

蔬菜品种中的茺菁、菘、芥等等，遇到干旱的时候，它们的顶端大多结成花球的样子，象莲花一样，或者象龙蛇一样弯曲。这是此类蔬菜的通常属性，没什么值得奇怪的。熙宁年间，太子宾客李及之任润州知州，园中菜花全变成了荷花，每朵花中各坐着一尊形如雕塑的佛像，不知道有多少。把它们晒干，依旧是原来的样子。有人说：“李君家信佛很虔诚，因而才有这种奇异的现象。”

“彭蠡小龙”，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宁中，王师南征，有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当是来护军仗耳。”主典者以洁器荐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风，日棹数百里，未尝有波涛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传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尝逾洞窟而南也。有司以状闻，诏封神为顺济王，遣礼官林希致诏。子中至祠下，焚香毕，空中忽有一蛇坠祝肩上。祝曰：“龙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胜。徐下至几案间，首如龟，不类蛇首也，子中致诏意曰：“使人至此，斋三日然后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斋戒。”蛇受命，径入银香奁中，蟠三日不动。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奁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湿胭脂，烂然有光。穿一翦彩花过，其尾尚赤，其前已变为黄矣，正如雌黄色。又过一花，复变为绿，如嫩草之色。少顷行上屋梁，乘纸旛脚以行，轻若鸿毛。倏忽入帐中，遂不见。明日，子中还，蛇在船后送之，逾彭蠡而回，此龙当游舟楫间，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彭蠡小龙”显示奇迹非常多，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其中有一桩奇事最著名。熙宁年间，朝

廷军队出征南方，有几十条装载兵器的船沿江甫行。从离开真州开始，就有一条小蛇登上船，船夫认识，说：“这是‘彭蠡小龙’，必定是来护卫兵器的。”掌管礼仪的人用干净的器具将它装起，蛇伏卧在器具中，船乘着顺风，每日航行几百里，从未遭到波涛的惊恐，不几天就到了洞庭湖，小蛇便搭一条商船返回南康。传说小蛇的封地到洞庭为止，从来没有越过洞庭湖再向南行。有关宫署上奏朝廷，皇上下诏封神蛇为顺济王，派遣掌管礼仪的官员林希传达诏书，林希到了祠庙，烧香完毕后，空中忽然有一条蛇落在司祭礼的祠祝肩膀上。祠祝说：“龙王到啦。”蛇的重量一条臂膀都承受不起。它慢慢的下来到桌子中间，头像乌龟，不像蛇头。林希传达诏书的意思说：“使者到这里，斋戒三天后才能献祭。大王接受天子诏命，不能不斋戒。”蛇接受天子诏命，径直进入银做的香奁中，盘屈三天一动不动，献祭的那一天，酒已经倒好之后，蛇就从香奁中伸出头来吸酒。一会儿出来沿着桌子爬行，颜色如同湿润的胭脂，光彩耀眼。它穿过一朵纸剪的彩花花时，尾部还是红色的，它的前部已变成黄色了，正好像雄黄的颜色。又穿过一朵花时，再变为绿色，像嫩草的颜色一样。过一会儿爬上屋梁，沿着纸旗的边行走，像鸿雁的羽毛般轻盈。很快进入帷暮中就不见了。第二天，林希返回，蛇在船后边为他送行，过了彭蠡就回来了。这条蛇常常在舟船间游走，与一般的蛇没有区别，但蛇爬行时一定是弯弯曲曲的爬行，而这条蛇却是笔直前行，江上的人常常借此来辨别。

天圣中，近辅献龙卵，云：“得自大河中”，诏遣中人送润州金山寺，是岁大水，金山庐舍为水所漂者数十间，人皆以为龙卵所致。至今棣藏，予屡见之，形类色理，都如鸡卵，大若五升羹，举之至轻，唯空壳耳。

天圣年间，皇帝身边的大臣进献龙卵，说：“从大河中得到。”皇帝下诏派人造到润州金山寺，这一年涨大水，金山房屋被水冲走的有几十间，人们都认为这是龙卵导致的。到今天龙卵还装在木匣子里，我见过多次，形状、颜色和纹理都像鸡蛋，大小如同能装五升的袋子，拿起来极其轻，仅仅是一个空壳罢了。

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和者，银悉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的。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人必谓火当先焚草木，然后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铄，而草木无一毁者，非人情所测也，佛书言“龙火得水而炽，人火得水而灭。”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

内侍李舜举家曾经遇到大雷击。他家堂屋的西屋，雷火自窗户出来，亮晃晃地窜上屋檐。人们以为堂屋已经着火焚烧，都出去躲避。雷停止后，房屋依然还是在，只是墙壁和窗纸都变黑了。屋内有一木架，里面杂乱存放着各种器具，其中镶银的漆器上的银全熔化流在地上，而漆器却没有被烧焦。有一把宝刀非常坚硬，就在鞘中熔为钢水，而刀鞘依然还在。人们以为，按理火应当先烧毁草木，然后才能熔化金石。现在金石都熔化了，而草木没有一样被烧毁，这不是一般常识所能预计到的。佛书上讲：“龙火遇到水更加旺盛，人火遇到水却会熄灭。”这个道理确实如此。人们只知道人世的事情，而人世以外的事情哪有止境，要用少量的世情常识去追究最终的道理，不是很难吗！

知道者苟未至脱然，随其所得浅深，皆有效验。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自力文以记其说。后移邓州，是时范文正公守南阳。少日，师鲁忽手书与文正别，仍嘱以后事，文正极讶之，时方饌客，

掌书记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学，文正以师鲁书示炎曰：“师鲁迁谪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见之，为致意开譬之，无使成疾。”炎即诣尹，而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见炎来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犹以生人见待？诛死矣。”与炎谈论顷时，遂隐几而卒。炎急使人驰报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师鲁忽举头曰：“早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岂不达此。”又问其后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头顾希文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言讫，遂长往。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矣，尚未能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进退两忘”犹存于胸中欤。

懂得道的人如果没有达到超脱的境界，依照他懂得的多少，都会有灵验的效果。尹洙从直龙图贬官经过汴梁时，与一僧人交谈。尹洙说把清静退隐作为乐事。僧人说：“这样还是有所牵累，不如把积极进取和清静退隐都忘掉。”尹洙马上若有所得，写下文章记下了僧人的说法。后来尹洙迁到邓州，当时范仲淹正任职南阳。没有几天，尹洙忽然写信给范仲淹告别，同时嘱托身后事，范仲淹非常惊讶，当时恰好在宴请客人，掌书记朱炎是在坐的客人，朱炎老人爱好佛学，范仲淹把尹洙的信与朱炎看说：“尹洙遭到贬谪非常不得意，就追求违背道理的东西，真是奇怪。应当去看看他，向他表示问候并开导他，使他不致于得病。”朱炎立刻到尹洙那里去，只见尹洙已经沐浴更衣戴帽坐着，看见朱炎来转告范仲淹的意见，就笑着说：“为什么范仲淹还把我当活人看待？尹洙已经死啦。”尹洙和朱炎交谈了一会儿就靠着桌子死了。朱炎急忙派人骑马去报告范仲淹，范仲淹来到，哭得非常哀伤，尹洙忽然抬头说：“早就与您告别了，哪用得着又来？”范仲淹惊讶地询问原因。尹洙笑着说：“死和生是平常的道理，您怎么能不懂得。”范仲淹又问尹洙的身后事。尹洙回答：“这就全托与您了。”于是作告告别范仲淹又死去。不久，又抬头对范仲淹说：“没有鬼神，也没有恐怖。”说完，便与世长辞，尹洙的修养到了这种境地，可以说已很有力量了，尚且还不能超脱有和无的见解，为什么呢？莫非不是“进退两忘”的说法还留存在心中吗。

吴人郑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监高邮军税务，尝遇一术士，能推人死期，无不验者，令推其命，不过三十五岁。忧伤感叹，殆不可堪。人有劝其读《老》、《庄》以自广。久之，润州金山有一僧，端坐与人谈笑间遂化去。夷甫闻之，涓然叹息曰：“既不得寿，得如此僧。复何憾哉。”乃从佛者授《首楞严经》，往还吴中，岁余，忽有所见，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释然放怀，无复蒂芥。后调封州判官，预知死日，先期旬日，作书与交游亲戚叙诀，及次叙家事备尽。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园，面溪一亭洁饰，夷甫至其间，亲督人洒扫及焚香，挥手指画之间，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犹作指画之状。郡守而下，少时皆至，士民观者如墙。明日，乃就敛。高邮崔伯易为墓志，略叙其事，予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士人中盖未曾有此事。

吴地人郑夷甫少年时考中进士，有很好的才能，嘉祐年间，他监管高邮军的税务，曾经遇到一个懂方术的道士，能够预测人的死亡的日期，没有不灵验的，让道士预测他的寿命，不超过35岁。郑夷甫听后忧伤感叹，几乎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人们劝他读《老子》、《庄子》来自我宽慰。过了很久，润州金山有一和尚，端正的坐着与人谈笑的时候就去世了。郑夷甫听说这件事，感慨地叹息说：“既然不能长寿，能够像这位僧人这样，又有什么遗憾呢！”于是跟随僧人学习《首楞严经》，来往于吴中，一年乡后，忽然有了领悟，说：“生和死的道理，我懂得了。”就放下疑虑心胸开朗起来，不再心存芥蒂。后来郑夷甫调到封州任判官，事先知道了死期，在死期到来前十天，写信向亲戚朋友

道别，然后把家中事情都讲到了。到死期时，洗澡换衣。他家屋外有一个小园子，对着溪水边有一个修饰干净的亭子，郑夷甫到亭子里，亲自督促人洒水打扫以及焚香，在他挥手指点之时就站着去世了。他的家人跑出来喊他，已经站立着变僵硬了：站立的样子高耸象种下的树木，一只手还作指划的样子。从郡守以下的官员，不久都来到，来观看的士人和平民百姓多得如排列的墙。第二天就入棺。高邮的崔公度为他写了墓碑碑文，大致记述了郑夷甫生平事迹。我同郑夷甫为远房亲戚，对他的了解非常详细。士人中大约还没有过这种事。

人有前知者，数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梦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定。予以谓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时，即是今日，中间年岁，亦与此同时，元非先后。此理宛然，熟观之可谕。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迁避之。”亦不然也。苟可迁避，则前知之时，已见所避之事，若不见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人当中有先知先觉的人，几十几百几千年的事都能说出来，做梦时也有这种情况。根据这个可以知道世上万事万物没有不在事前就定下来的。我以为并非如此，事情不是先前就决定了的。当人们知道某件事情的时候，就在事情发生的同时、事情的发生与人们的认识是同时的，中间并没有隔着许多年，本来是没有有什么先后的。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仔细观察就可以明白。有人说：“如果能事先知道，有不利的事，就可以回避它。”这也不对。如果可以回避，那么事先知道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要回避的事，如果没有见到要回避的事，就不是事先知道。

吴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与人言。予群从文通为知制诰，知杭州，礼为上客。文通尝学诵《揭帝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见曰：“舍人诵咒，何故阙一句？”既而思其所诵，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寿。一日斋心往问捷，捷曰：“公更三年为翰林学士，寿四十岁，后当为地下职事，权不减生时，与杨乐道待制联曹，然公此时当衣衰经视事。”文通闻之，大骇曰：“数十日前，曾梦杨乐道相过云：‘受命与公同职事，所居甚乐，慎勿辞也’。”后数年，果为学士，而丁母丧，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与文通诀别。时文通在姑苏，急往钱塘见之。捷惊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来？宜即速还。”屈指计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驰还遍别骨肉，是夜无疾而终。捷与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记，此吾家事耳。捷尝持如意轮咒，灵变尤多。瓶中水咒之则涌立。畜一舍利，昼夜转于琉璃瓶中，捷行道绕之，捷行速则舍利亦速，行缓则舍利亦缓。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谨，就捷乞一舍利，捷遂与之，封护甚严，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斋戒延捷加持，少顷，见观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动，疑其虫也，试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爱之，持以见归。子家至今严奉，盖神物也。

吴地僧人文捷持守戒律十分清苦，有很多奇异的事迹，能知道宿命，但极少与人说。我的族弟沈迥任知制诰官职，任职杭州，将文捷优待为座上宾，沈迥曾经学习诵读《揭帝咒》，没有人知道此事。文捷有一天见到沈迥说：“您诵读咒文，为什么缺一句？”沈迥想了想所诵读的咒文，果然少了一句。浙江的人大多说沈迥不会长寿。有一天他诚心前去问文捷，文捷说：“您过三年任翰林学士，寿命40岁，然后在阴间担任职务，手中的权力不小于活着的时候，同待制官杨乐道在一块办事，但您那时应当穿丧服办事。”沈迥听了非常惊骇他说：“几十天前，曾梦见杨乐道来过我家，说：‘我受命与您一同任职，居官非常快乐，千万不要推辞。’”几年之后，沈迥果然担任了学士，却遭丧母之

忧，当时他 39 岁。第二年秋，文捷突然派人与沈邁决别，当时沈邁在姑孙城，急忙赶到钱塘见文捷。文捷惊讶他说：“您的大限就在这几个月，哪里用得着再来？最好马上返回。”屈指计算后说道：“赶紧走还以到家。”沈邁依照文捷的活，骑马奔驰返回与所有亲人告别，这天晚上便无病去世。文捷给别人的预言大多如此，不能全部记下，这是我的家事呀，文捷曾经手拿如意轮念咒，灵验变化特别多，对瓶中的水念咒，那么水就翻滚上涌。积储了一枚舍利子，它白天夜晚都在琉璃瓶中打转，文捷行走绕过舍利子，文捷走得快舍利子也转得快，文捷走得慢那么舍利子也转得慢。士大夫郎忠厚侍奉他非常小心谨慎，向文捷求取一枚舍利子，文捷就给了他，他收藏保护得很严密，一天舍利子突然不在了，只有一个空瓶，郎忠厚斋戒延请文捷来扶助，不久，看见观音像衣上有一个东西在慢慢蠕动，疑心是虫子，试着去捕捉，原来是失掉的舍利子。像这样的事不止一桩。郎忠厚因为我喜欢舍利子，就拿来送给了我。我家到现在还恭敬地侍奉着，因这是神灵之物。

郢州渔人掷网于汉水，至一潭底，举之觉重。得一石，长尺余，圆直如断椽，细视之，乃群小蛤鳞次相比，绸缪巩固。以物试抉其一端，得一书卷，乃唐天宝年所造《金刚经》，题志甚详，字法奇古。其末云：“医博士摄比阳县令朱均施”。比阳乃唐州属邑不知何年坠水中，首尾略无沾渍，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宝藏其书，蛤筒复养之水中，客至欲见，则出以视之。孝源因感经像之胜异，施家财万余缗，写佛经一藏于郢州兴阳寺，特为严丽。

郢州渔人把网抛到汉水中网鱼，到一水潭底部，往上拖网时觉得很重。得到一块石头，有一尺乡长，圆而且直，如同椽木的断面一般。仔细察看，是一群小蛤蜊依顺序排列，紧密牢固地粘在一起。用东西试着打开它的一头，得到一个书卷，是唐代天宝年间所写的《金刚经》，题跋记事非常详细，字的笔法十分古朴。书卷末尾说：“医博士摄比阳县令朱均施。”比阳是唐州下属的县，书卷不知哪年落入水中，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浸湿的痕迹，这本书卷为当地豪士李孝源得到。李孝源向来信奉佛教，把这卷书作为宝物珍藏，又把蛤蜊筒养在水里，有客人来到想看时，就取出来看。李孝源由于感受到了经像十分奇特之处，就施放一万多缗钱的家财，写一部佛经收藏于郢州的兴阳寺中，写得特别庄重富丽。

张忠定少时谒华山陈图南，遂欲隐居华山。图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当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职，未可议此。其势如失火家待君救火，岂可不赴也？”乃赠以一诗曰：“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亦须多谢鬓边疮。”始皆不谕其言。后忠定更镇杭、益。晚年有疮发于项后，治不瘥，遂自请得金陵，皆如此诗言。忠定在蜀日，与一僧善。及归，谓僧曰：“君当送我至鹿头，有事奉托。”僧依其言，至鹿头关，忠定出一书封角付僧曰：“谨收此。后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请于官司，对众发之，慎不可私发。著不待其日及私发者，必有大祸。”僧得其书，至大中祥符七年岁乙卯，时凌侍郎策，帅蜀，僧乃持其书诣府，具陈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从官共开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题曰：“咏当血食于此。”后数日，得京师报，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馆。凌乃为之筑庙于成都。蜀人自唐以来，严祀韦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张詠年轻时拜谒华山的陈抟，便想要隐居华山。陈抟说：“别的人我不知道，像您这样的人，我该把华山分一半来送与您，但您正有官职，不能谈论这件事。那势头如同失火的房子等待您去救火，

怎么能不去呢？”便向张詠赠送了一首诗：“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亦须多谢翼边疮。”开始人们都不明白诗中的含意。后来张詠又到杭州、益州任职。年老时脖子后面生疮，治疗后仍不好，于是自己请求到金陵任职，都如诗中所说，张詠在蜀的时候，与一个僧人极好。到返回时对僧人说：“您该送我到鹿头关，我有事相托。”僧人照张詠的话，送他到鹿头关，张詠拿出一封封了口的信交给僧人说：“敬请收下这封信，以后到乙卯年的7月26日，应当告诉官方衙门，当众把信拆开，千万不要私下拆开。如果不等到那一天而私自拆开的，一定会遇到大祸。”僧人拿了这封信，到大中祥符七年岁在乙卯，当时侍郎凌策任蜀中守臣，僧人就拿着张詠的信到官府，把陈詠的话全部说出来。那位僧人也是有道行的，凌策相信他的话，集合了下属官员当众拆开信，原来是张詠的画像，上面有张詠亲手题的字：“张詠要在这里受祭祀。”几天后，得悉京城传来的通报，说张詠在这年的7月26日去世。凌策于是为他在成都建了一座庙宇。蜀中的人从唐代以来，敬重地祭祀韦皋，从此后就改为祭祀张詠直到现在。

熙宁七年，嘉兴僧道亲号通照大师，为秀州副僧正，因游温州雁荡山，自大龙湫回，欲至瑞鹿苑，见一人衣布襦行涧边，身轻若飞，覆木叶而过，叶皆不动，心疑其异人，乃下涧中揖之，遂相与坐于石上，问其氏族、闾里、年齿，皆不答，须发皓白，面色如少年，谓道亲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后九年当有疾，汝可持吾药献天子。此药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责，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锡，以授道亲，曰：“龙寿丹也”。欲去，又谓道亲曰：“明年岁当大疫，吴、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药，勉修善业，当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叶与之，道亲即时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药，至癸亥岁，自诣阙献之。”言讫遂去。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亲殊无恙。至元丰六年夏，梦老人趣之曰：“时至矣，何不速诣阙献药？”梦中为雷电驱逐，惶惧而起，径诣秀州，具述本末，谒假入京，诣尚书省献之。执政亲问，以为狂人，不受其献。明日，因对奏知，上急使人追寻，付内侍省问状，以所遇对。未数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句当御药院梁从政持御香，赐装钱百千，同道亲乘驿诣雁荡山求访老人，不复见，乃于初遇处焚香而还。先帝寻康复，谓辅臣曰：“此但预示眼药兆耳”。闻其药至今在彰善阁。当时不曾进御。

熙宁七年，嘉兴的和尚道亲，号称通照大师，担任秀州的付僧正，游历温州的雁荡山，从大龙湫返回，想要到瑞鹿苑去，看见一个穿着短布衣的人在山涧流水边行走，身体轻盈得如同飞起来一样，踩着树叶经过，叶子都不动，道亲和尚疑心他是奇异的人，于是下到山涧中向那人揖拜，便一同坐在石上，道亲询问他的姓氏家族，籍贯住处、年龄，他都不回答，胡须和头发都是洁白的，脸色如同少年，他对道亲说：“现在为宋朝第六个皇帝，再往后九年就会得病，你可以拿我的药进献给天子。这种药臣子不能服食，服食了就会受很大的责罚，应该妥善保存守护。”就从口袋中拿出一个丸子，如指头般大小，紫颜色，重量如同金和锡，把它交与道亲和尚说：“这是龙寿丹。”要离开时，又对道亲说：“明年将有大大瘟疫，吴、越两地尤其严重，你的名字已在死人名册上，现在吃我的药，努力修行做善事，就会免除这一灾难。”那人从口袋中取出一柏树叶给与道亲和尚，道亲当即吃下。那老人说：“你肯定会免除灾难，小心守护我的药，到神宗元丰六年，你自己去宫中进献药丸。”说完就离开了。南方流行大瘟疫，两浙无论穷人富人都得了病。十个人中有五、六个死了，道亲和尚竟没有得病。到宋神宗元丰六年夏天，道亲梦见那老人催促他说：“时间到了，为什么不快到宫中去献药？”道亲在梦中受到雷电的追赶，惊恐不安地起床，径直到了秀州，把事情来龙去脉详细讲述，请求请假去京城，到尚书省去献药。主政官员亲自过问此事，认为道亲是疯子，不接受他献的药。第二天，在奏对时向皇上禀报，皇上急忙派人去追寻，将道亲交与内侍省询问，道亲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说出来。

不几天，先帝果然有了病，于是派主管御药院的梁从政拿来御香，赐与一百千行装钱，和道亲一同乘驿车到雁荡山寻访那位老人，再没有看见，就在当初相遇的地方烧香后回来。先帝不久便恢复健康，对左右大臣说：“这只是预示服药的先兆罢了。”听说那种药至今仍在彰善阁中。当时没有进献给皇帝食用。

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自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忽得一瓶，封鏽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字。著拙得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至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遣内侍廖维持御书殿额赐之，乃与钱文符同。时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平观，具闻其事，召本观主首推诘其详，审其无伪，乃以其钱付廖维表献之。

庐山的太平观是九天采访使者的祠庙，创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建造一座房屋，叫弟子陈若拙监工，挖地时忽然得到一个瓶子，封闭得十分牢固，把瓶子打破，里面都是五色土，只有一枚铜钱，上面刻有“应元保运”四个字。陈若拙得到它，把它交给了师父，不认为有什么奇异。到元丰四年，忽然皇帝有诏书将九天采访使者进称号为应元保运真君，派内侍廖维拿着皇帝亲手书写的殿堂匾额赐与太平观，文字正与铜钱上刻二字相同。当时担任知制诰的熊本提举太平观，全听说了这件事，叫来太平观主持询问详细情况，检查了没有假，就把钱币交与廖维上表献给朝廷。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升云：“其法为炉灶，使人隔墙鼓铺，盖不欲人觐其启闭也。”其金，铁为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辄解凿为八片，谓之“鸦嘴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铸为金龟、金牌各数百，龟以赐近臣，人一枚，时受赐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余悉埋玉清昭应宫宝符阁及殿基之下，以为宝镇。牌赐天下州、府、军、监各一，今谓之“金宝牌”者是也。洪州李简夫家有一龟，乃其伯祖虚己所得者，盖十七人之数也。其龟夜中往往出游，烂然有光，掩之则无所得。其家至今棧藏。

大中祥符年间，方士王捷原本是脸上刺了字的士兵，曾因为犯罪发配到沙门岛，能制作黄金。有一位年老的锻工名叫毕升，曾经在皇宫中做过，替王捷锻炼金子。毕升说：“锻金的方法是搭起炉灶，派人在隔壁鼓风吹火，大概是不想让人看到其中的窍门。”他的金子是用铁炼制而成。开始从炉中出来时，颜色还是黑的。每一百多两为一块，每块又象车轴一样分凿成八片，这种金就叫做“鸦嘴金”。现在还有人收藏着。皇上让制办宫廷器物的官署用“鸦嘴金”做成金龟、金牌各几百个，金龟用以赏赐身边的臣子，每人一个，当时受到赏赐的人，除外戚之外，在场的有17人。余下的全部埋藏在玉清昭应宫的宝符阁以及大殿的地基下，作为镇守基础的宝物。金牌赐与全国的州、府、军、监，各处一个，就是现在称做“金宝牌”的。洪州李何夫家中有一金龟，就是他的先祖李虚己得到的赏赐，大约是17人中的一个。那金龟晚上常出来游走，光彩灿烂，抓它却抓不到。他家到今天仍用木匣子珍藏着。

卷二十一 异事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予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縠。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喻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

人们传说，虹能下到溪涧饮水，确实如此。熙宁年间，我出使契丹，到了契丹最北边的黑水境内的永安山下，撑起了帐篷。当时正好雨后初晴，看见彩虹下落到帐篷前的山涧中，我和同事一起到涧边观看。只见虹的两头都下到涧中。派人越过山涧，我们在虹的两边面对面站着，相距几丈远，中间仿佛隔着一层轻纱似的。这条彩虹从西向东可以看见（因为是傍晚的虹）站立在涧的东边向西边看，则因为太阳光晃眼，什么也看不见。过了许久，虹慢慢向东移，越过山离去。第二天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又看到了虹。（孙彦先说：“虹是雨中太阳的影子，太阳照雨就会有虹出现。”）

皇祐中，苏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垩书其墙壁，悉似“在”字，字稍异。一夕之间，数万家无一遗者。至于卧内深隐之处，户牖间无不到者，莫知其然。后亦无他异。

皇祐年间，一天夜晚苏州百姓家有人用白粉在墙壁上写字，所写字金象“在”字，字体略有区别。一个晚上的工夫，几万家人家没有一处漏掉的，至于卧室内幽深隐蔽之处，窗户上没有不写到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也没有什么其他异样的。

延州天山之巅有奉国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传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于佛书《大智论》，言尝割身肉以饲饿鹰，至割肉尽。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县为肤施县。详“肤施”之义，亦与尸毗王说相符。按《汉书》：“肤施县乃秦县名”。此时尚未有佛书，疑后人傅会县名为说，虽有唐人一碑，已漫灭断折不可读。庆历中，施昌言镇鄜延，乃坏奉国寺为仓，发尸毗墓，得千余秤炭，其棺椁皆朽，有枯骸尚完，胫骨长二尺余，骨大如斗，并得玉环块七十余件，玉冲牙长仅盈尺，皆为在位者所取。金银之物，即入于役夫。争取珍宝，遗骸多为拉碎，但贮一小函中埋之。东上阁门使夏元象时为兵马都监，亲董是役，为予言之甚详。至今天山仓侧昏后独行者，往往与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近州天山顶上有一座奉国佛寺，寺院中有一座墓，人们传说是尸毗王的墓。尸毗王出自于佛书《大智论》中的记载：说他曾经割身上的肉来喂养饥饿的鹰，直到将肉割尽。今天山天下有条河，叫濯筋河，其所处的县叫肤施县。考查“肤施”的意义，也和尸毗王的传说相符合。根据《汉书》记载：“肤施县是秦代的县名”。那时还没有佛书传入，我疑心是后人牵强附会的伪说。虽然有唐人立的一块碑，但已损坏蚀灭断折无法辨认。庆历年间，施昌言镇守鄜延，把奉国寺改为仓库，挖掘尸毗王的墓，得到炭一千多斤，棺木都朽坏，尸骨尚且完整，其中胫骨有两尺多长，颅骨像斗那么大，还得到了玉环、玉殃70多件，其中玉冲牙有一尺多长，都被当时的官员拿走。墓中金银财物也当即被役夫获取。争取珍宝时，尸毗王的遗骸多被人拉碎，只将遗骸收集放入一个木匣之中埋葬。东上阁门使夏元象当时任兵马都监，亲自监管过这次修造，对我讲述得十分仔细。到现在，黄昏时在天山顶上仓库边一个人独自行走，常会与鬼神相遇，当地人非常害怕。

予于谯毫得一古镜，以手循之，当其中心，则摘然如灼龟之声。人或曰：“此夹镜也。”然夹不可铸，须两重合之。此镜甚薄，略无焊迹，恐非可合也。就使焊之，则其声当铣塞，今扣之，其声冷然纤远。既因抑按而响，刚铜当破，柔铜不能如此澄莹洞彻。历访镜工，皆罔然不测。

我在亳州得到了一面古镜，用手在上面抚摸，在镜面的中心，就发出如同烙龟甲的声音。有人说：“这是个有夹层的镜子。”但是夹镜是铸造不出来的，必须将两面镜重合才行。这个镜子非常薄，没有一点焊的痕迹，恐怕不是焊拢的。即使是焊的，发出的声音也应该是沉闷的，现在敲击它，声音是这样清细悠长。既然压了以后才能响，那么刚铜铸造的就应当破了。柔铜不可能这样清亮光洁。我访问了所有铸镜的工匠，都说不出所以然。

世传湖湘间因震雷有鬼神书“谢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书之。此说甚著。近岁秀州华亭县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书，云：“高洞杨鸦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两字特奇劲，似唐人书体。至今尚在，颇与“谢仙火”事同。所谓“火”者，疑若队伍若干人为“一火”耳。予在汉东时，清明日，雷震死二人于州守园中，胁上各有两字，如墨笔画，扶疏类柏叶，不知何字。

人们传说：湖湘等地，因为打雷，有鬼神把“谢仙火”三个字刻写在木柱上，那字象刻入木中，倒着书写的。这种说法很普遍。近年秀州华亭县也因为打雷有字刻在天王寺的屋柱上，也是倒着书写的，说：“高洞杨鸦 16 人火令章”，总共是 11 个字。其中“令章”两个字写得特别奇异道劲，象唐代人的字体。这些字到现在还在，与“谢仙火”的事很相同。所谓的火，怀疑是队伍中若干人为一火的意义。我在汉东时，清明节那天，在州守的园子里，雷电打死了二个人，他们的胁上各有两个字，象是墨笔书写的，笔画松散像柏叶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字。

元厚之少时，曾梦人告之，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索无兄弟，疑此梦为不然。熙宁中，厚之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学士院：一人韩持国维，一陈和叔绎，一邓文约绾，一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绛，五人名皆从“系”，始悟弟兄之说。

元厚之少年时曾梦见有人告诉他，将来他会当翰林学士，并且是兄弟数人同在翰林院中。元厚之想自己向来没有兄弟，疑心此梦不以为然。熙宁年间，厚之被授以学士，与他相先后同时进入翰林院的学士有：韩维，字持国；陈绎，字和叔；邓绾，字文约；杨绘，字元素。加上元厚之名元绛，五个人的名字中都有“系”字旁，元厚才明白梦中兄弟数人同在翰林院之说。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县民家折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予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国”字中间“或”字仍起挑作尖口，全是颜笔，知其非伪者。其横画即是横理，斜画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

木质中显现文字，大多是柿木。治平初年，杭州南新县百姓家中砍伐柿树，在木头中有“上天大国”四个字，我亲眼看见，字体笔画类似颜真卿，笔力非常道劲，其中“国”字中间的“或”字挑

起为尖口，全部是颜体笔势，知其不是假的。字的横的笔画即是横向的木纹，斜笔即是斜向的纹路。将木直剖开，碰上从“天”字中间分开，但“天”字不破，将上下两画并在一块，“撇”和“捺”都横挺出半指多，正好如同木头中的节疤一样。把分开的两片木头合拢，如同拼合符契一样。

卢中甫家吴中，尝未明而起，墙柱之下，有光熠熠。就视之，似水而动。急以油纸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银，而光艳烂然。以火烛之，则了无一物。又魏国大主家亦尝见此物。李团练评尝与予言，与中甫所见无少异。不知何异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其间一卵烂然通明如玉，荧荧然屋中尽明。置之器中，十余日臭腐几尽，愈明不已。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类。

吴中甫家住吴地，有一次天没亮就起来，发现墙柱之下有一团很明亮的光，走近去看，看见这团光象火一样流动，他急忙用油纸扇将其舀上来，这团光便在扇子上荡漾，类似于水银，而光却更加灿烂。用火照它，则什么都没有了。另外魏国大公主家也曾见过这种东西，团练使李评曾对我说，与卢中甫家所见的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这是什么奇异的东西。我过去在海州，有天晚上煮成鸭蛋，其中有一只蛋光亮通明，象玉一样晶莹，屋中都被照亮。将它放在容器中，十多天都快烂尽了，却越来越明亮。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蛋，也是如此。物有相似的，肯定是同一类。

予在中书检正时，阅雷州奏犊，有人为乡民诅死，问其状，乡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顷，脍炙之类，悉复为完肉，又咒之，则熟肉复为生肉，又咒之，则生肉能动，复使之能活，牛者复为牛，羊者复为羊，但小耳，更咒之，则渐大；既而复咒之，则还为熟食，人有食其肉，觉腹中淫淫而动，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则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狱具案上，观其咒语，但曰：“东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两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无他术。

我在中书房任检正官时，读过一份雷州的奏折，上面提到有人被乡民诅咒而死的事，询问其情状，原来当地乡民能用熟食品来诅咒，诅咒之时，切碎的熟肉一会儿就全复原为完整的肉块，再念咒，熟肉就会变为生肉；又念咒，生肉就能动，又使它活过来，牛肉变为活牛，羊肩变为活羊，只是小些罢了。若再念咒，就慢慢变大，然后继续念咒，则又变为熟食，如果有人吃了这种肉，会感觉腹中蠕动，必须用金银绸帛以求解法，如果不送金银绸帛等礼物，那么就会腹部开裂而死，所吃的牛羊，以裂口处溢出。后来，把那念咒的人缉拿归案，看他的咒语，只有“东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一句话而已，其他则只是说自己的欲望，再没有其他方术。

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上有篆文“刘主”字，世传“淮南王药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谓之“印子金”是也。然止干一印，重者不过半两而已，鲜有大者，予尝于寿春渔人处得一饼，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传者以谓泥之所化，手痕正如握泥之迹。襄、随之间，故春陵、白水地，发土多得金麟趾裹蹄。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裹蹄作团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赵飞燕外传》：“帝窥赵昭仪浴，多衷金饼以赐侍儿私婢。”殆此类也。一枚重四两余，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艳，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于铅，虽大块亦可刀切，其中皆虚软。以石磨之，则霏霏成屑。小说谓麟趾裹蹄乃娄敬所为药金，方家谓之“娄金”，和药最良。《汉书》注亦云：“异于他金”。予在汉东一

岁，凡数家得之。有一窖数十饼者，予亦买得一饼。

寿州八公山旁边的土中以及溪水山涧之中，常常可以获得一些刻有篆文“刘主”的小金饼，人们传说是“淮南王药金”。得到的人非常多，人们称它为“印子金”。但这些金饼往往只有一个印，重量不超过半两，很少有大的。我曾经在寿春一位渔民那里得到一块金饼，渔人说得之于淮河，共有七两多重，面上有20多个印，背面有五只手指和手掌的印迹，纹路清楚。传说是湿泥化成的，手印正象捏泥留下的痕迹。在襄阳、随州的春陵、白水地区，挖土时常得到金麟趾和马蹄金。麟趾中间是空的，四边都有文字，刻功非常精致。马蹄金就象团饼，四边看不见用模子浇铸的痕迹，似乎是在平物上滴成的，形状就如同干柿子，当地人称它为“柿子金”。《赵飞燕外传》中记载：“皇上每次窥视赵昭仪沐浴，总是带很多金饼藏在袖子里赐与赵昭仪的宫女”。大概就是这类金饼。马蹄金一枚重四两多，四两就是古代的一斤。颜色为紫色，不是其他金子可以比的。用刀来切它，比铅还柔软，虽然是大块也能用刀切，它的中间很松软。若用石头来磨，就会纷纷变为金属。据小说中记载：“麟趾和马蹄金是娄敬炼制的药金。”从事炼金、炼丹的人称它为“娄金”，掺入药中最好。《汉书注》中也说：“与其他金子不同”。我在汉东一年，共有几家人得到这种金子。曾经有一窖中挖出几十块的，我也得到一块。

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予少时见小儿辈等闲则召之以为嬉笑。亲戚间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两见有此，自后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然皆非世间篆隶。其名有“藻笈篆”、“茁金篆”十余名，纶与先君有旧，予与其子弟游，亲见其笔迹。其家亦时见其形，但自腰以上见之，乃好女子，其下常为云气所拥。善鼓箏，音调凄婉，听者忘倦。尝谓其女曰：“能乘云与我游乎？”女子许之，乃自其庭中涌白云如蒸，女子践之，云不能载。神曰：“汝履下有秽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袜而登，如履络絮，冉冉至屋复下。曰：“汝未可往，更期异日。”后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无祸福。为之记传者甚详。此予目见者，粗志于此。近岁迎紫姑仙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予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然其灵异显著，无如王纶家者。

按旧时习俗，正月十五晚上迎厕神，称为紫姑。也不一定是正月，平常时候也可以召迎紫姑。我少年时见小孩子们以召迎紫姑为游戏。亲戚中曾有召来了而不肯离去的，见到过两次，从此以后就不敢召迎紫姑了。景祐年间，太常博士王纶家中因召迎紫姑，有神将女儿降下来，自称是上帝后宫中的侍女，能写文章，言词清丽，今天被称为《女仙集》刊行于世。她的书法有多种体势，笔力很遒劲，但都不是普通的篆体、隶书，她的书法有“藻笈篆”、“茁金篆”等十多种名称。王纶与我的先父有老交情，我与王家子弟游玩，曾亲眼见过那神女的笔迹。王家也时常见到她的形态，从腰以上看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但腰部以下却常被云气所环绕，她善于弹奏鼓箏，乐调凄恻哀婉，听的人常忘记了疲倦。曾有人问她说：“能乘云同我游玩吗？”她答应了，就从庭院中涌出许多白云，神女踏上去，白云却载不动她。神说：“你的鞋下有秽土，可以去掉鞋子登上。”神女就穿着袜子登上白云，如同踏在棉絮上，缓缓升到屋顶又落下。说：“你不能去，等待以后再去。”后来神女出嫁，天神就不来。他们家也没有降什么祸福。替她写传记的人记叙很详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粗略记载在这里。近年，召迎紫姑仙的人很多，紫姑大多能写文章诗歌，有写得非常好的，我多次见过。她们大多自称是“蓬莱谪仙”，治病占卜没有不能的，棋艺能与国手相匹敌。但她们显示的灵异不如王纶家的神女显著。

世有奇疾者。吕缙叔以知制诰知颖州，忽得疾，但缩小，临终仅如小儿。古人不曾有此疾，终无人识。有松滋令姜愚无他疾，忽不识字，数年方稍稍复旧。又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江南逆旅中一者妇，啖物不知饱，徐德占过逆旅，老妇诉以饥，其子耻之，对德占以蒸饼啖之，尽一竹箒，约百饼，犹称饥不已；日食饭一石米，随即痢之，饥复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绳，予友人也，亦得饥疾，每饥立须啖物，稍迟则顿仆闷绝，怀中常置饼饵，虽对贵官，遇饥亦便齧啖。绳有美行，博学有文，为时闻人，终以此不幸。无人识其疾，每为之哀伤。

世上有得奇怪疾病的人。吕缙叔以知制诰的官衔担任颖州知州，忽然得病，只是身体缩小，到临死时缩小得象一个小孩。古人不曾有过这种疾病，所以始终没有人懂得这是什么病。有一个松滋县令叫姜愚的，没有其他的病，忽然不认识字，几年后才稍微有些复原。又有一个人家的小老婆，看见笔直的东西都是弯曲的，把弓的弦和界尺这一类直的东西都看成象弯钩，行医的僧人奉真亲眼看见，江南的一个旅馆中有一老妇人，吃东西不知道饱。徐德占经过那个旅舍，那老妇人喊肚子饿，她的儿子很以为羞耻，便当着徐德占的面拿出蒸饼给她吃，吃完了一竹筐约一百个饼，还不停地喊饿。她每天吃一石米，吃完后马上拉肚子，还同没吃以前一样肚子饿。京兆府醴泉县主簿蔡绳是我的朋友，也得了饥饿病，每觉得饿时必须立即吃东西，稍微慢一点就昏倒在地。他怀中常带有饼，即使当着大官的面，碰到饥饿也必须马上吃。蔡绳行为端正，学识丰富而有文采，是当时有名气的人，终于得了这种不幸的病。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人们只能替他悲伤惋惜。

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壁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予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壳，光自壳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修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崔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名其亭为“玩珠”。

嘉祐年间，扬州发现一颗很大的珠蚌，通常在天色阴暗的时候出现。最初出现在天长县的湖泊水泽中，后又转入壁社湖，再后来又转入新开湖中，十多年来，当地居民、行人经常看见这只珠蚌。我的朋友的书斋在湖上，一天晚上忽然在很近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珠蚌，最开始，珠蚌只微微将壳打开，光线从缝中射出象一道金线，过了一会儿，忽然张开，有半张席面那么大，壳中白光如银色，珍珠如拳头大小，光彩夺目不可正视，方圆十多里的树木在珍珠光芒的照耀下皆有影子，如同太阳光所照，只几远处的天空红如野火。珠蚌突然远去，行动象飞一样快，浮游在波浪中，隐隐如日。古时有明月之珠，但这种珠的颜色不同于月色，它荧荧有光焰，几乎接近日光。崔伯易曾经写了《明珠赋》，崔伯易是高邮人，大约经常见到这个珠蚌。近年来，这只珠蚌不再出来，不知往哪去了。原来樊良镇正是珠蚌经常来往的地方，人们路过这里，常常停船几晚等候它出现，把附近的一座亭子取名为“玩珠”亭。

登州巨嶧山下临大海，其山有时震动，山之大石皆颓入海中，如此已五十余年，土人皆以为常，莫知所谓。

登州巨嶧山，下面就是大海。这座山有时候会震动，山上的大石头，都坍塌落入海中。这样已

有 50 多年，当地人都习以为常，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鸡卵，微绀色，莹澈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观，则末底一点凝翠，其上色渐浅；若回转，则翠处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谓之“滴翠珠”。佛书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虽深皆可见，如人仰望虚空月影，疑此近之。

士人宋述家中有一枚珠子，象鸡蛋那么大略呈天青色，表面清澈晶莹如水，手拿起它对着天空看，它的底部凝聚了一个翠绿的 247·247·点，往上色彩慢慢变浅，如果把珠子倒转过来，那么这个碧绿的凝聚点通常在下面。不知这个珠子是什么东西，有人称它为“滴翠珠”。佛书上讲：西域有“琉璃珠”，将它丢进水中，水虽深也能看见珠子。如同人抬头看天空的月影一般。我疑心这颗珠可能与琉璃珠相近似。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蚊虻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言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士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登州海面上有时有云气，形状象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之类的东西，一一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叫“海市”。有人说：“这是蚊虻吐气所造成的。”我疑心不是这样。欧阳修曾出使到黄河以北一带地区，路过高唐县，住在旅舍中，晚上听见有鬼神从空中经过，有车马人畜的声音，一一可以分辨出来，他说得非常详细，这里不再具体叙述。我访问过当地的老人，说：“20年前曾白天经过高唐县，也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人和物。”当地人也叫“海市”，与在登州见到的情形大致相似。

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荀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适有中人过，亦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芦根、鱼、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

近年，延州永宁关黄河岸崩塌，裂缝有几十尺深，土下面发现了一片竹笋林，总共有好几百根，竹笋的根和干连在一块，全变为石头了。当时正好有宦官经过这里，也拿走了几根竹茎，说要献给皇帝。延州从来没有过“竹子”，这些竹子深入地下几十尺深，不知是什么时代的東西。是不是在很古很古以前，这里地势低洼气候湿润而适合生长“竹子”呢？婺州的金华山有松石，还有核桃、芦根、鱼、螃蟹等等，都有变成石头的。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当地就有的东西，没有什么奇怪。而竹笋在这样深的地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本地也没有生这些东西，这才真是奇怪呢。

治平中，泽州人家穿井，土中见一物，蜿蜒如龙蛇状，畏之不敢触。久之，见其不动，试扑之，乃石也。村民无知，遂碎之。时程伯纯为晋城令，求得一段，鳞甲皆如生物。盖蛇虺所化，如石蟹之类。

治平年间，泽州有家人家打井，在土里看到一样东西，形状象龙蛇那样弯弯曲曲。人们害怕，不敢触摸。过了很久，看见它不动，就试着拍打了它一下，原来是石头。村里的人无知，将它打碎了。

当时程伯纯在晋城当县官，拿到一段，上面的鳞甲都象活的一样，大概是蛇虺之类的生物变化而成的。就象我们看到的已经变成石头的螃蟹一样。

随州医蔡士宁尝宝一息石，云：“数十年前，得于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极光莹如映。人搜和药剂。有缠纽之纹，重如金锡。其上有两三窍，以细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热者，服麻子许即定。其斤两岁息，士宁不能名，乃以归予。或云：“昔人所炼丹药也。”形色既异，又能滋息，必非凡物，当求识者辨之。

随州医生蔡士宁曾珍藏了一块息石，说这是他几十年前，从一道士那儿得到的。这块息石呈紫色的光泽，如同辰州的丹砂。很有光泽，能映照出人的身影，也能入药。石上有缠纽的纹路，和金锡一般重的质地。石上有两三个小孔，用细蔑剔小孔，小孔中就有象丹砂一样的红色小粉。心有狂热病的人，只要服食麻子大小一点的粉末就可以了。它的重量逐年增加，蔡士宁说不出这石的名字，就把它送给了我。有人说：“这是过去的人炼的丹药。”这石头的形和色都不一样，又能增长，一定不是平常的东西，应当寻求能懂的人来辨认。

随州大洪山人李遥杀人亡命，逾年至秭归，因出市见鬻柱杖者，等闲以数十钱买之。是时秭归适又有邑民为人所杀，求贼甚急。民之子见遥所操杖，识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执遥验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备至。遥实买杖，而鬻者已不见，卒未有以自明者。有司诘其行止来历，势不可隐，乃递随州，大洪杀人之罪遂败，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万而遥适值之，因缘及其隐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随州大洪山人李遥杀人逃亡在外，过一年多后到秭归，看到市面上有卖柱杖的，随意花几十文钱买了一根。这时，秭归正好又有一个乡民被杀了，官府正到处捉拿罪犯。被杀的人的儿子看见李遥拿的手杖，认识它，说：“这是我父亲的手杖。”于是告诉官府，将李遥抓获，把他所拿的手杖仔细验证，果然是被杀害人的手杖。于是动用所有刑法审讯。李遥的确是买的手杖，但卖的人早已离去了，终于无法证明手杖的来由，而官府又询问他的行踪来历。这时他过去的行迹实在无法隐瞒了，于是秭归府将李遥押送随州府，大洪山杀人案得以败露，最终不知道卖柱杖的人是谁，街上的人何止千万，而李遥正巧买了那根手杖，从而使他杀人的隐情泄露，这也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其的。诏：“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异兽。”最为慎重有体，今以子观之，殆“天禄”也。按《汉书》：“灵帝中平三年，铸天禄、虾于平（津）门外。”注云：“天禄，兽名。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予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鳞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详其形，甚类交趾所献异兽，知其必“天禄”也。

至和年间，交趾国进献的贡品中有一头麟，如同牛但更大，全身长满了鳞甲，头上有一只角。考证记载的材料，不像是麟，当时有人认为是山犀。但犀没有鳞，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诏书中说：

“想要称它为麟，又担心是夷人的欺哄；若不称它为麟，那么又没有确切的名称，只将它称为异兽。”这样称呼既慎重又得体，现在照我看来，这异兽和“天禄”差不多。根据《汉书》记载：“灵帝中平三年，在平门外铸造了天禄，虾”。注释说：“天禄”，是一种兽的名称。现在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边立着两只石兽，它们胳膊上一只刻有“天禄”，一只刻有“辟邪”的字样。元丰年间，我路过邓州，听说这个石兽还在，派人用墨将刻的“天禄”、“辟邪”的字拓印下来观看，这些字象篆体又象隶书，其兽有角有鬃，鳞甲大如手掌。南丰人曾阜任南阳令时，在宗资碑背面题有：“二兽胳膊所刻的字独在，制作精致工巧，兽有七八尺高，从头到尾都有鳞甲，不知它象什么而取下这一名称。”现在详细考查它的形状，很与交趾国进献的异兽相似，想必它一定是“天禄”。

钱塘有闻人绍者，常宝一剑。以十大钉陷柱中，挥剑一削，十钉皆截，隐如秤衡，而剑锋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关中种谔亦畜一剑，可以屈置盒中，纵之复直。张景阳《七命》论剑曰：“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盖自古有此一类，非常铁能为也。

钱塘有一个叫闻人绍的人，一直珍藏着一把剑。他让人用十枚大钉钉在木桩上，浑剑一削，十枚钉子都断了，而留在柱子上的钉子却如称星一样平整，而剑刃上没有一丝痕迹。用力将剑弯曲象钩时，一放手则铿然有声，又恢复到原来一般直。关中种谔也藏有一把剑，可以弯曲着放置在盒子里，取出来放开又恢复到原来一般直。张景阳在《七命》中论剑说：“如果剑象灵宝那样，那么伸展、弯曲就不受限制了。”大约从古以来就有这种剑，它们不是平常的铁制造的。

嘉祐中，伯兄为卫尉丞，吴僧持一宝鉴来云：“斋戒照之，当见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鉴。鉴不甚明，髣髴见如人衣绯衣而坐。是时伯兄为京寺丞，衣绿，无缘遽有绯衣。不数月，英宗即位，覃恩赐绯，后数年，僧至京师，蔡景繁时为御史，尝照之，见已着貂蝉，甚自喜。不数日，摄官奉祀，遂假蝉冕。景繁终于承议郎，乃知鉴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嘉祐年间，我的伯兄担任卫尉寺丞，吴地僧人拿来一枚宝镜说：“斋戒以后照它，当会见到前途吉凶。”伯兄遵照他的话，就用水把宝镜浸湿，镜面不怎么明亮，仿佛见到象有人穿红色的衣裳坐着。这时伯兄为京都寺臣，穿的是绿衣，没有来由突然换上红色衣裳。没有过几个月，英宗登帝位，施恩赐与他红色衣服。几年之后，僧人到京城，蔡景繁当时任御史，曾照镜子，见到自己已经戴上了貂蝉冠，心里很是高兴。没有几天，代理官职参加祭祀典礼，于是借貂蝉冠戴上。蔡景繁最后做到承议郎，就知道镜子占卜的东西，仅仅知晓近事罢了。

三司使宅本印经院，熙宁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师政经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后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谪去；而曾子宣继之，子宣亦谪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予为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继为之，而奉世又谪。皆不缘三司职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计，而三司官废，宅毁为官寺，厚卿亦不终任。

三司使的宅院本是印经院，熙宁年间，又新建了一座三司宅，由薛师政着手重建。宅院落成时，值日官周琮说：“这个宅院前面靠河，后面直接对着太庙，不利于居住的人。”起初，元厚之从拜为三司使时住进去，进去不久，厚之便遭到贬谪而离去；继任的是曾子宣，也被贬谪；章子厚住进去，又被贬谪；而我作三司使，也是带罪离开；后李奉世继任我职，也被贬谪，上述众人谪贬都不因为三司职事，全因为其他原因遭到谪贬。李奉世丢官，安厚卿主持计司，正逢三司官被撤销，三司宅被毁

而改为宫寺，安厚卿也没有任满期。

《岭表异物志》记鳄鱼甚详。予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大体其形如鼉，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尾有三钩，极锐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鼉、鼉，其为鳄者不过一二。土人说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鱼尾而食之，则为所毙。

《岭表异物志》对鳄鱼记载得非常详细。我年少时到过福建，当时正值王举直做潮州的知州，钓得一头鳄鱼，它的身体象小船一样大。王举直把它画成图画，并亲自在图画下面作了说明。鳄鱼外形大体上象鼉，它的嘴和身子一样长，牙齿像锯齿，身上有黄和青二种颜色，也有间杂白色的。尾巴上有三个钩，极其锋利，碰到鹿、猪等动物就用尾巴击杀他们来吃。产卵非常多，孵化后有的变成鱼，有的变为鼉与鼉，成为鳄鱼的不过一二成罢了。当地人将钩装在大猪身上，然后用竹筏载着猪在水中漂流，鳄鱼尾随而上把猪吞食，就被铁钩弄死。

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视人辄泪下。界至郡中，数日方死。有父老云：“青年曾见之，谓之‘海蛮师’。”然书传小说来尝载。（疑此物即“虎头鲨”也，能变虎。）

在嘉祐年间，海州的渔民捕获了一只动物，身子象鱼，头却象老虎，身上也有象老虎的花纹；有两短足在肩部；指头和爪都象老虎；身长八九尺。它见到人就流泪。将它抬到海州城里，几天后才死。有的老人说：“过去曾经看尿过这种动物，称为‘海蛮师’。”但史书、传记和小说都从未记载过。

邕州交寇之后，城垒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辄自动摇，昼夜不息，如此逾月。时新经兵乱，人情甚惧，有司不敢隐，具以上闻，遂有诏令置道场禳谢，动亦不已。时刘初知邕州，恶其惑众，乃界像投江中，至今亦无他异。

邕州经历了交趾贼人侵犯之后，城墙刚修整好，有定水精舍的泥佛像就自动摇晃，白天黑夜不停息，象这样超过了一个月。当时刚经过兵乱，人心都很惊恐，官府不敢隐瞒，把实情都告知皇上，于是有诏书不令安置道场祈祷灭灾，仍旧动摇不止。当时刘初任邕州知府，讨厌它迷惑民众，就抬起佛像扔到江中，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其他异样。

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张文孝左丞始以数千缗买洛大第，价已定，又求“掘钱”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余缗方售，人皆以为妄费。及营建庐舍，上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篆字三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发匣，得黄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置第之直，掘钱亦在其数，不差一钱。观其款识文画，皆非近古所有，数已前定，则虽欲无妄费，安可得也。

洛中地下埋藏许多宝物，凡是在当地购置住宅大院，在没有挖掘地基之前，照惯例要出“掘钱”。左丞张文孝开始用千串钱买洛中一座大宅第，价钱已谈定，而卖主又索要很大数额的“掘钱”，文孝一定想得到这宅第，将“掘钱”涨到千串时卖主才售与他，人人都认为这样破费不值得。到张文孝建

造房屋时，在土中挖出一个石匣，不很大，但雕刻精致，都为花鸟异形图案，顶上写有篆字 30 多个，笔法古怪，没有人能读懂。打开匣子，得到数百两黄金，卖后所得的钱正好与购置这所宅第的钱相等，“掘钱”也在其中，钱不差一分一毫。看匣子上款识文字，都不是近古所有。一切都是前世的定数，虽然不想枉费钱财，又怎么能行呢！

熙宁九年，恩州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俄顷，旋风卷入云霄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卷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

熙宁九年，恩州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方向卷来，看去好象一支插入天空的羊角，所到之处大树全都被连根拔起。顷刻间，旋风卷入云霄，而后渐渐地接近地面，经过县城，官家和百姓的房屋一扫而空，全都卷入云中。县官的儿女和奴婢被风卷去又从空中摔下落地，死伤好多人。民间死伤丢失的人不计其数。县城完全变成一堆废墟，于是把县城移到现在的地方。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言：“天圣中，青州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此事五代时已尝有之，予亦自两见如此。庆历中，京师集禧观渠中冰纹皆成花果林木。元丰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技，正如画家所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药者，细花如海棠、萱草辈者，皆有枝叶，无毫发不具，气象生动，虽巧笔不能为之，以纸拓之，无异石刻。

宋次道的《春明退朝录》中说：“天圣年间，青州严冬出现很大的霜，屋上的瓦都呈百花的形状。”这样的事在五代时就已经有过，我也曾亲眼见过两次。庆历年间，京师集禧观渠沟中的冰的花纹都结成果树木的形状。元丰末年，我到秀州，看见别人家的屋瓦上也结成冰花，每片瓦上一技，如同画家笔下的折枝，有的大如牡丹花、芍药花，细的如海棠、萱草之类，都有枝干、树叶，与真的丝毫不差，气象生动，虽然能工巧笔也不能画得这样生动逼真，用纸将它拓印下来，与石刻没有差异。

熙宁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鸡卵，小者如莲芡，悉如人头，耳目口鼻皆具，无异镌刻。次年，王师平河州，著戎授首者甚众，岂克胜之符预告邪？

熙宁年间，河州下冰雹，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有莲芡般小，形状全象人头，耳、目、口、鼻都具备，与雕刻的一样。第二年，朝廷大军平定河州，歼灭了许多善夷人，那场冰雹岂不是后来朝廷军队克敌致胜的预兆吗？

卷二十二 谬误

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竹为竹，箭为箭，盖二物也。今采箭以为矢，而通谓矢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于用木为筈，而谓之箭，则谬矣。

东南美好的东西，有会稽的竹箭。实际上竹子是竹子，箭是箭，是二样东西。现在选择剑作为矢，而把矢通称为箭，这是因为制作的材料而得名。至于把用木材制作的“筈”也称做箭，那是错误的。

丁晋公之逐，士大夫远嫌，莫敢与之通声问。一日，忽有一书与执政，执政得之不敢发，立具上闻。洎发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词颇哀切，其间两句曰：“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还之命。谓多智变，以流人无因达章奏，遂托为执政书，度以上闻，因蒙宽宥。

丁晋公受到贬逐之后，士大夫们都远离他避嫌，没有谁敢与他通音信。有一天，他突然有一封信交给执政官，执政官接到信后不敢打开，马上将信上报。皇上将信打开，原来是一封上奏的表，奏表情义深厚，言词很哀切，其中有二句说：“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于是就有北还的诏命。丁谓多有智谋变诈，因为遭流放的人不能向朝廷上奏章，就假托给执政官书信，估计他会上奏朝廷，因此得到宽免罪过。

尝有人自负才名，后为进士状首，扬历贵近，曾谪官知海州，有笔工善画水，召使画便厅掩障，自为之记，自书于壁间。后人以其时名，至今严护之。其间叙画水之因，曰：“设于厅事，以代反站。”人莫不怪之。予窃意其心，以谓“邦君屏塞门，管氏亦屏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其文相属，故谬以“屏”为“反站”耳。

曾有人以才名自负，后得进士第一，名声传扬于达官贵人之间。会谪官知任海州，有一位画工擅长于画水，叫画工画客厅屏障，并自己为之作记，亲自写在壁上。后来的人因为他当时的名气，到现在仍保护得很好。记中叙述画水的原由说：“设于厅事，以代反站。”没有人不感到奇怪。我私下猜测他的心意，是认为“邦君屏塞门，管氏亦屏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这些文字前后相属，所以错把“屏”当作“反站”了。

段成式《西阳杂俎》记事多诞，其间叙草木异物，尤多缪妄，率记异国所出，欲无根抵。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沈香，花鸡舌，叶藿，胶薰陆。”此尤谬。旃檀与沈香两木元异；鸡舌即今丁香耳，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叶，南方至多；薰陆小木而大叶，海南亦有薰陆，乃其胶也，今谓之“乳头香”。五物迥殊，元非同类。

段成式的《西阳杂俎》记载的事多虚妄的地方。其中叙述那些草木异物的，更多错误、荒诞之说，大多记载外国出产的物品，使人无处寻求根源。比如书中说：“一木五香：它的根是檀香，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叶是藿香，胶是薰陆香。”这种说法特别荒谬。旃檀和沉香，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树木；鸡舌香不过是今天的丁香，现在药品中所用的也不是这种鸡舌香；藿香原是草本，南方极多；薰陆是一种大叶子的小树，海南也有“薰陆”，是指它的树胶，现在称为“乳头香”。这五种东西远远不同，原本就不属于一类。

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晋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不须发尚衣带，自有小私带，且可服之以谢，候还京别赐可也。有司具以此闻。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谓近侍曰：“丁谓带与同列大殊，速求一带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带”。遂以赐之。其带熙宁中复归内府。

丁晋公扈从大驾巡幸礼毕，有诏赐与辅佐大臣玉腰带。当时的宰辅大臣共 8 人，但行在库房中只有七条，尚衣局有玉带，称做“比玉”，价值几百万，皇上想把它赐与大臣，以补足八个数目。丁谓心中很想得到“比玉”，但位置在七人之下，自忖肯定轮不到自己，于是告诉官署说不必拿尚衣局的玉带，他自己私人有一根小腰带，估且带上它来行谢礼，等到回京之后另外赏赐也可以。有关官署把实情全上奏。各位大臣都受到赏赐，只有丁谓的腰带仅仅有指头一样宽。皇上看了对近侍官说：“丁谓腰带与同列官员差异太大，快去取一条来与他换了。”官府回奏：“只有尚衣局的御带。”于是把玉带赐与丁谓，这条腰带在熙宁年间又归还到了内库。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诵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诵之，其实不见也，同列害之，密以他书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诵与奏目不同，归乃觉之，遂乞致仕。

黄宗旦晚年得眼病，每次上朝奏对，他先把奏折的内容背诵记在心中，到皇上面前，展开奏折，看着奏折读出来，其实并不看见折奏上的字。同僚中有人害他，偷偷地把其他的书奏换上了他的奏折，宗旦不知道，到皇上面前，他口中所讲的内容与奏折写的内容不同，待回家后才发觉，于是便请求辞官退休。

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竟往问之。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为术精而言直，后举倍获。有因此著名，终身享利者。

京城算卦的人，赚钱最多的是在应考举人来卜问能否考中的时候，赚钱的手段各有不同：那些贪图眼前生意的卖卜者，凡是有人来问卜，都说“一定能考中”。考生都希望能考中，争着来问卜。那些希望日后生意兴隆的卖卜者，凡是有人来问卜，都说“考不中”。没有考中的通常是不超过十分之七，都认为卖卜者算得准确而且说话直率，下次举场开考时卖卜者的收入就成倍增加。有的算卦的人因此名声远扬，终身受利。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贼，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抨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小人为奸，固难防也。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包拯主持开封府时，以明察秋毫著称。一次，有一人犯法应当罚以“杖脊”的刑法，有一个小

吏接受了这人的贿赂，对他说：“今天见官后，府尹必定把你交给我责问，到那时你便大声呼喊为自己辩解。我和你共同分担这个罪，你被判罚杖背，我也被杖背。”不久，包拯把囚犯问讯完毕，果然交与小吏责问情状，囚犯依照小吏事先所嘱咐的，大声分辩不已。小吏大声责骂说：“拉下去杖脊，何用多言！”包公认为他滥施权势，将小吏拉到庭上，杖刑 70，特地宽宥囚犯的罪过，只行杖刑，以此来遏止官吏的权势。包拯此举不知正好达到了那官吏料想的目的。小人狼狽为奸，实在难以防备。包拯性格素来刚直严厉，未曾露过笑脸，人们说：“包希仁的笑比黄河水清还难得。”

李溥为江淮发运使，每岁奏计，则以大船载东南美货，结纳当途，莫知纪极。章献太后垂帘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唯建州饼茶，而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羨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自国门挽船而入，称“进奉茶纲”，有司不敢问。所贡余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贿败，窜谪海州。然自此遂为发运司岁例，每发运使入奏，舳舻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求得其籍，言两浙笺纸三暖船，他物称是。

李溥任江淮发运使，每年向皇帝报帐和上缴财物时，就用大船运载无数的东南珍品美物，送给朝廷中当权的大官，以此勾结讨好。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李溥向朝廷奏对时，极力称赞浙江的茶叶好说：“从来献给皇上的，只有福建饼茶，而浙江的茶叶从未进贡过，本官署用赋税盈余的钱买了几千斤茶叶，请求献进宫内。”于是，李溥就让人从京城水城拉船而入，说是“进奉茶纲”，有关官吏也不敢过问、贡奉余下的货物，全落到私人手中。李溥晚年因贪污行贿败露，贬官流放到海州。然而从此以后李溥的所谓“进奉”便成为发运司每年的惯例。每当发运使入朝进奏，载物的船队首尾相连，把河面都遮盖住了。从泗州引船七天到达京城。我出使淮南时，看见有装得满满的船只进入汴河，去查看他们的货物登记册，说是两浙所产的精美纸张三暖船，其他货物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崔融为《瓦松赋》云：“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段成式难之曰：“崔公博学，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引梁简文诗“依檐映昔邪。”成式以昔邪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叶”，何成式亦自不识？

崔融曾经作《瓦松赋》说：“说它是木，询问山民但没有得到准确回答；说它是草，对证神农氏所著的书中又很少有记载。”段成式曾责难崔融说：“崔公博学，没有什么不知道的，难道不知道瓦松已有文章论说？”引用梁简文诗句“依檐映昔邪”以论证。成式把“昔邪”当作瓦松，那知道“昔邪”却是“垣衣”，瓦松原本叫“昨叶”，何以段成式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植物？

江南陈彭年博学书史，于礼文尤所详练。归朝，列于侍从，朝廷郊庙礼仪，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颇为详洽。尝摄太常卿，道驾，误行黄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顾曰：“自有典故。”礼曹素畏其该洽，不复敢诸问。

江南陈彭年博学经书史籍，对于礼典文献特别精通熟悉。南唐灭亡后归顺宋朝，任侍从官，当时朝廷的效庙祭把的礼仪，大多委派陈彭年来定夺，他引经据典，非常详细广博。他曾经代理太常卿的职位，有次他为皇上大驾开道，误行到黄道上，主管官员阻止他，彭年作古正经回看说：“这种做法是有典故出处的。”礼仪官素来畏惧彭年礼仪知识的渊博，不再敢多加责问。

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壳，故以为器，致如白

玉，生南海。《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康成乃解之曰：“渠，车罔也。”盖康成不识车渠，谬解之耳。

海中有种东西叫“车渠”，属贝类。大的象簸箕那么大，背上有隆起的部分象蚶壳一样。用它做成器具，象白玉一样精致。车渠生于南海，《尚书大传》中记载：“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大臣散宜生将所得的象车渠的大贝，拿去献给殷纣王。”郑康成解释说：“渠，是车轮。”大概郑康成不认得车渠，作了荒谬的解释。

李献臣好为雅言，曾知郑州，时孙次公为陕漕，罢赴阙，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献臣故吏，到郑庭参，献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饭，乃问之曰：“餐来未？”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这对曰：“离长安日，都运待制已治装。”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惭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日，曾吃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献臣掩口曰：“官人误也。问曾与未曾餐饭，欲奉留一食耳。”

李献臣喜好说雅致的话，曾在郑州做官，当时孙长卿为陕州漕臣，罢职回京，先派一人入京，所派的人正是李献臣的旧部，过郑州时参见了李献臣，李献臣非常高兴，准备叫左右备饭，就问使臣说：“餐来未？”使臣错把“餐”听作是孙次公，于是回答说：“我离开长安那天，都转运使，待制大人已整理行装。”李献臣忙说：“不是问孙待，官人餐来未？”使臣惭愧沮丧他说：“不敢隐瞒，作三司军将时，曾吃了13杖。”大约当时口语称受杖刑为“餐”。李进献掩口而笑说：“官人听错了，我问的是你是否进餐，我想留你一同进餐！”

卷二十三 讥谑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倡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只乞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吏人也。”杖而遣之。

石曼卿任集贤校理时，微服来到妓馆，被不法之徒困扰。石曼卿喝醉了酒，与不法之徒发生争执，被巡街士兵抓获。石曼卿怪异不羁，对主审人说：“只求在这里作出判决，想在明天早晨回到馆内供职。”主审官不懂他开的玩笑，说：“这人必定是三馆中的吏员”，施以杖刑后将石曼卿打发走。

司马相如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滹沱、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漾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东注震泽？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丈；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燂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司马相如叙述上林的各条河流时说：“丹水紫渊、灞水、滹、沱、渭水，八条河流的流向不同。方向相反形态各异，浩荡无涯，向东流入太湖。”唐代李善注释说：“太湖，就是所谓震泽。”按，八条河都注入大河，怎么会东进入震泽？另外白居易《长恨歌》中说：“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在嘉州，与唐玄宗幸蜀的道路毫无关系。杜甫在《赋侯庙柏》诗中说：“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的直径是七尺，这岂不是太细长了吗？防风氏身宽九亩，高三丈；按周代制度，一亩宽六尺，九亩就是五丈四尺，这样看来，防风氏的身体竟是一块饼一样的东西。这也是文章的弊病。

库藏中物，物数足而名差互者，帐籍中谓之“色缴”。尝有一从官知审官西院，引见一武人，于格合迁官，其人自陈年六十，无材力，乞致仕，叙致谦厚，甚有可观。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殴数人。此辕门也，方六十岁，岂得遽自引退？”京师人谓之“色缴”。

官府库房里收藏的东西，数目足够而名称相互交错的，在帐簿里叫做“色缴”。曾经有一个皇帝的侍从官主持审官西院，引见一位武士，按照规格应该升迁，那人陈述说自己已有60岁了，没有材力，请求辞职，述说得谦和温厚，很有可观之处。主审的官员摆手说：“我已72岁了，还能与几个人搏打，这是军队中，你刚60岁，怎么能就辞职引退？”京城的人称为“色缴。”

旧日官为中允者极少，唯老于幕官者，累资方至，故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岁州县官进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热中允”。又集贤殿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近岁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从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热撰”。时人谓“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过去做官做到中允的很少，仅有长期供事的幕僚，资历积累到一定时候才能做到，因此做中允的大多是失意不得志的人。近年来州县的官员受到升迁的多被授予中允官职，便有“冷中允”、“热中允”的说法。另外有集贤殿修撰这一职位，过去大多让长期在馆阁中供职的人担任，近年来有从一

般官员中超越资历委以要职的情形，没有做到待从宫的人，大多授以修撰官职，也有“冷撰”、“热撰”之说，当时人们说：“热中允比不上冷修撰。”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操觚循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

梅询担任翰林学士，一天草拟诏书特别多，他专心思考很是辛苦，拿着纸笔沿着台阶走。突然看见一年老的士兵躺在那里晒太阳，伸展着身子非常舒适，梅询叹息说：“舒服啊。”他慢慢地问老兵说：“你认识字吗？”老兵回答：“不认识字。”梅询说：“这就更快活了。”

有一南方禅僧到京师，衣间绯袈裟，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以为妖服，执归有司，尹正见之，亦迟疑未能断，良久，喝出禅僧，以袈裟送报慈寺泥逸叶披之。人以为此僧未有见处，却是知府具一只眼。

有一个南方的僧人到京师，穿着杂有红色的袈裟，主事僧向来不知南宗禅林的体式，以为是妖服，抓住那僧人送到官府中。长官见了之后，也迟疑不能作出断决，过了很久，把那禅僧吐喝出去，把他的袈裟送到报慈寺的泥塑迹叶披上。人们认为那个主事僧没有见识，知府大人倒是独具慧眼。

士人应敌文章，多用他人议论，而非心得。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会，用则不错。”

士人作应对文章，往往用别人的议论，而不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当时人们针对这种情形说：“问起来实际问题全不懂，用起来只会教条地生搬硬套。”

张唐卿景祐元年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题壁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其下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终于京官。盖姚晔大中祥符元年、梁固二年皆状元，而终于京官。

张唐卿景祐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约定日期在兴国寺宴会，他题诗于墙壁上：“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写了后两句：“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到朝官未可知。”后来张唐卿果然做到京官为止。原来姚晔在大中祥符元年，梁固在大中祥符二年都中了状元，都做到京官为止。

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独轮小车，马鞍蒙之以乘，谓之“木马”。挽车者皆衣韦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予尝按察河朔，见挽床者相属，问其所用，曰：“此运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闻者莫不掩口。

信安，地处沧州和景县之间，有许多蚊虻。夏天牛和马身上都用泥巴涂上。不这样牛马大多会被蚊虻叮死。人们到郊野不敢骑马，马若被蚊虻的毒液刺激，就会狂奔无法阻止。行人使用独轮小车，用马鞍蒙上而坐，称为“木马”；拖车的人全都穿上皮做的裤子。冬天做成小的坐床，在冰上拉，称做“凌床”。我曾经考察河北，看到拉床的一个接二个，问是谁的东西，说：“这是转运使的凌床，

这是提刑的凌床。”听的人没有不掩口而笑的。

庐山简寂观道士王告好学有文，与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当为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当为都工，讼于星子云：“职位颠倒，称号不便。”星子令封牒与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谚有云；散众夺都工，教门无例。虽紫衣与黄衣稍异，奈本观与别观不同。非为称呼，盖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显，岂所谓‘大道无名’。宜自退藏，无抵刑究！”告后归本贯登科，为健吏，至祠部员外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而卒。

庐山简寂观的道士王告爱好学习有文才，与星子县令相好。县里有位富豪置备祭祀，王告应为监工。监工稍微有点施啥的好处，有一外来的道士自言穿紫衣，应当做监工，到星子县令那里告状说：“职位颠倒，称呼起来不方便。”星子县令把诉状封好交与王告，王告于是判决说：“外来的僧人担任寺庙主持，民间谚语说，散乱的众人争抢主持，教门中还没有先例。虽紫衣和黄衣略有不同，怎奈我们这个观与其他观不一样。争当监工不是为了称呼，而是为了其中的好处；狂妄地自高自大，这难道是所谓‘大道无名，吗！应该自己隐退，不要触犯刑法！”王告后来回到原籍考中进士，成为刚强的官吏，官至祠部员外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而去世。

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

过去的制度：三班奉职官员每月俸禄七百钱，驿站供羊肉半斤，大中祥符年间，有人在驿站的房舍里题诗说：“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听到这首诗后说：“像这样怎么要求他们廉洁呢？”于是把俸禄增加到现在的数目。

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复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曾有一位知名人士，开始担任县尉时，有一应举的人写信向他要米，他戏作了一首诗作答：“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年间，照例增加候选官员的俸禄，不再有五贯九百俸钱的人，这确实是培养廉洁的根本。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讼科场，覆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时方期集于兴国寺，符至，追所赐敕牒靴服，数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独解靴袍还使人，露体戴幞头，复坐语笑，终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职。曼卿为一绝句曰：“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

石曼卿刚考中进士，有人状告科场考试不公，进行覆考，结果有人落选，石曼卿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石曼卿等人正在兴国寺聚会，朝廷的命令传到，追回赐与的敕牒和靴子服装，几个人哭泣着站起来，只有石曼卿脱下靴袍还给使者，裸露着身体戴着头巾，又坐下接着谈笑，席终才离去。第二天，

被废免的人都被授予三班借职。石曼卿作了一首绝句说：“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

蔡景繁为河南军巡判官日，缘事至留司御史台阅案牒，得乾德中回南郊仪仗使司检牒云：“准来文取索本京大驾卤簿，勘会本京卤簿仪仗。先于清泰年中，未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

蔡景繁任河南军巡判官时日，回事到留守司御史台翻阅卷宗，查到乾德年间给南郊仪仗使司回批的公文说：“允许来文索取京城大驾仪仗，检索得京城仪仗，早在后唐末帝清泰年间，未帝带领着逃跑，不知道在那里。”

江南宋齐丘，智谋之士也。自以为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士卒十万，大江当十万，而已当十万。江南初主本徐温养子，及僭号，迁徐氏于海陵。中主继续，用齐丘谋，徐氏无男女少长皆杀之。其后齐丘尝有一小儿病，闭阁谢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乐工且双替，作一诗书纸鸢上，放入齐丘第中，诗曰：“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谋。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东至今有小儿坟数十，皆当时所杀徐氏之族也。

江南的宋齐丘是一位有智谋的人士，自认为江南有精兵 30 万，士兵 10 万，大江抵十万，他自己抵十万。江南初主李昇本是徐温的养子。等到他僭越帝号后，把徐温迁谪到海陵。中主李昇即位后，采纳宋齐丘的谋略，把徐家男女老幼全都杀尽。后来宋齐丘曾有一个孩子病了，闭门谢客，中主设置宴会请他也不出门。有位双目失明的老乐工，写了一首诗在纸做的老鹰风筝上，放进宋齐丘的住宅中，诗说：“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谋。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海陵州衙东边至今有小孩的坟几十座，都是当时所杀的徐氏家族的人。

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尝嬉游。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讪谑，题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有一个过去宰相的远亲在苏州，有次出游。在墙壁上书写道：“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一士人李璋向来爱开玩笑。在题字的旁边写道：“混元皇帝 37 代孙李璋继至。”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骑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骑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扈买饮食以给坐客耳。李乃杖骑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

吴中有一个士人，曾当过转运司别试的第一名，且以此自负，喜欢攀依权贵。当时，侍御史李制任常州知州，丞相庞籍任湖州知州。士人到毗陵游历，带着朋友到娼妓家饮酒，对一位随从说：“你去告诉李二，我在这里喝酒，马上派人带酒菜来。”李二是指李御史。不久，厨子带着酒菜来到，非常丰盛。有一位妇科医生恰好在妓女家，看到了这件事，后来他到李御史家，提到这件事，李御史非

常奇怪，派人捉到那随从，原来是兵马都监借用的，受那士人安排，派人在官署厨中买了酒菜以欺骗客人。李御史就以杖刑处罚随从，罚士人出城。州官中有与士人相好的，出门与他告别说：“仓促离去，当往哪里去？”士人回答说：“且去湖州依靠庞九。”听的人没有不大笑的。

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馆阁每晚有一校官轮流值夜，如果因故不值夜，那么当夜就无人，称为“豁夜”。旧日制度：“豁宿”不能超过四天，到第五天就必须有人值夜。遇到“豁宿”时，照惯例在宿历下面写道：“肚腹不安，免宿。”所以馆阁的宿历，相传称为“害肚历。”

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燂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髻瓮，汤燂右军两只，聊备一饌。”

吴地的人多把梅子称为“曹公”，因为曹操曾经望梅止渴；另补将“鹅”称为“右军”。因为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有一位士人送酸梅和炖鹅给人，写信道：“醋浸曹公一瓮，汤燂右军两只，聊备一饌。”

卷二十四 杂志一

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立；高万兴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予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

延州现在有五座城。说的人认为原有东西二座城，隔河相对。高万兴主持延州时，开始扩展南北东三关城。我因读了杜甫“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的诗句，才知天宝年间延州就已经有五座城了。

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采入击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鄜州、延州一带有石油，过去所说的“高奴县出脂水”就是这种东西。石油出产在水边，在沙石与泉水相杂的地方，慢慢地溢出，当地人用野鸡尾部的羽毛把油沾上来，收集在瓦罐里。这种油看上去挺象淳漆，燃烧起来象麻杆，但冒出来的烟很浓，把帐篷都熏黑了。我猜想这种烟可以利用，就试着扫了一些烟灰来做墨，结果写出来的字又黑又亮。象漆一般，即使松墨也比不上它。于是，就大量制作，并给它定名叫“延州石液”。这种东西以后一定会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是我最初制作使用它。石油非常多，地下的蕴藏无穷无尽，不比松木那样有时会用完。现在齐、鲁一带的松木已经砍光，慢慢地连太行山区、京西、江南一带的松山也大部分砍伐得成为秃山了。造墨的人必定不知道用石油烟的好处。煤的烟也大，将人们的衣服熏黑。我戏作了一首诗说：“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与南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风不冰，盖大卤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风，虽不及“盐南”之厉，然亦甚于他处，不知缘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风穴山中出。”今所谓风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谚云：“汝州风，许州葱。”其来素矣。

解州盐池的南边，秋夏之际多刮大风，被人们称为“盐南风”。其风势极大，可以摧毁房屋，将树木连根拔起，几乎可以动地了。但是这风朝东朝南都不会过中条山，朝西不过席张铺，朝北不过鸣条山，纵横仅在数十里之内。”解盐若没有这种风就不会结晶，大概是大卤的气与风相感应的缘故，人们终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另外汝南也多刮大风，虽然比不上“盐南风”厉害，但比其他地方则厉害，但也不知因为什么这样。有人说：“风出自于城北的风穴山。”今天所谓的风穴山，已经成为平地了，而汝南风依旧，可知并不是有风穴。民间谚语说：“汝州风，许州葱。”由此看来，这种风是由来已久的。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予奉使，尝帐宿其下。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谓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临视之，无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东。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卢龙郡。北人谓“水”为“龙”，卢龙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湖”，南与“达靺”接境。

过去人们的文章中谈及北方少数民族，大多说他们在黑山。黑山位于大漠的北边，现在被称为“姚家族”，在它的西南边有一座城，叫作庆州。我奉命出使北方时，曾搭帐住宿在黑山下。黑山有几十里长，山上土石都呈紫黑色，就如同现在的磁石。山下有一条河水流出，就是所说的黑水。胡人说黑水是上游低下游高，水曾经倒着流。我到水边看了，并不这样，也是平常的流水罢了。黑山位于黑水之东，大约是北方的水多为黑色，因此有“卢龙郡”，北方人把“水”称为“龙”，“卢龙”的意思就是“黑水”。黑水的西边是连山，被称为“夜来山”。山非常高峻，契丹人的墓地都在山的东南麓。靠近西边有远祖射龙庙，位于山上，有龙舌收藏在庙中，它的形状如同一把剑。山的西边就是另外一个民族，他们特别强悍，只吃生肉生血，不吃熟食，胡人将他们称为“山西族”，往北与黑水胡人，往南与达靺部族相接。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龄常言其祖贻永侍中，有女子嫁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医朱严药遂差。貂蝉喜甚，置酒庆之，女子于坐间求为朱严奏官，貂蝉难之曰：“今岁恩例已许门医刘公才，当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径归不可留。貂蝉追谢之，遂召公才，谕以女子之意，辍是岁恩命，以授朱严。制下之日而严死，公才乃嘱王公曰：“朱严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为公才请，及制下，公才之尉氏县，使人召之，公才方饮酒，闻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门助教而死二医。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我的亲家朝散郎王九龄经常谈及他的先祖侍中王贻永，说他有一个女儿嫁给诸司使夏偕，因病生命非常危险，吃了医生朱严的药后就好了。侍中很高兴，置办了酒席庆贺，在酒席上女儿请求父亲为朱严谋个官职，侍中为难地说：“今年的恩例已经许了门医刘公才，只能等到明年。”女儿便哭着起身，径直离去留也留不住。侍中为了补谢朱严，就把刘公才唤来，把女儿的意思告诉他，把今年许他的恩例转让给朱严。朝廷恩命下来的那天，朱严死了。刘公才就对王侍中说：“朱严没有接受恩命就死了，按法规还可以再奏恩例。”侍中答应了他，又为刘公才另请官位，时刘公才去了尉氏县，王侍中派人喊他回来受命，当时刘公才正在喝酒，听说得了官职，高兴极了，就归即暴死。一个小小的四门助教的官职就使二个医生丧了命。一个官职是不可以随便得到的，何况更大的官职呢！

赵韩王治第，麻捣钱一千二百余贯，其他可知。盖屋皆以板为直，上以方砖甃之，然后布瓦，至今完壮。

韩王赵普修建筑宅第，光是用以加在壁中的麻线就用了一千二百多贯钱，其他用费之多可想而知。房顶上都用木板代替竹席作天棚，上面用方形砖砌好，然后铺上瓦，房屋至今完好雄壮。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才寸许，后足几一尺，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尺，止则蹶然仆地，生于契丹庆州之地大漠中。予使虏日，捕得

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麇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

契丹北部有种动物叫跳兔，形状与兔子完全象，但前脚才一寸多长，后脚几乎有一尺长。行进时就用后脚跳，一跃有几尺远，停止时就骤然仆倒在地。跳兔生长在契丹国庆州一带的荒漠中。我出使契丹时，捕获了几只带回来。这种动物大概就是《尔雅》中所说的“麇兔虫”，也叫作“蛩蛩巨驢。”

螻蛄之小而绿色者，北人谓之“螻”，即《诗》所谓“螻首蛾眉”者也。取其顶深且方也。又闽人谓大蝇为“胡螻”，亦螻之类也。

体型小而带绿色的蝉，被北方人称为“螻”，就是《诗经》中所说的“螻首蛾眉”，取其头顶深长而且方。另外，闽地人把大苍蝇称为“胡螻”，也是属螻一类的东西。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北方有种白雁，样子象雁但比雁体积小，白色的羽毛，深秋季节就飞来。每当白雁来到的时候就有霜降，黄河以北一带的居民称它为“霜信”。杜甫的诗句说：“故国霜前白雁来”，指的就是这种雁。

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谓“《史记》所载‘径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

熙宁年间，开始推行“淤田法”。议论的人认为《史记》中记载的“浸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其中所说的“粪”，就是淤田。我出使到宿州，发现一块石碑，原来是唐人开凿六座斗门，截引汴河水对下游的沼泽地进行淤田，人民得到了利益，刻了石碑来赞颂刺史的功绩。可见淤田的方法，大概是由来已久的。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上，此理必然。

我奉命出使河北，沿着太行山往北走，只见山崖之间，往往含有海螺海蚌的化石和鸟蛋一般的石头，象一条带子一样横贯在石壁中。显然这里是过去的海滨，现在这里离东边的大海已有千里远了。这一带的所谓大陆，都是水中泥沙沉积而成的。舜杀鲧的地方在羽山，过去传说在大海中，今天是在平坦的陆地上了。黄河、漳河、滹沱河、拒马河、桑干河等等，都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现在潼关、陕县以西的地方，由于河流的冲刷作用，使地表被切割成深谷，河道低于地面不少于一百多尺，泥沙年年东流，沉积而成大陆，这是必然的道理。

唐李翱为《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孟子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淮、泗固尝入江矣。此乃禹之旧迹也。

熙宁中，曾遣使按图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

唐代李翱作《来南录》中说：“从淮河顺流而下能到达高邮，溯流而上能到达长江。”孟子说：“决汝水、汉水、排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那么淮水、泗水应该注入长江，这就是大禹治水过去的路线。熙宁年间，曾派人按图追寻过，过去的河道依然还在。但现在江、淮的河道已深，其水流再也流不到高邮了。

予中表兄李善胜曾与数年辈炼朱砂为丹，经岁余，因沐砂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朱砂至良药，初生婴儿可服，因火力所变，遂能杀人，以变化相对言之，即能变而为大毒，岂不能变而为大善？既能变而杀人，则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术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谓之无，然亦不可不戒也。

我的表哥李善胜曾经有几个同辈人一同把朱砂炼为丹药。经历一年多，因用水陶洗丹砂，准备再放到炼丹炉中去炼时，无意中丢下了一块。他的徒弟把它搓成药丸吃了下去，就昏迷过去了，过了一晚便死了。朱砂是一种极好的凉药，刚生下的婴儿也可以服食，因火力烧炼，使朱砂起了质变，所以能毒死人。根据变化的规则相对来说，朱砂既然能变成十分有毒的，难道就不能使它变成极其有用的东西吗？既然能变成毒死人的东西，就应该有能救活人的道理。只不过没有得到这种技术罢了。由此可知，所谓成仙升天的药方虽然不能说没有，可是也不能不加小心啊！

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按西域书，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驿，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荡龙湫所在。后因伐木，始见此山。山顶有大池，相传以为雁荡；下有二潭水，以为龙湫。又有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谢灵运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嶮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严，亦此类耳。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则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见。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温州雁荡山，风景特别秀丽，而历来的地图文籍都不曾提到过。祥符年间，因建造玉清宫，到山里采伐木材，方才有人看到了雁荡山，这时雁荡山还没有名称，据佛书记载，罗汉诺矩罗住在中国东南大海边的雁荡山芙蓉峰的龙湫中。唐代僧人贯休著《诺矩罗赞》中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的句子。这座山的南面有芙蓉峰，峰下有芙蓉驿，向前可以俯视大海，但不知道雁荡龙湫在哪里。后来因为采伐木材才看见了这座山。山顶上有一个大水池，相传这就是雁荡，池下有两个水塘，相传就是龙湫。又有经行峡、宴坐峰，都是后人用贯休的诗句命名。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所有永嘉山水，都几乎游历遍了，唯独不提雁荡山，大概当时没有雁荡山这个名字。我观看雁荡山各个山峰，都峻峭挺拔奇险怪异，向上耸立约有千尺，插入天空的山崖和巨大沟谷，都被包围在深谷当中，

不同于其他大山。从岭外看，什么都看不到，到山谷里，才看到高耸的山峰，直冲云霄。推究其中的道理，应当是山谷中大水的冲刷，把沙土都给冲走了，只剩下巨大的岩石巍然屹立在那里。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等，都是水流穿凿而成的洞穴。从谷底仰望，全是悬崖峭壁；从高处去看，这些山峰的高低都差不多，象地面一样平坦，雁荡诸峰的高度甚至比周围山顶所代表的原始地面还低。世上的深沟中被水冲凿过的地方，都有直立的土和带有坑凹的岩石，也与雁荡山的情形相似。现在，成皋、陕西大的沟壑中，直立的黄土往往高达百尺，非常突出地耸立在那里，它们如同是雁荡山的缩影，只是这里是泥土，那里是岩石罢了。雁荡山既然不是挺立在地面上，而是隐蔽在深谷和密林之中，所以古人没有看见它，谢灵运也没有到过这里，这是并不奇怪的。

内诸司舍屋，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

内阁里各个官署的房屋，只有秘阁最宏大壮观。秘阁屋顶高大宽敞，相传被称为“木天”。

嘉祐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船中有三十余人，衣冠如唐人，系红鞞角带，短皂布衫。见人皆恸哭，语言不可晓。试令书字，字亦不可读，行则相缀如雁行。久之，自出一书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毛罗岛首领陪戎副尉制。又有一书，乃是《上高丽表》，亦称毛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船中有诸谷，唯麻子大如莲的。苏人种之，初岁亦如莲的，次年渐小，数年后只如中国麻子。时赞善大夫韩正彦知昆山县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罢，以手捧首而。意若欢感。正彦使人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之为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首而。

嘉祐年间，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只船，船上的桅杆已被折断，风将船吹送到岸边。船中有30多人，衣着打扮象唐人，腰系红色皮革的角带，身穿短黑布衫。看见人他们都大哭，所说的话都听不懂。试着要他们写字，所写的字也无法认读，走路则相互紧跟象大雁阵形。过了很久，才拿出一份文件给大家看，是唐朝天祐年间任命毛罗岛的首领为陪戎副尉的诏书。他们又出示一份文件，是《上高丽表》，也称他们是毛罗岛人，都用汉字，大概是臣属于高丽的东夷人。他们所乘的船中载有各种谷物，只有麻子不同于中国的，有莲子般那么大。苏州人试着种下它们，第一年的果实也如莲子般大，第二年就小些了，几年后便与我国的麻子一般大小了。当时，赞善大夫韩正彦任苏州昆山县知县，召见了他们，以美酒佳肴犒劳这些毛罗岛人，他们吃完后，用手捧着头而笑，意思是表达感激之情。韩正彦派人为他们修理桅杆，船桅修好后，安装在船上却不能转动，于是工匠又为他们制造了一个转轴，并教导他们起倒的方法，他们又高兴欢喜，再次捧着头而笑以示谢意。

熙宁中，珠鞞国使人入贡，乞依本国俗“撒殿”，诏从之。使人以金盘贮珠，跪捧于殿槛之间，以金莲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谓之“撒殿”，乃其国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扫彻，得珠十余两，分赐是日侍殿阁门使副内臣。

熙宁年间，珠鞞国派使者入我朝进贡，请求让他们依照本国风俗“撒殿”，皇上宣诏同意。使者用金盘装满珍珠，跪着捧到大殿的栏槛之间，用金莲花勺将珍珠向御座撒去，这就称为“撒殿”，这是他们国家最为尊敬的礼仪。退朝之后，有关官吏打扫御殿，得到十多两珍珠，将珍珠分赐当天在大殿侍奉的阁门使、副使和内侍。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

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着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纻中独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看风水的人用磁石去磨针尖，针尖就能指出南方，不过常常略为偏东，并不完全指向正南。把磁针浮在水面上，常晃荡不停。也可以把磁针放在指甲上和碗口上，磁针转动更灵快些，但这上面又硬又滑，磁针容易掉落，不如用丝线悬挂为最好。其方法是从新丝棉中抽取一根蚕丝，用芥菜籽大小的一点蜡粘连在磁针的腰部，悬挂在没有风的地方，磁针就常常指向南方。磁针也有经磨后指向北的。我家的磁针，指南指北的都有。磁石的指南，如同柏树的指西，不能推究出其中的道理。

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宗憲母郑夫人。宗憲有妹名钟馗。则知钟馗之设亦远。

在一年的开头把钟馗的像画在门上的风俗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皇祐年间，金陵挖掘一座坟墓，有一块石刻碑志，是南朝宋代宗憲的母亲郑夫人。宗憲有一妹妹名叫钟馗。那么可知钟馗的设置也非常久远了。

信州杉溪驿舍中有妇人题壁数百言，自叙世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职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婉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将死乃书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状，恨父母远，无地赴诉。言极哀切，颇有词藻，读者无不感伤。既死，稿葬之驿后山下，行人过此，多为之愤激，为诗以吊之者百余篇。人集之，谓之《鹿奴诗》，其间甚有佳句。鹿主，夏文庄家奴，人恶其贪忍，故斥为“鹿奴”。

信州杉溪驿站中，有一妇人在墙壁上题了一首几百字的诗，自叙自己的家庭世代都是读书人家，父母把她嫁给了三班奉职鹿生的儿子。她才分娩三天，鹿生贪图每月的俸禄，迫使她跟随启程赴任，于是就死在了杉溪。临死时就把这首诗写在墙壁上，诗中把受逼迫的苦楚情形详细地陈述出来，哀怨父母远离，无处可以倾诉。言词非常哀婉凄切，很有文采，读过诗的人没有不感伤的。妇人死后，草葬于驿舍后面的山下。行路人经过此地，大多为之愤慨激动，为吊唁她而写的诗有一百多篇。有人把这些诗收集在一起，题为《鹿奴诗》，集中很有一些好的诗句。鹿生是夏竦的家奴，人们都厌恶他的贪婪残忍，因此指斥他为“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姓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顷，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

通有百家，皆谓之土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冈头卢、泽底李、上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士人以出身于世代有名的氏族而互相夸耀，虽说自古以来就有，但没有大为盛行。从魏开始，评论人物，选拔官员，虽然重视各门望族，但也没有专门以门第作为选官的标准。只有四周的少数民族国家全以姓氏种族作为区分贵贱的标准。例好天竺就是以刹利、婆罗门两种姓为贵族的种姓；其余都是平民的种姓。如毗舍、首陀等；再往下就是四种贱民的姓，即工、巧、纯、陀等姓。其它各国也是如此。国王和大臣各有自己的种姓，如果不是高贵的种姓，就没有人民归服他们；平民种姓的人中虽然有功劳和才能的人，他们也甘心居于大姓之下，到现在仍这样。从后魏割据中原之后，这种以种姓定贵贱的风气便在中国盛行起来，所以有了八氏、十姓、36族、92姓。凡是三代做“三公”的贵族称为“膏粱”，做尚书令和左右仆射的称为“华腴”；尚书、领军、护军以上的官称为“甲姓”；任九卿、州郡方伯称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的官称为“丙姓”；吏部正员郎称为“丁姓”。符合这些条件的叫做“四姓”。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世族们互争族位贵贱，谁也不能最终肯定。于是朝廷便依照前世官员的名册，把博陵崔姓、范阳卢姓、陇西李姓、荥阳郑姓定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加了太原王姓、清河崔姓、赵郡李姓为甲族，共称为“七姓”。但他们的地位和势力差不多，更是互相排挤攻击，并各自著书立说，连篇累牍，差不多几十家。以至朝廷为此专门设官撰写，然而习惯相沿，成为风俗，虽施用国家权力也不能排除当时的门阀势力间的纷争。大概从高到低有五种等级的种姓，总共有百家之多，都称为土族，除此之外都是庶姓，婚姻和做官都不敢与这百家土族并列。陇西李氏族是唐朝的皇族。第一等的土族中，又如冈头的卢姓、泽底的李姓、土门的崔姓，靖恭的杨姓等为最高的豪门贵族。这种风俗直到唐朝末年才慢慢衰落。

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颗”，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上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唯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颗者，极下材耳，乃北人不识，误为品题。予山居有《茶论》。《尝茶诗》云：“谁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茶芽，被古人称为“雀舌”或“麦颗”，是说它极细嫩。现在最好的茶，品质本来就很优良，而且种檀的土壤很肥沃，所以一发新芽，就有一寸长，象针一样尖细，只有这种芽长的是最上等的。这是因为茶树的品种好、树壮和土壤肥力都有余的缘故。象雀舌、麦颗之类的茶要算最下等的。由于北方人不了解，错误地把它当作好茶。我在山居期间，写有《茶论》，并赋《尝茶诗》一首：“谁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闽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复种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种之不复牙。正如六畜去势，则多肉而不复有子耳。

福建有一种核小如丁香的荔枝，肉多而甜，当地人也能种植它。方法是：选取荔枝树苗，去掉主根，再用火烧使树皮烤焦，然后栽下去，用大石头压住它的根部，只让旁根生长，这样种的荔枝核就小，把核种到地里去也不再发芽，这正如同把马、牛、羊、猪、鸡、狗阉割后可以长肥却不再有生殖能力一样。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

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傍不肯”。

元丰年间，庆州地界发生了粘虫，正在危害秋田庄稼的时候，忽然田中生出了一中虫子，样子象土中的狗蝎，嘴部有钳，成千上万，满地都是，遇上粘虫，就用钳搏杀，粘虫都被咬成两段。十多天后，粘虫都绝迹了，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这种虫过去也有过，当地人称为“傍不肯”。

养鹰鹞者，其类相语谓之“啖漱”。三馆书有《漱》三卷，皆养鹰鹞法度，具其医疗之术。

养鹰鹞的人，他们相互交谈称为“啖漱”。三馆的图书中有《漱》三卷，都是记载养鹰鹞的法则，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医治鹰鹞的方法。

处士刘易隐居王屋山。尝于斋中见一大蜂，于蛛网，蛛搏之，为蜂所螫坠地，俄顷，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啮芋梗微破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渐消，轻躁如故。自后人为蜂螫者，授芋梗傅之则愈。

处士刘易隐居在王屋山时，曾经在书房中看见一只大蜂，被蛛网粘挂住，蜘蛛与蜂搏斗时，被蜂螫而掉在地上，一会儿，蜘蛛腹部鼓胀象要裂开似的。蜘蛛慢慢爬出书房进入草丛。用嘴咬破一根芋梗，将蜂螫的地方贴近芋梗咬破的地方磨擦了很久，鼓胀的腹部渐渐消退，行动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从此以后，被蜂螫了的人，把芋梗揉碎贴在伤处，就能治愈。

宋明帝好食蜜渍鱖，一食数升。乃今之鱼贼肠也，如何以蜜渍食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蜜拥剑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笊，令饗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坐客莫不大笑。予尝过亲家设饌，有油煎法鱼，鳞鬣虬然，无下箸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宋明帝喜欢吃用蜜浸渍的“”，每次吃几升。就是现在的乌贼鱼肠。怎样用蜜浸渍来吃呢？大业年间，吴郡曾向隋炀帝进贡二千头蜜蟹，蜜拥剑四坛。另外何胤特喜欢吃糖蟹。大约南方人爱吃咸的，北方人爱吃甜的。鱼蟹加糖蜜，大概是沿于北方的饮食习惯吧。现在的北方人喜欢用麻油煎炸食物，不论什么食物，都用油煎。庆历年间，许多学士在玉堂聚会，让人买来一筐生蛤蜊，要厨师煮熟。过了很久，还不见厨师端上来，客人们十分奇怪，派人去厨房看看，厨师说：“已经被煎黑了还没有烂熟。”在座的客人们没有不大笑的。我曾经在亲家的宴会上吃过一道油煎法鱼，鱼鳞都未去掉，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主人却用手捧着横啃，最后因无法咀嚼而作罢。

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牒至漳州，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至乌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甚，睚眦矚，忽坠水中，至于没顶，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漳州一带有一条河，叫做“乌脚溪”，涉水过河的人脚都变成黑色，几十里之内水都不能喝。喝了的话就生瘡病，路过这里的人都是自己带水而行。龙图大学士梅公议在州县任职时，奉命到漳州，梅公向来多病，为预防瘡病的侵害，到乌脚溪时，让好几个人用肩扛他过河，并用东西遮住身子，担心毒水沾上身。因为他过于紧张，惊惧之中忽落水中，河水淹没了他的头顶，被救出来后，全身墨黑象昆仑奴，他自以为肯定会死。可是从此之后，他的旧病全消，顿觉身体健康，不再象过去那样衰病，这又不知是什么原因。

北岳常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题名云：“太原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回师自飞狐路即归雁门。”今飞狐路在茂之西，自银冶寨北出倒马关，度虜界，却自石门子、冷水铺入瓶形、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阁路可至河东，然路极峭狭。太平兴国中，车驾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门路，至今有行宫在。

北岳常山，就是今天所说的大茂山，山的一半属于契丹，以大茂山的山脊为界。北岳祠旧时在山下，石晋之后，稍向里迁，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神棚。现在祠庙在曲阳，祠庙的北面有个望岳亭，初晴气爽之时，就可以看见大茂山。祠庙中有许多唐代人所刻的石碑，祠殿前有一座亭子，亭子中有李克用的题词：“太原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领步骑50万，问罪幽陵，回师自飞狐路即归雁门。”现在，飞狐路在大茂山以西，从银冶寨北出倒马关，过胡人地界，从石门子，冷水铺进入瓶形和梅回两寨之间，到达代州。现在这条路已经不通了，只有从北寨西出承天关路可以到达河东，然而，这条路十分陡峭狭窄。太平兴国年间，皇上的车驾从太原移至常山，就是从土门路入，到现在皇上的行宫还在。

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乃王镒时海子园也。镒尝馆李正威于此。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与镇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以压镇之“潭园”。予熙宁中奉使镇定。时薛师政为定帅，乃与之同议，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数里，颇类江乡矣。

镇阳的池塘园林是最负盛名的，居于各镇的首位，它便是王镒时期的海子园。王镒曾经请李正威在此居住过。亭台楼馆还是过去的样子，都非常壮丽。镇阳人喜欢说大话，把池塘夸大称为“潭园”，大概他们还不知道过去曾被称为“海子”。中山人常常喜欢与镇阳人争比高低，中山城北园中也有一个大池，于是中山人就称之为“海子”，以压低镇阳的“潭园”。我在熙宁年间奉命出使镇阳和定州。当时薛师政为定州主管，我便和他一起商议，扩展“海子”直到西城中山王镒，其中全部为稻田，把新河水引来灌注，清澈的水波弥漫几里，很有点类似江南水乡。

卷二十五 杂志二

宣州宁国县多积首蛇，其长盈尺，黑鳞白章，两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鳞耳。人家庭槛间动有数十同穴，略如蚯蚓。

宣州宁国县有许多两头蛇，有一尺长，黑色的鳞间有白色的花纹，两个头的花纹是相同的，只是其中一个头的鳞片是倒生的。在人们的庭院栏栅间，往往有几十条两头蛇在同一个洞穴里，有点像蚯蚓那样。

太子中允关杞曾提举广南西路常平仓，行部邕管。一吏人为虫所毒，举身溃烂。有一医言能治，呼使视之，曰：“此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为也。”乃以药傅其创，有肿起处，以钳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余条，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汁，饮一斗许，令其恣饮，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间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当戒也。

太子中允关杞，曾任广南西路常平仓提举官，他在巡视邕州管辖的地方时，有一小官吏被毒虫所咬，全身溃烂。有一位医生说能治疗，便请这位医生来看，医生说：“这是被天蛇所咬，病毒已经很深，不能医治了。”于是他用药贴在伤口上，在肿起的地方，用钳子拨出许多象蛇一样的东西。但小吏的病仍没有好，死了。另外，我家的祖坟在钱塘西溪，曾经有一位农户忽然得了麻风病，全身上下溃烂，痛苦而又绝望地喊叫，西溪寺的僧人知道这种病，说：“这是中了天蛇毒，而不是麻风病。”他取出一些树皮熬水，让这农人喝了一斗多，并叫他尽量地喝。第一天，病就减轻了一半，两三天后病就好了。考证僧人用的树皮，就是现在的秦皮。但却不知天蛇是什么东西。有的人说：“就是草里的黄花蜘蛛。人若被它咬了，又被露水沾湿了伤口，就会得这种病。”因而在露水中行走的人也应当小心才是。

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槨，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

天圣年间，侍御史知杂事章频出使辽国，死于辽国境内。辽国没有棺材，被抬到范阳才得以入殓。从此之后，辽国做了几口漆棺，并用银子装饰，每次有使者进入辽国，就把棺材用车装着随行，到现在他们还有这个规定。

景祐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杨告入蕃吊祭，告至其国中，元昊迁延遥立，屡促之，然后至前受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皇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既而餼告于厅，其东屋后若千百人锻声。告阴知其有异志，还朝，秘不敢言。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朝廷兴师问罪，弥岁，虏之战士益少，而旧臣宿将，如刚浪遇、野利辈，多以事诛，元昊力孤，复奉表称蕃，朝廷因赦之，许其自新，元昊乃更称兀卒曩霄。庆历中，契丹举兵讨元昊，元

昊与之战，屡胜，而契丹至者日益加众，元昊望之，大骇曰：“何如此之众也？”乃使人行成，退数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许，引兵压西师阵，元昊又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余里，每退必尽焚其草莱，契丹之马无所食；因其退，乃许平。元昊迁延数日，以老北师，契丹马益病，亟发军攻之，大败契丹于金肃城，获其伪乘舆、器服、子婿、近臣数十人而还。先是，元昊后房生一子，曰宁令受。“宁令”者，华言“大王”也。其后又纳没臧讹咙之妹，生谅祚而爱之。宁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臧氏，授戈干宁令受，使图之。宁令受间入元昊之室，卒与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诸大佐没臧讹咙辈仆宁令受。明日，元昊死，立谅祚，而舅讹咙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国人，为讹咙子妇，谅祚私焉，日视事于国，夜则从诸没臧氏。讹咙恚甚，谋伏甲梁氏之宫，须其入以杀之。梁氏私以告谅祚，乃使召讹咙，执于内室。没臧，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余人，悉诛之，夷其宗。以梁氏为妻；又命其弟乞埋为家相，许其世袭。谅祚凶忍好为乱，治平中，遂举兵犯庆州大顺城。谅祚乘骏马，张黄屋，自出督战，陴者纒弩射之中，乃解围去，创甚，驰入一佛祠，有牧牛儿不得出，惧伏佛座下，见其脱靴，血洩于踝，使人裹创舁载而去，至其国，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国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继之，谓之没宁令。“没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关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萌讹皆以昵幸进，唯马尾粗有战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属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国。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虏中，秉常昵之，因说秉常以河南归朝廷，其谋泄，青为梁氏所诛，而秉常废。

景祐年间，党项族的首领赵德明去世，他的儿子元昊继位。朝廷派遣郎官杨告到那儿去吊唁，杨告到达党项境内，元昊远远地站立，拖延不愿接诏，几次催促他之后才上前受诏。等到跪拜起身之后，他环顾左右后说：“先皇真是大错！有这样的国家，竟臣属于他人。”过了一会儿，元昊在大厅宴请杨告，他的东屋后面传来成千上百人锻造铁器的声音。杨告暗知元昊有叛逆之心，回到朝廷，杨告不敢讲这件事。不久，元昊果然叛逆。元昊的同党独居一楼上创造了党项文字，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到这时献元昊。元昊于是改年号，制订了衣冠礼乐制度，下令在本国中全用本族文字和礼仪，并把国名自改为“大夏”。朝廷于是兴师问罪，一年之后，党项的士兵日益减少，而过去的老臣宿将，如刚浪汪遇、野利之流，多因事而被杀。元昊力量单薄，又再次向朝廷上表称臣，朝廷因而赦免了他，同意让改过自新。元昊就更更换名字为兀卒曩霄。庆历年间，契丹发兵攻伐元昊，元昊与契丹作战，多次获胜。但契丹的兵将日益增多，元昊见了大惊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于是派人求和，退兵几十里以躲避与契丹交战。契丹不同意求和，引兵逼进元昊的军队，元昊又退兵回避，这样三次。共退了一百多里，每次后退都要将牧草荒地烧尽，使契丹的战马没有饲料可吃，因而只好退兵讲和。元昊拖延几天，待契丹兵疲马瘦，突然发兵攻讨，大败契丹军队于金肃城。缴获了契丹军队的战车、兵器服装，俘虏了契丹主的儿子女婿，以及大臣几十人，得胜而回。最先，元昊的后房为他生了儿子，取名为宁令受。“宁令”用汉语讲就是“大王”的意思。后来，元昊又纳没臧讹咙的妹妹为妃，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谅祚，元昊对她十分宠爱。宁令受的母亲对她深为忌恨，想要除掉没臧氏。她把利刃交给儿子宁令受，让他想办法杀掉臧氏。一天，宁令受悄悄进入元昊房中，突然与元昊相遇，就刺杀元昊，没等元昊死就跑了，被没臧讹咙等人抓到梟首示众。第二天，元昊死了，就立谅祚为王，由他的舅舅讹咙为宰相相辅佐他。党项国中有一个女人叫梁氏，早先为汉人，是讹咙的儿媳，谅祚与她私通。谅祚白天处理国事，晚上就与梁氏鬼混，讹咙对此非常愤恨，设计谋在梁氏宫中埋下伏兵，等

到惊祚进入就将他杀掉。梁氏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惊祚，惊祚派人将讹咙召进，到内室将讹咙杀了。没臧家族是党项的名门望族，其在外的子弟族人有80多，全被惊祚杀掉，整个家族被诛。于是惊祚娶梁氏为妻，又把梁氏的弟弟乞埋任命为家相，并让他家世袭这个爵位。惊祚为人凶狠残忍而好斗，治平年间，他起兵进犯庆州大顺城。惊祚骑着骆马，撑着黄伞盖亲自督战，守城的宋军用弩射中了他，便解围离去，惊祚身受重伤，跑进一个佛寺中，寺中有一个牧童见到忙害怕地躲藏在座佛像下，看到惊祚脱下靴子，血流不止，一直流到脚踝，让人裹好他的伤口，抬着他回去。回到国中就死了。他的儿子秉常继承王位，由梁氏主持国事。梁乞埋死后，他的儿子移逵继承他的相位，被称这“没宁令”，“没宁令”用汉语讲就是“天大王”的意思。秉常在位时，参与主持国事的有嵬名浪遇，是元昊的弟弟，在行军打仗方面非常精通，因为不依附讨好子梁氏，迁下治而死。另外参与国政的还有三人，移逵凭借世袭居于首尾，其次是都罗马尾，再其次是关萌讹，略为知书，暗地侍奉梁氏。稀逵与萌讹都以阿谀奉承得到高升，只有罗马尾稍有成功，但是都是平庸的人才。秉常放纵懦弱，梁氏自掌兵权，从不和儿子商量。秉常郁郁不得志，他向来仰慕中国。有一个人叫李青，本来是秦地逃来的汉人，秉常和他交往亲密，因为劝说秉常把河南的土地归还朝廷，计谋被泄露，李青被梁氏杀掉，秉常也被废黜。

古人论茶，唯言阳羨、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以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淮南唯丛茭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古人评论茶，只提到阳羨、顾渚、天柱、蒙顶之类的茶，都没有提到建溪的茶。但是唐代人看重的粘黑串茶，就接近于“建饼”茶了。建溪一带的茶树都是乔木，吴、蜀、淮南等地只有丛生的茶树而已，品级自然低于建茶。建茶最好的产地是郝源和曾坑，这两地又要数岔根、山顶两处出产的茶最好。南唐李氏在统治江南时，把这地方叫做北苑，并设置官吏管理它。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水能为铜，物之变化，固不可测。按《黄帝素问》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此其验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为钟乳、殷孽。春秋分时，汲井泉则结石花。大卤之下，则生阴精石，皆湿之所化也。如木之气在天为风，木能生火，风亦能生火，盖五行之性也。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出来成为溪涧。把苦泉水舀出来熬炼，就成为胆矾，把胆矾煮过就生成铜。熬胆矾的铁锅熬久了也变成了铜。水能变为铜，物质的变化真是不可预测。根据《黄帝素问》记载：“天有五行，地有五行。土中的气升到天上就是湿气，土能生成金属石头，湿也能生成金属石头。”这就是验证。另外石洞中的水，水滴都能变成钟乳、殷孽。春秋时节，汲的井水或泉水都能结石花；盐池卤水之下，能生成阴精石。这都是湿气变化所致。就象木的气在天空中是风，木能生火，风也能生火，这大略是五行的本性。

古之节如今之虎符，其用则有圭璋龙虎之别，皆楛将之英荡是也。汉人所持节，乃古之旄也。予在汉东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红，酣酣如醉，肌温润明洁，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为币者，《春官》“以白琥礼西方”是也。有以为货者，《左传》“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为瑞节者，“山国用虎节”是也。

古代的节如同现在的虎符，它的作用有圭璋龙虎的区别，都是匣子装着的符节。汉代人拿的节，就是古代的旄。我在汉东得到一个玉琥，是美玉略呈红色，好像喝酒醉了似的，肌理温润明洁，有人说就是玫瑰。古人有用来作为礼物的，《春官》中“以白琥礼西方”的就是。有用作货币的，《左传》中“加以玉琥二”就是。有用作符节的，“山国用虎节”就是。

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祥符中，阁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尔后三岁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埋淀，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埋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沛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予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于京城东数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陞，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

本朝汴河，每年征调京城及其附近三十余县的民夫疏浚一次。祥符年间，阁门祗候使臣谢德权负责京郊沟渠水道的治理工作，曾暂时借用过疏浚汴河的民夫，从那经后，汴渠改为每三年疏浚一次。开始还派遣京郊县官兼管沟渠水道，并作为一种常职。时间一久，治理沟渠的工作松懈下来，县官只是有治理沟渠的空名，而汴渠也有二十多年没有疏浚，年年淤积沉淀。过去京师沟渠中的水都流入汴渠，旧尚书省都堂壁上记载说：“疏治八渠，南入汴水”，说的就是这件事。自从汴渠淤积沉淀，从京城东水门往下游直到雍丘、襄邑等地，河床底部都高出堤外平地达一丈二尺多，从汴堤上往下看民房，就如同民房处在深谷中。熙宁年间，考虑改引洛水入汴。我因受到委派，沿着汴渠作过勘测。从京城的上善门量到泗州的淮河岸，总长有840里130步。按地势而言，京城的地势比泗州高出19丈4尺8寸6分。在京城以东几里的渠心打井，深到三丈才可以看见原来的河底。测量地势，若用水平、望尺和干尺测量不能没有小的差错。在汴渠堤外，到处都是过去取土后留下的旧沟，我就叫人把水沟挖开，使它们互相连通。当时筑一道堰栏水，等水面已平，上游的沟水快要干的时候，就再筑一道堰，依次相互排列得象台阶一样。然后测量得各堰上下水面的高差，把所有的高差总加起来，就可以得到汴渠上下游地势高低的实际数据。

唐风俗：人在远或闺门间，则使人传拜以为敬。本朝两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闺闼，则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见所礼，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则答拜。使人出复拜客，客与之为礼如宾主。

唐代习俗：人在远处或是闺门内，就让人传拜以为恭敬。本朝两浙一带仍然有这一习俗。客人来到，要向闺闼表达敬意，就站立让人拜之，让人入见的礼仪，就是再拜致命。如果有中外就答拜。使人出再拜客，客与之为宾主之礼。

庆历中，王君贶使契丹，宴君贶于混融江，观钓鱼。临归，戎主置酒谓君贶曰：“南北修好岁久，恨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传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亲授君贶举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万岁寿。

先是，戎主之弟宗元为燕王，有金燕之众，久畜异谋，戎主恐其阴附朝廷，故特效恭顺。宗元后卒以称乱诛。

庆历年间，王君脱出使契丹，在混融江宴请君祝，观赏钓鱼。归还之际，契丹主置酒对君祝说：“南北和好已经很久了，遗憾的是没有亲眼见到南朝皇帝兄，我托你带一杯酒到南朝。”于是亲自起来舀一杯酒，看上去很恭敬的样子，亲自与君祝举杯，又自鼓琵琶，祝南朝皇帝千万岁寿。从前，契丹王的弟弟宗元为燕王，拥有金燕众多的人，早有反逆的阴谋，契丹王担心他暗地依附朝廷，所以特地显示恭顺。宗元后来死了，以称乱被诛杀。

潘阆，字逍遥，咸平间有诗名，与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尝为诗曰：“散拽禅师来蹴鞠，乱拖游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实也。后坐卢多逊党亡命，捕迹甚急，阆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许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仰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啾啾，罚教临老投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后会赦，以四门助教召之，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放弃终身。

潘阆，字逍遥，咸平年间有诗名，与钱易、许洞为友，行为狂放不羁。曾写诗说：“散拽禅师来蹴鞠，乱拖游女上秋千。”这是他自我的真实写照。后因与卢多逊为同党，卢多逊事发，潘阆赶忙逃命，朝廷追捕得很紧急，潘阆就更改姓名，穿上僧人服装隐入中条山中。许洞曾悄悄赠给他一首诗说：“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啾啾，罚教临老投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后遇到大赦，朝廷召他回来任四门助教之职，潘阆于是回去，送往信州安置，仍然不收敛行为，又作了一首诗《扫市舞词》说：“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潘阆因此被众人所不齿，终身没有入仕。

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

在江湖中行船，只怕有大风。冬天的风是逐渐刮起来的，行船可以有所防备；只有盛夏的风是转眼间突然而起的，行船往往遭难。曾经听说一个往来于江湖之间的商人想办法免除这一祸患。一般夏天的大风多发生在午后，要行船的人，在五更时分起来，看天空星月明亮皎洁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的话，就可以行船，到巳时时分就停下来，这样就不会与暴风遭遇了。国子博士李元规说：“我平生游江湖上游历，从未遇到过暴风，便是使用了这种方法。”

予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蓊菱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名“蓊”，恐其因此也。如扬州宜杨，荆州宜荆之类。“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我出使到古契丹界，只见蓊菱大如车盖，中原没有这么大的。它的名称为“蓊”，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扬州的宜杨、荆州的宜荆之类。“荆”有时称为“楚”，“楚”也是荆木的别名。

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饧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似小木罌，以色绫木为之，如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牟子而脆。

刁约出使契丹，写了4句开玩笑的诗：“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饧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都是写的实情。移离毕，是官职名称，如同中原的执政官。贺跋支，如同执衣防阁。匹裂，像小木瓮，用有色绸子那样的木制成，像黄色的漆。貔狸，样子像鼠但比鼠大，住在洞里，吃果子粮食，喜欢吃肉的北方少数民族当作一道好菜，味道像猪肉但比猪肉脆。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据说江西人好打官司，有一本书名叫《邓思贤》，都是讲讼牒的方法。最初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就欺诬以得取，欺诬不能得，就寻求其罪劫取之。大概“思贤”是人的名字，他传授讼牒的方法，于是书就用他的名字命名。村校中常常用来传授给学生。

蔡君谟尝书小吴笺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为终身之恨。此君殊清节，可为世戒。张乖崖镇蜀，当邀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头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检押。”此帖今在张乖崖之孙尧夫家。予以谓买书而为终身之恨，近于过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蔡君谟曾经在一张小笺上写道：“李及任杭州知府，买了部《白居易集》，成为终身之恨。这位李及非常清廉，可为世人的楷模。张乖崖镇守蜀中，当他出来游览时，美女围绕在左右，但他三年来从来没有回过头顾盼过，此君为人特别厚重，可以成为轻薄之人的对照”。这张笺至今还在张乖崖的孙子张尧夫家中。我以为因为买了一部书而成为终身的悔恨，太过激了，如果他生性便是如此，也还是值得推崇。

陈文忠为枢密，一日，日欲没时，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时见有帘帟，灯烛炜煌，皆莫知何处，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两花槛，已有数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帘，蜡烛十余炬而已，相继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齐，唯记文忠、丁谓、杜镐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镐时尚为馆职。良久，乘舆自宫中出，灯烛亦不过数十而已。宴具甚盛，卷帘，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设于席东，设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宾主之位，尧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谕不已，尧叟恳陈自古未有君臣齐列之礼，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为天下太平，朝廷无事，思与卿等共乐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开宴？今日只是宫中供办，未尝命有司，亦不召中书辅臣，以卿等机密及文馆职任侍臣无嫌，旦欲促坐语笑，不须多辞。”尧叟等皆趋下称谢。上急止之曰：“此等礼数，且皆置之。”尧叟悚慄危坐，上语笑极欢。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两绉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时和岁丰，中外康富，恨不得与卿等日夕相会。太平难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费。”群臣欲起谢。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赐，悉良金重宝。酒罢已四鼓，时人谓之“天子请客。”文忠之子述古得于文忠，

颇能道其详，此略记其一二耳。

陈文忠任枢密使时，一天，太阳要落的时候，忽然有宦官宣召，待他走到中书省时，天已昏黑，于是被宦官带入宫中，弯弯曲曲走了很久，这时看见前面有帘帟，灯烛，但不知是哪里，过一会又到了一个小殿，殿前有两道雕花栏干，已有几个人先到了，都站立在庭中，殿门垂有帘帟，蜡烛十多只，相继而来的共7人，宦官于是秉奏人都到齐，来人中只记得有陈尧叟、丁谓、杜镐三人，其余四个人忘了他们的名字。杜镐当时还在作馆职。过了很久，皇上所乘的轿子从宫中出来，随从的灯烛也不过几只。宴会非常盛大，帘帟卷上，要他们不要下拜，升殿就坐。御座设在宴席东面，陈尧叟的座位在西面，与普通人家宴客的宾主位置没有什么两样，陈尧叟等人都很惶恐不敢就坐，皇上宣谕不止，于是陈尧叟诚恳地陈奏自古以来没有君臣齐列的礼规，推辞再三不敢就坐。皇上变脸色说：“本以为现在天下太平，朝廷无事，想和卿等共同欢宴，如果这样，何不就在外朝开宴？今天只是在内宫中共宴，没有安排差吏，也没有宣诏中书大臣，只想同卿等机枢、文馆官员没有隔阂、无拘无束地促膝谈笑，不要再多讲。”陈尧叟等人都急忙下拜叩谢，皇上急忙制止说：“这等礼数，全都免了。”陈尧叟惶恐地端坐着，皇上言谈笑语非常欢快。酒过五、六巡之后，侍从用膳具盛着两个绛色锦囊放在陈尧叟等人面前，里面装的都是大珍珠。皇上说：“现在时政和平，年年丰收，这些东西可充作卿等宴饮的费用。”大家正要起身叩谢皇上，皇上又说：“且坐，还有相赐之物。”于是酒又过三巡之后，在坐的都有皇上所赐的礼物，都是金银珍宝。酒宴散时已到四更时分，当时人们把这件事说成是“天子请客。”后来陈尧叟把这件事讲述给儿子陈述古，陈述古很清楚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这里不过略记其中一二罢了。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疟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关中地区没有螃蟹，元丰年间，我在陕西，听说秦州有人得到一只干螃蟹，当地人害怕它那样子，以为是怪物，每当哪个家中有人害疟疾，就借去挂在门上，往往就好了。不但人不能辨识，鬼也不能辨识。

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为闳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人谓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丞相陈秀公在润州建造住宅，非常宏伟壮观，池塘房屋接连长达几百步。住宅落成，陈秀公已病得很重，只好坐轿子登一次西楼罢了。人们称为“三不得”“住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福建剧贼廖恩，聚徒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骚然。后经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补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时坐恩黜，免者数十人，一时在铨班叙录，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独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

福建大盗廖恩，聚集一千多人，抢夺城镇，杀害官员，江、浙一带因而不平静。后来经过朝廷赦免宽恕，才带领他的那些人投降，朝廷将廖恩补为右班殿直，到三班院等候派遣。当时因廖恩的事受牵连而免职降级，被赦免的几十个人，一时之间都在依次排列任用，他们的履历都要区分私罪还是公罪，只有廖恩的履历表说从来就没有公私罪过。

曹翰围江州三年，城将陷，太宗嘉其尽节于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尽赦之。使人至独木渡，大风数日不可济，及风定而济，则翰已屠江州无遗类，适一日矣。唐吏部尚书张嘉福奉使河北，逆韦之乱，有敕处斩。寻遣使人赦之，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与此相类，得非有命欤？

曹翰围江州 3 年，快要攻陷江州时，太宗嘉许那些人对所事奉的尽了气节，派人告诉曹翰，江州攻克的时候，对那些抗拒的人全部赦免。使者到了独木渡，刮了几天大风不能渡河，等到风停以后再过河，那曹翰已把江州人杀得一个不剩了，不过一天的工夫。唐代吏部尚书张嘉福奉派到河北，对逆韦的叛乱，有诏令处死。不久，朝廷又派人赦免他们，使者在马上昏睡，晚走了一个驿站，等他到达时已杀完了。与这个相类似，莫非生死有命吗？

庆历中，河北大水，仁宗忧形于色。有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到阙，即时召对，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曰：“如丧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诏阁门：“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至今阁门有此条，遇有合奏事人，即预先告示。

庆历年间，河北涨大水，仁宗为之忧虑，形之于色。这时，恰好有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到京城，立刻将其宣诏进殿，询问河北水灾情形怎样，使臣回答说：“怀山襄陵。”仁宗又询问百姓情形怎样，使臣回答：“如同爹娘去世一样悲痛。”仁宗听后默然，退朝之后，就对阁门使说：“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必须直说事情，不能过于雕饰。”到现在阁门司订下这一条文，凡碰到有奏事的人，就预先告知。

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熔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我奉命出使巡视边防地区，才开始做木图用来表示当地山川道路的形势。最初，普遍察看各地山脉、河流，随后就用面糊和木屑在木板上模制出它们的形势来。不久天气冷了，面糊冻结，木屑不能用了，就改用熔蜡来制作。这都是为了使制出的地图模型重量轻而便于携带。回到官所以后，就雕刻成木图献给皇帝。皇帝召集辅佐大臣一起观看，并下令边防各州都把地理形势刻成木图，送存皇宫内库收藏。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梟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珪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珪二官，仍阁门祗候。文珪，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予尚识之。文珪家有《季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蜀中“大盗”李顺，攻下了剑南、两川，关右一带大为震惊，朝廷忧虑惶恐。后来朝廷的军队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把李顺砍头示众，收复两川，给将士记载功劳给予奖赏，当时人们毫无异议。到景祐年间，有人向朝廷告密说李顺还活着住在广州。巡检使陈文珪将他逮捕，确实确实是李顺，已经70多岁。验明身份后，将李顺囚押到京城，再次查核，证明属实。朝廷因为已对平定蜀乱的将士记功行赏，不想张扬这件事，便将真李顺斩首，给陈文珪进了二级官职，并仍担任阁门祗候。陈文珪，是福建泉州人，康定年间他告老还乡，我还认识他。陈文珪家有有关李顺起义的案件资料，对事件的经过从开头到结尾都记载很详细。李顺原是四川味江王小波的妻弟。起初，王小波在四川造反，不能很好地率领起事的部众，于是大家就共同推举李顺为头领。李顺初起事时，把乡里富人大姓统统召集起来，要他们报出家中所有的财物和粮食，除按人口留够吃用的以外，其余的统统加以证调，广泛地救济贫民。任用有才能的人，保护好人，号令严明，所到的地方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当时，两蜀闹饥荒，十多天之内，归顺他们的有几万人。义军所到的州县，都开门迎接；起义军的檄文传到哪里，哪里就被攻破。后来李顺起义失败，人们还怀念他，所以他得以逃脱30多年才被杀。

交趾乃汉、唐交州故地，五代离乱，吴文昌始据安南，稍侵交、广之地。其后文昌为丁璉所杀，复有其地。国朝开宝六年，璉初归附，授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威杀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天圣七年，公蕴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蕴据安南，始为边患，屡将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熙宁元年，伪改元宝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与其母黎氏号“燕鸾”太妃，同主国事。熙宁八年，举兵陷邕、钦、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阁待制赵公才讨之，拔广源州，擒酋领刘纪，焚甲峒，破机郎、决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众来拒，大败之，斩洪真，众歼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时乾德方十岁，事皆制于尚吉，广源州者，本邕州羁縻，天圣七年，首领依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转运使章频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乱，杀其兄，率土人刘川以七源州归存福。庆历八年，智高自领广源州，渐吞灭右江田州一路蛮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协奏乞招收智高，不报，广源州孤立无所归，交趾觊其隙，袭取存福以归，智高据州不肯下，反欲图交趾，不克，为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归朝廷，邕州陈拱拒不纳。明年，智高与其匹卢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广。及智高败走，卢豹等收其余众归刘纪，下广河。至熙宁二年，豹等归顺。未几，复判从纪。至大军南征，郭帅遣别将燕达下广源，乃始得纪，以广源为顺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贵，娶李公蕴之女，改姓甲氏。承贵之子绍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为婚姻，最为边患。自天圣五年，承贵破太平寨，杀寨主李绪。嘉祐五年，绍泰又杀永平寨主李德用，屡侵边境。至熙宁大举，乃讨平之，收隶机郎县。

交趾国是汉、唐时代的交州故地，五代时分裂动乱。吴昌刚占据安南，稍后就入侵交、广等地區。后来吴文昌被丁璉杀掉，又据有了交趾。北宋开宝六年，丁璉归附北宋，被授予静海军节度使。开宝八年，被册封为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当地人黎威把丁璉杀了自立为王。景德三年，黎威死，安南大乱，很久都没有推选出酋长。其后交趾国民众共同推选福建人李公蕴为王。天圣七年，李公蕴去世，他的儿子德政继位。嘉祐六年，李德政去世，他的儿子日尊继位。自从李公蕴占据安南，交趾国

就开始成为南疆的边患，曾多次派兵入侵。到日尊主持安南时，便擅自称为“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将李公蕴尊称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为“大越。”熙宁元年，又把年号改为“宝象”。第二年，又改为“神武”。日尊死后，他的儿子乾德继位，用宦官李尚吉和他的母亲黎氏号为“燕鸾”太妃的共同主持国政。熙宁八年，发兵攻打下北宋的邕州、钦州和谦州。熙宁九年，朝廷派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阁待制赵公才征讨交趾国，攻取广源州后，活捉首领刘纪，捣焚甲峒，破机郎、决里，直达富良江。尚吉派遣王子洪真率众兵抗拒，被宋军大败，洪真被斩，他的部将都被消灭在富良江上。乾德便投降宋朝。那时乾德才10岁，国事都是由尚吉决定。广源州，原来是属邕州羁管。天圣七年，它的首领依存福归附朝廷，朝廷让依存福补邕州卫这一职位。但转运使章频罢遣了存福，不接受他的地区，存福就与他的儿子智高向东攻掠笼州并占据了它。七源存福因为内乱，杀掉兄长，率领当地人刘川以七源州归附依存福。庆历八年，依智高自掌广源州，逐渐吞并消灭右江、田州一带的蛮族。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协上奏皇上请求招抚依智高，奏表没有被接受，因而广源州孤立无所归依，交趾国看到这个机会，乘机袭取存福，想让它归附，智高占据州城不肯降，反而想要图谋交趾，没有成功，被交趾国人攻打，智高弃城出逃到右江文村，准备了金函奏表投递到邕州，乞求归依朝廷，但邕州陈拱拒不接纳。第二年，智高与他的同党卢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人入侵攻下横山寨，并陷邕州，入两广，等到智高败走，卢豹等人收拾残部归依刘纪，攻下广河。到熙宁二年，卢豹等人归依朝廷，不久，又反叛归依刘纪。直到朝廷大军南征，郭逵派遣别将燕达攻陷广源，才抓获刘纪，以广源为顺州。甲峒是交趾的一个大部落，甲承贵是首领，将李公蕴的女儿娶为妻，改姓甲氏。甲承贵的儿子绍泰，又娶德政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景隆，娶的是日尊的女儿。甲峒与交趾世代结为婚姻，是边疆最大的忧患。自从天圣五年，甲承贵攻破太平寨，把寨主李绪杀死。嘉祐五年，绍泰又把永平寨；寨主李德用杀死，多次入侵边境。到熙宁年间，朝廷大举进兵，才将他讨伐平定，收属隶从于机郎县。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中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僱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宋太祖当政的时候，曾经禁令禁兵的衣不能长过膝，将鱼肉和酒买入营门的人都有罪。又制定了轮流守卫边防的制度，使禁兵习惯于爬山涉水的劳苦，减少对妻子儿女和家乡的依恋。在外面卫戍的日子多，在军营里的日子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另外京师卫兵领取粮食，营在城东的，就令到城西仓领取；营在城西的，就令到城东仓领取，还不许租雇车马脚力，必须自己背负，宋太祖曾亲自登右掖门观看禁兵背粮。使他们劳动出力，以抑制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因而士兵仍在生活上不羡慕外面的浮华，安于辛苦而易于指挥。

青堂羌本吐蕃别族，唐末，蕃将尚恐热作乱，率众归中国，境内离散。国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乱挟其主钱逋之子唃廝囉东据宗哥邈川城。廝囉人号“瑕萨钱逋”者，胡言“赞普”也。“唃廝”，华言佛也，“囉”，华言男也；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廝囉立，立遵与邈川首领温、温逋相之，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宗哥邈川”即所谓“三河间”也。祥符九年，立遵与唃廝囉引众十万寇边，入古渭川，知秦州曹玮攻败之，立遵归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毡、磨毡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娶乔氏，生子董毡，娶契丹之女为妇。李氏失宠，去为尼；子二亦去其父，瞎毡居河川，磨毡角

居邈川，唃廝囉住来居青堂城。赵元昊叛命，以兵遮廝瞎，遂与中国绝。屯田员外郎刘涣献议通唃廝囉，乃使涣出古渭州，循未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至青堂，见唃廝囉，授以爵命，自此复通。磨毡角死，唃廝囉复取邈川城，收磨毡角妻子质于结罗城。唃廝囉死，子董毡立，朝廷复授以爵命。瞎毡有子木征；“木征”者，华言“头龙”也。以其唃廝囉嫡孙，昆弟行最长，故谓之“头龙”，羌人语倒，谓之“龙头”。瞎毡死，青堂首领瞎药鸡罗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毡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钺星之子也，与木征不协，其舅李笃毡挟瞎征居结河，瞎征数与笃毡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乡城。有巴欺温者，唃氏族子，先居结罗城，其后稍强，董毡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涧，瞎征居结河，董毡独有河北之地。熙宁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马蔺州，擒木征母弟结吴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已毡角降，尽得河南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一千余里，降蕃户三十余万帐。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青堂羌族原是吐蕃中的另一族，唐末，蕃将尚恐热作乱，率领部众归顺中国，于是吐蕃境内离散。国初有一个胡僧叫立遵的，乘乱挟持其主唃廝囉的儿子唃廝囉东占据宗哥邈川城。唃廝囉人号称“瑕萨箠逋”的，用胡人语言就是“赞普”的意思。“唃廝”用汉语讲就是“佛”的意思，“囉”汉语讲“男”的意思；自称为“佛男”，如同中国称“天子”。立遵姓李氏。唃廝囉立，立遵和邈川首领温、温逋辅佐他，据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约二千多里。“宗哥邈川”就是所谓“三河间”。祥符九年，立遵和唃廝囉率众兵十万寇边，侵入古渭州，秦州知州曹玮将他们攻取，立遵回去就死了。廝妻李氏，是立遵的女儿，生有二个儿子，一个叫瞎毡，另一个叫磨毡角。立遵死后，唃廝囉又娶乔氏，生子名叫董毡，娶契丹之女为妻。李氏失宠，离去为尼姑；二个儿子全离开父亲，瞎毡居住在河州，磨毡角居住在邈川，唃廝囉住在来居青堂城。赵元昊叛命，以兵遮廝，于是与中国绝。屯田员外郎刘涣献计建议与唃廝囉通。于是派遣刘涣出古渭州，沿着未邦山到河州国门寺，渡河逾廓州，到青堂，见到唃廝囉，授以爵命，从此又相通。磨毡角死，唃廝囉又夺取邈川城，收磨毡角的妻子质于结罗城。唃廝囉死后，其子董毡继位，朝廷又授以爵命。瞎毡有子木征；“木征”用汉语讲是“头龙”的意思。瞎毡死，青堂首领瞎药鸡罗和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毡的外甥瞎征伏，是羌蕃部李钺的儿子，与木征不协，他的舅舅李笃毡挟持瞎居于结河，瞎征多次与笃毡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联合攻打木征，木征离开结河居安乡城。有个叫巴欺温的，是唃氏族子，先居住在结罗城，其后稍强，董毡河南之城于是被分为三：巴欺温，木征居洮河涧，瞎征居结河，董毡独占河北之地。熙宁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攻下香子城，平定河州，又出马蔺州，活捉木征母弟结吴叱，破洮州，木征的弟弟已毡角投降，完全夺得了河南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从临江寨到安乡城东西一千多里，投降的蕃户有30余万帐。第二年，瞎木征投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

范仲淹常说：“史书上说诸葛亮能破格任用不合传统标准的人或与自己疏远、有不同意见的人。用人的人，没有不想罗致天下贤才而尽用之的，但是常不自觉地用了那些迎合自己好恶的人。能够任用不合传统标准的人或与自己疏远、有不同意见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

元丰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将引兵卒至保安军顺宁寨，围之数重。时寨兵至少，人心危惧。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乃掀衣登陴，抗声骂之，

尽发其私，虏人皆掩耳，并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丑，虏人度李终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鸡鸣狗盗皆有所用，信有之。

元丰年间，夏戎的母亲梁氏派遣将领带兵到保军顺宁寨，将寨子围上几重。时寨内兵士极少，人心危惧。有一老娼妇李氏，知道一一梁氏的私事十分详细，于是掀衣登上女墙，抗声骂梁氏，将梁氏的隐私全部揭发出来，虏人都掩耳，并用箭射李氏，但没有能射中，李氏的话更加难听，虏人估计不能射得李氏，恐且得罪，于是旗以他事，半夜引兵解围离去。鸡鸣狗盗之徒都有其用处，确实有这样的事。

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讎。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

宋宣献公学识广博，喜欢收藏奇书，所收藏的书都经过他亲自校勘。他常说：“校书如同打扫灰尘，一面扫，一面又生。因此每每有一种书校了三、四次，还有脱落谬误的。”

卷二十六 药议

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咽则咽入胃脘，次入胃中，又次入广肠，又次入大小肠；喉则下通五脏，为出入息。五脏之含气呼吸，正如治家之鼓鞀。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凡人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人肠之物，英精之气味，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眼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磺、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

古代医药书说：“直接吞服云母，它就会附着在肝肺上去不掉。”象枇杷叶毛、狗脊毛不可以吃，都说它们能“进入肝肺”。世俗象这样的说法很多，都是谬论。还说人“有水喉、食喉、气喉”的。现在流传的《欧希范真五脏图》也画有三个喉，这是那时检验不够审慎的缘故。水和食物同时吃下，怎能在嘴里就分开进入所谓水、食二喉呢？人只有咽与喉而已，咽能够进饮食，喉则能通气。咽下的食物进入胃脘，其次进入胃中，再其次进入广肠，最后进入大小肠；喉则与下面五脏相通，用以吐气和吸气，其功用类似于铁匠的风箱。人的饮食药饵，只不过从咽而进入肠胃，怎么能到五脏呢？人的肌骨、五脏、肠胃虽然各有区别，但那些进入肠的东西，它们的精华气味却能通达各处，只是渣滓和肮脏的东西就进入二肠。一般人们吃的饮食和药物进入肠以后，在真气的熏蒸之下，其中精华的气味，甚至那些金石的精华，如那些细研过的硫磺、朱砂、乳石等等，凡是能够挥发融化的，都随着人体元气而通达至肌骨里去，如同天地之气，贯穿在金石土木之中，没有一点阻碍；其余剩下的顽石草木，则只有气味能够深入到达。等到它们的气味挥发完了，渣滓糟粕便转入大肠，润湿进入小肠。这些都是废物，不再能转化，只应当排泄出去了。一般所说的某物进入肝脏，某物进入肾脏，只是气味到了那里罢了，一般的物质本身怎么能到达那里呢？这是医生不能不知道的。

予集《灵苑方》论“鸡舌香”以为“丁香母”。盖出陈氏《拾遗》，今细考之尚未然。按《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新补本草》又出“丁香”一条，盖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鸡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剝开如柿核，略无气味，以治疾殊极乖谬。

我收集《灵苑方》，上面说鸡舌香是丁香母。这大概出自《陈氏拾遗》，现在仔细考察并不如此。根据《齐民要术》说：“鸡舌香，人们都认为它象丁香子，故又把它叫做‘丁子香’。”就是今天所说的“丁香”。《日华子》中说：“鸡舌香治疗口气。”所以三省的通例。郎官每天口含鸡舌香，使其在奏事对答时，其气芬芳，这就是所说的丁香治口气，直到现在，医书上仍这样记载。另外有一古代医药书中“五香连翘汤”，用了鸡舌香。《千金方》中的“五香连翘汤”则没有用鸡舌香，而有

丁香，这是最好的明证。《新补本草》又列出了“丁香”一条，大约没有深入考证。现在人们用的鸡舌香，是从乳香中得到，象山茱萸那么大，锉开里面象柿核，没有一点气味。用这种药治病极其错误荒谬。

旧说有“药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其意以为药虽众，主病者专在一物，其他则节级相为用，大略相统制，如此为宜。不必尽然也。所谓君者，主此一方者，固无定物也。《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以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说也。设若欲攻坚积，如巴豆辈，岂得不为君哉。

过去所说的用药处方，有“药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的说法。它的意思是处方中治病的药虽然多，但是主治疾病的药却只有一样。其它的药则按照主次搭配运用，大体上相互制约。这样做才为适当，但不一定都要依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的规定来处方。称为君药的，是指在这一个处方中起主导作用的，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药物。《药性论》这本书中把药性平和醇厚的药定为君药，其次是臣药，再次为佐药，最后把有毒的药定为使药，这是错误的说法。假如要治疗顽固的食积阻滞疾患，譬如巴豆一类有毒的药物，难道不可以作为君药吗？

金罌子止遗泄，取其温且涩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红熟时取汁熬膏用之，大误也。红则味甘，熬膏则全断涩味，都失本性。今当取半黄时采，干，捣末用之。

金罌子可用来治疗遗尿、泄痢之类的病，是取其药性温和而涩。人们用金罌子时，等到它红熟时取其汁熬成膏使用，真是大错。金罌子红熟就味甜，熬成膏则涩味全没有，丧失了原有的药性。应当在金罌子半黄时采取，晒干后捣碎成末服用。

汤、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无用者，唯近世人为之。大体欲达五脏四肢者莫如汤，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后散者莫如丸。又无毒者宜汤，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须用丸。又欲速者用汤，稍缓者用散，甚缓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汤者全少，应汤者皆用煮散。大率汤剂气势完壮，力与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比功较力，岂敌汤势？然汤既力大，则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难以定论拘也。

中药的汤剂、散剂、丸剂各有各的用途。古方中汤剂用得最多，用散剂、丸剂的很少。古方中没有用煮散的，只有近代人才这样做。大体上要使药效达到五脏六腑的以汤剂最好，要让药久留胃中的以散剂为最好，要长期保持疗效的，不如用丸药。无毒的药物适宜用汤剂，小毒的药物适宜散剂，大毒的药物必须做成药丸。如果要药效快的用汤剂为宜，稍缓的用散剂，很慢的用丸药。这是汤、散、丸药剂使用的大致情况。近代用汤剂的很少，应该用汤剂的都用煮散。大致说来，汤剂的药力比较大而足，汤剂的效力是丸、散的好几倍。煮散一次最多只能服三、五钱，比较功效与药力，怎能比得上汤剂的势头？既然汤剂的药力大，那么在用药剂量上就不应当有差错。用药全在于医生高明的医术，不可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方法。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

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沈；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如笙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稻。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娇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牙；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古法采草药多在二月、八月，这很不恰当。只是因为二月草木已发芽，八月草木的茎叶还没有枯死，摘取药的人容易辨认罢了，对药的质地来说，在二月、八月采摘则未必是好的时候。一般来说，用根的药物如果有宿根，必须在没有茎叶时采取，这时药物的养分都集中在根部。要验证这一点，只须拿萝卜、地黄等来看，在没有茎叶时采，根部就饱满而分量重；在有茎叶时采，根部就空虚而分量轻。那些没有宿根的，就要等到茎叶长成而没有花的时候采取，那样就根部已充分长成而又没有衰老。如现在的紫草，没有开花的时候采，根部就色泽鲜润；花已开过再采，根部色泽就灰暗难看，这便是采药时节不同药材质地也不同的验证。用叶的药物在叶子刚长足时采取，用芽的药物应在芽刚长足时采取，用花的药物应在花初开放时采取，用果实的药物应在果实成熟时采取。都不可以限制在固定的月份采药。因为土壤的温度和湿度早晚不同，天气也有寒暖的不同。如在平原地方三月开花的，在深山地区就要四月开花。白居易在《游大林寺》诗中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是通常的道理。这是由于地势高低不同的原因。如茎竹笋有二月生的，有三、四月生的，还有五月生的，被称为晚稻。水稻有七月成熟的，有八、九月成熟的，有十月成熟的，被称为晚稻。同一种作物种植在同一田畦中，成熟期也有早晚的不同，这是因为植物特性不同的缘故。岭南的小草，严冬时也不凋枯。而并州、汾州一带的乔木，秋天还没到，树叶就已凋落。广东、广西一带的桃李在冬天也能结实，而北方地区的桃李到夏天才能开花。这是因为各地的气候不同的缘故。同一亩地里的庄稼，施肥灌溉的先发芽；同一块地里的禾苗，后种的晚成熟。这是因为人力不同造成的。采药怎么能限制在固定的月份呢！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误也。柚皮极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柑耳。

根据《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这是错误的。柚皮非常苦，根本不能进口，皮甘的是橙。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种，殆疏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误也。窃详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筋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唯麋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其坚如石，计一昼夜须生数两，凡骨之顿成生长，神速无甚于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无能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岂可与凡血为比哉。麋茸利补阳，鹿茸得利补阴。凡用茸无乐太嫩，

世谓之“茄子茸”，但珍其难得耳，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唯长数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玛瑙、红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麀、麀駝，麀极大而色苍，尻黄而无斑，亦鹿之类。角大而有文，莹莹如玉，其茸亦可用。

根据《礼记·月令》记载：“麋角在冬至那天脱落，鹿角在夏至那天脱落。”麋角、鹿角脱换的季节中的阴阳二气，相反到这个地步。现在人们却把麋茸和鹿茸等同使用，这恐怕是一种疏忽。还有人刺取麋血、鹿血用来代替茸，说“茸也是血”，这就更错了。我推测古人的意思，凡是含血的东西，肉较易生长，其次是筋，最难长的是骨。所以一个人从胚胎发育到成人，要20年，骨骼才长结实。只有麋角从长出到坚硬，不要两个月的时间，大的重达20多斤，象石头那样坚硬。算起来一昼夜要长几两，一般骨骼的生长，再没有比这更快的了，就算是最易生成的草木，也赶不上它。这是骨质中最强有力的，因此能够补血养骨，强壮男子的性功能，增强精髓，怎么能与一般的血相比呢。麋茸利于补阳，鹿茸利于补阴。一般使用茸，不要追求太嫩的，人们说的“茄子茸”，不过是因它难于得到而珍贵罢了，其实它的药效并不大。长成坚硬的角的又太老。只有那种几寸长的，破开其茸肉疏松如同朽木，茸的顶端色泽如同玛瑙红玉一样的最好。另外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麋、麀、麀、驼等兽，其中麀体型很大呈青色，臀部呈黄色而没有斑纹，也是属鹿的一类，它的角大而有花纹，晶莹如玉，这种茸也可以作药用。

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千金翼》云：“甘州者为真，叶厚大者是。”大体出河西诸郡，其次江池间圩埂上者。实圆如樱桃，全少核。暴干如饼，极膏润有味。

枸杞，是生长在陕西最边缘地区的，有一丈多高，其中粗大的树干可以用来作梁柱，叶子有几寸长，没有刺，根皮象厚朴，果实甘甜味美与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千金翼方》上说：“枸杞以甘肃出产的为正品，叶子厚而且大的便是。”这种枸杞大体出自于黄河以西各郡县，其次就是长江下游一带圩田的堤坝上的。枸杞果实象樱桃一样圆，很少有核，晒干后象饼，十分滋润味美。

淡竹对苦竹为文，除苦竹外，悉谓之淡竹，不应别有一品谓之淡竹。后人不晓，于《本草》内别疏“淡竹”为一物。今南人食笋有苦笋、淡笋两色，淡笋即淡竹也。

淡竹与苦竹相对成文，除了苦竹以外，其余的竹全被称为淡竹，不应该另外还有一种竹称为淡竹。后人不知道，在《本草》中另外列出淡竹为一物。现在南方人吃竹笋，有苦笋和淡笋两种，淡笋就是淡竹。

东方南方所用细辛，皆杜衡也。又谓之“马蹄香”。色黄白，拳局而脆，干则作团，非细辛也。细辛出华山，极细而直，深紫色，味极辛，嚼之习习如生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细辛水渍令直”，是以杜衡伪为之也。襄汉间又有一种细辛，极细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邮”，亦非细辛也。

东方南方所用的细辛，都是杜衡，又称为“马蹄香”。呈黄白色，蜷曲而脆，晒干后呈团状，这不是细辛。细辛出自华山，枝干非常细而且直，呈深紫色，味道很辣，放进口中咀嚼，辣滋滋地象吃生花椒，但比吃生花椒更辛辣些。所以《本草》中说：“把细辛用水泡让它变直。”那是用杜衡伪

作的。襄水、汉水之间另外一种细辛，枝茎很细而直，呈黄白色，这是“鬼督邮”，也不是细辛。

《本草注》引《尔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茎青赤。”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坼；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

《本草》注引用《尔雅》说：“藟，大苦”。注释说：“甘草是一种蔓生植物，叶子象荷叶，茎呈青赤色。”这就是黄药，味道很苦，所以说它大苦，不是甘草。甘草的枝叶与槐树完全相似，有五六尺高，只是叶子的顶端略尖而且粗糙涩手，象有白毛，结的果实象角状，象相思树的豆荚，四五个角状荚果长在一枝上，成熟后荚果就裂开，种子如小扁豆，非常坚硬，牙咬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予已于《灵苑方》论之。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中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苴麻，又曰“牡麻”。张骞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胡麻就是今天的油麻，再没有其他的说法，我已经在《灵苑方》中谈到。胡麻的角有六个棱的、八个棱的，就是今天所说的“大麻”。有子实的是苴麻，没有子实的是苴麻。又叫做“牡麻”。张骞从大宛国得到麻油的种子，也称为麻，所以用胡麻加以区别，而把汉麻说成大麻。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后人既误出“天麻”一条，遂指赤箭别为一物；既无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为之，滋为不然。《本草》明称采根阴干，安得以苗为之？草药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为第一。此神仙补理养生上药。世人惑于天麻之说，遂止用之治风，良可惜哉。或以谓其茎如箭，既言赤箭，疑当用茎，此尤不然。至如鸢尾、牛膝之类，皆谓茎叶有所似，用则用根耳，何足疑哉。

赤箭就是今天的“天麻”。后人既然错误地另列出“天麻”一条，于是便把赤箭当成另外一种东西，既然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又把天麻苗当作赤箭，这就更加不对了。《本草》上分明说采根阴干，怎么能说成天麻苗呢？草药中的上品，除了“五芝”以外，要数赤箭为第一。这是神仙补养调理、保养身体的最好的药。人们因为迷惑于天麻的说法，于是只用它作治风症，实在是可惜啊！说它的茎象箭，既然叫赤箭，就以为该用它的茎，这更加不对。象鸢尾和牛膝等等，都是因为它们的茎叶类似于鸢尾、牛膝而得名，而作药用的还是用根，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识天名精，又妄以地菘为“火菘”，《本草》又出“鹤虱”一条，都成纷乱。今按地菘即天名精，盖其叶似菘，又似蔓菁（名精，即蔓青也。），故有二名；鹤虱即其实也。世间有单服火菘法，乃是服地菘耳，不当用火菘。（火菘，本草名“稀菘”，即是渚膏苗，后人不识，亦重复出之。）

地菘就是“天名精”。人们既不认识天名精，又错把地菘当作“火菘”，《本草》中又另外列出“鹤虱”一条，十分纷乱。现在考证，地菘就是天名精，大概它的叶子象菘，又象蔓菁，所以有两个名称。鹤虱就是它的果实。世间有单独服用火菘的方法，实际就是服用地菘，不应该是火菘。（火

菝，《本草》中名叫“稀菝”，就是渚膏苗，后人不认识，又重复列出一条。）

南烛草木，记传《本草》所说多端，今少有识者。为其作青精饭色黑，乃误用乌桕为之，全非也。此木类也，又似草类，故谓之“南烛草木”，今人谓之“南天烛”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庭槛之间，茎如朔藟，有节；高三、四尺，庐山有盈丈者，叶微似楝而少；至秋则实赤如丹。南方至多。

有关南烛草木，前人写的记传和《本草》的说法有很多。现在很少有人能识别，因为用它做出的青精饭呈黑色，这是错把乌桕当成了南烛，全错了。南烛属木本，又象草本，所以被称为“南烛草木”，也就是今天称作“南天烛”的那种植物。南方人大多把它种植在庭园栏杆间，它的茎象朔藟，有节，有三、四尺高，庐山上有一丈把高的，叶子有点象苦楝树叶但较稀疏，到秋天结的果实红如丹砂。南方最多。

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卤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六角，端正似刻，正如龟甲。其裙襴小椭，其前则下刻，其后则上刻，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折，莹明如鉴；折处亦六角，如柳叶，火烧过则悉解折，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洁可爱。此乃稟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楚州盐城古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名“太阴玄精”，然喜暴润，如盐碱之类。唯解州所出者为正。

太阴玄精，出产于解州盐池的盐卤中，由沟渠的土中得到。大的有杏叶般大，小的有鱼鳞般大，全呈六角形，外形端正得如同刀切刻一般，正如龟甲的形状。其四周围稍微倾斜，前边的晶面斜向下，后边的晶面斜向上。龟甲形的晶体一片片互相重叠，就完全如同穿山甲的鳞片相叠一样。呈绿色而且透明，如果敲打它，它就会沿着纹理而断裂，表面如同镜子那样光亮，裂开的地方也是六角形形状，样子象柳叶用火烧过，就会全部裂开，薄如柳叶，片片分离，象霜和雪那样平滑洁白可爱。这是由于承受了阴气而凝结的缘故，所以都呈六角形。现在世上所用的玄精，是绛州山中出产的绛石，并不是玄精。在楚州盐城县古盐仓下面的土中，又出产一种东西，呈六棱形状，样子很象马牙硝，象水晶一样清澈透明，润泽可爱，那里的人也把它叫做太阴玄精。但是这种东西象盐碱那样容易吸潮。唯有解州出产的才是正宗的太阴玄精。

稷乃今之稷也，齐、晋之人谓“即”“积”皆曰“祭”，乃其土音，无他义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属。《大雅》：“维秬维秠，维糜维芑。”秬、秠、糜皆黍属，以色为别：丹黍谓之糜。今河西人用“ ”字而音“糜”。

稷就是今天的稷，齐、晋地方的人把“即”、“积”都说成“祭”，这是他们当地口音，没有其他意义。《本草》注中说：“另外又叫做糜子。”糜子是黍属。《大雅》说：“维糜维芑，维糜维芑。”秬、秠、糜、芑都是黍属，以颜色为区别：红黍被称为糜。现在河西人用作“糜”字但读音仍是“糜”。

苦耽即《本草》酸浆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条。河西番界中酸浆有盈丈者。

苦耽就是《本草》中说的酸浆。《新集本草》中又重复出了“苦耽”一条。河西胡人地带的酸浆有一丈高的。

今之苏合香，如坚木，赤色。又有苏合油，如胶，今多用此为苏合香。按刘梦得《传信方》“用苏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虫动，气烈者佳也。”如此则全非今所用者。更当精考之。

今天的苏合香，木质如同坚木，颜色为红色。另外有苏合油，如同胶，现在人们大多用苏合油制成苏合香。根据刘梦得在《传信方》中提到苏合香的用法说：“皮薄，子如金色，按它便收缩变小，松开就起来，长时间不定，象虫子动，气味浓烈的为好。”象这样的话，他所说的根本不是现在人们所用的苏合香。应当再作更精细的考查。

薰陆即乳香也，本名“薰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熔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

薰陆就是乳香，原本名为“薰陆”，因为它滴下如乳头，所以被称为“乳头香”。熔塌在地上的，被称为“塌香”，如同腊茶有“滴乳”、“白乳”之品，怎能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极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误也。

山豆根味道很苦，《本草》中说“味甘”，真是大错了。

蒿之类至多，如青蒿一类，自有两种：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谓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栎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独青，气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为胜。

蒿的种类极多，如青蒿一类便有两种：有黄色的，有青色的。《本草》所说的“青蒿”，恐怕又是另外一种。陕西绥州、银州一带有青蒿，在蒿丛中间，时有一两株根本不同的青色蒿，当地人把它称为“香蒿”，“香蒿”的茎叶与普通的蒿完全相同，但普通的蒿是呈绿色，而这种蒿颜色呈青翠色，就如同松栎的颜色。到深秋时节，其他的蒿都枯黄了，唯独这种蒿颜色青翠，略有芬芳的气味。恐怕古人所用的，以这种蒿最好。

按文蛤即吴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车螯也。海蛤今不识，其生时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棋子，细者如油麻粒，黄白或赤相杂，盖非一类。乃诸蛤之房，为海水苍砺光莹，都非旧质。蛤之属，其类至多。房之坚久莹洁者皆可用，不适指一物，故通谓之海蛤耳。

据文献记载，文蛤就是吴人吃的花蛤，魁蛤也就是车螯，而海蛤又是什么今天不得而知，活的海蛤只能在海岸泥沙中得到，大的有棋子般大，细小的如同油麻粒那般大，呈黄白色，有的还杂有红色，大约不是一类。各种蛤的外壳被海水冲磨得光洁晶莹，根本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蛤的种类很多，

外壳坚硬光泽晶莹洁净的都可用，不只指一种，所以将它们通称为海蛤。

今方家所用漏芦，乃飞廉也。飞廉一名漏芦，苗似苦苣，根如牛蒡绵头者是也。采时用根。今闽中所用漏芦，茎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采时用苗。《本草》自有一条，正谓之“漏芦”。

现在方家用的漏芦就是飞廉。飞廉另外又叫做漏芦，其苗似箬叶，根象牛蒡、绵头的便是。采取的时候用根。现在福建地区用的漏芦，茎象油麻，高有六七寸，深秋时候变得如漆一样枯黑，采取时用苗入药。《本草》中已列有一条，正叫做“漏芦”。

《本草》所论赭魁，皆未详审。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靴，闽、岭人谓之“余粮”。本草“禹余粮”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本草》中论述的赭魁，都没有经过仔细查考。现在南方有很多这种赭魁，皮黑肉红，样子象何首乌，切破来看，里面红白相间，纹理如同槟榔，有红褐色的汁液，南方人用来染皮制靴。闽中、岭南地方的人把它称为“余粮”。《本草》中“禹余粮”注释中所引的就是这种植物。

石龙芮今有两种：水中生者，叶光而未圆；陆生者，叶毛而未锐。入药用水生者，陆生亦谓之“天灸”，取少叶揉系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烧者是也。

石龙芮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水中生的，叶面光滑而叶端圆；一种是陆地上生的，叶子上有毛而叶端尖锐。入药用水生的。陆生的又被叫做“天灸”，取几片叶子揉碎敷在手臂上，一个晚上手臂上就起大泡，如同被火烧一样的就是这种东西。

麻子，海东来者最胜，大如莲实，出柘罗岛。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余皆下材。用时去壳，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汤中浸，候汤冷，乃取悬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干，就新瓦上轻掇，其壳悉解，簸扬取肉，粒粒皆完。

麻子以东海来的最好，如莲米般大小，出产于柘罗岛。其次要数上郡北方出产的，如大豆般大小，也好。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产的都不好。用的时候要去壳。方法是：把麻子用帛包起来，放在热开水中浸泡，待水冷之后，就取出来悬在井中过一晚，不要让它沾水，第二天放在太阳下曝晒，晒干之后放在新瓦上轻轻地掇，它的壳就全都脱开，再用簸箕扬去壳取其肉，粒粒都完好。

补笔谈卷一 故事

故事：不御前殿，则宰相一员押常参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韩忠献当国，遇奏事退晚，即依旧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乐道为御史中丞，弹奏语过当，坐谪陈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时未退，即一面放班，遂为定制。

先例：皇上不能驾临前殿，就由宰相一人监督常参官再次叩拜后退出。神宗刚即位时，宰相禀报政事，经常到很晚的时候。韩忠献掌管朝政时，遇到禀报政事退出得晚，就按照旧例，自行退朝，没有什么书面的规定。王乐道当御史中丞时，弹劾参奏的话失当，犯了过错被贬到陈州。从这时起就命辅佐大臣在禀报时，到了辰时还未退出，就自行退朝，因此成为固定的制度。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礼则推恩迁一官，有增俸。熙宁中，张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师致仕，用子荫当迁仆射，廷议以为执政官非可以子荫迁授，罢之。前两府致仕，不以荫迁官，自此始。

先例：担任升朝官的，如有父亲辞官，遇到隆重的典礼就被封赠提升一级官职，还要增加薪俸。熙宁年间，丞相张杲卿在太子太师任上辞官，因此儿子得到荫庇应升为仆射，朝廷大臣议论认为执政官不能因此而让儿子得到荫庇提升官职，就没有执行。以前两府辞官，没有因为荫庇而升官，就从这里开始。

故事：初授从官给谏，未衣紫者，告谢日，面赐金紫。何圣从在陕西就任除待制，仍旧衣绯，后因朝阙，值大宴殿上，独从衣绯，仁宗问所以，中筵起，乃赐金紫，遂服以就坐。近岁许冲元除知制诰，犹著绿，告谢日，面赐银绯。后数日，别因对，方赐金紫。

先例：当初给皇上的近臣授予给事中或谏议大夫官职时，没有穿紫色朝服的，到向皇上谢恩时，皇上直接赏赐金鱼袋和紫衣。何圣从在陕西等待任命命令，仍然像以前一样穿红衣，仁宗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在筵席上站起来，皇上就赏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于是穿好回到座位上。近年许冲元被任为知制诰，还穿着绿衣，到谢恩时，皇上赏赐银红衣。过了几天，另外接见时，才赏赐金鱼袋和紫衣。

自国初以来，未尝御正衙视朝。百官辞见，必先过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两拜而出；别日却处内朝。熙宁中草“视朝仪”，独不立见辞谢班。正御殿日，却谓之“无正衙”，须候次日依前望殿虚拜，谓之“过正衙”，盖阙文也。

自从本朝开始以来，不曾用正衙临朝听政。文武百官辞别拜见皇上，一定要先经过正衙。正衙即便不亲临，只要望大殿两拜就可退出，另选一天还是要赶去内朝。熙宁年间起草“视朝仪”，唯独没有制订拜见、告辞、谢恩的规矩。供奉帝王的物品摆在大殿时，就说是“没有正衙”，要等到第二天照以前那样望大殿虚拜，说是“经过正衙”，大约是文字有缺漏吧。

熙宁三年，召对翰林学士承旨王禹玉于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

熙宁三年，皇上在内东门小殿召翰林学士承旨王禹玉回答问题，到夜深时，赏赐银台蜡烛，两人带领回归院中。

夏郑公为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东中徙知蔡州，道经许昌，时李献臣为守，乃徒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时以为知体。庆历中，张邓公还乡，过南阳，范文正公亦虚室以待之，盖以其国爵也。遂为故

夏郑公做忠武军节度使时，从河东中调任蔡州知州，途经许昌，那时李献臣是许昌太守，就搬到别的房子住，腾出自己的住宅等待夏郑公，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懂礼。庆历年间，张士逊回故乡，经过南阳，范仲淹也腾出房子来待他，那是因为他是国爵。于是太守的事成了先例。

国朝仪制，亲王玉带不佩鱼。元丰中，上特制玉鱼袋，赐扬王、荆王施于玉带之上。

本朝的规矩，亲王的玉带上不佩带鱼皮饰品。元丰年间，皇上特制玉质鱼袋，赏赐给扬王、荆王挂在玉带上。

旧制：馆职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试，唯检讨不试。初置检讨官，只作差遣，未比馆职故也。后来检讨给职钱，并同带职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试。

过去的规矩是：弘文馆的职务从校勘以上，除非特别任命的都要先行考试，只有检讨官不必考试。刚开始设立检讨官时，只当作差遣用，并不等同于弘文馆职务的缘故。后来检讨官也发给薪俸，并且连同兼职在校勘之上的，也依循老规矩不必考试。

旧制：侍从官学士以上方腰金。元丰初，授陈子雍以馆职，使高丽还，除集贤殿修撰，赐金带。馆职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过去的规矩是：侍从官学士以上的官职才在腰带上镶着金饰。元丰初年，任命陈子雍担任弘文馆的职务，出使高丽回来后，封他为集贤殿修撰，皇上赏赐金带。弘文馆的官员腰带镶金，是因为有特殊的恩赐，不是有先例。

今之门状，“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唐人都堂见宰相，或参辞谢事先具事因，申取处分。有非一事，故称“件状如前”，宰相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敬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予曾见白乐天诗稿，乃是新除寿州刺史李（忘其名）门状，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数十言，其末乃言谨祇候辞某官。至如稽首之礼，唯施于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则虽交游皆稽首，此皆生于谄事上官者，始为流传，至今不可复革。

现在的名片上，有“名片分列状如前，谨书写名片”的字样。这是唐代都堂拜见宰相的礼节。唐代的都堂拜见宰相，或是参辞谢事先要详细说明事情的因由，申报请求处理。有不止一件事的，所以说“分列状如前”，宰相在状后决定引进，才准许拜见。后人渐渐地把这种礼节用到掌管政事的

大官的私宅。小说中记述用到私宅的事，从李德裕开始。近年来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不论对方地位高低，一律用这种礼节，称为“大状”。我曾见过白居易的诗稿，竟是新任命的寿州刺史姓李的（忘了他的名字）的名片，那前面叙述住在京城的来由及改变职务和被差遣的话有几十字，到末尾才说恭谨地等候告辞某官。另外像叩头的礼节，只对君主用；大夫的臣属不叩头，因为亚于君主。如今却成了即使普通朋友之间也叩头，这都是从那些巴结上级官员的人开始的，才流传开来，到现在不能再变回去。

辩证

今人多谓廊屋为庑。按，《广雅》：“堂下曰‘庑’。”盖堂下屋檐所覆处，故曰“立于庑下”。凡屋基皆谓之堂，廊檐之下亦得谓之庑，但庑非廊耳。至如今人谓两廊为东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东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谓之“荣”；荣，屋翼也，今之两徘徊，又谓之“两厦”。四柱屋则谓之“东西溜”。今谓之“金厢道”者是也。

现在的人多把廊屋称为庑。根据《广雅》说：“堂下叫做‘庑’。”大概是堂下屋檐覆盖的地方，所以说“立于庑下”。一般屋基都称为堂，廊檐之下也得称为庑，但是庑并不是廊。现在人们把两廊称为东西序，也不对。序是堂上东西壁，在室外的。序的外面称为荣，荣就是屋翼，现在的西徘徊，又称为“两厦”。四柱屋就称为“东西溜”，就是现在被称为“金厢道”的。

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南人谓之“朴”，“朴”亦言“驳”也，但声之讹耳。《诗》“隰有六驳”是也。陆玠《毛诗疏》：“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人云：‘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得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驳似马之驳者。今解《诗》用《尔雅》之说；以为“兽锯牙，食虎豹”，恐非也。兽动物，岂常止于隰者？又与苞栎、苞棣、树槿非类，直是当时梓榆耳。

南方人把梓榆称为“朴”，齐鲁一带的人就称为“驳马”。“驳马”，就是梓榆。南方人把它称为“朴”，“朴”也说成“驳”，只是“朴”的音读错罢了。《诗经》中“有六驳”便是这样。陆玠《毛诗疏》说：“檀木，皮像作文叙述似的，又像毛色不纯的马。有人说：‘砍削檀木不明白成了一篇文章，写文章还可成为毛色不纯的马。’”大概这三种树木相似。现在梓榆皮很像檀木，因为它斑驳像马的毛色不纯。如今解释《诗经》用《尔雅》的说法，以为“兽锯牙，食虎豹”，恐怕不对。兽是动物，怎么会经常停在低湿的地方？这种树又与苞栎、苞棣、树槿不同类，应当是当时的梓榆了。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其曰“先王尝游高唐”，则梦神女者，怀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环姿玮态，不可胜赞。’玉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玉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称“玉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余”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自古说“楚襄王梦与神女遇”。用《楚辞》来考察这个传说，似乎并不是这样。《高唐赋》序说：“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这篇序说：“先王尝游高唐。”那么梦见神女的，是怀王，不是襄王。另外，《神女赋》序中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王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环姿玮态，不可胜赞。’对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从文中考察，所说的“茂矣”到“不可胜赞”等等，都是襄王的话，宋玉称叹是可以的，但却不应该说：“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说“明日以白玉”，国君与他的臣子说话，不应该称“白”。另外《神女赋》叹说：“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如果宋玉为襄王作赋如宋玉自己说的，就不应当自己说：“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然说“玉览其状”，就是宋玉的话。又不知道称“余”的是谁。由此考证，“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中的王字是玉字。“明日以白玉者”是“白玉”。“王”与“玉”写错罢了。前日梦神女的人是怀王，这夜梦神女的是宋玉。这件事与襄王无关，从来冤枉担了这个名声罢了。

《唐书》载：“武宗宠王才人，尝欲以为皇后。帝寝疾，才人视左右。熟视曰：‘吾气奄奄，顾与汝辞，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一殉。’及大渐，审帝已崩，即自经于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按，李卫公文武《两朝献替记》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以嫉妒忤旨，日夕而陨，群情无不惊惧，以为上成功之后，喜怒不测。”与《唐书》所载全别。《献替记》乃德裕手自记录，不当差谬。其书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据《献替记》所言，则王氏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赠。按，《张祐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其恳，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详此，则《唐书》所载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唐书》记载：“武宗宠爱王才人，曾想把她立为皇后。武宗卧病，王才人看视在武宗身边。武宗仔细看着王才人说：‘我已气息奄奄，看来要与你分别了，怎么办？’王才人回答说：‘陛下去世后，妾要以死相殉。’过了很久，看到武宗已死，就在帐幕旁吊死。宣宗即位，嘉奖她的贞节，赠为贤妃。”根据李卫公文武《西朝献替记》记载：“自从皇上到来交媾，王妃有专房之宠，因为嫉妒违抗了圣命，日夕而死，大家没有不惊惧的，认为皇上成功之后，喜怒无常，无法预测。”与《唐书》所记载的完全不同。《献替记》是德裕亲手记录的，不应当有差错，它记录王妃的死，已根本不同。根据《献替记》所说，那么王氏为妃已经很久了，也不是宣宗即位才开始追赠为妃。据《张祐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它的序中说：“武宗皇帝病重，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而获宠的，侍候在身边，武宗看着她说：‘我若有不讳，你怎么办呢！’孟才人指笙袋哭泣着说：‘请求用这个自缢而死。’武宗表现出十分怜悯的样子。孟才人又对武宗说：‘妾曾善歌，愿当着皇上的面唱一曲发泄内心的忧愤。’皇上因为她的恳切，同意她唱。于是唱了一曲《何满子》，站着气竭而死。皇上让医生诊候，医生说：‘脉还温，但肠已断。’”这样详细，那么《唐书》所记载的，又疑心是孟才人了。

建茶之美者，号“北苑茶”。今建州凤凰山，士人相传谓之“北苑”，言江南尝置官管辖，谓之“北苑使”。予因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

及《文苑纪》，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瓿”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晋公为《北苑茶》录云“北苑，地名也，今日龙焙。”又云：“苑者，天子园囿之名。此在列郡之东隅，缘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盖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误传，自晋公实之于书，至今遂谓之北苑。

建茶最好的，称为“北苑茶”。现在的建州凤凰山，士人相继称为“北苑”，说江南曾置宫管辖，称为“北苑使”。我因为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文苑纪》，知道北苑就是江南禁苑，在金陵，不是建安。江南的“北苑使”正如同今天的“内园使”。李后主时有“北苑使”擅长子制茶，人们都看得高贵，称为“北苑茶”，如同现在茶器中有“学士瓿”等等，都是因人而得名，并不是地名。丁晋公为《北苑茶》记载说：“北苑，是地名，现在叫龙焙。”又说：“苑是天子园囿的名称。这在列郡的东边，为什么却名叫北苑？”丁晋公自己也有疑惑，大概不知道“北苑茶”的“北苑”本来就不是地名，开始因为误传，从丁晋公写到书上，到现在就称它为北苑。

唐以来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语，而不考其意。凡说武人，多云“衣短后衣。”不知短后衣作何形制。短后衣出《庄子说剑篇》。盖古之士人，衣皆曳后，故时有衣短后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岂更复有短后之衣。

唐以来文人写诗文喜欢用古人语，但不考察古人语的含意。凡是说武人，多说“穿短后衣”，不知道短后衣是什么样子。短后衣出自《庄子·说剑篇》。大概古代的文人，衣服都拖后，所以时有穿短后衣的人。近代文人和百姓，衣都短后，哪里再有短后衣。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甚不谦。

班固议论司马迁作《史记》说：“《史记》所论，大大违背了圣人的是非标准，论大道理则以黄老为先，而以六经为后，叙述《游侠》则贬低处士，而突出奸诈的人，叙述《货殖》就推崇势利而鄙视贫贱。这些是《史记》的毛病。”据我考证，后汉王允说：“武帝不杀司马迁，致使他作诽谤的书，流传于后世。”班固所说的，就是王允所谓“谤”。其实，这正好是司马迁的精辟见解。所有《史记》的前后次序，记述评论，都有针对性，不是随便编写的。班固竟讥讽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大背离了圣人的是非标准”，这种评论是很不正确，很不公正的。

人语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间事，未尝离口也，而字书中须读作“否”音也。若谓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岂可谓之“否可”？“不然”岂可谓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岂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决非如此，止是字书谬误耳。若读《庄子》“不可乎不可”，须云“否可”，读《诗》须云“曷否肃雍”、“胡否饮焉”：如此全不近人情。

人们语言中有“不”字来表达对世间事物的可否，这个字经常出现从未离口，但在字书中应该读作“否”音。若说古今语言与读音不同，如说“不可”，怎能说成“否可”？“不然”怎能说成“否

然”？古人说：“否，不然也”，怎能说“否，否然也”？古人读音，决不是这样，只是字书错误罢了。如果读《庄子》“不可乎不可”，就要说“否可”，读《诗》就要说“曷否肃雍”、“胡否饮焉”，这样根本不近人情。

古人谓章句之学，谓分章摘句，则今之疏义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耳。今人或谬以诗赋声律为章句之学，误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如《易》云“终日乾乾”，两“乾”字当为两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终终之也。“王臣蹇蹇”，两“蹇”字为王与臣也。九五、六二，王与臣皆处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为冥鸿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应乎五故也，则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后人又改“蹇蹇”字为“蹇”，以“蹇蹇”比“谔谔”，尤为讹谬。“君子夫夫”，“蹇蹇”二义也。以义决其外，胜己之私于内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来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为连语，如“齟齬”“哑哑”之类读之，此误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啞人凶”，当为句。君子则夫夫矣，何咎之有，况于凶乎？“自天祐之吉”当为句，非吉而利，则非所当祐也。

《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谓：“汤没，至太甲方称元年。”按《孟子》，成汤之后，尚有外丙、仲壬，而《尚书》疏非之。又或谓古书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汤誓》、《仲虺之诰》、《汤诰》，皆成汤时诰命，汤没，至太甲元年，始复有《伊训》著于书，自是孔安国离其文于“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读之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则文自足，亦非缺落。尧之终也，百姓如服考妣之丧三年，百姓有命者也，为君斩衰，礼也。邦人无服三年，四海无作乐者，况畿内乎？《论语》曰：“先行”，当为句，其言自当后也。似此之类极多，皆义理所系，则章句亦不可不谨。

古人说的关于章句的学问，说是分章摘句，就是现今的疏通和阐发文义。过去有人看不起这种关于章句的学问，以为它不专于文词的思想内容罢了。现在有人甚至错误地把诗赋声律当作关于章句的学问，错了。但章句的意思不明了，也是影响思想内容的。如《易经》上说“终日乾乾”，两个“乾”字应该是两句，上句的“乾”知道达到道的最高境界，下句的“乾”知道事物的终结。“王臣蹇蹇”，两个“蹇”字指王与臣。九五、六二，王与臣都处在蹇卦中，王担当起艰难困苦，臣或者可以成为有理想的人；六二之所以不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与王相应和的缘故，那么六二的“蹇”，就不是自身的缘故了。后人又把“蹇蹇”的字改成“蹇”，把“蹇蹇”等同“谔谔”，更是错误。“君子夫夫”，“夫夫”有两个意思。用它的意思来判断它外面的事，超过在里面对自己个人的事的判断。凡属是卦名重叠说出的，都兼顾上下卦，像“来之坎坎”就是这样。以前的学者大多以为是连续的词，如同“齟齬”“哑哑”那样的读法，这是断句错了。另外“履虎尾啞人凶”，应是一句。君子已经果断了，哪里有什么灾祸，更何况是不吉利？“自天祐之吉”，应是一句，不吉利而得到好处，那就不应当保佑了。

《尚书》说：“成汤已经死了，在太甲元年。”孔安国说：“汤死，到太甲才称为元年。”查一下《孟子》，成汤之后，还有外丙、仲壬，那《尚书》的解释不对。另有人说古书有缺损的，文字不完全。据我的考证，《汤誓》、《仲虺之诰》、《汤诰》，都是成汤时的诰命，汤死，到太甲元年，才又有《伊训》写在书上，从这里孔安国离开那文句在“太甲元年”的下面注释，就似乎可疑。假如连同下文读它说：“成汤已死，太甲元年伊尹写成《伊训》”，那文句就完整了，也没有什么缺漏。尧去世时，百姓像守父母的丧一样守丧三年，百姓中有使命的，为君主穿着丧服，这就是礼貌。全国的人三年不脱丧服，全国没有奏乐的，何况王都周围呢？《论语》说：“先行”，应是一句，它说的

自然是指后面的。像这样的情况很多，都牵涉到思想内容，那么章句也就不可不小心注意了。

古人引《诗》，多举《诗》之断章。断音段，读如“断截”之“断”，谓如一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取义，不取全篇之义，故谓之断章。今之人多读为断章，断音锻，谓诗之断句，殊误也。诗之末句，古人只谓之“卒章”，近世方谓“断句”。

古人引用《诗经》，大多列举《诗经》的章节。断音段，读作“断截”的“断”，意思是如在一首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之义，不取全篇之义，所以称为断章。现在的人多读为断章，断音锻，意思是诗的断句，错极了。诗的最后的句子，古人只称为“卒章”，近代称为“断句”。

古人谓帛，言“玄纁五两”者，一玄一纁为一两。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黄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渍、丹秫染之。《尔雅》：“一染谓之‘纁’。”纁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谓之‘窵’。”纁，纁也。“三染谓之‘纁’。”盖黄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帛，以皂帛为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谓之盛者非也。

古人称帛，说“玄纁五两”的，以一玄一纁为一两。玄是红黑色，像天的色；纁是黄红色，像地的色。所以天子的六种冠服，都是玄衣纁裳，用朱渍、丹秫浸染成的。《尔雅》说：“一染称为‘纁’。”就是今天的茜根染的色，是浅红色。“再染称为‘窵’，”窵就是纁。“三染称为‘纁’。”大概是黄红色。“玄”和“纁”是两样东西。今天用帛，用皂帛为玄纁，是不对的。古代称束帛的，用五匹屈曲捆束，现在用十匹，不对。《周易》说：“束帛戔戔”。戔戔是少，说它是多就错了。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辈，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陆德明吴人，多从吴音，郑康成齐人，多从东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赎刑”，赎音树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谓赎为“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如“疡医祝药劓杀之齐”，“祝”音咒，郑康成改为“注”，此齐、鲁人音也。至今齐谓注为“咒”。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之“尚书”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谓尚书为“常”。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等人，原本是河朔人，反切字音大多用北方口音。陆德明是吴人，反切字多依从吴地口音。郑康成齐人，反切字音多依从东音。如“璧有肉好”，把肉说成揉的，是北方人口音。“金作赎刑”，把赎音读作树的也是北人口音。到现在河朔人把肉音说成“揉”，把赎读成“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都是吴地口音。如“疡医祝药劓杀之齐”，“祝”读作“咒”音，郑康成则改为“注”，这是齐、鲁人的口音。到现在齐鲁把注当作“咒”。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把它称为“尚书”的，是秦人的口音。到现在秦人把尚书中的尚称为“常”。

乐 律

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太平兴国年间，琴待诏朱文济弹琴技艺为天下第一。京师僧人慧日大师夷中都学到了他的方法，把它传授给越僧义海。义海要深入研究夷中的技艺，于是到越州法华寺研习弹琴技艺，谢绝宾客来往，累计十年不下山，昼夜都不放下琴弦，于是探究了琴的奥妙。天下跟随义海学琴的人极多，像车辐集中于轴心一样。没有人达到奥妙的境地。义海现在老了，琴的指法技艺到这就断绝了。义海读书能写文章，士大夫多与他交往，但义海独以能奏琴而著名。义海的技艺并不在于声，他意韵萧然的琴声，是在声外得到的，这就是大家不及的地方。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七声：宫、羽、商、角、徵、变宫、变徵也。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声。外则为犯。燕乐七宫：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七商：越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钟角。七羽：中吕调、南吕调、仙吕调（又名高平调）、黄钟羽（又名大石调）、般涉调、高般涉、正平调。

12律，每律的名目用法各有不同。正宫大石调、般涉调有7种声调：宫、羽、商、角、徵、变宫、变徵。现在的燕乐有28个调，用的声调各有不同。正宫大石调、般涉调都用9个声调：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大石角同这一样，增加下五，共10个声调。中吕宫双调、中吕调都用9个声调：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双角同这一样，增加高一，共10个声调。高宫、高大石调、高般涉都用9个声调：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这一样，增加高四，共10个声调。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都用9个声调：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小石角增加勾字，共10个声调。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都用7个声调：正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增加下工，共8个声调。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都用9个声调：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增加高工，共11个声调。黄钟宫、越调黄钟羽都用9个声调：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增加高凡，共10个声调。这以外就是“犯”。燕乐有7宫：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

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7 商：越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7 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钟角。7 羽：中吕调、南吕调又叫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又叫大石调、般涉调、高般涉、正平调。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亦不能尽归本律，故有祖调、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杀。凡此之类，皆后世声律读乱，各务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间亦自有伦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备纪。

12 律加上清宫，应该有 16 个声调，现在的燕乐只有 15 个声调，大概现在的音乐比古代的音乐高 2 律以下，所以没有正黄钟声调。现在的燕乐只用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即使是这样，但各调的杀声，也不能全回到本律上来，所以有祖调、正犯、偏犯、旁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东。像这一类的情况，都是后代声律混乱了，各自追求新奇，音律的规则错乱了。但是从它们中间来看也还是有次序有规矩的，擅长的人都能说出来，这里不能全部记述。

乐有中声，有正声。所谓中声者，声之高至于无穷，声之下亦无穷，而各具十二律。作乐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声，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应天地之节。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盈丈之弦，其节亦十三；盈尺之弦，其节亦十三，故琴以为十三徽。不独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为磬之法，已上则磨其端，已下则磨其旁，磨之至于击而有韵处，即与徽应，过之则复无韵；又磨之至于有韵处，复应以一徽。石无大小，有韵处亦不过十三，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近世金石之工，盖未尝及此。不得正声，不足为器；不得中声，不得为乐。

音乐有中声，有正声。所谓中声，指声音高到无穷，声音低也无穷，但各自都有 12 律。制作音乐的人一定要寻找那高低之间最合适的声音，不这样就不能够得到非常和协的音，适应天地的节奏。所谓正声，如同弦乐有 13 泛韵，这是 12 律自然的节奏。一丈长的弦，它的节奏也是 13；一尺长的弦，它的节奏仍是 13，所以琴把它定为 13 徽。不仅弦乐是这样，金石类的乐器也是这样。考察工匠制磬的方法，上端过分了就磨它的端，下端过分了就磨它的边，磨到敲打起来有韵的地方，就与徽相应，超过了就没有韵了；再磨到有韵的地方，又与一徽相应。石不论大小，有韵的地方也不超过 13，就同弦有 13 泛声一样。这是天地间的大道理，人们不能在这中间增减一毫一厘。近年来制作金石类乐器的工匠，大都不曾达到这个水平。找不到正声，不能够制成乐器；找不到中声，不能够成为音乐。

律有四清宫，合十二律为十六，故钟磬以十六为一堵。清宫所以为止于四者，自黄钟而降，至于林钟官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则即以黄钟为角，南吕以大吕为角，则民声皆过于君声，须当折而用黄钟大吕之清宫。无射以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以大吕为商，角钟不可不用清

宫，此清宫所以有四也。其余徵羽自是事物用变声，过于君声无嫌，自当用正律，此清宫所以止于四而不止于五也。君臣民用从声，事物用变声，非但义理次序如此，声必如此然后和，亦非人力所能强也。

乐律有四清宫，连同 12 律共有 16，所以钟磬以 16 为一组。清宫之所以只到四为止，是因为从黄钟以下，到林钟官商角 3 律，都用正律，不违反尊卑的次序。到了夷则就以黄钟为角，南吕以大吕为角，那民声就超过君声，就一定要反过来用黄钟大吕的清宫。无射以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以大吕为商，角钟不能不用清宫，这就是清宫有四的原因。其他的徵羽本来是事物用变声，超过君声无关紧要，自然应该用正律，这就是清宫到四为止而不到五为止的原因。君臣民用从声，事物用变声，不仅内容次序是这样，声音也一定这样才能和协，也不是人力能够勉强的。

本朝燕部乐，经五代离乱，声律差舛，传闻国初比唐乐高五律，近世乐声渐下”，尚高两律。予尝以问教坊老乐工，云：“乐声岁久，势当渐下，一事验之可见：教坊管色，岁月浸深，则声渐差，辄复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响皆是古器。铁性易缩，时加磨莹，铁愈薄而声愈下。乐器须以金石为准，若准方响，则自当渐变。古人制器，用石与铜，取其不为风雨燥湿所移，未尝用铁者，盖有深意焉。律法既亡，金石又不足恃，则声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本朝燕部乐，经历了五代的离乱，声律的高低都已错乱。传说开国初年的音律比唐代乐音高五律，近代乐音逐渐变低，仍然高出二律。我曾问过教坊的老乐工，他说：“时间久远了，乐声必然会逐渐降低。”例举一事就可以加以验证：教坊用的管乐器，使用的时间很久，那么声音就逐渐地变了，总是时时更换。祖父时所用的管乐，现在大多不能再用，仅有方响还是从前的古器。铁性容易锈蚀而减缩，时常要把它磨光亮，铁片越薄，声音就越低。乐器要用金、石作为定音标准，如果用方响为定音标准，就自然会逐渐变化。古人用石和铜制作乐器，是取它们不因风雨燥湿而发生变化，不用铁来作，大概是有远见的。乐律的标准已经失传，金石又不足为依凭，那么乐音不得不变化，这也是自然的道理。

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辩。

古代乐钟都呈扁形，如同两片对合起来的瓦。大概钟圆声音就长，钟扁声音就短。声音短就有节奏，声音长就余音也长，在乐曲拍节急促的地方，余音都互相干扰，不成音律。后来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全都做成圆钟，急速敲击时就多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再也分辨不清声音的高低清浊了。

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琴瑟的弦都有相应和的音：宫弦就有少宫相应和，商弦就有少商相应和，其余的都相隔四根弦互相应和，现在曲子中要有应声，就必须按照这个规律。要想知道某一根弦的应弦，可以先把各条弦的音（依五音声阶）调准，然后剪纸人放在这根弦上。这样一弹它的应弦，纸人就会跳动，弹奏其他

弦，纸人就不动。如果琴弦的音高都相同，即使在其他的琴上弹，这张琴上的应弦同样也会振动，这就叫做“正声”。

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更有折声，唯合字无，折一分、折二分、至于折七八分者皆是。举指有浅深，用气有轻重。如笙箫则全在用气，弦声只在抑按，如中吕宫一字，仙吕宫五字，皆比他调高半格，方应本调。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音乐中有敦、掣、住三种声，一敦一住，各当一个字，一个大字住当两个字，一掣减少一字，像这样快慢才适应节奏。琴瑟也是这样。另外有折声，只合字就没有，折一分、折二分、直到折七八分的都这样。动手指有浅有深，用力有轻有重。如笙箫就完全在于用气，弦乐只在于压、按。像中吕宫一个字，仙吕宫五个字，都比别的乐调高出半格，才能适应本调。这些只有皇宫中的演奏员才懂，外面普通的乐师大都不明白了。

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稽琴格”。

熙宁年间，宫中举行宴会，教坊的演奏员徐衍弹奏稽琴，刚开始进酒时一根弦便断了。徐衍不再换琴，只用一根弦奏完了乐曲。从此开始成为“一弦稽琴格”。

律吕宫商角声各相间一律，至徵声顿间二律，所谓“变声”也。琴中宫商角皆用缠弦，至徵则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与九徵应，独徵声与十徵应，此皆隔两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虽增少宫、少商，然其用丝各半本律，乃律吕清倍法也。故鼓之六与一应，七与二应，皆不失本律之声。后世有变宫、变徵者，盖自羽声隔八相生再起宫，而宫生徵，虽谓之宫、徵，而实非宫徵声也。变宫在宫、羽之间，变徵在角、徵之间，皆非正声，故其声庞杂破碎，不入本均，流以为郑卫，但爱其清焦，而不复古人纯正之音。惟琴独为正声者，以其无间声以杂之也。世俗之乐，惟务清新，岂复有法度，乌足道哉。

律吕宫、商、角声之间各间隔一律，到徵声一下子间隔二律，这就是“变声”。琴中宫、商、角都用缠弦，到徵改用平弦，隔一根弦弹奏，都与九徵相应，唯独徵声与十徵相应，这都是相隔两律的规则。古时的规则只有五音琴是这样，即使是增加了第六弦、第七弦，但它们用的丝各自只有本律的一半，这就是律吕清倍法。所以琴的第六弦与第一弦相应，第七弦与第二弦相应，都不背离本律的声音。后代有变宫、变徵，大约是从羽声起相隔八相生再开始宫，而宫生徵，即使叫做宫徵，但实际上不是宫徵的声音了。交宫在宫羽之间，变徵在角徵之间，都不是正声，所以它的声音庞杂破碎，不能进入本韵，流成为郑、卫一样的俗乐，只是喜欢它的清焦，但不再是古人那纯正之音了。惟有琴独独保持着正声，因为它没有别的杂声混杂在里面。世俗的音乐，只是追求清新，哪里能再讲究法度，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十二律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

今为南昌宫，用“尺”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今燕乐皆无；太簇商，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大簇角，今为越角，用“上”字；大簇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商，今燕乐皆无；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调，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大吕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四”字；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

12律配燕乐28调，除了设有徽音之外，凡属是杀声黄钟宫现在成了正宫，用“六”字；黄钟商，现在成了越调，用“六”字；黄钟角，现在成了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现在成了中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现在的燕乐都没有；林钟宫，现在成了南吕宫，用“尺”字；林钟商，现在成了小石调，用“六”字；大吕宫，现在成了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现在的燕乐都没有；太簇商，现在成了大石调，用“四”字；太簇角，现在成了越角，用“上”字；太簇羽，现在成了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现在成了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现在成了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商，现在的燕乐都没有；姑洗角，现在成了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现在成了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现在成了道调宫，用“上”字；中吕商，现在成了双调，用“上”字；中吕角，现在成了高大石调，用“六”字；中吕羽，现在成了仙吕调，用“尺”字；林钟角，现在成了双角，用“四”字；林钟羽，现在成了大吕调，用“尺”字；夷则宫，现在成了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现在的燕乐都没有；南吕商，现在成了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现在成了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现在成了般涉调，用“四”字；无射宫，现在成了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现在成了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现在的燕乐没有；无射羽，现在成了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现在的燕乐都没有；应钟角，现在成了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现在的燕乐没有。

补笔谈卷二 象数

又一说：子午属庚（此纳甲之法，震初爻纳庚子庚午也。），丑未属辛（巽初爻纳辛丑辛未也。），寅申属戊（坎初爻纳戊寅戊申也。），卯酉属己（离初爻纳己卯己酉也。），辰戌属丙（艮初爻纳丙辰丙戌也。），巳亥属丁。（兑初爻纳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宫与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属土。余皆仿此，）三言而得之者，徵与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属火。）五言而得之者，羽与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己。故皆属水。）七言而得之者，商与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己。故皆属金。）九言而得之者，角与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己。故皆属木。）此出于《抱朴子》，云是“河图、玉版之文”。然则一何以属土，三何以属火，五何以属水？其说云：“中央总天之气一，南方丹天之气三，北方玄天之气五，西方素无之气七，东方苍天之气九。”皆奇数而无偶数。莫知何义，都不可推考。

又有一种说法：子午属庚（这是纳甲之法，震初爻纳庚子庚午），丑未属辛（巽初爻纳辛丑辛未），寅申属戊（坎初爻纳戊寅戊申），卯酉属己（离初爻纳己卯己酉），辰戌属丙（艮初爻纳丙辰丙戌），巳亥属丁（兑初爻纳丁巳丁亥）。一个字就得到的，是宫与土。（假如让庚子庚午，一个字就得庚；辛丑辛未，一个字就得辛；戊寅戊申，一个字就得戊；己卯己酉，一个字就得己；所以都属土。其他的都照这样。）三个字就得到的，是徵与火。（假如让戊子戊午，都是三个字就得庚；己丑己未，都是三个字就得辛；丙寅丙申，都是三个字就得戊；丁卯丁酉，都是三个字就得己。所以都属火。）五个字就得到的，是羽与水。（假如让丙子丙午，都是五个字就得庚；丁丑丁未，都是五个字就得辛；甲寅甲申，都是五个字就得戊；乙卯乙丑，都是五个字就得己。所以都属水。）七个字就得到的，是商与金。（假如让甲子甲午，都是七个字就得庚；乙丑乙未，都是七个字就得辛；壬申壬寅，都是七个字就得戊；癸丑癸酉，都是七个字就得己。所以都属金。）九个字就得到的，是角与木。（假如让壬子壬午，都是九个字就得庚；癸丑癸未，都是九个字就得辛；庚寅庚申，都是九个字就得戊；辛卯辛酉，都是九个字就得己。所以都属木。）这些都出自《抱朴子》，说是“河图、玉版的文字”。既然如此，那么一为什么属土，三为什么属火，五为什么属水？它是这样说的：“中央总天之气一，南方丹天之气三，北方玄天之气五，西方素天之气七，东方苍天之气九。”都是奇数却没有偶数。不知是什么意思，都不能够推求考究。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谓之“入易”，吴人谓之“倒布”。壬日气候如本月，癸日差温类九月，甲日类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时节即温，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后，自如时令。此不出阴阳书，然每岁候之，亦时有准，莫知何谓。

民间的习俗：十月间遇到壬日，北方人叫做“入易”，吴地人叫做“倒布”。壬日的气候像它那个月，癸日略显温暖像九月，甲日像八月。像这样倒布，一直到辛日。如十一月，遇到春秋时节就

温暖，到夏天就暑热，到冬天就寒冷。辛日以后，自然像时令一样。这些没有超出阴阳书，但每年等着，也有时准确，不知道怎么来的。

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百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复有早晚？予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月正午而生者为“潮”，则正子而生者而“汐”，正子而生者为“潮”，则正午而生者为“汐”。

卢肇论说海潮，以为是固为太阳的升落激起来而形成的，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如果因为是太阳的升落所引起的，那么海潮每天发生的时间是有规律的，怎么潮来又有早晚呢？我曾经考察海潮涨落的规律，每到月球正好运行到子、午的位置时就有海潮发生，按这一条规律来观察海潮，总是没有丝毫误差。（这是在海边上观察得到海潮产生的时刻。离海远，就应该根据地理位置增添时刻了。）当月球正好到子午位时产生的叫“潮”，那么月球正好到子位时产生的叫“汐”；正好到了子位时发生的叫“潮”，那么正好到了午位时发生的便叫“汐”。

历法见于经者，唯《尧典》言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置闰之法，自尧时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闰之法，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谓之一日；月一盈亏，谓之一月。以日月纪天，虽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复与日会；岁十二会而尚有余日，积三十二月，复余一会，气与朔渐相远，中气不在本月，名实相乖，加一月谓之“闰”。闰生于不得已，犹构舍之用礅楔也。自此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岁事之舒惨。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则朔在气前者是也，徒谓之乙岁之春，而实甲岁之冬也；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则朔在气后者是也；徒谓之甲岁之冬，乃实乙岁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为实，而生杀之实反为寓，而又主闰月之赘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问，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陵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不须改旧法。唯月之盈亏，事虽有系之者，如海、胎育之类，不预岁时，寒暑之节，寓之历间可也。借以元祐元年为法，当孟春小，一如此历日，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怒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于之说者。

历法在经书中见到的，只有《尧典》说：“用设置闰月的方法调整历法上一年的长度，以便按节令确定四季。”设置闰月的方法，从尧帝时就开始有，远古以前，又不知如何。设置闰月的方法，是先圣王遗下的，固不当议论。但有的事情是古人没有认识到，而有待于后人解决的，如岁差之类便是近代才发现，这当然就谈不上是今人议论古人了。一般太阳出没一次，称为一天；月球盈亏一次，称为一月。用日月记天时，虽定名，但月球运行 29 天多，又与太阳相会，一年 12 次相遇还有多余的日，积 32 月，再余一会。由于朔望月的日数少于二个中气之间的日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气与朔日

就离得越来越远，以致中气落后到下一个月份，中气不在应该在的月份，这个月的名称和实际节气就不相符合，增加一个月叫做“闰”。“闰”的产生出于不得已，如同造房子用的石楔子。加了闰月之后，虽然中气在应该在的月份了，但节气和朔日还是时前时后，历年时长时短与回归年总不一致，历法上的四季不能正当节令，算起来十分繁杂而琐碎。积数月而成为一季，合四季而成一年，寒去暑来，万物的生长衰亡变化的规律，都是由于24节气决定的。仅仅记月亮的圆缺，与一年的农事兴衰好坏就全无关系。现在历法上用朔来定12个月，节气反而不能表示一个月的时政。历法上已称为春季了，但依旧是冬季的肃杀的景象，这是由于朔在节气前面的缘故，光说是乙岁的春季，实际上是甲岁的冬季。历法上仍然称为冬季，但已是万物生长发育的时令了，这是由于朔在节气后面的缘故，光说是甲岁的冬季，实际上是乙岁的春季了。按朔定的不反映气候特征的正二三四月成了定季节的基础，而实际反映万物生长衰亡的24节气反而只写在历书中，不作为定月份的依凭了，而又产生闰月这一多余的事物，这可能是古人没有考虑到。现在的办法，不如用12气为一年，再不用12个月为一年，只用立春的这一天为孟春的第一天，用惊蛰为仲春的第一天，月大31天，月小30天，历法上的一年和回归年的长短相等，再也没有闰余了。12个月以月大月小相间，纵然有两个小月相连，一年不过一次。这样，四季的节气在历法上得到了立常的反映，再也不会出现“春行冬令”或“冬行春令”的混乱现象了，日月五星的运行及其位置自然要用新历表示，而计算的方法不必更改，仍用旧法，虽然也有的事与月亮的圆缺有关，如海生动物的生长发育，但月亮的圆缺与四季气候变化却完全没有关系，只要在历书里注明就可以了。借以元祐元年为例子，当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逆；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这样的历法岂不是简易严整，既与天体的运行相符，又省掉弥补闰余的麻烦了吗？我曾验证过一天有的多于一百刻，有的不到一百刻，对于我的说法人们已经怀疑了。我又说过12次划分和斗建都应当随着岁差而迁移，人们就更加惊诧了。现在这番有关历法的议论，更加要遭到怒骂和攻击了，但将来必定会有采用我这一学说的人。

五行之时谓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时，以四时分属五行，则春夏秋冬虽属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属土，故不可以时言，须当以月言。月谓之十二辰，则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也。

五行的时辰叫做“五辰”，在春夏秋冬，各管一个时辰，用四季分属五行，那春夏秋冬虽属木火金水，但三月、五月、九月、十二月，各有十八日属土，所以不能按季节说，必须按月说。月份称做十二辰，那么五行的季节就叫做五辰了。

《黄帝素问》有“五运”、“六气”。所谓“五运”者，甲巳为土运，乙庚为金运，丙辛为水运，丁壬为木运，戊癸为火运。如甲巳所以为土，戊癸所以为火，多不知其因。予按，《素问·五运大论》：“黄帝问五运之所始于歧伯，引《太始天元册文》曰：‘始于戊巳之分’。所谓戊巳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王砮注引《遁甲》：“六戌为天门，六巳为地户。”天门在戌亥之间，奎、壁之分；地户在辰巳之间，角、轸之分。凡阴阳皆始于辰，上篇所论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谓之十二辰，十二时亦谓之十二辰，日月星谓之三辰，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五运起于角轸者，亦始于辰也。甲巳之岁，戊巳斡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土运。（角属辰，轸属巳。甲巳之岁，得戊辰巳巳干皆土，故为土运。下皆同此。）乙庚之岁，庚辛素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金运，庚辰辛巳也。丙辛之岁，壬癸玄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水运，壬辰癸巳也。丁壬之岁，甲乙苍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本运，甲辰乙巳也。戊癸之岁，丙丁丹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火运，丙辰丁巳也。《素问》曰：“始于奎、壁、轸、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凡运临

角轸，则气在奎、壁以应之。气与运常同天地之门户。故曰：“土位之下，风气承之。”甲巳之岁，戊巳上临角、轸，则甲乙木在奎、壁。（奎属戌，壁属亥。甲巳之岁得属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者，乙庚之岁，庚辛金临角、轸，则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气承之”者，丙辛之岁，壬癸水临角、轸，则戊巳上在奎、壁。曰“风位之下，金气承之”者，丁壬之岁，甲乙木临角、轸，则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者，戊癸之岁，丙丁火临角、轸，则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问》者，皆莫能喻，故具论如此。

《黄帝素问》有“五运”、“六气”的说法。所谓“五运”，甲巳是土运，乙庚是金运，丙辛是水运，丁壬是木运，戊癸是火运。比如甲巳之所以是土，戊癸之所以是火，大多不知道它的由来。我考察了一下，《素问·五运大论》说：“黄帝向岐伯问五运的由来，岐伯引述《太始天元册文》说：‘来自戊己之区分’。所谓戊己区分，奎星、壁星、角星、轸星，就是天地的门户。”王冰注释引用《遁甲》说：“六戊是天门，六己是地门。”天门在戌亥的中间，奎星、壁星的分野；地门在辰巳的中间，角星、轸星的分野。凡是阴阳都从辰开始，上篇说到十二月叫做十二辰，十二支也叫做十二辰，十二时还叫做十二辰，日月星叫做三辰，五行的季节叫做五辰。五运从角星、轸星开始，也就是从辰开始。甲巳的年岁，戊巳黄天的气从角星、轸星经过，所以是土运。（角属辰，轸属巳。甲巳年，得戊辰己巳干都是土，所以是土运；以下都与这相同。）乙庚的年岁，庚辛白天的气从角星、轸星经过，所以是金运，就是庚辰辛巳。丙辛的年岁，壬癸黑红天的气从角星、轸星经过，所以是水运，就是壬辰癸巳。丁壬的年岁，甲乙青天的气从角星、轸星经过，所以是木运，就是甲辰乙巳。戊癸的年岁，丙丁红天的气从角星、轸星经过，所以是火运，就是丙辰丁巳。《素问》说：“从奎星、壁星、角星、轸星开始，就是天地的门户。”凡是运到了角星、轸星，那气就在奎星、壁星来相应。气与运常同天地的门户。所以说：“土位的下面，风气承接。”甲巳的年岁，戊巳土到了角星、轸星，那甲乙木在奎星、壁星。（奎属戌、壁属亥。甲巳的年岁就属甲戌乙亥。以下都与这相同。）说“金位的下畜，火气承接”，是乙庚的年岁，庚辛金到了角星、轸星，那丙丁火在奎星、壁星。说“水位的下面，土气承接”，是丙辛的年岁，壬癸水到了角星、轸星，那戊巳土在奎星、壁星。说“风位的下面，金气承接”，是丁壬的年岁，甲乙木到了角星、轸星，那庚辛金在奎星、壁星。说“七月火的下面，水气承接”，是戊癸的年岁，丙丁火到了角星、轸星，那壬癸水在奎星、壁星。自古至今说《素问》的，都没有说明白，所以像这样详细说一遍。

世之言阴阳者，以十干寄于十二支，各有五行相从，唯戊巳则常与丙丁同行，五行家则以戊寄于巳，巳寄于午，六壬家亦以戊寄于巳，而以巳寄于未，唯《素问》以奎、壁为戊分，轸、角为巳分。奎、壁在亥戌之间，谓之戊分，则戊当在戌也。轸、角在辰巳之间，谓之巳分，则巳当在辰也。遁甲以六戊为天门，天门在戌亥之间，则戊亦当在戌；六己为地户，地户在辰巳之间，则巳亦当在辰。辰戌皆上位，故戊己寄焉。二说正相合。按字书，“戌”从戌从一，则戌寄于戌，盖有从来。“辰”文从厂从（《左传》：“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 ”字。）；从乙从己，则己寄于辰。与《素问》、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与水相随。戊，阳上也。一，水之生数也。水乃金之子，水寄于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戌”之理如是。己，阴上也。六，水之成数也。水乃木之母，水寄于东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与隐于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岩之可居者；乙，隐也。

世上讲阴阳的，将十干依附在十二支，各有五行相随，唯有戊巳常与丙丁同行，五行家将戊依

附在巳，巳依附在午，六壬家也将戌依附在巳，却将己依附于未，只有《素问》将奎星、壁星作为戌的分野，轸星、角星作为己的分野。奎星、壁星在亥戌之间，叫做戌分，那么戌应该在戌。轸星、角星在辰巳之间，叫做己分，那么己应该在辰。遁甲把六戊作为天门，天门在戌亥之间，那么戊也应该在戌；六己作为地门，地门在辰巳之间，那么己也应该在辰。辰戌都在土位，所以戌己就依附在这里。这两种说法完全相合。按照字书解释，“戌”从戌从一，那么戌依附在戌，大概就有个来历。“辰”字从厂从壬（《左传》：“亥有两个头六个身子。”也用这个“辰”字。）；从乙从己，那么己依附在辰。与《素问》、遁甲相符合。五行的说法：土常与水相随。戊，是阳土。一，是水的生数。水是金的孩子，水依附在西方金的后面，生成了水，又用旺土包起来。这“戌”的道理就像这样。己，是阴土。六，是水的整数。水是木的母，水依附在东方木的后面，是老水，而衰土接着隐藏在岩穴下面，那是水土的坟墓。厂，是山岩中可以居住的地方；乙，就是隐藏。

律有实积之数，有长短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所谓实积之数者，黄钟管长九寸，径九分，以黍实其中，其积九九八十一，此实积之数也。林钟长八寸，径九分，八九七十二。（《前汉书》称八八六十四，误也，具下文。）余律准此。所谓长短之数者，黄钟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长六寸；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长八寸，此长短之数也。余律准此。所谓周径之数者，黄钟长九寸，围九分（古人言“黄钟围九分”，举盈数耳，细率之当周九分七分之二，举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钟长六寸，亦围九分。（十二律皆围九分，《前汉志》言“林钟围六分”者，误也。予于《乐论》辩之甚详。本《史记》称“林钟五寸十分四”，此则六分九五十四，足以验《前汉》误也。）余律准此。所谓清浊之数者，黄钟长九寸为正声，一尺八寸为黄钟浊宫，四寸五分为黄钟清宫。（倍而长为浊宫，倍而短为清宫。）余律准此。

律管有实积之数，有长短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所谓实际之数，指的是黄钟管长 9 寸，直径 9 分，把黄米充塞在它里面，它的体积九九八十一，这就是实积之数。林钟长 8 寸，直径 9 分，八九七十二。（《前汉书》说是八八六十四，错了。详细说明在下文。）其他的律管都依此为准。所谓长短之数，指的是黄钟 9 寸，3 分减 1，下面生出林钟，长 6 寸；林钟 3 分增 1，上面生出太簇，长 8 寸，这就是长短之数。其他的律管依此为准。所谓周径之数，指的是黄钟长 9 寸，周长 9 分（古人说“黄钟周长 9 分”，是举的整数，细率应是周长 $9\frac{3}{7}$ 分，全周长 $9\frac{3}{7}$ 分。）；林钟长 6 寸，周长也是 9 分。（12 根律管都是周长 9 分，

《前汉志》说“林钟周长 6 分”，错了。我在《乐论》中阐述得很详细。原来《史记》说“林钟 5 寸 10 分 4”，这里却是 6 分 9、5、10、4，足以证明《前汉书》错了。）其他的律管都依此为准。所谓清浊之数，指的是黄钟长 9 寸是正声，1 尺 8 寸是黄钟浊宫，4 寸 5 分是黄钟清宫。（加一倍还长是浊宫，加一倍还短是清宫。）其他的律管都依此为准。

八卦有过揲之数，有归余之数，有阴阳老少之数，有河图之数。所谓过揲之数者，亦谓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过揲之数也，余卦准此。（前卷叙之已详）所谓归余之数者，乾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五”，再变之、三变之初各四，并卦为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归余之数也。坤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九”，再变、三变各八，并卦为二十六爻，三（爻）合之七十八，此坤卦归余之数也。余卦准此。阴阳老少之数，乾九揲而得之，故曰

老阳之数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阴之数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阳之数七；巽、离、兑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阴之数八。所谓河图之数者，河图北方一，南方九，东方三，西方六，东北八，西北六，东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五；坤得（东）西、南、东北、西北，故其数十有三；震得东南、西南、东、西、北，故其数十有七；巽得南、中、东北、西北，故其数十有八；坎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中，故其数十有五；离得东、西、南、北，故其数十有二十；艮得南、东、西、东北、西北，故其数十有三；兑得东南、西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二。具图如后（图缺）。

八卦有过揲之数，有归余之数，有阴阳老少之数，有河图之数。所谓过揲之数，也叫做“八卦之策”。乾九揲就得出来，揲必定用到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就得出来，揲必定用到四，四六二十四。这就是乾坤之策过揲之数，其他的卦都依此为准。（前卷已说得很详细）所谓归余之数，指的是乾卦一爻三少，首先变成“初五”，再变、三变的初各是四，合卦是十四爻，三合成四十二，这就是乾卦归余之数。坤卦一爻三少，首先变成“初九”，再变一、三变各是八，合卦是二十六爻，三（爻）合成七十八，这就是坤卦归余之数。其他的卦都依此为准，阴阳老少之数，乾卦九揲就得出了，所以说老阳之数是九；坤卦六揲就得出了，所以说老阴之数是六。震卦、艮卦、坎卦都是七揲得出的，所以说少阳之数是七；巽卦、离卦、兑卦都是八揲得出的，所以说少阴之数是八。所谓河道之数，河图的北方是一，南方是九，东方是三，西方是七，东北方是八，西北方是六，东南方是四，西南方是二，中央是五。乾卦得到南方、中央、北方，所以它的数是十五；坤卦得到（东）西方、南方、东北方、西北方，所以它的数是三十；震卦得到东南方、西南方、东方、西方、北方，所以它的数是十七；巽卦得到南方、中央、东北方、西北方，所以它的数是二十八；坎卦得到东南方、西南方、东北方、西北方、中央，所以它的数是二十五；离卦得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所以它的数是二十；艮卦得到南方、东方、西方、东北方、西北方，所以它的数是三十三；兑卦得到东南方、西南方、中央、北方，所以它的数是十二。画了一个图在后面。（图缺。）

揲蓍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阳爻，乾为老阳，两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后，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阴爻亦如此；三爻坤为老阴，两少一多，非巽即离，非离即兑，多在前，即巽也；多在中，离也；多在后，兑也。），积三爻为内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为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弃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弃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内外六十四卦复自相乘，为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蓍凡十有八变，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间，细算之乃见。）凡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此变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外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尽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贡易林》中所载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终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积至微之数，以成至大，积至大之数，却为至微；循环无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图》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变为一卦，循环相生，莫知其端。）大小一也，积小以为大，积大复为小，岂非一乎？往来一也，首穷而成尾，尾穷而反成首，岂非一乎？故至诚可以前知，始末无异故也。以夜为

往者，以昼为来，以昼为往者，以夜为来。来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来，不足怪也。圣人独得之于心而不可言喻，故设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学者当观象以求。圣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见，然后可以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独此数也。知言象为糟粕，然后可以求《易》。

数蓍草的方法（凡是一爻含四卦，凡是一阳爻，乾卦是老阳，两多一少，不是震卦就是坎卦，不是坎卦就是艮卦。少的在前，是震卦；少的在中间，是坎卦；少的在后，是艮卦。三次数蓍草中，含有这四卦，才能成为一爻。阴爻也是这样：三爻坤卦是老阴，两少一多，不是巽卦就是离卦，不是离卦就是兑卦，多的在前，就是巽卦；多的在中间，是离卦；多的在后，是兑卦。），积三爻成为内卦，共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有十二卦。）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叠的是六卦，爻共得六十四卦。（重叠八卦的方法，把下爻四卦去掉中爻四卦，得到十六卦；又把上爻四卦去掉，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也是六十四卦。将内外六十四卦再自相乘，成了四千零九十六卦，才成为《周易》的卦。（这就是卦法。数蓍草共十八变，成为《周易》的一卦。一卦之中，包括四千零九十六卦在里面，仔细一算就可发现。）大凡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这种变卦法，就是《周易》。）六十四卦变成四千零九十六卦。（这种卦法，如同乾卦啊坤卦啊屯卦啊蒙卦啊，全部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共得出四千零九十六卦，现今《焦贡易林》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四千零九十六卦同时得出能返回成一卦，终与始相对产生。用头生出尾，用尾生出头；积累极小的数，用来变成最大，积累最大的数，却变成极小；这样循环没有尽头，没有人能弄清它的首尾，所以《图象成名图》说：“那大的没有外，那小的没有内，迎面看不见它的头，跟着看不见它的尾。”（一卦变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成了四千零九十六卦；四千零九十六卦却变成一卦，循环相生，不能弄清它的尽头。）大和小同一，积累小而成为大，积累大又成为小，难道不是同一吗？往和来同一，首到了尽头就成了尾，尾到了尽头反而成了首，难道不是同一吗？所以极忠诚就可以事先了解，因为自始至终都没有两样。将夜间当成去的，就把白昼当成来，把白昼当成去的，就把夜间当成来。来与往常互相更迭，而我你知道的就是同一。所以躲避过去知道未来，不值得奇怪。圣人只是在心中领会却不用语言说明，所以用一种征象来告诉别人。征象怎么能躲避过去知道未来，成为变化而传布鬼神？学者应当观察征象去寻求。圣人能自然得到的原因，是因为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出，然后可以躲避过去知道未来，成为变化而传布鬼神。《周易》的征象都是这样，不只是这种教。知道了说这种征象是糟粕，然后才可以寻求《周易》的道理。

官 政

有一朝士，与王沂公有旧，欲得齐州。沂公曰：“齐州已差人。”乃与庐州，不就，曰：“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便尔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惭沮而退。

有一位朝士，和王沂公有老交情，想要到齐州任职。沂公说：“齐州已派遣了人。”于是授与庐州的官职，他不去，说：“齐州地方的名望，比庐州卑弱，只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比较方便罢了。相公若能不使一物失所，把前面的任命改换了，应该也不难。”王沂公用严肃的神色说：“要不使一物失所，只有均衡公平。如果夺一给一，这一方不失其所，那么那一方必定失其所。”这位朝士惭愧沮丧地退下来。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孙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买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盐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近岁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徭，比旧浸繁多，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如山，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被科无已时也。”其远虑多类此。

史馆孙伯纯任海州知州的时候，发运司决议设置洛要、板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不便利，发运使亲自到郡，决意要做，孙伯纯反对，力排众议态度十分坚决。百姓挡佐孙伯纯诉说办盐场的便利，孙伯纯晓之以理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长远的计谋，官买盐虽有眼前利益，官盐怕的是卖不出去，不怕盐不足。盐多而卖不出去，会在30年后留下祸患。”到孙伯纯罢去州郡职位，海州最后还是设置了三个盐场。近年在连州、海州间刑狱、盗贼、徭役，比往年增多，就因为三个盐场所置的盐堆积如山，运卖不行，亏欠很多，动不动就使人破产，老百姓才把它看成祸患。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桩箭干等等，海州向来就没有这些东西，百姓很为此而苦恼，请求用鳔胶代替。孙伯纯说：“弩桩箭干，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产，不过是一时的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品去替代，恐怕你们每年被判定上交鳔胶就没有穷尽了。”孙伯纯的考虑问题之远多类似于此。

孙伯纯史馆知苏州，有不逞子弟与人争“状”字当从“犬”当从“大”，因而构讼。孙令褫去中带，纱帽下乃是青巾。孙判其牒曰：“偏旁从大，书传无闻；巾帽用青，屠沽何异？量决小杖八下。”苏民传之，以为口实。

史馆孙伯纯任苏州知州时，有不得志的年青人跟人争“状”字应当从“犬”，还是应当从“大”，因此而打官司。孙伯纯叫他们剥去中带，纱帽下竟是青巾，孙伯纯在他们的状纸上判道：“偏旁从大，书传没有听说过；巾帽用青，与屠夫卖酒的人有什么两样？量刑判决小杖八下。”苏州百姓把它作为话柄流传。

忠定张尚书曾令鄂州崇阳县。崇阳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忠走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自此茶园渐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

间。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民有入市买菜者，公召谕之曰：“邑居之民，无地种植，且有他业，买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答而遣之。自后人家皆置圃，至今谓芦菔为“张知县菜”。

张忠定尚书任鄂州崇阳县令时，崇阳有很多空地，当地的百姓不从事耕织，只以种茶为业。张忠定令百姓挖掉茶园，引导他们种桑麻。从此茶园逐渐减少，而种植桑麻在鄂州、岳州之间非常兴盛。到嘉祐年间修改茶法，湖、湘一带的人民，为茶租的繁重所苦，唯独崇阳县的茶租最少，当地人看到其他邑县的情形，思念张忠定的好处，建立了一座寺庙来报答他。村民有上街买菜的，张公叫来对他说：“住在邑县的人，没有土地种植，又有其他职业，买菜是可以的。你是村民，都有土地，为什么不自己种菜而花钱买菜？”用板子打过之后让他回去。从此之后家家都置菜园，到现在称芦菔为张知县菜。

权 智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戍兵步骑甚众，刍粮亦富，戎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王子醇枢密使镇守熙河时，西戎想要侵犯，先派人探听我方的虚实，被巡逻的人抓获，搜查他衣服的边饰，得到一封信，这封信记下了熙河人马、粮草的数量。官属都要把西戎密探处以分尸而死，王子醇很快就判打背 20 下，在脸上刺上“蕃贼决讫放归”六个字后放了他。这时恰好有很多戍兵步骑，粮食也很富有，敌人得到消息，知道熙河已有准备，他们便打消了入侵熙河的计谋。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君来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邪！聊欲安众心耳。”

宝元元年，党项围攻延安七天，几次濒临被攻破的危险。侍郎范雍为帅，非常忧虑。有一位老军校出，说：“我是当地人，几次遭到敌人围城，情形与今天非常相近。敌人不擅长进攻，终不能攻下城池。今天千万不要担忧，我可以担保。如有意外，我甘愿被斩首。”范雍对他的话十分赞赏，人心也因此而略为安定。事情平定，危险过去之后，这位军校受到大大的奖赏提拔，说他最善于知兵料敌。有人对他说：“你居然敢轻肆妄言，万一没有验证，须伏法被斩首。”军校笑着说：“你没有思考啊，如果城真的被攻陷，还有什么工夫杀我呢！那番话不过暂时安慰大家的心罢了。”

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陘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余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耳，向使余小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彼知己，量敌为什。”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汉五年，楚、汉决胜于该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此亦拔赵策也。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堕马”势也。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观古人者，当求其意，不徒视其迹。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从古言韩信善用兵，书中不见信所以善者。予以谓信说高帝，还用三秦，据天下根本，见其断；虏魏豹，斩龙且，见其智；拔赵破楚，见其应变；西向师亡虏，见其有大志；此其过人者。惜乎《汉书》脱略，漫见于此。

韩信袭击赵，先让万人背水布阵，于是树起大将旗鼓，出井陘口，与赵人大战，假装失败，丢

弃旗鼓，退到水上，军队背水修筑阵地，又是危险的路，又是丢弃旗鼓逃跑，这必定是败势。而韩信运用这个战法，是因为陈余是老将，不用必败之势激他，不能达到目的。韩信知道自己才华超过陈余，才敢用这一办法。假使陈余比韩信略微狡猾一点，韩信怎能不败？这就是所谓“知彼知己，量敌为计”。后来的人不估量敌势，沿袭韩信的战术，必败无疑，汉五年，楚、汉在垓下决胜负，韩信率30万大军面对敌人，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他后面，绛侯、柴武在高帝后。韩信头一次交战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马，楚兵不利，韩信又借机进攻，大败楚军。这也是攻陷赵国的策略。韩信当时威震天下，项籍所怕的人只有韩信。韩信以30万大军战不利而后退，是真后退，然后不疑，所以韩信与孔将军、费将军得以利用对方的空子，这就是“建成堕马”势，韩信兵虽然后退，但孔将军、费将军的军队环绕在他的左右，高帝军在他后面，绛侯、柴武又在高帝后面，不同于背水之危，这就是防备项籍的方法。用破赵的办法，就歼灭了。这都是韩信的奇策。考察古人，应当了解他的本意，不只是看表面行为。班固写《汉书》，删去了这件事，大概没有发觉取胜项籍的原因正在这一战。从古讲韩信善用兵，但书中没有见到韩信善用兵的情况。我以为韩信说高帝，还用三秦，据此作为天下根本，可以看出其果断；俘虜魏豹，杀龙且可以看出他的智慧；拔赵破楚，可以看出他的善于应变；往西面向军队放走俘虏，可以看出他的大志，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可惜《汉书》漏见了，从这里随便地可以看出来。

种世衡初营青涧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刚果有谋，以义烈自名。世衡延置门下，恣其所欲，供亿无算。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遇之愈厚。留岁余，崧亦深德世衡，自处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拽下械系，捶掠极其苦楚，凡一月，滨于死者数矣，崧终不伏，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则死矣，终不以不义自诬。”毅然不顾。世衡审其不可屈，为解缚沐浴，复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尔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万一可胁，将泄吾事。设虜人以此见穷，能不相负否？”崧默然曰：“试为公为之。”世衡遗遣之，以军机密事数条与崧曰：“可以此藉手，仍伪报西羌。”临行，世衡解所眼絮袍赠之曰：“胡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谋臣也。崧如所教，间关求通遇乞，虜人党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虜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迁于北境。久之，遇乞终以疑死。崧邂逅得亡归，尽得虜中事以报，朝廷录其劳，补右侍禁，归姓为王。崧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世衡本卖崧为死间，邂逅得生还，亦命也。康定之后，世衡数出奇计，予在边，得于边人甚详。为新其庙像，录其事于篇。

种世衡刚驻扎青涧城，有位紫山寺的僧人法崧，刚正果敢有谋略，以义正刚烈自称。世衡召揽他安置在手下，随他想要什么，尽量满足没有数目。法崧酗酒纵赌，无所不为。世衡对他更好。留有一年多，法崧很感激世衡，自己一点不疑惑。一天，世衡忽然发怒地对法崧说：“我对你这样好，你却暗地与贼勾结，为什么要负我？”拖下去用刑具绑住捶打，他非常痛苦，一个月中几次接近死亡。法崧始终不伏，说：“法崧我是大丈夫，您听信奸人妄言要杀我，就是死了，也不以不义的罪名使自己蒙受诬辱。”毅然不顾。世衡看到他不可屈服，替他解开绳索让他洗澡，又请进卧室内，隆重对待他，道歉说：“你没有过错，不过是试试你罢了。想让你做间谍，万一你被敌人胁迫，将泄露我的事。倘若敌人因此而弄清了，能不辜负我吗？”法崧沉默了一会，说：“我试着替您做这件事。”世衡送他走，把几条军事机密告诉法崧说：“可以以这个为凭借，仍然给西羌送假情报。”临走时，世衡解下所穿的絮袍送给法崧说：“胡地特别寒冷，以这件衣作为分别纪念。到那里一定要想办法求见遇乞，

不是这个人不能得到实情。”遇乞，是胡人的谋臣。法崧依照世衡讲的方法，辗转求得见了遇乞，胡人发觉而怀疑他，将他抓到官衙里。几天后，有人打开世衡所赠的絮袍领中，得到世衡与遇乞的信，言词十分亲密。法崧当初不知道衣领中有信，胡人对他用尽了刑，他始终不讲实情，胡人因此怀疑遇乞，放了法崧迁到北方边境。很久之后，遇乞终因受怀疑而死。法崧偶然得以逃回来，把所得的胡人情报报告了朝廷，朝廷记载了他的功劳，补上右侍禁，归为王姓。法崧后来官至诸司使，至现在边人称他为“王和尚”。种世衡本来叛法崧到了死地，偶然的机会有以生还，也是命运。康定年间以后，种世衡多次出奇计，我在边疆，从边人那里知道得十分详细。为重新布置他庙中的神像，我在这里记下他的事。

祥符中禁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大中祥符年间，宫中失火，当时丁晋公负责修复宫室，担忧取土太远会给施工带来困难。丁晋公下令在附近挖街道取土，没有几天就挖成了好多巨大的壕沟。于是打开汴水的堤坝，将汴水引入壕沟之中，使各路的竹木排筏以及船只所运的各种材料，都从壕沟中进入运到宫门。宫室修好之后，就把废弃的瓦砾灰土填塞进壕沟中，又重新成为街道。这项措施一举而解决了取土、运料和废物处理三件事，节省的费用总计有亿万钱。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量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笱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本朝初年，两浙地区的官员向皇帝献龙船，船有20多丈长，上面是宫殿式的多层楼房，设有皇帝的卧榻，以备皇帝游览。年岁久后，船的腹部腐烂需要修理，但在水中不能施工。熙宁年间，宦官黄怀信出了个主意，在金明池北面开凿一个深水池，大小可以容纳龙船，在水池府下安置柱子，上架大木梁，再放水入池，把龙船引到梁上后，就车出池中水，船就被架在空中，修补完后，又放水进池，使船重新浮起，抽去梁柱，在上面造一个屋顶把它盖起来，就成为藏船室，这样龙船就永远不用担心被日晒雨淋了。

艺 文

李学士世衡喜藏书，有一晋人墨迹，在其子绪处，长安石从事尝从李君借去，窃摹一本，以献文潞公，以为真迹。一日，潞公会客，出书画，而李在坐，一见此帖，惊曰：“此贴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归，取验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石君所传，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墙进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为摹本。李乃叹曰：“彼众我寡，岂复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李世衡学士，喜欢收藏书。有一幅晋人的书法真迹，在他的儿子李绪那儿，长安石从事曾经从李君那里借去，私下临摹了一本，献与文彦博把它作为真迹。一天，文彦博会客，拿出字画给客人看，而李绪也在座，一见这幅书法，惊讶地问：“这一幅书法是我家的东西，怎么忽然到了这里？”急忙令人回去取，验对之后，才知道文彦博所收藏的是临摹本。李绪才知是被石君传出来的，便把详细情况告诉文彦博。客人都勉强他说文彦博所收藏的是真迹，却认为李绪所收藏的是临摹本。李绪于是感叹说：“他人多势众，我孤身一人，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说，今天才体会到自己地位低微。”

章枢密子厚善书，尝有语：“书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不晓吾意也。”尝自谓“墨禅”。

章子厚枢密擅长书法，曾有话说：“写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都不能写好。此有妙理，不是得之于心的，不懂我的意思。”曾自称“墨禅”。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各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世上很多谈论书法的人，大多说写字不一定要有成法，各人可自成一派。这只能说对了一半。比如西施、毛嫱，容貌虽然不一样，但都是美人，但手必须是手，脚必须是脚，这是不能变更的。写字也是这样，虽然字的形体、气韵不同，但撇须是撇，捺须是捺，尽管千变万化，但这是不能更改的。如果撇不成撇，捺不成捺，纵使字的精神筋骨如同西施、毛嫱，但手脚不正常，终究不能算是完美的人。杨朱、墨翟辩论时才智过人，但终究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全得到了师法，规矩法度都具备，没有变化，仍然是“奴书”，但又一定要从这里入门。经过了这一步，才能达到妙境，等到找不到师法的踪迹了，然后进入神品之境。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昔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

亦只谓之‘八分书。’”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今天世上称为“隶书”的，就是古人的“八分书”，说它初从篆文变隶体，还有二分篆法，所以称它为“八分书”。后来就全变为隶书，今天的“正书”、“章草”、“行书”、“草书”都是。后人错把古“八分书”当作“隶书”，把现在的字说是“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是隶书之正书罢了，其余行书、草书，都是隶书。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说：“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是指《老子朱龟碑》。《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都是今天所谓隶书。杜甫诗也只称它‘八分书’。”另外《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不是篆书就是八分书，不曾用隶书。”可知汉、魏碑文都是八分书，不是隶书。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江南府库中，书画特多，书画上的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用墨印的，被称为“金图书”，说只有这些印是用黄金做的。在各种书画中，经常有李后主的题跋，然未曾题书画人姓名、只有钟隐的画都是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个字，后主擅长绘画，尤其工于翎毛。有人说：“凡说‘钟隐笔’的，都是后主自己画的。”后主曾自号钟山隐士，所以隐瞒名字称为“钟隐”，并不是姓钟的人，现在世上流行的钟隐画但没有后主亲笔题词的都是假的。

器 用

熙宁八年，章子厚与予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车轮崇六尺，轂崇三尺三寸，（穀末至地也。轂为四尺）牙围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车同也。）穀长三尺二寸，径一尺三分寸之二。轮之获三寸九分寸之五，（穀上札幅鉴眼是也。）大穿内径四寸五分之二，（记谓之“贤”，穀之里穿也。）小穿内径三寸十五分寸之四，（记谓之“轂”穀之外穿也。）辐九寸半，辐外一尺九寸，（并辐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穀之长。）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辐广三寸半，（深亦如之。）輿六尺六寸，车队四尺四寸，（队音遂，谓革之深，盖深四尺口才，广六尺四寸也。）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轂内。）崇三尺三寸（半輿之广为之崇。）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较，两骑上出式者，并车高五尺五寸。）轂围一尺一寸，（车后横木。）贰围七寸三分之一，较围四寸九分寸之八，积围三寸二十六分寸之七（此轂乃轂木之植者，衡者与穀末同名）树围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式之植者，衡者如较之植轂而各互异。）任正围一尺四寸五分之二（此輿下三面材持车正者。）辘深四尺七寸（此梁舡辘也。轂崇三尺三寸。此辘如桥梁，矫上四尺七寸，并衡颈为八尺七寸；国马高八尺，除衡颈则如马之高。）长一丈四尺四寸，（軌前十尺队四尺四寸。）軌前一丈，荣长五尺，衡围一尺三寸五分之二，长六尺六寸；轴围一尺三寸五分之二，兔围一尺四寸五分之二；（輿前当轂者，与任正相为四面。）颈围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颈，辘前持衡者。）踵围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踵，辘后承轂处。）轨广八尺（两辙之间。）阴如轨之长（侧子轨前。）二，前著驂轡，后属阴。（在驂之外，所以上出。）肋驱长一尺（皮为之，前系于衡，后属于轂内肋，所以止之。）服马颈当衡轂（两服齐首。）驂马齐衡（两驂雁行，谓小却也。）轡六（服马二轡，驂马一轡。）度皆以周尺。（一尺当今七寸三分少强。）以法付作坊制车，兼习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

熙宁八年，我与章子厚同时管理军器监，奉皇上之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车轮高六尺，车轴高三尺三寸，（车轴没有到地。轂为四尺）牙围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是车罔），车轴长三尺二寸，直径一尺三分寸之二。轮之获三寸九分寸之五（轮子上札幅鉴眼的就是。）车辐长九寸半，辐外长一尺九寸。（并辐三寸半，共三尺二寸，就是轮子的长。）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全是一寸）。车辐宽三寸半（深也是如此。）輿有六尺六寸，车深四尺四寸。（队音遂，是说车深度，约深四尺四寸，广六尺六寸。）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其中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轂内。）高三尺三寸（輿的一半为它的高），较高二尺二寸，全高五尺五寸（较，两骑上出式的，并车高五尺五寸。）轂围一尺一寸（车后横木）。贰围七寸三分之一，较围四寸九分寸之八，积围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轂是轂木之植者、横者与穀不同名。）树围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式之植者，衡者如较之植轂而各不相同。）任正围一尺四寸五分之二（这是輿下三面材持车正者。）辘深四尺七寸（这是梁舡辘。）轂高三尺三寸，（此轂如桥梁，矫上四尺七寸，加上横颈为八尺七寸；国马高八尺，除去衡颈就如马的高度。）长一丈四尺四寸，（軌前十尺队四尺四寸。）軌前一丈，荣长五尺，衡围一尺三寸五分之二，长六尺六寸。轴围一尺三寸五分之二，兔围一尺四寸五分之二，（輿前当轂者，与任正相为四面。）颈围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颈，是车轂前持衡的。）轨宽八尺（两车辙之间。）阴如轂之长（在轨前侧）。二个，前著驂轡，后属阴，（在驂之外，所以止出。）

胁驱长一尺（皮做成，前面系在衡上，后面系在车后横木内胁，所以止之。）服马颈当横轭（两服齐首），骖马齐衡（两骖如雁行·称为小却。），六个马辔（服马二辔，骖马一辔。）都以周尺度量。（一尺相当今天七寸三分略多。）用此方法规矩交与作坊制作车，同时练习五御法。这年秋天八月大阅，皇上到延和殿亲自考察。这种车收藏在武库中。把它作礼仪用的东西罢了。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涪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谓浊恶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方为鼎实。今京师大屠善熟彘者，钩悬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遗意也。又古铜香炉，多楼其底，先人火于炉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则难灭而持久。又防炉热的席，则为盘荐水，以渐其趾，且以承灰炆之坠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大概多同。盖有所传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己意，奇邪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古代的鼎有三只脚，都是空心，中间可以装东西的，这就是“鬲”。煮肉的方法，常常是要汁在下面，肉在上面，就能使食物容易熟，而又不致熟得不均衡，使一部分糜烂。等到涌上鼎顶时，肉的渣滓全沉入到空足里去了，《易经》中的鼎卦“初六”爻辞说：“将鼎翻倒过来，就容易使渣滓清除出去。”就是讲，煮肉的渣滓沉下去了，必须先把它倒空。“九二阳爻”系辞所说，才把肉放进鼎去。现在京都擅长煮猪的大师父，把猪肉用钩悬挂在锅里煮，不让猪肉沾着锅底，这也是从古人煮肉的方法学来的，另外有一种古铜熏炉，它的底部大多数是镂孔的，用的时候，先把火放进炉里去，然后用灰覆盖在它上面，这样，火大而不易熄灭，而且能维持很长时间。又为了防止避香炉热了烧杯席子，就用盘子盛上木以浸渍炉足减低热度，同时又用来承接漏落的灰烬。其他古器物，大都有这样曲折的含意。至于形式和刻画的文饰，大多是相同的。大概这都是前人的传授，各自都遵守前人的方法，后人没有人敢随意改动，现在后学的人，人人凭自己的意愿，作出的东西奇形怪状而浅陋，这种抛弃前人的方法的情况，不仅仅是在器物方面是这样啊。

补笔谈卷三 异事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千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金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铃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铃辖者申状，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四人皆为宰相。

韩魏公在庆历年间以资政殿学士之职统领淮南，一天，后园中芍药花有一株分成四枝，每一枝上有一朵花，上下红色，中间杂以黄色花蕊。当时扬州的芍药，没有这个品种，今天说的“金缠腰”的芍药就是。韩魏公认为此花奇异，开了一个会，想招四方客人来欣赏它，以应四枝花的祥瑞。当时王峡公任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金判，都被召请。还少一客人，因为判铃辖诸司使忘了他的名字，官最大，于是就取以充数，第二天上早衙，铃辖者申述，肚子大泄没有到。还少一客人，就命令取过客历，寻求一位朝官补足四人，但过客中没有朝官，只有陈秀公当时为大理寺丞，于是命他一同会聚。到筵席中间，剪下四枝花，四个客人各簪一枝，很为盛大。过了30年，四个人都做了宰相。

濒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亲，至一山中，见居人说：旬日前有数十龟负一大龟葬于此山中。梁以为龟神物，其葬处或是福地，与其人登山观之，乃见有丘墓之象，试发之，果得一死龟。梁乃迁葬他所，以龟之所穴葬其亲。其后，梁生三子：立仪、立则、立贤。立则、立贤皆以进士登科；立仪尝预荐，皇祐中，依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则值熙宁立八路选格，就二广连典十余郡，今为朝请大夫致仕，予亦识之。立仪、立则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广州，郁为士族，至今谓之“龟葬梁家”。龟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适兴，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启之邪？

海边向来少士人。大中祥符年间，廉州人梁氏占卜找地安葬他的父母亲，到一山中，见当地人说：十多天前有几十只龟背着一只大龟葬在这座山中。梁氏认为龟是神物，它安葬之处或许是福地，与山中人登山观看，便看见有坟墓的形状。试着发掘，果然发现一死龟。梁氏就把死龟迁葬到别处，将龟所葬的穴安葬他的父母亲。后来，梁氏生了三个儿子：立仪、立则、立贤都以进士登科。立仪曾参加考试，皇祐年间，依智高之乱平定，得到恩宠被授予假板官。立则碰上熙宁年间确立八条选拔人材的标准，到广南西路、东路接连主管十余郡，如今做朝中大夫而退休，我也认识他。立仪、立则都是朝散郎，至今都在。迁居广州，成为了大士族，到今天还称为“龟葬梁家”。龟能安葬，这件事本已奇怪，而梁氏恰好兴盛，这是偶然的呢，还是神灵启示呢？

杂志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欧阳文忠公、刁景纯同知礼院。景纯喜交游，多所过从，到局或不下马而走。一日退朝，与子京相遇，子京谓之曰：“久不辱至寺，但闻走马过门。”李邯郸献臣立谈间，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嘲之曰：“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磨毡；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为一体书，写于一幅纸上，子京于其后题六字曰：“效子美谑景纯。”献臣复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文忠公又以子美诗书于一缕扇上。高文庄在坐曰：“今日我独无功。”乃取四公所书纸为一小贴，悬于景纯直舍而去。时西羌首领响厮罗新归附，磨毡乃其子也。王宣庆大阉求景纯为墓志，送钱三百千，故有磨毡、王宣庆之消。今诗贴在景纯之孙概处，扇诗在杨次公家，皆一时名流雅谑，予皆曾借观，笔迹可爱。

宋景文字子京，担任太常侍卿时，欧阳修、刁景纯一同掌管太常礼院。刁景纯喜欢交游，与朋友多有来往，到官府有时不下马就走了。一天退朝，与宋子京相遇，子京对他说：“好久不到我那里去，只听见走马过门。”邯郸李献臣在立谈间，戏改赴有《赠郑广文》诗嘲笑他说：“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磨毡。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写一幅字，写在一幅纸上，子京在后面题上“效子美谑景纯”六个字。献臣又在下面注说：“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修又把杜甫的诗写在一把绞扇上。高文庄在座说：“今天只有我无功。”就取四公所写的纸做一小贴挂在景纯的官舍才走。当时西羌首领响厮罗刚归附宋朝，磨毡是他的儿子。大太监王宣庆求景纯写墓志铭，送上三百千钱，所以有磨毡、王宣庆之讥。现在诗贴在景纯的孙子刁概处，扇诗在杨次公家，都是一时名流的高级玩笑。我都曾借着看了，笔迹十分可爱。

禁中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幸翠华还宫，上不择，因疾作，将逾月，巫医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屣一足跣，一足悬一屣，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鞞双足，乃捉其小者，剖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瘡若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瞪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优劳宵吁，以衡石妨膳，而瘡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人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皇祐中，金陵上元县发一家，有石志，乃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夫人汉大司农郑众女也。悫有妹名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将乔钟馗、杨钟馗。然则“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于开元之时，开元之时，始有此画耳。“钟馗”字亦作“钟葵”。

宫中有吴道子画的钟馗图，在卷首有唐人的题记说：“明皇开元年间在骊山讲武，车驾还宫，皇上不高兴，接着疟疾发作，快要超过一个月，巫师医生用尽了办法，不能使好转。忽然有一晚，梦

见两个鬼，一大一小。小鬼穿着红衣，鼻子似牛鼻，一只脚穿着麻鞋，光着脚吊着一只麻鞋，插一把大竹纸扇，偷了杨太真的紫香袋和明皇的玉笛，绕殿逃跑。那大鬼戴着帽子，穿蓝衣，袒露一只手臂，用兽皮包着双脚，抓住那个小的，挖掉他的眼睛，然后用手掰开把小鬼吃了。明皇问大的鬼说：‘你是什么人。’回奏说：‘我是钟馗氏，就是武科考试没有成功的人。发誓替陛下除掉妖孽。明皇醒来，病顿时好了，身体更加强壮。于是诏令画工吴道子，把梦告诉他说：‘试着替我把梦中的情形画出来。’道子奉明皇之旨，恍惚如见梦中情景，很快画好进献上去。明皇瞪着眼看了很久，抚着靠几说：‘真是你与我做了同样的梦一样啊，怎么像到这样的地步！’道子说：‘陛下昼夜忧劳，因为掌管国家大权而妨碍进食，疟疾得以侵犯。果然有镇邪之物，来卫护圣德。’手舞足蹈祝圣上千万岁。明皇很高兴，犒劳他以百金。批示说：‘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日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法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宁五年，皇上使画工摹拓刻板，印好赐与两府辅臣各一本。这年除夕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到东西府送达钟馗的像。看到这题像记，似乎是从开元时开始。皇祐年间，金陵上元县发掘出一座坟墓，有一块石记，是宋廷西将军宗恂母亲郑夫人的墓。夫人是汉大司农郑众之女。宗恂有个妹妹名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代有将乔钟馗、杨钟馗。然而“钟馗”的名字，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开元年间开始。开元时才有这幅画。“钟馗”两字也可作“钟葵”。

故相陈岐公，有司谥“荣灵”，大常议之，以“荣灵”为甚，请谥“恭”。以“恭”易“荣灵”，虽差美，乃是用唐许敬宗故事，适足以为累耳。钱文僖公始谥不善，人有所为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 故事，后乃易今谥。

己故宰相陈岐公，死后封“荣灵”称号，太常寺商议，认为“荣灵”太过分，请赐与“恭”，用“恭”换“荣灵”，虽还很美，还是按唐代许敬宗的先例，也算是问题了。钱文僖公开始追封的称号不好，有人为他申辩理由而改为“思”，也是按干颂的先例，后来才改为今天的这个称号。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有关地理的书中，古人有《飞鸟图》，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作的。所谓“飞鸟”，是说从前的地图虽然有四周界限的距离，但都是沿着道路用步测量的，道路曲曲折折没有规则，画成地图，曲弯曲道路测所得的里数和实际的直线距离就无法相符合，所以要按照制图要求另外测量四周界限的直线距离，正像飞鸟在空中从一地直接飞往另一地那样，据此画出图来，便没有因为山川阻隔和道路曲折所产生的误差了。我曾经绘制过《守令图》，用2寸折算100里作为分率，又建立了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共七个方法，来求得“鸟飞”的里数。图绘成后，得到四方四角远近的实际里程，才可以运用这一方法。把地图的四周、八方所到分为24至，用十二地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和乾坤艮巽四个卦名称呼它们。假使后世把图丢失了，只要得到这本书，根据24至来分布州县，马上可以绘成图，就不会有丝毫的差错了。

咸平末，契丹犯边，戍将王显、王继忠、屯兵镇、定。虜兵大至，继忠力战，为契丹所获，授以伪官，复使为将，渐见亲信。继忠乘间进说契丹，

讲好朝廷，息民为万世利。虏母老，亦厌兵，遂纳其言，因寓书于莫守石普，使达意于朝廷，时亦来之信。明年，虏兵大下，遂至河，车驾亲征，驻蹕澶渊，而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达于行在。上使曹利用驰遗契丹书，与之讲平。利用至大名，时王冀公守大名，以虏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会围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继往，得殿前散直张皓，引见行在。皓携九岁子见曰：“臣不得虏情为报，誓死不还，愿陛下录其子。”上赐银三百两遣之。皓出澶州，为徽骑所掠，皓具言讲和之意，骑乃引与俱见戎母萧及戎主。萧攀车帘召皓，以木横车轭上，令皓坐，与之酒食，抚劳甚厚。皓既回，闻虏欲袭我北塞，以其谋告守将周文质及李继隆、秦翰、文质等，厚各以待之。黎明，虏兵果至，迎射其大帅挾览，坠马死，虏兵大溃。上复使皓申前约，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与利用俱往，和议遂定，乃改元景德。后皓为利用所轧，终于左待禁。真宗后知之，录其先留九岁子牧为三班奉职，而累赠继忠至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国史所书，本末不甚备，予得其详于张牧及王继忠之子从佺之家。蒋颖叔为河北都转运使日，复为从佺论奏，追录其功。

宋真宗咸平末年，契丹侵犯边境。边地主将王显、王继忠在镇、定驻扎军队。辽军蜂涌而至，王继忠奋力迎战，被契丹抓获，被授以伪职，又派他当将领，渐渐被信任。继忠乘机向契丹进言，建议和宋朝讲和，使人民生息造就万代好处。当时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年老，也不愿意打仗，于是采纳继忠的意见。王继忠因此写信给宋朝的莫州守将石普，让他把萧后同意讲和的消息告诉宋真宗。当时也没有人相信。第二年，辽兵大肆南侵，深入到黄河边。真宗亲自出征，驻留在澶州，而继忠从辽军中把辽主讲和的意思全部奏明，送到皇帝驻扎的地方。真宗派曹利用骑马送信给契丹，与契丹谈判讲和。曹利用到大名时，王钦若任大名守宰，认为辽兵军势正盛，怀疑他们主动讲和不合情理，留住曹利用，没有让他出境。这时恰巧大名被敌军包围，曹利用不能回澶州。朝廷不知曹利用在何处，又招募人再去辽方，殿前散直张皓应征，有关官员带他去见皇帝。张皓带着九岁儿子进见说：“我没有得到辽主情报作为回报，誓死不回，请求陛下录用这个孩子。”真宗赐与他三百两银子让他去。张皓出澶州，被辽方的巡逻骑兵抓获，张皓把宋朝讲和之意全讲出来，骑兵就带他去见辽圣主和他的母亲萧太后。萧太后掀起车帘召见张皓，用木横在车轭上，让张皓坐，给张皓酒食吃，很好地抚慰他。张皓回来，听说辽兵想要袭击我朝的北方边境，把他们的计谋告诉守将周文质及李继隆、秦翰、文质等作好充分准备等待辽兵。黎明时分，辽兵果然来到，宋军迎射辽军主将萧挾览，他从马上坠落而死，辽兵大败。宋真宗又派张皓到辽方重申和议，还申明以前已经派遣过曹利用讲和的意思。张皓进入大名告诉了王钦若，同曹利用一起前往，和议便定下来，才改年号为景德。后来张皓被曹利用倾轧排挤，官仅封为左待禁。后来真宗知道，录取了他先次出使时留下的九岁儿子张牧为三班奉职，而重赠继忠到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国史馆的记载，对澶渊之役的本末不甚完备，我从张牧及王继忠之子从佺的家中得到详情。蒋子奇任河北都转运使时，又替从佺论奏，追证他的功劳。

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处不疑，不务过敬。前世启甚简，亦少用联幅者。后世虚文浸繁，无昔人款款之情，此风极可惜也。

以前人们的习惯是：地位低的人写信给地位尊贵的人，尊贵的只要在纸末尾批语回答，这就叫做“反”，所以人们称之为“批反”。如官司的批状、诏书批答等等都是如此。所以纸末大多写上“敬空”二字，表示不敢抗敌，只是空出纸末尾以等待批反罢了。尊贵的也这样处理没有什么犹豫的，不

求什么尊敬。前代的书信非常简单，也少用联幅的。后世虚文渐渐罗索，没有过去人们的一片真情，这种风气非常可惜。

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予按，九军乃方法，六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者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真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九军之次，李靖之后，始变古法，为前军、策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策后军。七军之次：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扬奇备伏，先锋踏白，皆在阵外；跳荡、弩手，（其人）皆在军中。

风后八阵，将军握奇，处在中军，那么加上中军就是九军。唐代李靖因为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加上中军为七军。据我观察，九军是方阵之法，七军是圆阵之法。算术的原理是：方物八中裹一，大概是少阴之数，加上中间的为老阳；圆物六里裹一，是老阴之数，加上其中的为老少阳。这是事物的固定阵式，真数是不可以改换的。既为之圆二阵，形势自当这样。九军的次序，李靖之后，才改变古法，九军为前军、策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策后军。七军的次序是：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扬奇备伏，先锋踏白，都在阵外。跳荡、弩手，这些人都在军中。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列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糜军”也。又古阵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为一巷，令面相向而立，虽文应古说，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上疑其说，使予再加详定。予以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今营阵法是也。

熙宁年间，让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作战布阵的方法，写成为书，发到各个帅府，副本收藏在秘阁。郭固的方法是，九军共为一阵营，（行则为阵，住则为营）。阵营之外围绕着警戒部队。如果依用古法，每人占地二方步，马四方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那么十万人的阵势，占地方圆十里。天下哪有方圆十里没有小山土山沟涧林木的阻碍的！并且九军同以一支警戒部队四面环绕，那么兵不再可分，如同九人共一张皮，分开就死，这正是孙武所说的受牵制而不能灵活机动的军队。另外古阵法有“面对面、背对背”的话，郭固不能理解，就让阵间士兵都侧立，每两行为一巷，命令士兵面对面站立。虽和古阵法中的说法相符，但不知士兵侧立如何应付敌人？宋神宗怀疑郭固的说法，让我再加以详细审定。我以为，应当使九军各自为阵，虽然也是按左右前后分开排列，但可以各自占据有利的地形，每个军都以驻地向着外面的一侧派警戒部队环绕守卫，就是跨越溪涧密林，也不会妨碍各自守营。金鼓一响，队伍的收、散、离、合，始终保持一个整体而不错乱。九个军的分阵合起来就成为

一个大的阵营，中间分出四条通路，好像井田的形状。九个军都背对背，面对面，四头八尾，哪里接触到敌人，哪里就首先行动起来。神宗以为是这样，亲自举出手说：“比如这五个手指，如共用一张皮包裹，那么怎么运用？”于是写成条令，就是今天的《营阵法》。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者，尊宾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让客，此甚无义。惟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者，主道也，非以左为尊也。《礼记》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乃就西阶。”盖尝以西阶为尊，就主人阶，所以为敬也。韩信得广武君，东向坐，西向对而师事之，此尊右之实也。今惟朝廷有此礼。凡臣僚登阶奏事，皆由东阶立于御座之东；不由西者，天子无宾礼也。方外惟释门主人升堂，众宾皆立于西，惟职属及门弟子立于东，盖旧俗时有存者。

古人以右为贵：主人居左，坐在右边的客人，是尊贵的宾客。今天有人把主人的位置让给客人，这很没有道理。只有天子到诸侯那里，从东面台阶走上来，是主道，不是以左为尊贵。《礼记》说：“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乃就西阶。”大概曾经把西阶作为尊贵，走到主人的合阶，所以为尊敬。韩信见广武君，向东坐，向西对着而拜广武君为师，这是以右为尊贵的实例。现在只有朝廷有这个礼仪，一般臣僚登阶奏事，都由东阶立在御座之东。不经西边，是天子没有宾礼。尘世外佛门主人升堂，众宾客都站立在西，只有下属及佛门弟子立在东面，大概这旧习俗有时还有保存的。

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见在今州域北门外。）又南阿师桥、周家桥（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顾家桥、通泗桥（今存）、太平桥（今存）、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见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

扬州在唐代时最为富庶繁盛。旧城南北宽 15 里 110 步，东西长 7 里 30 步，可记录的有 24 桥。最西边是浊河茶园桥，其次东大明桥，（现在的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现在在建隆寺前。）其次有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另有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其次南桥，（在现在州城北门外。）另外南有阿师桥、周家桥（现在这个地方为城北门。）小市桥（现在还有）、广济桥（现在还有）、新桥、开明桥（现有还有）、顾家桥、通泗桥（现在还有）、太平桥（现在还有）、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现在还有）、青园桥，从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在现在开元寺前。）其次东水门（现在有新桥，不是古迹）东出有山光桥（在现在山光寺前。）又从衙门下马桥直南面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称为“九桥”，不通船，在 24 桥数目之内，都在今天州城西门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为舒州观察支使，能为水丹。时王荆公为通判，问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则水渐凝结如金玉，精莹骇目。”问其方，则曰：“不用一切，但调节水火之力，毫发不均，即复化去。此‘坎’、‘离’之粹也”。曰“日月各有进退节度”，予不得其

详。推此可以求养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奋发，鸟兽孳乳，此定气所化也。今人于春、秋分夜半时，汲井水满大瓮中，封闭七日，发视，则皆有水花生于瓮面，如轻冰，可采以为药；非二分时，则无。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时吐翕咽津，存想腹胃，则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璨耀日，术家以为丹药，此中和之在人者。凡变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穷玄化，天人无异，人自不思耳。深达此理，则养生治疾，可通神矣。

有一姓李的读书人，忘记了他的名字，嘉祐年间任舒州观察支使，能炼水丹。当时王安石任通判，询问他的方法，他说：“把清水放入土鼎中，在下面用火燃烧，不几天水就慢慢凝结成晶如同珠玉，晶莹光亮夺目。”询问他的方子，就说：“什么都不用，只是调节水火之力，有一丝不均衡，就又融化掉。这是坎卦、离卦的精粹。”还说“日月各有进退节度”。我不知道它的详细情形。推想这可以求养生治病的道理。如仲春二月，草木茂盛生发，鸟兽繁殖，这定是气所化，现在人们在春分、秋分夜半时，汲井水装满大瓮，封闭七天，打开看，就有水花在瓮面出现，如薄冰一样，可以采取作为药。假如不是春分、秋分时，就没有水花。这是中和表现在物体上。在春分、秋分时吐收咽津，想象在腹胃中，就有丹砂从腹中下来，光彩耀目，方术家把它当作丹药，这是中和表现在人身上。大凡变化的物体，都由这个道理，道理的究竟变化的奇妙，天与人没有差异，人只不思量罢了。深谙这个道理，那么养生治病，可通神了。

药议

世人用莽草，种类最多，有叶大如手掌者，有细叶者，有叶光厚坚脆可拉者，有柔软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谬误。按《本草》：“若石甫而叶稀，无花实。”今考木“若石南”，信然；“叶稀、无花实”，亦误也。今莽草蜀道、襄、汉、浙江湖间山中有，枝叶稠密，团栾可爱，叶光厚而香烈，花红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上，中心有新红蕊，倒垂下，满树垂动摇摇然，极可玩。襄、汉间渔人竟采以捣饭饴鱼，皆翻上，乃捞取之。南人谓之石桂。白乐天有《庐山桂》诗，其序曰：“庐山多桂树”。又曰：“手攀青桂枝”。盖此木也。唐人谓之红桂，以其花红故也。李德裕诗序曰：“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移植郊园，众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卫公此说亦甚明。自古用此一类，仍毒鱼有验。《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缘谓之草，独此未喻。

人们用的莽草，种类最多，有叶片像手掌大的，有细叶的，有叶子光亮厚实、坚硬而有脆性，可以拉长的，有又软又薄的，有长得象蔓生的草类一样的，这多是错误的说法。根据《本草》记载：“样子好像石南，而叶子稀疏无花和果实。”今天考证莽草的茎干本如同石南，确实这样，而“叶稀无花实”的说法，也是错误的。现在的莽草，在蜀道、襄、汉、浙一带江湖之间和山中有，枝叶稠密，圆滚滚的很可爱，叶片光洁厚实而香气浓郁，开红色的花，如杏花大小，六个花瓣，花瓣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红花心，倒着垂下，满树垂动摇晃的样子，很可玩赏。襄、汉一带的渔人，都竞相采来捣碎拌饭喂鱼，鱼吃了浮到水面上来，就把鱼捞取上来。南方人称它为石桂。白居易有《庐山桂》诗，诗的序说：“庐山多桂树。”又说：“手攀青桂枝。”大概就是莽草。唐人称它为红桂，因为它的花多是红色的缘故。李德裕《诗序》说：“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在伊川独秀，把红桂树移植到城郊园林中，所有的花草都为之黯然失色。红桂树就是蜀道的莽草，这里只不过把莽草换上了一个好的名称而已。”李德裕这一说法也很明确。自古以来，用莽草毒鱼还是有效验的。《本草》把它收在木部，不知为什么又把它称作“草”，唯独这点使人不明白。

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异。子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鳅、鳢入江中辄死。乃知鳅、鳢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一验。《诗》所谓“岂其食鱼，必河之魴。”盖流水之鱼，品流自异。

孙思邈著的《千金方》上说，人参汤必须用流水煮，用止水煮就没有效验。”人们大多认为流水止水没有差异。我曾见丞相王安石喜欢放生，每天到市场上买来活鱼，把它们放回江中，没有一条不是活泼泼地游走的，只有泥鳅和鳢鱼入江中就死了。由此可知泥鳅和鳢鱼只可生活在止水之中，可见流水与止水果然不同，不可不知道。另外鲫鱼生在流水中，背部鱼鳞就白而且味道很美；生在止水中，背部的鱼鳞就黑而且味道很差，这也是一个证明，《诗经》中所说的：“难道吃鱼，必定要吃黄河中的魴鱼？”这大概是因为流水中的鱼，品味自然不同。

熙宁中，阁婆国使人人贡方物，中有“摩娑石”二块，大如枣，黄色，微似花蕊，又“无名异”一块，如莲苗，皆以金函贮之。问其人“真伪何以验？”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虽不同，皆姜黄汁，磨之汁赤

如丹砂者为真。‘无名异，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为真。’广州市舶司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世人蓄“摩娑石”、“无名异”颇多，常患不能辨真伪，小说及古方书如《炮炙论》之类亦有说者，但其言多怪诞，不近人情。天圣中，予伯父吏书新除明州，章宪太后有旨，令于舶船求此二物，内出银三百两为价；值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终任求之，竟不可得，医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验。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壳许，人口即瘥。

熙宁年间，阁婆国派使者进贡物品，其中有“摩娑石”二块，有枣子般大，呈黄色，有点像花蕊。另外有一块“无名异”，形似莲花，都用金匣子储存，问使者如何验证真伪，使者说：‘摩娑石，有五种色，颜色虽不同，但都是姜黄汁，‘摩娑石，磨出的汁红得如丹砂的是真的。‘无名异，颜色如漆一般黑，用水磨颜色如乳白色的是真的。’广州市舶司依照使者的话试验，都被验证。才把这些贡品向皇上传送。人们收藏了很多“摩娑石”、“无名异”，常常担心不能辨别真伪，小说以及古时的方书如《炮炙论》等等也有说明的，但多是怪诞的言论，不近人情。天圣年间，我的伯父吏书新任明州知州，章宪太后有旨，令在船上访求这两样东西，宫中出三百两银子的价格，银子如果不够，可以在州库中支出银子补贴。伯父在任上一直寻求，竟没有寻得。医生潘璟家有“白摩娑石”，颜色如糯米糍，磨出的汁也被验证。潘璟用来治中毒的人，得出少许水汁，放入口中病就好了。

药有用根，或用茎、叶，虽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达其理，未可妄用。如“仙灵脾”，《本草》用叶，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远志”用根，则其苗谓之“小草”；“泽漆”之根，乃是“大戟”；“马兜零”之根，乃是“独行”。其主疗各别。推此而言，其根、苗盖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壳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拿”能懵人，食其心则醒；“楝”根皮泻人，枝皮则吐人；邕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蓝蛇之尾能解药；鸟兽之肉皆补血，其毛、角、鳞、鬣皆破血；鹰鹞食鸟兽之肉，虽筋骨皆化，而独不能化毛。如此之类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补骨髓者，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精气不泄，乃所以补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弃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凿。若用《本草》中主疗，只当依本说。或别有主疗，改用根、茎者，自从别方。

中草药有用根、用茎或者用叶的，虽然是同一株植物上的一部分，但药性或许不同，如果没有深入通晓它的药理，千万不要乱用。例如仙灵脾，《本草》说用叶，南方人却用根。赤箭，《本草》中用根，今天人们反而用苗。这样用药，不知药性是否相同。如古人用远志是用它的根，它的苗是另一种药称为小草；泽漆的根，就是另一种药大戟；马兜铃的根，是另一种药独行，它们所主治的疾病是不一样的。由此推论，根和苗一般并不是能相互代用的。如巴豆是让人腹泻的药，但它的果壳却能止泻；甜瓜蒂能使人呕吐，但甜瓜肉却能解除这种呕吐；坐拿能使人昏迷，但吃它的果心却能让人清醒；楝树的根皮可使人腹泻，但楝树枝的皮却是使人呕吐；邕州进贡的蓝药，就是蓝蛇的头，能毒死人，但蓝蛇的尾部却能解除这种毒；鸟兽的肉，都能补血，但它们的毛、角、鳞、鬣又都会坏血；鹰鹞等猛禽食鸟兽的肉，虽然把筋骨都消化了，但唯独不能消化它们的毛。像这样的情形很多，全部是同属一物，但它们的药性竟如此相反。山茱萸能滋补骨髓，取其核性味温涩，能封闭精气，精气不外泄，就能起到补骨髓的作用；现在有的人们削取它的果肉作药用而将核丢弃，这远不是古人的用意。这样做都近乎牵强附会。如果是运用《本草》中说的主要疗效，就应当根据《本草》用药。假如另外有别的主要疗效而改用根或茎的，那就应当依据其他药方有药。

岭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涧中水皆有毒，唯此水无毒，士人陆行多饮之。至深冬则凝结如玉，乃“天竹黄”也。王彦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澳间水皆不可饮，唯剖竹取水；烹任饮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阙，冬行，求竹水不可复得。间土人，乃知至冬则凝结，不复成水。遇夜野火烧林木为煨烬，而“竹黄”不灰，如火烧兽骨而轻。上人多于火后来拾，以供药品，不若生得者为善。

岭南地区的深山有一种大竹，竹内有水，很是清澈，那儿的溪涧中的水都有毒，唯独这竹内水没有毒。当地的人走旱路外出时大多喝这种水，到了寒冬就凝结起来，如同玉石一般，这就是“天竹黄”。王彦祖到雷州任知州时，正是盛夏时节去赴任接事。山中溪水都不能喝，只得破竹取水、做菜、煮饭、饮用都用竹水。第二年，王彦祖被召进京，冬天赶路，再也找不到那种竹水了，向当地人询问，才知道它到冬天便凝结起来了，不再成水。如果碰上野火烧山，树木被烧为灰烬，但“竹黄”不会成灰，像火烧过的兽骨那样，变得很轻。当地人经常在烧山后来采来做药，但这种竹黄没有生时采得的好。

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

用磁石磨针尖，那么针尖常指南，也有指北的，这恐怕是磁石的极性也不同。如夏至鹿角脱落，冬至麋角脱落。是由于鹿与麋的习性不同一样。磁针南北方向相反，按理说一定有差异，只是没有深入研究罢了。

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据《本草》：“河豚，味甘温，无毒，补虚，去湿气，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说，人遂信以为无毒，食之不疑，此甚误也。《本草》所载河豚，乃今之鱼，亦谓之“鲀鱼”，非人所嗜者，江、浙间谓之“回鱼”者是也。吴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鱼”。《本草注》引日华子云：“河豚，有毒，以芦根及橄榄等解之。肝有大毒。又为‘鱼’、‘吹肚鱼’。”此乃是侯夷鱼，或曰胡夷鱼，非《本草》所载河豚也，引以为注，大误矣；日华子称又名“鱼”，此却非也，盖差互解之耳。“规鱼”，浙东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规”。“吹肚鱼”，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胀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为栅，待群鱼大下之时，力拔去栅，使随流而下，日暮狼至，自相排蹙，或触栅则怒而腹鼓浮于水上，渔人乃接取之。

吴人喜欢吃河豚鱼，有吃了中毒的，往往造成死亡，这是特别要警惕的。根据《本草》中说：“河豚味道甘温，没有毒，补虚弱，去湿气，治疗腰腿病。”因为《本草》中有这一说法，人们就相信河豚是没有毒的，毫不怀疑地去吃，这是非常错误的。《本草》中记载的河豚，就是今天的鱼，也称为鲀鱼，并不是人们喜欢吃的那种，汪、浙一带人称为“回鱼”的就是它。吴人吃的河豚，有毒，原来叫侯夷鱼。《本草注》中引了日华子中的话说：“河豚有毒，用芦根和橄榄等药可以解毒。肝有大毒。又叫做鲀鱼，吹肚鱼。”这就是“侯夷鱼”，或叫“胡夷鱼”，不是《本草》中记载的河豚，引用这样的话作注解，是大错了。日华子说：“又称做鱼”，这也是不对的，这是把两种鱼相互混淆，造成解释上的错误。浙东人把这种鱼叫做“规鱼”，又有生在海里的，腹部长有刺，叫做海规。南方人把这种鱼通称为吹肚鱼，因为它的腹部鼓胀像吹起来的一样。南方人捕捉河豚的方法是：用栅

栏把河拦截起来，等鱼群大批游下来时，就将栅栏拔去一小部分，让鱼群随流而下，到日落时候，鱼群大量来到。河豚相互挤在一起，有的河豚鱼碰到栅栏，就气得鼓起肚皮飘浮在水面上，捕鱼的人就捉住了它们。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兰蕙是也。又名“薰”。《左传》曰：“一薰一获，十年尚犹有臭。”即此草也。唐人谓之“铃铃香”，亦谓之“铃子香”，谓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至今京师人买零陵香，须择有铃子者，铃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语，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会名之。后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经自有薰草条，又名“蕙草”，注释甚明。南方处处有，《本草》附会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零陵香，本名叫“蕙”，就是古时的兰蕙。又叫做“薰”。《左传》说：“一薰一获，十年尚犹有臭。”指的就是这种植物。唐代的人把它叫做“铃铃香”，也叫做“铃子香”，是说它的花倒挂在树枝间如同小铃子。直到今天京城人买零陵香还是要选有铃子的。铃子就是它的花。这本来是俗语，文人们以为是与湖南的零陵郡相关，于是附会称为“零陵香”。后人将它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经已经有了“薰草”一条，又称为“蕙草”，注释得十分明确。这种草南方到处有。后人牵强附会，根据零陵香这个名称，在《本草》中说它出产在零陵郡，也是不对的。

药中有用芦根及苇子、苇叶者，芦苇之类，凡有十数种多，芦、苇、葭、荻、菹、萑、蕙、华之类，皆是也。名字错乱，人莫能分。或谓芦似苇而小，而非苇也。今人云：“葭一名‘华’。”郭璞云：“似苇，是一物。”按《尔雅》云：“荻、菹、苇、芦”盖一物也，名字虽多，合之则是两种耳。今世俗只有芦与荻两名。按，《诗疏》亦将葭、荻等众名，判为二物，曰：“此物初生为英，长大为菹，成则名为萑。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故先儒释乱为荻，释葭为苇。予今详诸家所释葭、芦、苇，皆芦也，则荻、菹、萑自当是荻耳，《诗》云：“葭莩揭揭”，则葭，芦也；荻，荻也。又曰：“萑苇”，则萑，荻也；苇，芦也。连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诗释文》云：“乱江东人呼之为‘乌苩。’”今吴中乌苩草。乃荻属也。则萑为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主，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荀，味甘脆可食；茎脆，可曲如钩，作马鞭节；花嫩时紫，脆则白，如散丝；叶色重，狭长而白脊。一类小者，可为曲薄；其余唯堪供爨耳。芦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茎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叶阔大而色浅；此堪作障席筐笥织壁覆屋绞绳杂用，以其柔韧且直故也。今药中所用芦根、苇子、苇叶，以此证之，芦、苇乃是一物，皆当用芦，无用荻理。

中草药中有芦根及苇子、苇叶。芦苇之类的药，共有十几种之多，芦、苇、葭、荻、菹、萑、蕙、华等等，都是的。因为名字错乱，人们不能分辨。有的人说芦很像苇但比苇小，而不是苇。现在的人说：“葭又名‘华’。”郭璞说：“就像苇，是一样东西。”根据《尔雅》说：“荻、菹、苇、芦”大概是同属一物，名字虽多，合起来只不过两种罢了。现在世上只有芦和荻两个名称。根据《诗疏》也把葭、荻等众多名称，判定为两种东西，说：“这种东西刚长出来称为荻，长大称为萑，长成称为菹。刚长出来称为葭，长大称为芦，长成称为苇。”所以过去的学者把葭解释为萑，把荻解释为苇。”我现在把各家对葭、芦、苇的解释都仔细看过了，都是解释为芦，那么荻、菹、萑应当是

获了。《诗经》中说：“葭莩揭揭”，那么葭是芦，莩是获。又说：“葭苇”，那么葭是获，苇是芦。《诗经》中将它们连起来说，表明它们不是一种东西。另外《诗释文》说：“江东人把 叫做‘马苕’。”现在吴中乌苕草，就是属于获。那么葭 是获就很明白了。然而《召南》中有“彼茁乾葭”，把“葭”说成初生的是可以的。《秦风》中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分散在文中说起来，秋天霜降之时也可以称为葭，不一定要初生之时。如果是两者相对在文中就要分大小的名称了。获芽像竹笋一样，味道甘脆可吃，茎脆，可以像钩子那样弯曲，可以做马鞭节。花嫩时呈紫色，脆时就变白，如同散丝。叶色重，形状狭长有白色的茎脉。有一类小的，可做曲薄，其余的只能供烧火煮饭了。芦芽味道略有甜味，作菜味道特别好，茎直，花叶穗状，像狐狸尾巴，呈褐色，叶子阔大呈浅色，它能作障席筐宫织壁盖屋绞绳等多种用途，是因为它茎秆柔韧又直的缘故。现在中草药中用的芦根、苇子、苇叶，由此验证，芦、苇本是一种东西，都应当用芦，没有用获的道理。

扶移，即白杨也。《本草》有白杨，又有扶移。扶移一条，本出陈藏器《本草》。盖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杨，乃重出之。扶移亦谓之“蒲移”，《诗疏》曰：“白杨，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谓白杨只谓之蒲移。藏器又引《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又引郑注云：“棠棣，棣也，亦名‘移杨’。”此又误也。《论语》乃引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此自是白移，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乔木耳。木只有棠棣，有唐棣无棠，《尔雅》云：“棠棣，棣也。唐棣，移也。”常棣即《小雅》所谓“常棣之华，鄂不 ”者；唐棣即《论语》谓“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谓之“郁李”。《豳诗》云“六月食郁及薁”，注云：“郁，棣属，即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属。又谓之“车下李”，又谓之“唐棣移”，即郁李也。郁、薁同音，注谓之薁薁，盖其实似薁，薁即含桃也。晋《宫阁铭》曰：“华林园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车下李，即郁也、唐棣也、白移也；薁李即郁李也、薁也、常棣也，与蒲移全无交涉。《本草》续添“郁李一名车下李”，此亦误也。晋《宫阁铭》引华林园所种车下李与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误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叶似棣，黄花绿茎而无实，人家亭槛中多种之。

扶移就是白杨。《本草》中有白杨，又有扶移。扶移一条本出自陈藏器《本草》中，藏器不知道扶移就是白杨，就又列出一条。扶移也中“蒲移”，《诗疏》说：“白杨就是蒲移”，确实是。到现在越中人把白杨只称为蒲移。藏器又引《诗经》说：“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又引郑注说：“棠棣，移也，亦名‘移杨’。”这又错了。《论语》便引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这自然是白移，小树干，比郁李略大，这不是蒲移，蒲移是乔木。木只有唐棣，有唐棣没有棠，《尔雅》说：“棠棣，棣也。唐棣，移也。”常棣就是《小雅》所说的“常棣之华，鄂不 ”中的常棣，唐棣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中的唐棣，常棣现在的人称为“郁李”。《豳诗》说“六月食郁及薁”，注说：“郁，棣属，即白移也。”因为它像棣，所以说是棣属。又称它为“车下李”，又称它为“唐棣”。薁就是郁李。郁与薁同音，注释把它们称为薁薁，大概它的果实象薁，樱就是含桃。晋代《宫阁铭》说：“华林园中，有车下李314株，薁李一株。”车下李就是郁、唐棣、白移，薁李就是郁李、移、棠棣，与蒲移没有丝毫关系。《本草》增添了“郁李一名车下李”一条，这也错了。晋代《宫阁铭》引华林园所种车下李与薁本是两类东西，常棣有时写作“棠棣”，也错了。现在小树中却有棣棠，叶子像棣，黄色的花、绿色的茎而没有果实，大多种在人家的亭园栏杆之中。

杜若，即今之高良姜，后人不识，又别出高良姜条，如赤箭再出天麻条，天名精再出地菘条，灯笼草再出苦耽条，如此之类极多。或因主疗不同，盖

古人所书主疗，皆多未尽，后人用久，渐见其功，主疗浸广，诸药例皆如此，岂独杜若也。后人又取高良姜中小者为杜若，正如用天麻、芦头为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姜为杜若者。杜若，古人以为香草，北地山姜，何尝有香？高良姜花成穗，芳华可爱。上人用盐梅汁淹以为菹，南人亦谓之“山姜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图经》云：“杜若苗，似山姜；花黄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峡山、岭南北。”正是高良姜，其子乃红蔻也。骚人比之兰芷。然药品中名实错乱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说，亦莫能坚决。不患多记，以广异同。

杜若就是现在的高良姜，后人不了解这一点，又另外列出高良姜一条，如同有赤箭又另出天麻一条，有天名精又另出地菘一条，有灯笼草又另出苦耽一条，像这样的情形很多。或许因为药物主治的功效不同，一般古人记载药物的主疗，多未详尽，后人用药久了，药物功效渐显著，主疗范围才逐渐扩大。许多药物都是这样，岂只杜若一种。后来人们又把小的高良姜当作杜若，正如用天麻，芦头作为赤箭一样。另外有把北方地区的山姜当成杜若的。杜若，古人把它当作香草，北地的山姜，何曾有香？高良姜的花呈穗状，芳香美丽很可爱。当地人用盐和酸梅汁把它泡成腌菜。南方人又把它称为“山姜花”，又称为“豆蔻花”。《本草图经》上说：“杜若的苗似山姜，花呈黄红色，果实呈红色，如酸枣般大小，种子像豆蔻，出产在峡山、五岭南北。”这正是高良姜，它的种子象红蔻。诗人们把它比作“兰”、“芷”。然而药品中名称与实物错乱的非常多，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也没能得出确定的意见，我不厌其烦地记述了这么多，让大家广泛地了解各种不同或相同的说法。

钩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疗甚多。注释者多端，或云可入药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杀人。予尝到闽中，上人以野葛毒害人及自杀，或误食者，但半叶许，人口即死。以流水眼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经官司勘鞠者极多，的然如此。予尝令人完取一株观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菜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主于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言：“花似椀椀稍大”。谬说也。根皮亦赤。闽人呼为“吻莽”，亦谓之“野葛”；岭南人谓之“胡蔓”；俗谓“断肠草”，此草人间至毒之物，不入药用。恐《本草》所出，别是一物，非此钩吻也。予见《千金》、《外台》药方中时有用野葛者，特宜子细，不可取其名而误用，正如侯夷鱼与鱼同谓之“河豚”，不可不审也。

钩吻，《本草》中记载：“一名野葛。”主要疗效很多。注释的有多种说法，有的人说可入药用，有的人说有大毒，吃了就会毒死。我曾经到闽中，当地人用野葛毒害人和自杀，有的误吃了野葛的，只要叶子的一半多人口就会死。用江河溪涧的活水服药，毒性更快，药喝下去，刚放下杯子就死了。经官府推究审讯的非常多，钩吻的毒性就是这样的明显。我曾经要人完整地取来一株观看，它的草是蔓生，如同葛一样，它的藤是红色，节粗，象鹤的膝，叶呈圆形，叶端是尖的，样子象杏叶而光洁厚实，像柿子叶，三叶为一枝，像绿豆之类植物，叶生节间，都相对。花黄细。花绽开的样子。完全象茴香花，生在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说》：“花像椀椀花而略大。”是错误的说法。根皮也是红色，闽人称为“吻莽”，也称为“野葛”，岭南人把它称为“胡蔓”，俗称为“断肠草”。这种草是人间毒性最大的东西，不入药用。恐怕《本草》中所列出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是这种钩吻。我看见《千金外台》药方中，经常有用野葛的，特别要仔细，不能只取其名而误用，正像侯夷鱼与鱼同被称为“河豚”，不能不知道。

黄环，即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实如皂荚。《蜀都赋》所谓“青珠黄环”者，黄环即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种以为亭槛之饰。今人采其茎于槐干上接之，伪为矮槐。其根入药用，能吐人。

黄环，就是现在的朱藤，到处都有。叶子像槐叶，花呈穗状悬挂在枝上，呈紫色，像葛藤的花。花能当菜吃，如果煮得不熟，也有小毒。京城人家的花园、菜圃中搭大棚架种植，称作“紫藤花”的就是。果实如同皂荚。《蜀都赋》中所讲的“青珠黄环”，其中黄环就是这种紫藤的根。古今人们都把它种在亭台栏杆用来做装饰。现在人们采取它的茎嫁接在槐树的树干上，成为一种假的矮槐。紫藤的根可作药用，能使人呕吐。

栞有二种：树生，其实可作数珠者，谓之“木栞”，即《本草》“栞花”是也；丛生，可为杖捶者，谓之“牡栞”，又名“黄荆”，即《本草》“牡荆”是也。此两种之外，唐人《补本草》又有“栞荆”一条，遂与二栞相乱。“栞花”出神农正经，“牡荆”见于《前汉·郊祀志》，从来甚久，“栞荆”待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谓“栞荆”也。

栞有二种：树生，果实可以做数珠的，称为“木栞”，就是《本草》的记载的“栞花”。丛生，可以做杖捶的，称为“牡栞”，又叫“黄荆”，就是《本草》中记载的“牡荆”。这两种之外，唐代人《补本草》中另外有“栞荆”一条，就与那两种栞相混。“栞花”出自神农正经，“牡荆”见于《前汉·郊祀志》。用来已久“栞荆”有“栞荆”一条，就与那两种栞相混。“栞花”出自神农正经，“牡荆”草》，应该是另一物，不是古人所说的“栞荆”。

紫荆，陈藏器云：“树似黄荆，叶小，无桠，夏秋子熟，正圆如小珠。”大误也。紫荆与黄荆，叶丛生，小木，叶如麻叶，三桠而小。紫荆稍大，圆叶，实如梧，荚著树连冬不脱。人家园亭多种之。

紫荆，陈藏器说：“树像黄荆；叶子小，没有桠杈，夏秋时节果实成熟，如同小珠一样正圆。”这大错了。紫荆与黄荆，叶丛生，小树，叶子如同麻叶，三个桠杈都小。紫荆稍微大些，圆叶，果实如同梧，花附着在树上整个冬天不落。在人家的花园亭阁多种有它。

六朝以前医方，唯有枳实，无枳壳，故《本草》亦只有枳实。后人用积之小嫩者为枳实，大者为枳壳，主疗各有所宜，遂别出枳壳一条，以附枳实之后。然两条主疗，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实者，便是枳壳，《本草》中枳实主疗，便是枳壳主疗；后人既别出“枳壳”条，便合于“枳实”内摘出枳壳主疗，别为一条。旧条内只合留枳实主疗，后人以神农《本经》，不敢摘破，不免两条相犯，互有出入。子按，神农《本经》枳实条内称：“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安胃气，止搪泄，明目。”尽是枳壳之功，皆当摘入“枳壳”条。后来别见主疗，如通利关节，劳气，咳嗽，背膊闷倦，散瘤结，胸胁痰滞，逐水，消胀满，大肠风，止痛之类，皆附益之，只为枳壳条。旧枳实条内称：“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皆是枳实之功，宜存于本条，别有主疗，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条始分，各见所主，不至甚相乱。

六朝以前的医药书籍中，只有枳实，没有枳壳，所以《本草》也只有枳实。后人用小嫩的枳作为枳实，大的是枳壳，主要疗效各有适宜的，于是另外列出枳壳一条，附加在枳实的后面。但这两条的主要疗效，也各有所不同。古人说的枳实，便是枳壳，《本草》中枳实的主要疗效，便是枳壳的主要疗效。后人既然另列枳壳一条，就应该从枳实条中摘出枳壳的主要疗效，另成一条；而只在原来的枳实条中保留枳实的主要疗效。后人因为神农《本经》，不敢摘取和破除，不免两条相抵触，相互有出入。据我看来，神农《本经》枳实条内说：“主治在皮肤中的大风病，麻豆痒得难受，解除集结不退的寒热，止泻，长肌肉，利五脏，培补元气身轻体健，稳定胃的消化功能，止大便溏薄和腹泻，明目。”这全是枳壳的功效，都应当摘入“枳壳”条中。后来另外发现主要疗效，如通利关节，劳气，咳嗽，背膊闷倦，消散肿块，胸胁痰浊阻滞，消除水肿，消除胀和闷的症状，大便带血，止痛等等，都增益在枳壳那一条。旧枳实条内说：“消除胸胁痰块，驱逐停水，破结实，消除胀和闷的症状和心下急痞痛，气喘或呕吐。”都是枳实的主要功效，应该存于本条，另外有主要疗效，也附加上去就行了。像这样，两条就有区分，各见它们的主要疗效，不至于相互混乱。

续笔谈十一篇

鲁肃简公劲不正，不徇爱憎，出于天性。素与曹襄悼不协，天圣中，因议茶法，曹力挤肃简，因得罪去。赖上察其情，寝前命止从罚俸。独三司使李谿夺职，谪洪州。及肃简病，有人密报肃简，但云“今日有佳事。”鲁闻之，顾婿张且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试往侦之，果襄悼滴随州。肃简曰：“得上殿乎？”张曰：“已差人押出门矣。”鲁大惊曰：“诸公误也！利用何罪至此？进退大臣，岂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枢密院，尽忠于朝廷，但素不学问，倔强不识好恶耳，此外无大过也。”嗟惋久之，这觉气塞，急召医视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动其气。脉已绝，不可复治。”是夕，肃简薨。李谿在洪州闻肃简薨，有诗曰：“空令抱恨归黄壤，不见崇山滴去时。”盖未知鲁简临终之言也。

鲁肃简公正刚直，不凭个人爱憎是出于天性。他与曹襄悼向来不和。天圣年间，因讨论茶法，曹襄悼努力排挤肃简，肃简因而得罪免职，所幸皇上了解实情，在卧室前命停止只扣罚薪俸，只有三司使李谿被夺职，贬谪到洪州。到肃简生病，有人悄悄报告肃简，只说“今天有好事”。鲁肃简听了，看着女婿张温之说：“这肯定是曹利用被免职。”试着前去探听，果然是襄悼贬谪随州。肃简说：“应该上殿吗？”张且之回答：“已被人押出门了。”鲁肃简十分惊异他说：“各位先生错了！利用有什么罪要到这样的地步？处分大臣，怎么可以这样快！利用在枢密院，对朝廷竭尽忠诚，只是素来不学习和询问，性格倔强不分好坏罢了，除此之外并没有大的过错。”叹息惋惜了很久，突然觉得气塞，急忙请医生看视，医生说：“这肯定是有很不如意的事动了气。脉气已断，不能再医治。”这晚，肃简死了。李谿在洪州，听说肃简死了，写诗说：“空令抱怀恨归黄壤，不见崇山谪去时。”大概李谿不知道肃简临死前说的话。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太祖皇帝曾问赵普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大？”在赵普仔细思考没有回答时，太祖又问了一遍，赵普回答说：“道理最大。”皇上不断他说回答得好。

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句。近世注杜甫诗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系绳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尝有近侍奉使过夔峡，见居人相率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众操兵仗，群噪而祭，谓之“养鬼”，言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每岁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谓“养乌鬼”者。

杜甫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的诗句，近年来注杜甫诗引用《夔州图经》说：“峡中人把鸬鹚称为‘乌鬼’。”左在水边的蜀人都养鸬鹚，用绳子系住它们的脖子，让它们去捕鱼，捕得鱼后就将其倒提着让它吐出鱼来，到现在仍是这样。另外曾有近侍奉使过夔峡，看见当地人一个接一个百十人成为一群，把祭祀用的牛羊和酒摆设于田间，众人手拿兵甲器仗，大家叫嚷着拜祭，称为“养鬼”，说乌蛮战场多与人为鬼，每年用这种祭祀的方法消除灾害。我又疑心这就是所谓“养乌鬼”。

寇忠愍拜相白麻，杨大年之词，其问四句曰：“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

我胸中事。”例外别赠白金百两。

寇忠愍用白麻纸起草封相诏书，杨大年的评价中有四句说：“能决定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的宏器，不露锋芒；心怀光明而宽广能容。”寇忠愍听了很高兴他说：“正懂我胸中事。”例外另赠白金百两。

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作“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非佳作。

陶渊明《杂诗》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去校定《文选》，改成“悠然望南山”，似乎不太恰当。假如是“望南山”，那么上下句的意思完全不相连，就不是佳作了。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节美才。年二十余，忽梦为诗，其两句曰：“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虽佳句，有丘墓间意。不数月卒。高邮士人朱适，予舅氏之婿也。纳妇之夕，梦为诗两句曰：“烧残红烛客未起，歌断一声尘绕梁。”不逾月而卒。皆不祥之梦，然诗句清丽，皆为人所传。

侍郎狄棐的儿子狄遵度，有清节美才。20多岁，忽然梦见做诗，有两句说：“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句子虽好，但很不吉利，有坟墓间的意思。他没有几个月就死了。高邮士人朱适，是我的舅家的女婿。娶妻的晚上，梦做诗两句说：“烧残红烛客未起，歌断一声尘绕梁。”不到一个月也死了。这都是不祥的梦，但诗句非常清丽，都被后人传诵。

成都府知录，虽京官，例皆庭参。苏明允常言：“张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为京寺丞，知录事参军，有司责其庭趋，生坚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献一诗辞忠定，其间两句曰：‘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忠定大称赏，自降阶执生手曰：‘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罪人也。’遂与之升阶置酒，欢语终日，还其牒，礼为上客”。

成都府知录，虽是京官，照例都要当庭参谒。苏洵常说：“张忠定任成都知府时，有一个人，忘了他的姓名，做京寺丞，任录事参军，有关官员责令他当庭趋拜，这人态度坚定不同意。忠定生气地说：‘只有辞职就可免礼。’这人于是上书请求免官，把请求的文书放在袖中，又献一首诗辞别忠定，其中有两句诗说：‘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忠定非常赞赏，亲自下台阶握着这人的手说：“部内有这样有才能的诗人却不知道，我是罪人。”于是和这人走上台阶并备置好酒，在一起欢语终日，归还这人的文书，礼待为上宾。”

王元之知黄州日，有两虎入郡城夜斗，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鸡夜鸣。司天占之曰：“长吏灾。”时元之已病，未几，移刺蕲州，到任谢上表两联曰：“宣室鬼神之间，绝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付之身后。”上闻之愕然，顾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为此语？”不逾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遗表曰：“岂知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

王禹偁任黄州知州时，有两只虎进郡城夜斗，一只虎死了，被吃了一半。另外许多鸡夜晚鸣叫。

司天占卜说：“长吏灾。”当时王禹偁已生病，不久，调任新州刺史，到任后呈上两联谢表说：“宣室鬼神之间，绝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付之身后。”皇上听了很吃惊，看着周围侍臣说：“禹偁身体好不好？怎么写这样的话？”不到一个月，王禹偁果然死了，年 48 岁，遗表说：“岂知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

元祐六年，高丽使人入贡。上元节，于阙前赐酒，皆赋观灯诗，时有佳句。进奉副使魏继延句有“干侧彩山擎日起，一声天乐漏云来。”主簿朴景绰句有“胜事年年传习久，盛观今属远方宾。”

元祐六年，高丽派人进贡。元宵节，在宫殿前赐酒，都朗诵观灯诗，有时出现佳句。进奉副使魏继延有佳句“千仞彩山擎日起，一声天乐漏云来”。主簿朴景绰有佳句“胜事年年传习久，盛观今属远方宾”。

欧阳文忠有《奉使回寄刘元甫诗》云：“老我倦鞍马，谁能事吟嘲？”王荆公《赠弟和甫诗》云：“老我衔主恩，结草以为期。”言“老我”，则语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著作“我老”，与“老我”虽同，而语无情，诗意遂颓情。此文章佳语，独可心喻。

欧阳修有《奉使回寄刘元甫诗》说：“老我倦鞍马，谁能事吟嘲？”王安石有《赠弟和甫诗》说：“老我衔主恩，结草以为期。”说“老我”，便话中有情，上下句都有惜老之意。如果作“我老”，与“老我”意虽同，但话中无情，诗意就颓情。这诗文佳句，只可意会。

韩退之诗句有“断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万事无过酒”。王荆公戏改此两句为“一字题”四句曰：“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损一字，而意韵如自为之。

韩愈有诗句“断送一生唯有酒”，又说“破除万事无过酒”。王安石把这两句戏改为“一字题”四句，说：“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减一个字，而诗的意思韵味如同全是自己写的。

